



*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伊拉斯谟传

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

Johan Huizinga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 著
何道宽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ΗΡΑΚΛΕΙΟΥ
ΤΟΝΟΙ



本书介绍了15、16世纪之交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的传奇一生以及代表作品。本书犹如一面镜子，我们借以审视传主的生平和成就，同时又观照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荷兰和欧洲。这一面镜子既反映了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又折射了传主心静如水的隐士情怀；既透视了伊拉斯谟的历史深度，又折射了赫伊津哈的批判精神。



上海贝贝特

推荐上架类别：历史类 传记类

ISBN 978-7-5633-7629-2



9 787563 376292 >

定价：29.50元

*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伊拉斯谟传

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

Johan Huizinga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 著
何道宽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Publica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

Copyright © 1924 by Johan Huizing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5-19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荷)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7-5633-7629-2

I. 伊… II. ①赫…②何… III. 伊拉斯谟, E. (1466 ~ 1536) —传记 IV. B503. 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320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9.5 字数:230千字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中译者序

一、一本非同寻常的书

这是一本厚重的书。作者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1872—1945) 是荷兰历史学家, 英译者乔治·诺曼·克拉克是英国历史学家, 传主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约翰·赫伊津哈是欧洲文化史权威, 他的主要代表作已经有中文译本。我与他间接相知二十来年, 在阅读、翻译和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过程中了解到他的《游戏的人》; 两年来又直接和他对话, 先翻译了他的《游戏的人》(花城出版社, 2007), 接着又翻译了他的《中世纪的秋天》和《伊拉斯谟传》, 由此结识了两位荷兰大师, 通过他们了解了荷兰文化, 通过他们进一步去学习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传统。

乔治·诺曼·克拉克是英国历史学家, 以学术成就封爵, 著作等身, 代表作有《英国简史》、《剑桥近代史》、《17世纪史》、《近代早期欧洲史》、《17世纪的战争与社会》、《都铎王朝后期》、《牛顿时代的科学与社会福利》等。

作者赫伊津哈和传主伊拉斯谟相隔四百年, 但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赫伊津哈之所以要为伊拉斯谟树碑立传, 不仅是想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学问, 而且是想学习他宽容的态度和反战的立场。伊拉斯谟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 赫伊津哈对两次世界大战也持坚定的反对态度, 1922年成书的

《伊拉斯谟传》就透露了他的反战立场。

赫伊津哈擅长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代表作有《中世纪的秋天》、《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明天即将来临》、《文明复活的必要条件》、《愤怒的世界》、《17世纪的荷兰文明》、《文化史的任务》、《历史的魅力》、《痛苦的世界》等。

伊拉斯谟是欧洲北方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终身用拉丁文写作，翻译和校订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圣经》，创作了大量的人文著作，把人文主义思想传遍欧洲，对当代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代表作有《新约圣经》（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版）、《圣哲罗姆文集》（9卷）、《愚人颂》、《格言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基督徒士兵须知》、《论自由意志》、《箴言集》、《对话集》等。

《伊拉斯谟传》是一面镜子，我们借以审视传主的生平和成就，同时又观照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荷兰和欧洲。这一面镜子既反映了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又折射了传主心静如水的隐士情怀；既透视了伊拉斯谟的历史深度，又折射了赫伊津哈的批判精神。

在中世纪文化的评价、古典学问的追求、印欧语文的掌握、温文尔雅的人性、色彩斑斓的学问、好学深思的精神、乱世之中的平和、抨击暴政和战争的立场上，作者和传主是那么相近相通。

《伊拉斯谟传》共21章，再加伊拉斯谟书信22封，有几个突出的重点：第五章《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第六章《渴望神学》，第九章《愚人颂》，第十一章《神学之光》，第十二、十三章《伊拉斯谟的思想》，第十四章《伊拉斯谟的性格》，第十六章《宗教改革》，第十八章《与路德论战》和第二十一章《结语》。

第五章的重点之一是介绍他初期的重要作品《格言集》，这是古代经典名句集萃，加上他自己的理解、评注与发挥，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伊拉斯谟迅速成为欧洲北方人文主义者的典范。

第六章的亮点之一是他早期的作品《基督徒士兵须知》，体现了他以

道德和审美为主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第九章介绍《愚人颂》，这是他最主要、影响最深远、普及程度最高的作品，在辛辣的嬉笑怒骂之中传递出各种不同的信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可以从哲学、宗教、社会、政治各方面去进行解读。书中主人公“愚夫人”就是伊拉斯谟的化身，她大智若愚的思想符合古今中外圣贤的思想。无论读者取何态度，他都可以在轻松的笑声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第十一章讴歌伊拉斯谟在净化神学上的伟大成就，凭借他那部双语版的《新约圣经》等神学著作，伊拉斯谟成为罗马教廷、欧洲神学界、宗教界、学术界、天主教和新教共同顶礼膜拜的“世界之光”。

赫伊津哈用第十二、十三两章的篇幅介绍伊拉斯谟的思想，其中的重点有：伦理和审美倾向，语文学和道德倾向，基督教和古典文化互相发明的思想，既非哲学亦非史学的头脑，回归古典纯净的源头，《圣经》里的人文主义，自由、澄明、纯净、质朴的真理，唯实论和不可知论倾向。

第十四章剖析伊拉斯谟身心矛盾、思想悖论的根源，从非婚生子、身体孱弱、经院禁锢、回归希腊罗马典籍和基督教典籍的主张等方面加以介绍和剖析。

第十六章和第十八章应该是本书的重中之重，本书的英文题名是“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伊拉斯谟为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主张从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反对新教用暴力和革命反对教廷，坚定不移地走中间道路；天主教和新教都拉拢他、借重他、利用他，但他最珍惜的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反对依附、反对站队；他对宗教改革时期的激烈论战和对抗冲突抱超脱的态度，作壁上观，所以罗马教廷和新教领袖既不满意他洁身自好、退守书斋的态度，又拿他无可奈何。

最后一章的重点是：伊拉斯谟与16世纪的精神既相契又相悖，他那彻底的理想主义和温和的头脑，使他无意之间担当起了百年启蒙者的角色，他对新教和天主教双方的改革都产生了影响。

本书选录的 22 封信多角度展示了伊拉斯谟的心灵世界和思想世界。

赫伊津哈这部《伊拉斯谟传》介绍的伊拉斯谟著作数以十计,按照出版年代择其要者有:《反蒙昧主义》、《常用通俗语手册》、《格言集》、《箴言集》、《丰富多样的语言》、《书信指南》、《对话集》、《基督徒士兵须知》、《基督教君主的教育》、《阿尔卑斯颂歌》、《愚人颂》、《修道院长和文人的对话》、《婚姻赞》、《和平之控诉》、《论忏悔之道》、《论戒荤食》、《君王的婚姻教育》、《基督教寡妇的道德》、《论教会的和谐》、《论自由意志》、《关于对土耳其人宣战》、《论儿童的成长与文理教育》、《驳路德所谓意志的不自由》、《新约圣经》(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版)、《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论基督教寡妇》、《论布道艺术》、《奥利金文集》、《未经战乱者的无知》、《论西塞罗的语言》、《论基督教会的纯洁》。这些作品显示他视野之广阔。

二、伊拉斯谟的学术成就

就笔者所知,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为伊拉斯谟立传,这个人叫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书名为《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赫伊津哈和茨威格所做的两种传记都用尽了一切赞美之词,肯定了伊拉斯谟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这些赞誉既有作者两人的褒扬,也有伊拉斯谟同时代思想领袖的歌颂:“唯一的权威”、“思想之王”、“世界之光”、“世界明灯”、“时代启蒙者”、“时代的大脑、心脏和良心”、“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铺路人”、“北欧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现代精神的先驱”,等等。

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的出版商为了争夺他的著作而不惜互挖墙角、背信弃义,神学家和大学教授以结识伊拉斯谟为荣,有人甚至吹嘘自己非伊拉斯谟的书不读、非伊拉斯谟的书不教。教皇、君主、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无不以得到他的赠书为荣。各阶层的人争相与他通信,争相传

阅甚至半途拦截他的书信,以得到他的回信而感到无上光荣;到了他的晚年,出版社每年至少为他出一本书信集,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他的《格言集》、《对话集》、《愚人颂》、《基督徒士兵须知》刊印发行几十版。在那个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多少出版商盗印他的书啊!在那个没有版税、稿费少得可怜的时代,四十岁以后能够用稿费养活自己的人,那真是凤毛麟角。

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伊拉斯谟“对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贡献恐怕要超过其他人贡献的总和”。“在所有人文主义者中,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恐怕只剩下伊拉斯谟的名字了。”

三、伊拉斯谟的历史地位

“尽管伊拉斯谟登场的时候,早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亮相一百多年,但对他那个时代而言,他的思想还是崭新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是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梦寐以求的理想……可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要等到伊拉斯谟来完成。”(英文版第103页,以下引文均为英文版页码。——中译者注)

伊拉斯谟有一段写实的文字颇能说明他受人尊敬和拥戴的程度:“然而无论我身居何处,我都受到最值得赞誉者、最受人赞誉者的赞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也好,英格兰、苏格兰也好,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召唤我去分享他们的殷勤好客之道。即使我并非受到一切人的喜爱,无论如何,我的确在最高贵的地方受到人家的喜爱。罗马没有一位红衣主教不把我当作兄弟……主教、大执事和博学多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第215页)

他在生命行将结束之前说的一句话表明他受欢迎的程度:“每天都有许多人对我表示感谢,因为我的书激发了他们的兴趣,无论他们的长处是什么,他们的热情都投向了向善的人性和神圣的文学。那些人从未见过伊拉斯谟,然而由于读了他的书,他们了解并喜欢伊拉斯谟。”(第191页)

本书作者和伊拉斯谟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散见于各章。我们仅以第二十一章和《伊拉斯谟书信选》的几条摘要为例，借以管窥蠡测。

在《伊拉斯谟书信选》的导语里，赫伊津哈对伊拉斯谟做了这样的总体评价：“他操劳过度、病痛缠身，总是疲于奔命地应付数不尽的写作计划。许多信的结尾总是有‘匆草’、‘无暇读以上的文字’之类的附笔。终其一生，伊拉斯谟总是顽强地死守中间路线。在宗教问题上，他既反对旧传统的腐败和僵化，又反对新变革里那不妥协的暴力。在治学问题上，他既反对新的异端，又在虔诚的借口之下拒绝使用批判的方法去研究古典文本。”（第197页）

赫伊津哈认为，伊拉斯谟“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一条宽阔的文化溪流从他那里流淌出来，不舍昼夜”。（第190页）

赫伊津哈又断言，伊拉斯谟是现代精神的先驱。“他的思想在16世纪和17世纪形成了一股潜流；到了18世纪，他释放的讯息开花结果了。在这个方面，他无疑是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铺路人，他为卢梭、赫尔德、裴斯泰洛齐以及英国和美国思想家奠定了基础。”（第192页）

四、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

1517年10月31日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神父马丁·路德在教堂外面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并抨击罗马教廷的积弊和赎罪券，后世称之为《九十五条论纲》。几年之内，教会分裂，教徒对抗，宗教改革开始了。保守的天主教徒和主张改革的“抗议宗”（新教）分庭抗礼，“抗议宗”内部激进和温和的派别也纷争不息。

俗谚云：“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保守的天主教徒指责伊拉斯谟支持和纵容激进的路德，甚至怀疑他是路德的捉刀人。以路德为代表的改革派竭尽全力拉拢他，企图以他为旗帜。伊拉斯谟陷入了极其痛苦的境地。他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以净化错讹众多的《新约圣经》、净化神

学、净化教会为己任,希望以自己的精神产品为教廷服务,为教会献身,为太平盛世摇旗呐喊。和平是他的追求,对抗使他痛苦不堪。

路德的“大字报”犹如晴天霹雳。他精神痛苦,身份尴尬,美梦幻灭。

他反对拘泥于形式主义,但他不盲目反对行礼仪、做祷告、守斋戒、望弥撒,更坚决反对颠覆教廷、颠覆传统。

伊拉斯谟是诗人气质和理想主义的神学家,以纯洁基督教神学为己任,主张回归基督教元典,对《圣经》进行勘误、校订、解释,用异教的经典比照研究《圣经》。他校正了通俗拉丁语《圣经》的错误,校订了前人出版的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版的《新约圣经》,使《圣经》得以“净化”。他认为,凡是真善美的东西都符合基督教的精神。他推动了神学和哲学,但又未能进入正统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殿堂,因为他毕竟是诗人和散文家。

在神学问题上,他的身份很尴尬。他用大量辛辣的著作批判传统教会的弊端,所以他的部分著作在他身后被罗马教廷列入“禁书目录”。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传统教会内部进行修补,反对路德发动的教会“革命”。他主张节制、温和、宽容、和平,坚决反对暴力和战争,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

他坚定地走中间路线,既批判传统教会的腐败,又反对新教的暴力和过火行为。以路德为代表的改革家和以教皇为代表的保守派都争夺他的支持。改革派想让他当“旗手”,教廷想让他当“侍从”,而他都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他珍惜身心自由和独立人格。他是真正的隐士、书斋型的学者和诗人。1517年路德“揭竿而起”之后多次和他辩论,试图让他放弃中间道路。1535年,他已经病入膏肓,教皇还以红衣主教的职位拉拢他,希望他疏远改革派。

终其一生,他紧守中间立场,毫不动摇。有人说得好:激进的路德和加尔文、温和的茨温利、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都吸引了大批教徒,但伊拉斯谟却吸引了大多数的基督教徒。

伊拉斯谟高度珍惜和谐、和平与和善，但他很难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这些价值。他感到理想幻灭。在短暂的政治乐观主义之后，他不再说起黄金时代，而是用沉痛的话说起罪孽深重的时代、最不幸的时代、最难以想象的堕落的时代。（第 152 页）

五、丰厚的遗产

伊拉斯谟达到了其他人文主义者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欧洲北方的“圣人”、“明灯”、“巨星”。他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居无定所，四海为家，逐学术和出版而居，以结识各国一流学者为荣。他是旗帜鲜明的和平主义者，《和平之控诉》、《论教会的和谐》、《未经战乱者的无知》表明他反对战乱，《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讽刺好战的教皇。

他清理和净化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他大智若愚的思想、他的教育主张、他的博学机智和幽默都成为后世宝贵的遗产，难怪我们 21 世纪的中国人还要学习他。

伊拉斯谟享年七十岁，但他个子瘦小、终生病弱、痛苦不堪，四十岁就自称老态龙钟，并随时准备了却余生，能够活到七十岁实在是一个奇迹，能够成为宗教界和学术界的明灯更是奇迹。

奇迹当然要靠奇才。他的传世之作《愚人颂》和《基督徒士兵须知》都是几天之内一气呵成的，他的《阿尔卑斯颂歌》是在翻越阿尔卑斯的马背上吟诵而成的，这就是天才。

他少年时代在修道院里就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拉丁文诗歌，这就是天才。

他的诗风清丽、晓畅、平易。“我的诗作里没有风暴，没有山洪冲决河岸，没有任何夸张的豪言壮语；语言极为俭省。我的诗作紧守疆界，而不是超越疆界，我宁可拥抱海滩，而不去劈波斩浪。”（第 105 页）

他二十九岁初闯巴黎就名震欧洲，这不能不说是天才。

他三十五岁开始学习希腊语,在三年之内就掌握了希腊语,并能够翻译和校正希腊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和《新约圣经》。须知,他的学习是在繁忙的读书写书之余,几乎是靠无师自通的自学。这不能不说是天才。

然而天才离不开勤奋。他几十年如一日、夜以继日、夙兴夜寐、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即使在舟车劳顿的旅途、在震耳欲聋的印刷厂、在病入膏肓的晚年,他都能够气定神闲地创作。

他写作时总是满怀激情。在巴塞尔的弗洛本出版社工作时,他仿佛是在“磨房里推磨”,写作、校订、督察、印制了几本书,“八个月内就完成了六年的工作”。

他的文字清晰、流畅,他的活泼、风趣、想象、兴味和幽默使他的文字富有魅力;他的一切作品对同时代人都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直到今天,一旦开卷读他的著作,我们也会沦为他的俘虏。他的全部才能使他成为文艺复兴精神的完美代表。首先是他形之于外的论述。他的文字绝不模糊、晦涩——总是容易理解的。一切如行云流水,如一股清泉。其调子、修辞特征和语气听上去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第113页)

《格言集》收录数以千计的希腊和拉丁格言警句、历史名句,再加上他调侃戏谑的评说。这些名句互相参照,使读者能够学习写作。

在《丰富多样的语言》里,多种表达的妙语扑面而来。以“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我想快要下雨了”为例,他为每句话列举了50种不同的句式。(第115页)

《愚人颂》也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水准,既不失轻松的喜剧幽默,也不曾落入露骨的粗俗窠臼。只有能够在诡辩术的钢丝上名副其实地翩翩起舞的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艺术水晶。在《愚人颂》里,伊拉斯谟自始至终在深刻真理的边缘上翱翔。虽然《愚人颂》是献给那个时代的作品,但它能够以轻松活泼的调子驾驭如此浩繁的内容,所以它仍然使今天的我们受用无穷。我们应该记住:《愚人颂》是名副其实的嬉笑怒骂之作,但它的笑声值得玩味、发自内心。(第75—76页)

伊拉斯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是一笔丰厚的遗产。青壮年时代,为了谋生而聚徒授业的时候,他就编订了不少拉丁文读本和写作教材,比如《常用通俗语手册》、《丰富多样的语言》、《书信指南》、《论学习方法》。此外,他的传世名著《格言集》、《对话集》和《寓言集》也发挥着教谕的功能。再者,他还写了一些教育专论,比如《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君王的婚姻教育》、《论男孩的礼貌教育》、《论童蒙的自由教育》、《论儿童的成长与文理教育》等。

他的翻译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他记述翻译欧里庇得斯悲剧的体会说,那“真是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啊,凡是进入这种翻译领域的人都会感觉到个中甘苦”。(第 205 页)

他主张译家博学、严谨:“因为把地道的希腊语翻译成地道的拉丁文需要译者具有非凡的艺术家才能,他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而且要有驾驭两种语言、玩赏语词于指尖的才干,况且他还必须具有极其机敏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译事之难到几百年间无一人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以诗译诗,而且原诗又如此多变和陌生,译事之艰辛就不难想象了。欧里庇得斯不仅时间上离我们久远,写的又是悲剧,而且他的剧作文字洗练、结构紧凑、不尚虚饰,不多一词一符;所以即使改动或省略一词一符,那也是一种罪过。”(第 205 页)

他主张忠实于原文,不同意意译:“一方面,我不赞同西塞罗容许并实践的意译(我几乎要非常不客气地说不赞成);另一方面,作为经验不足的译者,我宁可犯过分小心的错误而不是过分自由地翻译。我宁愿在沙滩徘徊踟蹰,也不愿意沉船在大浪中挣扎。我宁可让学界抱怨译文没有文采、没有诗意美,也不愿意缺乏对原文的忠实。最后需要表明心志的一点是……如果我履行翻译职责时宁可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质朴和优雅,而不是用我不熟悉的夸大其词,他们就不应该抱怨我,因为我从来不会钦佩那种夸大其词的风格。”(第 206 页)

伊拉斯谟离开我们将近五百年了。他的作品全部用典范而优美的拉

丁文写就,我们读不懂,他的时代离我们更远,但他的精神、道德、人格和学术追求却是跨越时代、地域和民族文化的,是永恒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圣洁的人文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何道宽

2007年9月19日

◎ 英译者序

vii 二十多年前,在一个阴晴交错的春天早晨,本书作者约翰·赫伊津哈造访牛津,我给他担任向导。这不是他初到牛津,他熟悉主要的建筑,所以我们去看不那么著名的建筑。我心里想,虽然他是世界知名作家,我们陪同他游览的两三个小时也许和我陪同其他客人游览的感受差不多吧。然而,这一天的游历却让我终身难忘。他熟悉这些古建筑的功能,熟悉缔造者和建筑师的意图。不过,既然他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涉及大学和学术的历史,他熟悉这些古建筑原本就在你的期待之中。真正使我惊喜交加的是他那独具只眼的洞察力。他告诉我,四会塔(Tower of the Four Orders)上的哪些装饰图案是常见的,哪些是不常见的。他指着万灵学院(All Souls)的霍克斯穆尔(Hawksmoor)双塔,点评其优点,一般人很难具有这样的鉴赏能力。我对他的绘画才能早有耳闻,在和他边走边谈的过程中,我深受他坚强而沉静人格的感染,他那艺术家敏锐的感知力和寻求真理的决心融为一体了。

赫伊津哈大器晚成,四十岁出头才一举成功,闻名遐迩。他的创造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与其说是来得缓慢,不如说是在静悄悄的酝酿之中。他的友人知道,他的才能得天独厚,不过友人和他本人都无法预见他的研究会走向何方。1872年,他出生在格罗宁根省,这是荷兰最北边的主要城市。他在家乡一直读到大学,研习的范围包括荷兰历史和文学、东方语言、神话和社会学。他擅长语言学,稳步积累了高深的学问。不过,他既不是早慧的神童,也不是无所不知的学者。理科和时事难以吸引他的兴趣。在他大器晚成之前,能够满足他的似乎是幻想,而不是研究。三十

viii

岁之前,他在哈雷姆教历史,至于最终是献身于欧洲研究或东方研究,他实在是举棋不定。在脱离中学教学之前的两三年里,他已经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兼职教梵文。但以后进入他家乡的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几乎是偶然的机遇。终其一生,他有一个有别于常人的特点:经过一段创造期、写完一本书之后,他总是要搁下曾经吸引他的课题,转向另一个课题,用一段时间沉潜下去研究新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辑录到赫伊津哈的八卷本全集(第九集正在编纂)里的专著和文章,涵盖面非常广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常常回头研究以前匆匆而过的历史的各个方面,所以他洞悉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生活。有人说他既不是学究,也不是教条,这样的评论恰如其分。在格罗宁根大学执教的十年里,他确定了终生的研究方向。他的婚姻美满,孩子纷纷降临,脑子里的许多要素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他敏于优雅的文风,典雅的文采和严谨的学问彼此协调、相得益彰。他植根于荷兰民族环境和学术环境的传统之中;正如荷兰人民的历史探险和荷兰大学传统的历史探险一样,他的好奇心并不受制于时间、空间或偏见的局限。他的研究方向越来越明确,他研究的核心课题是文明;他发现,文明是人类已然实现的理想,人们创造的文明具有无穷多样的形式,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

赫伊津哈内心的成就感使他进入最佳状态,然而与此同时,他周围的世界却面目全非了。1914年,荷兰在大战里中立,可它周围的所有国家都在交战。同年,他的妻子去世,丧妻之后的第二年,他被聘为莱顿大学教授,执教通史,他终身在这个岗位上执教。大战结束之后,他的大部头史学著作《中世纪的秋天》问世,他在历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地位得以确立,该书的英文译名是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主题是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与思想の様式。世世代代以来,英格兰人把中世纪理想化了,所以他们并不觉得《中世纪的秋天》里的一些主要思想很新奇。相反,荷兰人却觉得这些思想新奇,因为许多荷兰人把文艺复兴当作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纪的开端,而且很多荷兰人认为,宗教改革开启了一个更

加美好的新世纪。由于英美两国卷进了大战的漩涡,所以《中世纪的秋天》使人回想到理性的标准,痛感有必要回归理性。赫伊津哈这本书作为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将长期享有重要的地位。

赫伊津哈这本《伊拉斯谟传》比《中世纪的秋天》篇幅略短,是其姊妹篇。《伊拉斯谟传》初版于1924年,也是他创作最佳时期的作品。传主是一代人中的核心思想人物,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是中世纪刚刚结束的时代,赫伊津哈把这个时代称为中世纪衰落的时代。从《伊拉斯谟传》的许多篇幅来看,作者对传主抱有特殊的同情态度。他在伊拉斯谟身上花的笔墨也可以用来描写他自己,至少可以用来作为他对传主那个时代变革的回应。

这篇序文未必适合我们详细分析赫伊津哈对那个时代进行拷问和诠释时所做的回应,也不适合对他的成就做精心的总体评价,我们只能够简单介绍他晚年的生活与工作。他被公认为荷兰的思想领袖之一,1937年的第二次婚姻使他重享天伦之乐。然而,西方世界彤云密布。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露头之日起,赫伊津哈就以简单明快、气定神闲的态度坚决反对。德国人入侵荷兰以后,他对一些同事说:“我们要保卫莱顿大学,保卫荷兰科学和学术的自由。那一时刻很快就要到来,当它到来时,我们要为此而贡献一切力量,包括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自由,甚至是我们的生命。”德国人关闭了莱顿大学,把赫伊津哈劫为人质,此时的赫伊津哈老态龙钟,身体虚弱。接着,德国人又把他放逐到荷兰东部一个偏远的教区软禁起来。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仍然坚持写作,而且保持了他优美的文笔。战争结束之前的冬天,解放大军已经逼近荷兰,他和战区的其他贫民一样忍受着黎明前的艰难困苦,但他的精神是坚不可摧的。1945年2月1日,他溘然长逝,离荷兰解放只剩下几个星期。

G. N. 克拉克

1952年4月

目 录

CONTENTS

i 中译者序

xii 英译者序

1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 1466—1488

10 第二章 修道院读经 1488—1495

21 第三章 巴黎大学求学 1495—1499

30 第四章 初访英格兰 1499—1500

40 第五章 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

48 第六章 渴望神学 1501

56 第七章 艰难岁月：在卢万，巴黎，英格兰 1502—1506

63 第八章 在意大利 1506—1509

70 第九章 《愚人颂》

81 第十章 三访英格兰 1509—1514

89 第十一章 神学之光 1514—1516

103	第十二章	伊拉斯谟的思想
113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的思想(续)
122	第十四章	伊拉斯谟的性格
134	第十五章	在卢万 1517—1518
142	第十六章	宗教改革的初期岁月
153	第十七章	在巴塞尔 1521—1529
163	第十八章	与路德论战,走向保守 1524—1526
172	第十九章	与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的舌战 1528—1529
182	第二十章	晚年
191	第二十一章	结语
199		伊拉斯谟书信选
268		人名索引
279		中译者后记
281		中译者简介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

→1466—1488

15 世纪的低地国家——勃艮第的强权——与日尔曼帝国和法兰西的关系——名副其实的荷兰北部郊野——“近代虔敬”运动：共同生活兄弟会和温德舍姆修道院——伊拉斯谟的出生：1466——他的亲属和名字——在高达、德文特和波伊-勒-达克上学——成为教士：大概在 1488 年

伊拉斯谟降生时，荷兰在勃艮第公爵治下已经有二十年之久。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历代的勃艮第公爵把许多领地纳入麾下，其中一半是法语区，含勃艮第、阿尔特瓦、艾诺特、纳穆尔，另一半是荷兰语区，含佛兰德斯、布拉邦、西兰、荷兰。当时的“荷兰”仅限于今天的北荷兰、南荷兰与西兰三个省的范围。其余的几省和当时的“荷兰”共同组成今天的荷兰王国。历代的勃艮第公爵垂涎其余的几个省，但它们始终未被纳入勃艮第的统治范围。乌特勒支主教辖区已经扩展到艾瑟尔河的尽头，勃艮第的影响已经到达这个区域。对弗里斯兰的征服是荷兰伯爵通过继承实现的，荷兰伯爵比勃艮第人抢先一步。格尔德公爵领地是唯一保持独立、未受侵犯的领地，它和毗邻的德意志地区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密切。

此时，以上领地统称为“滨海低地”；在许多方面，它们还带有郊野的

- 2 性质。数百年来，德意志帝国的权威仅仅存在于“滨海低地”人们的想象中。德意志人的民族融合已经如黎明破晓，荷兰和西兰这两块领地却没有德意志民族意识。长期以来，他们在政治问题上放眼法兰西。自1299年起，统治荷兰的是操法语的阿诺特王朝。14世纪中叶，巴伐利亚王室取代了阿诺特王朝的统治，然而荷兰并未因此而恢复与德意志帝国的密切关系，它反而被高卢化了，因为巴黎对它更有吸引力。不久，荷兰就处在勃艮第的钳制之下，它和勃艮第的关系因双重的联姻而加强了。

“低地国家”北部的“郊野”性质还表现在基督教事务和文化事务中。它们被纳入基督教的时间相当晚(9世纪末)，属于乌特勒支主教区。在这里，基督教组织的网眼比较疏松，没有一所大学。1425年，在勃艮第公爵政策的指导之下，卢万大学创办起来，即使这样，在北方“低地国家”人们的心目中，巴黎仍然是教义和科学的中心。佛兰德斯和西兰成了勃艮第繁华的中心，这两个富裕城区的人认为，荷兰和西兰是船民和农夫的困厄之地。勃艮第公爵试图给骑士精神注入新的辉煌，但这样的精神在荷兰贵族的生活里不太风光。荷兰人没有丰富的宫廷文学，它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值一提，相反，佛兰德斯人和布拉邦人却热情地追随法兰西文学。

凡是荷兰出现的事物均昙花一现，不为人注意；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不能吸引基督教世界的注意力。这里的文化是活跃的航海和贸易文化，且多半是转口贸易；荷兰人仿效德国同人的同业公会。在转口贸易中，他们接触到法兰西、西班牙、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北德意志和科隆以北的莱茵河流域。他们从事的是鲑鱼业，规模不大，但财源滚滚，这是一门新兴产业，几个小镇共享其繁荣。

- 3 荷兰省和西兰省的这些小镇是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哈勒姆(Haarlem)、米德尔堡(Middelburg)。它们都不能和南方的根特(Ghent)、布鲁日(Bruges)、里尔(Lille)、安特卫普或布鲁塞尔匹敌。诚然，在这些荷兰小镇里，最高雅的精神产品也在萌芽，但它们实在太小、太穷，不可能

成为艺术和科学的中心。最杰出的人物必然被吸引到世俗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中心去了。伟大的雕塑家斯鲁特(Sluter)去了勃艮第,他效命几代公爵,没有向他出生的家乡遗赠一件雕塑作品。哈勒姆的艺术家迪尔克·鲍茨(Dirk Bouts)迁居卢万,他最优秀的作品收藏在那里,留在哈勒姆的作品却不幸散佚。哈勒姆渴望一种伟大的艺术,哈勒姆人从事的试验走在其他人前面,却不为人知,这一即将改变世界的伟大艺术就是印刷术。

另一种独具特色的精神现象也在这里滥觞,给这些低地国家的生活打上特别的烙印。14世纪末兴起的一场运动旨在赋予宗教生活以厚重和热情。创始者是德文特人(Deventer),名叫格尔特·格卢特^①。运动表现为两种相互联系的形式,一是共同生活兄弟会,信徒同住,却不与世隔绝;二是温德舍姆(Windesheim)修道院,修士们信奉奥古斯丁^②的信条。这场运动兴起于艾塞尔河畔,在迪温特和兹沃勒(Zwolle)两个小镇之间,位于乌特勒支主教教区外围。很快,运动就向东传播到德意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向北传播到格罗宁根和弗里斯兰,向西传播到荷兰本土。兄弟会所如雨后春笋,温德舍姆修道院或独立,或附属于兄弟会所。时人将这场运动称为“近代虔敬”(devotio moderna)运动,但这场运动与其说有明确的教义,不如说是情感和践行的运动。教会权威很早就承认,它具有真正的天主教性质。真诚与谦虚、淳朴与勤劳的品格尤其宗教情感和思想的热忱是这场运动的目标。教徒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病人和其他的慈善事业,

4

① 格尔特·格卢特(Geert Groote, 1340—1384),天主教虔敬派的创始人和共同生活兄弟会的缔造者,1387年,这个组织发展成为隐修团体温德舍姆会,该会强调基督教的人性而不是神性,与13、14世纪的经验学派截然不同,到16世纪时为本笃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宗派吸收。

②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aint of Hippo, Augustine, 354—430),被认为是古代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著有《忏悔录》(7卷)、《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等。

特别注重传授写作艺术。在这个方面，这场运动和同时复兴的方济各会^①和多明我会^②迥然有别。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转向布道。温德舍姆会和耶罗姆教徒（即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主要精力却花在课室里，他们静悄悄地学习写作。很快，近代化的课室就吸引了远远近近的学童。于是，文化就在低地国家和低地德意志的中产阶级里扩散开来，这种文化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性质的文化；由于这样的性质，它很适合渗透到各阶层的大众里去。

温德舍姆教徒写出的虔敬文字主要限于有训诫意义的小册子、教徒的传略，其突出特点是虔敬的调子和真诚的情怀，而不是大胆和新奇的思想。

在这些文字里，最伟大的当数（坎普滕的）托马斯^③的不朽著作《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他在兹沃勒附近的圣阿格内滕堡修道院隐修。

到谢尔特（Scheldt）和穆斯（Meuse）以北地区造访的外国游客常常嘲笑当地人的粗鲁和酗酒，同时又谈起他们的虔诚。这些地区的居民已经养成静思和自制的心性，这样的心态适合思考人间的问题并提出责难，而不是用光辉的才智使人感到震惊。

鹿特丹和 12 英里之外的高达位于荷兰最低的位置，是一片水乡泽国，因此它们并不是荷兰最早的城镇。这两座城很小，排在多特雷赫特、

① 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由意大利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创建的罗马天主教修会，以他的忠实、俭朴及对自然的爱激励追随者，方济各 1228 年被教皇正式追封为圣徒。

② 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由西班牙天主教修士圣多明我（Saint Dominic, 1170?—1221）创建的修会，又称为布道兄弟会，1220 年起称托钵修会。

③ 托马斯（坎普滕的）（Thomas à Kempis, 1379—1471），德意志修士，他可能是《效法基督》（又译《师主篇》）的作者，该书是灵修著作，朴实无华，以灵性生活为重，物质生活为轻，强调善报和圣餐礼，其影响之深远仅次于《圣经》。

哈勒姆、莱顿和迅速上升的阿姆斯特丹之下。这些小城镇都不是文化中心。伊拉斯谟 10 月 27 日在鹿特丹降生,年份大约是 1466 年。因为他是非婚生子,所以他的血统和亲属关系始终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也许伊拉斯谟很晚才了解到他出生的情况。他对自己出生的“污点”极其敏感,尽力加以掩盖,而不是揭示。盛年之后他描绘的情况既浪漫又悲惨。根据他的想象,年轻的父亲与一位姑娘野合,因为他希望娶这位医生的女儿。年轻人的父母和兄弟们都非常生气,叫他听从神的指令,他不得不在孩子出生前背井离乡。他浪迹罗马,以抄书为生。他的亲属编造消息说,他的心上人已经去世;于是悲痛的年轻人当上了神父,一心事主。回到家乡之后,他才发现亲戚骗了他。他谢绝与心上人来往,因为他再也不能娶她,于是他呕心沥血让儿子接受文理教育。母亲继续照料孩子,但不幸夭亡,父亲随即也进了坟场。伊拉斯谟回忆说,母亲去世时他只有十二三岁。但我们似乎可以确信,她去世的时间不可能早于 1483 年,那就是说,伊拉斯谟已经十七岁了。伊拉斯谟对年代的感觉很差,常差得令人吃惊。

5

遗憾的是,伊拉斯谟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的细节并非全是正确的,而且他自己知道是不正确的。很可能,他的父亲在生育他的那场恋情发生时已经是神父。无论如何,那不是业已订婚的恋人迫不及待的鲁莽之举,而是长期不太规矩的关系,因为比伊拉斯谟年长 3 岁的哥哥彼得也是这样出生的。

我们只能勉强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这是一个人口多的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有 9 个同胞兄弟,且都已婚。祖父辈的人都很长寿,几位舅舅也很长寿。奇怪的是,他们的许多表亲即伊拉斯谟的先辈都不吹嘘自己和伟大的伊拉斯谟有什么亲属关系。这些先辈的后人也不去追寻这样的亲属关系。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事实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这里的人还没有固定的家姓,所以我们要追寻伊拉斯谟的亲属就有困难。一般地说,人们用自己和父亲的名字。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情况,父亲的名字固定下来,下一代就用父亲的名字。伊拉斯谟称呼父亲的名字是杰拉德

6

(Gerard),哥哥的名字是彼得·杰拉德(Peter Gerard);教皇在一封书信里称呼伊拉斯谟的名字是伊拉斯谟·罗杰利(Erasmus Rogerii);由此可见,他父亲的名字可能是罗杰·杰拉德(Roger Gerard)或罗杰·杰拉兹(Roger Gerards)。

伊拉斯谟和他哥哥出生在鹿特丹,许多迹象表明,父亲的亲属不是鹿特丹人,而是高达人,他们的近亲都家住高达。

伊拉斯谟是教名,这名字不常用,但选用这样的名字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圣伊拉斯谟(St. Erasmus)名列14位殉道的圣徒,15世纪的人们很崇拜这些殉道者。或许一般人相信,取名伊拉斯谟可以给人带来财运,这个名字有分量。伊拉斯谟比较熟悉希腊语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拼写成“希拉斯谟”(Herasmus),后来他后悔没有用更加正确、更加铿锵的“伊拉斯弥乌斯”(Erasmus)。有些时候,他用幽默的口吻自称为“伊拉斯弥乌斯”,他的教子总是用“伊拉斯弥乌斯”这个名字,教子的父亲是约翰·弗洛本(Johannes Froben)。

人们称呼他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Rotterdammensis)。大概是出于类似的审美考虑吧,不久他就把带有蛮族韵味的Rotterdammensis改写为Rotterdamus,紧接着又把它改写为Roterodamus。也许他按照希腊语的规则把重音放在倒数的第三个音节上。这个名字之前再加上Desiderius是他自己挑选的,他初次使用Desiderius是在1496年。这和他喜爱的作家圣哲罗姆^①有关,圣哲罗姆的书札里有一位友人叫Desideriu。他第一次用全名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是在1506年第二版的《格言集》里,这个版本由若斯·巴迪乌斯(Josse Badius)推出。这表明,时年四十岁的伊拉斯谟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了。

7 人生际遇使他难以找到出版商若斯那样的道路。他仿佛记得,幼小

^① 圣哲罗姆(Jerome,340?—420?),早期基督教最著名的教士和学者,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和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翻译成拉丁文。

的他还不到四岁就被父亲送到高达去上学,和大他几岁的哥哥一道去。九岁时,父亲又把他送到德文特,这一次上的学校是著名的圣勒宾(St. Lebuin)的分校,是母亲带他去的。他在这里待的时间很长,在此期间,从1475到1484年,他曾经加入乌特勒支修道院的唱诗班。据伊拉斯谟宣示,他十四岁离开德文特;我们大概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他把短暂离开德文特的时间(也就是他到乌特勒支教堂去唱歌的时候)和他最后离开德文特的时间混淆起来了。他的著作里经常出现对德文特的回忆。他对那里接受的教育没有什么感激之情,他说,那时的学校还未开化,还在用老掉牙的中世纪课本,内容之愚蠢和讨厌令人难以想象。有些老师是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教徒。其中一位名叫约翰·辛森(Johannes Synthen),他多多少少对古典的纯净形式有一点理解。伊拉斯谟在德文特上学的后期,校长名叫亚历山大·希基乌(Alexander Hegius),他是弗里斯兰人道主义者鲁道夫·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的朋友。阿格里科拉从意大利回乡时,弗里斯兰人惊叹他是天才。每逢节日,校长会给学童讲话,伊拉斯谟听过他的讲演。有一次,著名的阿格里科拉来校讲演,这次讲演给伊拉斯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母亲在家乡流行的瘟疫中去世,伊拉斯谟在德文特的学业戛然而止。父亲把他和哥哥召回高达,父亲随即病故。父亲必定是有文化的人,因为他懂希腊语,曾经在意大利听许多人文主义者讲演,还抄写了一些经典著作,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藏书。

父母去世后,三位监护人照看伊拉斯谟和他的哥哥,但他后来对监护人的照顾却颇有不恭之词。我们难以断定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夸大之词。一位监护人叫彼得·温克尔(Peter Winckel),是高达的一位校长,对新古典主义缺乏同情,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这里的学监对人相当热情。“如果你能够再写一篇这样优雅的文章,请务必加上一些评论,”这是学监在回信中对伊拉斯谟表示的不满。那年他十四岁,这篇文章是他用心阅读一篇使徒书以后写的一些感想。学监劝告年轻人进修道院,认为这样做

可以取悦上帝,同理,年轻人认为这是他们摆脱重担的最便捷的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伊拉斯谟看来,监护人这种可怜的工作带有自私的色彩,他们借此掩饰自己不诚实的行政工作;他们的工作全然是滥用权威和权力,应该受到责备。他的不恭之词不仅针对监护人,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样的形象又成了他哥哥的形象,虽然他青少年时代和哥哥的关系很亲密。

温克尔把两位年轻人送去上学,这一次是到波伊-勒-达克(Bois-le-Duc)城,哥哥二十一岁,伊拉斯谟十八岁。他们住宿在兄弟会,学校就附属于这个兄弟会。这所学校不如德文特那所学校风光。伊拉斯谟说,兄弟会只知道一个目的,那就是摧毁一切天分,老师动不动就拳脚相加,破口骂人,狠狠体罚,目的是要让年轻人的灵魂适合修道院。他想,这正是他的监护人的目的。他们上大学本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是,监护人故意把他们排除在外。两年的光阴就这样浪费了。

有一位叫隆包特(Rombout)的老师喜欢伊拉斯谟,隆包特千方百计劝说他加入共同生活兄弟会。后来,伊拉斯谟后悔自己没有答应,因为兄弟会并不要求他接受不可撤销的宣誓,可这正是他不久就不得不接受的宣誓。

波伊-勒-达克爆发瘟疫,兄弟二人又回到高达。伊拉斯谟患发热病,这耗尽了他的抵抗力,而这正是他需要抵抗力的时候。监护人(其中一人死于瘟疫)尽力把他们兄弟二人送进修道院。监护人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不善理财;据伊拉斯谟说,监护人不再给兄弟二人转账拨款。后来,伊拉斯谟用最灰暗的调子描绘他人生这一段黑暗的岁月;一切都令人沮丧,当然他本人除外。伊拉斯谟笔下的自己年方十六(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二十岁),热病缠身而虚弱不堪,但意志坚强,该拒绝听人摆布时就断然拒绝。他说服哥哥逃出修道院去上大学。一位监护人是心胸狭隘的暴君,另一位监护人是温克尔的兄弟,此君是商人,轻佻,骗人。伊拉斯谟的哥哥彼得首先屈服于监护人的压力,他被迫进了戴尔夫特附近的锡安修

道院(正规的奥古斯丁教派);把彼得安插进去的正是这位商人。伊拉斯谟进行了比较久的抵抗。后来,他到高达附近的斯泰恩(Steyn)修道院或艾毛斯(Emmaus)修道院看了看,还是不得不屈从于监护人的安排,进了斯泰恩修道院(奥古斯丁教派的修道院),因为这里的一位修士是他德文特的老同学,这位同学向他指出,修道院的生活也有光明的一面。进修道院不久,大概是1488年,伊拉斯谟就宣誓终身侍奉上帝了。

第二章 修道院读经

→1488—1495

成为斯泰恩修道院教士——他的朋友——致塞瓦提乌斯的信——修道院里的人文主义；拉丁文诗歌——厌倦隐修生活——离开修道院去担任坎布雷主教的秘书：1493——詹姆斯·巴特——《反蒙昧主义》——告假赴巴黎求学：1495

10 伊拉斯谟在后期的生活里深感悔恨。他身为修士，却企图逃避修士的生活，这带来无穷的烦恼，使他被迫进修道院的事态发展在他的心里形成了一幅扭曲的图画。在斯泰恩修道院，他给兄长彼得的书信仍然热情洋溢，但在他的心目中，彼得已经一无是处，甚至成了邪恶的精灵，如同犹大一般。劝他进修道院起决定作用的老同学似乎成了叛徒，这位老同学完全是在受私利的驱使，是出于自己的懒惰，是因为他喜欢有伊拉斯谟做伴。

在斯泰恩修道院写的书信里，伊拉斯谟没有透露出讨厌修道院生活的迹象。后来他却要我们相信，他一开始就厌恶这样的生活。我们当然可以假设，他的督导防止他在书信里直抒胸臆，我们还可以假设，他的心灵深处渴望自由，渴望进行比修道院更有修养的交流。尽管如此，他必定

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这是他的老同学的期望。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修士生活赞》(*Praise of Monastic Life*)。据他说,那是为了取悦一位想要引诱表亲的朋友。这是伊拉斯谟事后杜撰的天真故事之一,他从来不觉得这样的编造不合理。

在斯泰恩修道院,他发现相当自由,找到了满足他渴望古典的精神食粮,结交了一些同气相求的朋友。三位朋友对他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劝说他进修道院的老同学再也不被提起。这三位朋友是鹿特丹的塞瓦提乌斯·罗杰(*Servatius Roger*)、高达的威廉·赫曼斯(*Weiliam Hermans*)和高达的科尼利乌斯·杰拉德(*Cornelius Gerard*)。罗杰和赫曼斯是伊拉斯谟在斯泰恩修道院的同伴,杰拉德的年龄稍长,伊拉斯谟一般叫他奥里利乌斯(*Aurelius*,这是高地人的准拉丁化拼写)。科尼利乌斯·杰拉德大多数时间在莱顿附近的罗普森修道院生活。伊拉斯谟和这三位朋友一道读书、交往、说俏皮话。在离别的时间里,他们常常书信来往。

11

伊拉斯谟致塞瓦提乌斯的书信里展示出来的形象,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到了。这个年轻的伊拉斯谟比女性还要敏感;他渴望多愁善感的友谊。在致塞瓦提乌斯的书信里,伊拉斯谟展现出热恋者的全套路数。每当朋友的形象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时候,他不禁潸然泪下。他每隔一个小时就手捧朋友的书信重读一次,且禁不住低声抽泣。他心灰意冷,焦躁不安,因为朋友讨厌他极端的依恋情绪。塞瓦提乌斯问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伊拉斯谟却反问:“你怎么啦?”他的友情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这使他难以忍受,他对塞瓦提乌斯说:“你别这么拘谨,务必告诉我,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我的希望寄托在你一个人身上。我全身心献给你,你却让我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你知道我胆怯,没有人依靠的时候,我就感到绝望,生活就成了包袱。”

我们要记住这段话。从此以后,伊拉斯谟再也没有如此强烈地倾诉过自己的感情。这段话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使我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他的后半生。

这些书信有时被当作文学手法上的夸张。它们暴露了他的虚弱，他有话不吐不快；这和他掩饰亲密感情的习惯完全不相吻合，他后来再也没有放弃过掩饰自己的感情。研究他的艾伦博士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下结论，然而艾伦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些书信是真诚的感情倾泻。我则认为，它们就是感情的宣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种热烈的友谊和那个时代吻合，也符合作者的性格。

12 在15世纪世俗生活的圈子里，柔肠百结的友谊呈一时之盛，和18世纪末的风气别无二致。每一个宫廷里都有成对的朋友，他们同床共枕，心心相印，互诉衷肠。对热烈友谊的崇拜并不限于贵族生活圈子。这是“近代虔敬”运动的特点之一，在其他圈子里也风靡一时，从本质上来看，它似乎和虔诚的信仰难以分割。以同情的眼光看朋友，观察并注意彼此的内心生活，那是共同生活兄弟会和温德舍姆修士们的习惯，也是他们赞同的日常消遣。虽然斯泰恩修道院和锡安修道院不属于温德舍姆教派，“近代虔敬”运动精神还是在这两个修道院盛行一时。

伊拉斯谟很难得袒露他性格的根基，但在致塞瓦提乌斯的信里他却做了彻底的表白、明确的宣示：“我心里想，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友谊，最热烈渴望的是友谊，出于嫉妒而珍视的是友谊。”即使在稍晚的时候，当有人怀疑他的动机是否纯洁时，他也爆发了一阵猛烈的感情宣泄。后来他说起过年轻人的感情，断言青春可以用来构想某些同性朋友间强烈的感情。再者，经典中的例子，比如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①、达蒙和皮提亚^②、忒修斯和庇里托俄斯^③以及大卫和约拿单^④的友情随时随地都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这颗年轻的心柔肠百结，女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充满古典

① 俄瑞斯忒斯(Orestes)和皮拉得斯(Pylades)，希腊神话人物。

② 达蒙(Damon)和皮提亚(Pythias)，罗马神话人物。

③ 忒修斯(Theseus)和庇里托俄斯(Pirithous)，希腊神话人物。

④ 大卫(David)和约拿单(Jonathan)，《圣经》人物。

文学里的情绪和幻想,却发现爱欲前面横亘着一座山,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粗俗而冷漠的环境,他的愿望在这里处处碰壁。这样的年轻人在情感的表达上难免会夸大其词。

他不得不节制自己的感情。塞瓦提乌斯坚决拒绝这种充满嫉妒心的、苛刻的友谊。也许,伊拉斯谟遭受的羞辱和羞愧超过了书信中显露出来的代价,所以年轻的伊拉斯谟不得不有所收敛,后来他就谨小慎微地防止表白自己的感情了。稍后,感情丰富的伊拉斯谟一去不复返,很快让位于智慧的拉丁文学者。他的学问很快就超过了老朋友们,他和老朋友探讨诗歌和文学,就他们的拉丁文风格提出建议,有必要时甚至进行一番教训。

伊拉斯谟在德文特上学、在修道院读经时,已经知道一些经典作家。考虑到这个条件,伊拉斯谟在此间培养读经的品味,应该是不乏机会的,并不像他后来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没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猜想,他父亲留下的书籍也有助于他提高修养,这些书是他父亲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尽管他常常贬低他读过书的学校和进过的修道院,但奇怪的是,他连父亲这些书也不曾提起。尽管他后来议论荷兰人的愚昧和蒙昧主义,我们却很清楚,他青年时代获得的人文主义知识不可能是他独自一人摸索出来的。他在修道院里的两位朋友科尼利乌斯·奥里利乌斯和威廉·赫曼斯也掌握了这样的知识。

在给科尼利乌斯的一封信里,伊拉斯谟把以下罗马诗人当作自己的诗艺楷模: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尤维纳利斯(Juvenal)、斯塔提乌斯(Stattius)、马提雅尔(Martial)、克劳狄安(Claudian)、佩尔西乌斯(Persius)、卢坎(Lucan)、提布卢斯(Tibullus)、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他又宣示在散文风格上模仿罗马作家西塞罗(Cicero)、昆体良(Quintilian)、萨卢斯特(Sallust)和泰伦斯(Terence),可惜世人尚未认识到这四位作家的韵律特征。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中,他特别熟

悉洛伦佐·瓦拉^①;不过,法尔福^②、艾尼伊尼阿斯·西尔维乌^③、格里诺^④、波焦·布拉乔利尼^⑤等人他也略有所知。在基督教文学方面,他特别通晓圣哲罗姆的作品。伊拉斯谟读书的学校是“近代虔敬”运动的学校,其办学宗旨是极端清教徒式的目标,严格的纪律旨在压制人的个性。令人惊叹的是,这样的教育居然培养出了伊拉斯谟到修道院后表现出来的头脑——这是成就卓著的人文主义者的头脑。他唯独感兴趣的是用拉丁文写诗,并锤炼一手纯粹的拉丁文风格。如果要在他和高达的科尼利乌斯·奥里利乌斯和威廉·赫曼斯的通信中寻找虔诚的宗教感情,那几乎是大海捞针。他们能够轻松驾驭拉丁文的格律和罕见的神话术语。他们的题材是田园牧歌或卿卿我我的,即使有献身的痕迹,其中的古典主义也使虔诚的调子消失殆尽。附近赫姆(Hem)修道院的院长邀请伊拉斯谟去吟诵他的诗作《大天使米迦勒》(*Archangel Michael*),事后院长不敢张贴他这首萨福^⑥式的颂歌。院长认为这首诗“极富诗意”,就像希腊诗歌。在那

14

-
- ①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保守的批评家和杰出的雄辩家。被奉为宗教改革的先驱,著述范围很广,以《论君士坦丁赠礼》考证《君士坦丁赠礼》为伪书而闻名世界,曾被教廷判处死刑,但晚年获得罗马教皇的提拔、委任和宠幸。其他著作有《论快乐》、《论自由意志》、《辩证的论辩》、《优雅的拉丁语》等。
- ② 法尔福(Francesco Filelfo,1398—1481),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于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具有很高的声望,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
- ③ 艾尼伊尼阿斯·西尔维乌(Aeneas Sylvius,1631—1701),意大利高级教士,后任教皇,即庇护二世(1458—1464)。
- ④ 格里诺(Battista Guarino,1434—1513),意大利人文学者,著有《关于教授和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应遵守的顺序和方法》。
- ⑤ 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aracciolini,1380—1459),人文主义者,发现许多古典拉丁文手稿,著有《论咨嗟》、《论命运》、《佛罗伦萨史》等。
- ⑥ 萨福(Sappho),希腊抒情诗人,女性,活跃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常被视为女同性恋的象征,作品讴歌爱情,存世不多。

些日子里,诗意就是古典。但伊拉斯谟却认为这首诗几乎不讲究韵律,几乎是散文。他自己的解释是:“时代使然,诗坛荒芜”,这是他后来的叹息。

他们这几位年轻的诗人觉得,自己要承担起诗歌守护人的使命,在压迫他们的愚钝和蒙昧中守护一片光明。和一切充满青春活力的诗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的诗作会永垂不朽,梦想斯泰恩修道院诗歌光辉的未来,憧憬斯泰恩修道院能够和意大利的曼图亚修道院一比高低。在他们的心目中,周围全是形如小丑、心胸狭隘、墨守成规的教士,这些人既不承认也不鼓励他们的诗作。伊拉斯谟有一个强烈的倾向,他想象自己受到威胁和伤害,这就给他的处境涂抹上了一层被压迫天才的殉道色彩。在致科尼利乌斯的信里,他用优雅的贺拉斯韵律抱怨诗歌被鄙视的不幸;修道院的同伴命他罢笔,可他的手已经养成写诗的习惯难以割舍了。然而,同伴们的强烈嫉妒最终还是迫使他放弃了写诗。令人恐怖的野蛮蒙昧趾高气扬,同胞们嘲笑心高气傲的阿波罗桂冠艺术;粗鄙的乡巴佬命令博学诗人作诗。“我有口难言,有说不尽的哀怨。纵然我的嘴巴多如满天繁星,数不胜数,纵然我的嘴巴如春风扬起的玫瑰,俯拾即是,我也道不尽众多的邪魔,如今神圣的诗歌艺术受尽欺凌。我厌倦写诗。”对他不尽的哀怨,科尼利乌斯做出了回应,这使他很高兴。

这些文字十有八九可能是修辞虚构或刻意模仿,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应该低估这几位年轻诗人火一样的热情。我们对拉丁文的魅力已经钝化,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年轻人志得意满的心情。他们学习拉丁文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靠荒唐的启蒙书和最可笑的方法学习拉丁语,后来却发现了它的纯净美,最后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学会了驾驭富有魅力的韵律,掌握了它极其精密的结构,拉丁文的声韵美就烂熟于胸了。

*Nec si quot placidis ignea noctibus
Scintillant tacito sydera culmine,
Nec si quot tepidum flante Favonio*

Ver suffundit humo rosas,

Tot sint ora mihi...

纵然我有千张嘴巴，
就像那满天的繁星，
纵然我有千张嘴巴，
就像那春风下的落英……

能够吟咏以上文字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是诗人，这有什么奇怪呢？在与友人的唱和中，伊拉斯谟能够用 50 双对仗的句子写一首讴歌春天的诗歌，而且是模仿梅利波雅^①的诗歌，这值得大惊小怪吗？你不妨称之为学究迂腐之作，斧凿痕太重，然而它清新扑鼻、雄劲有力，这是他的拉丁文跃然纸上的风格。

从这些心境中跃然而出的还有伊拉斯谟第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这部手稿失而复得，但其中一部分已经亡佚，许多年后这部残稿才刊行于世。这就是《反蒙昧主义》(Antibarbari)。据艾伦博士考证，他在斯泰恩修道院动笔写这本书。当它最终成书时，它反映的却是伊拉斯谟后来的生活，他早已离开修道院了。斯泰恩那位年轻诗人那种舒适惬意、智慧风趣、捍卫世俗文学的调子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洒脱高贵的生活理想。与朋友的切磋交流，从不间断地研习古人，这就是他在修道院围墙里的生活。

在修道院的岁月里，那些围墙也许使他越来越感到压抑。富有学问和诗意的通信、学习绘画艺术^②、与朋友萨斯堡(Sasboud)的交往，都不能

① 梅利波雅(Meliboeus)，罗马诗人维吉尔作品中的人物。

② 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 16、12 号，比较第四卷第 xx 页，亦比较第四卷第 756 页，在回顾青年时代时，伊拉斯谟写道：“我画的人像都瘦得似无形体。”(Pingere dum meditor tenuis sine corpore formas.)——原注

减轻修道院生活的压抑感,都不能使才智局限、缺乏友情的环境带上一丝甜蜜的色彩。根据艾伦博士仔细推敲的《伊拉斯谟年谱》,有关他修道院后期的生活,没有一封书信保存下来。这是由于他耍脾气停止写信呢,还是因为资深的修士不允许他继续写信呢,亦或是由于偶然的遗失呢?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伊拉斯谟 1492 年 4 月 25 日被授以神职,主持仪式的是勃艮第公爵乌特勒支的主教;我们不知道此时的场面,也不知道他的心境。也许,他之所以接受神职,和他谋划离开修道院有关系。后来他自己公开宣示,他很少读弥撒辞。稍后,卑尔根的亨利即坎布雷(Cambrai)主教让他去担任秘书,这使他有离开修道院的机会。伊拉斯谟把这次升迁机会归功于他的名气,他自恃通晓拉丁文,写一手好文章。他之所以去效命坎布雷主教,那是因为他心中在盘算如何去罗马的道路,因为坎布雷主教想在罗马得到红衣主教的职位。伊拉斯谟已经得到乌特勒支主教的批准,也得到斯泰恩修道院院长和教长的认可。当然,不存在永远离开修道院的问题,因为即使在坎布雷主教秘书的岗位上,他伊拉斯谟还是继续身着教士袍。他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准备离别修道院。他的朋友和诗友威廉·赫曼斯在高达城外等待他,希望伊拉斯谟路经高达时有机会见面,可赫曼斯错失送别他的机会。这一幕感人至深。他们两人曾经商量过要同时离开斯泰恩修道院的,然而伊拉斯谟在筹划离开过程中,却不让威廉·赫曼斯知道一点风声。威廉只能够以得到他的书信聊以自慰。

16

此时的伊拉斯谟年届二十五,他很可能是 1493 年离开修道院的。他踏上的职业生涯道路在那时是十分普遍、受人青睐的:大人物荫蔽下的知识分子生涯。他的恩主来自比利时最高贵的家族,在效力勃艮第人的过程中地位上升,这个家族乐意为勃艮第王朝的繁荣奉献力量。格莱姆家族是卑尔根奥普佐姆的贵族,该城堡位于谢尔特河与穆斯三角洲之间,是荷兰南北的交通枢纽。坎布雷主教亨利刚刚

17 被任命为金羊毛兄弟会的执事，这是宫廷里最显赫的神职，那时的哈布斯堡皇室还是以勃艮第命名。随侍这样一位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几乎预示着无限的名利和荣耀。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以耐心和羞辱为代价、不惜以放弃原则的灵活性爬上主教的位置。然而，伊拉斯谟并不是能够充分利用那种机会的人。

随侍主教的经历后来却证明是令人失望的经历。伊拉斯谟不得不随时陪他外出，他总是在卑尔根、布鲁塞尔或梅希林三座城市的住所之间穿梭。主教总是很忙，但究竟忙什么却不清楚。通向罗马的道路是每一个神职人员或神学院学生梦寐以求的事业顶峰，但伊拉斯谟的秘书职位并没有开花结果。前几个月，主教对伊拉斯谟蛮有兴趣，但他的性格却不像伊拉斯谟期待的那样随和。于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伊拉斯谟郁郁不乐。他说自己的命运是“最艰难的命运”，这使他轻快的调子荡然无存。做学问的机会根本没有。他羡慕朋友威廉，威廉被圈定在斯泰恩修道院那间小小的研修室里，但他有时间写美妙的诗歌，因为他“福星高照”。伊拉斯谟欲哭无泪，长吁短叹。命运使他脑筋迟钝、心力枯竭，过去做学问的生活不再具有吸引力。这些话有夸大的成分，我们不能够认真看待他渴望修道院生活的表白，但他的心灰意冷和萎靡不振倒是显而易见的。与政治和野心打交道使他感到不安。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方面的才能。生活的真实面目使他感到害怕和压抑。当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时，他看到的是苦难和混乱。“哪里有什么欢乐或安逸？无论我放眼何方，我看见的都是灾难和艰辛。在乱哄哄、闹嚷嚷的环境中，你还指望我有闲心去从事缪斯女神的创作么？”

18 伊拉斯谟一生从未有过真正的闲暇。他的一切阅读和写作都是在匆忙中进行的，他反复使用“匆忙”这个词。然而，他的工作极其专注，他吸收知识的能力真是不可思议。在随侍主教期间，他造访布鲁塞尔附近的

格林南达尔修道院,鲁伊斯布鲁克^①曾经在这里隐修写作。或许,伊拉斯谟没有听见修士们提起鲁伊斯布鲁克,否则他会乐于阅读这位伟大而神秘的修士的著作。不过,他在藏书室里发现了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于是就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他的勤奋使格林南达尔的修士们感到吃惊,他甚至把书带回借宿的卧房。

他偶尔忙里偷闲写点东西。在离卑尔根奥普佐姆城不远的哈尔斯特伦,主教坎布雷有一座别墅。在这座别墅逗留期间,伊拉斯谟修订了他的《反蒙昧主义》,这本书的初稿是在斯泰恩修道院完成的;经过精心打磨,《反蒙昧主义》改写成了对话的形式。他似乎要在田园牧歌的闲适氛围中,为他焦躁的生存状态寻求一点补偿和文雅的会话。他笔下传达的景色(以后不断重述这样的景色)始终是他愉快生活的理想:在城郊的一座花园或别墅里,风和日丽,三五知己雅聚,或略备茶点边吃边聊,或静静地在花园里散步,在柏拉图式的宁静中交换心得。除他之外,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他的知心朋友。他珍爱这些忠实的朋友,他们是:詹姆斯·巴特(James Batt)、老朋友威廉·霍姆斯。巴特是他在卑尔根结识的,一位教书先生,后来又担任卑尔根城的文员。伊拉斯谟继续在威廉·霍姆斯的文学创作上助他一臂之力。威廉从荷兰不请自来。稍后参加雅聚的还有卑尔根的贝尔格马斯特(Burgomater of Bergen)以及城里的内科大夫。在调侃、平静的语气中,他们探讨诗歌的创作和拉丁文学的鉴赏。文学鉴赏和真正的虔诚并不矛盾,蒙昧主义的愚钝思想却要我们相信,两者是不可调和的。然而,如果要证明两者兼容,他们却又遭遇到证据不足的一丝愁云,而且连圣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也有类似的遭遇。伊拉斯谟前不久研读过圣奥古斯丁;圣哲罗姆他早年就熟知,而且和他的思想更加相宜。在

① 鲁伊斯布鲁克(Ruysbroeck, 1293—1381),佛兰德斯奥秘神学家,1317—1343年在布鲁塞尔的圣古都尔教堂任牧师,后来在格林南达尔创办修道院,代表作有《爱上帝之人的国度》、《属灵的配偶》等。

19 庄重的气氛中,他们假借古罗马人的名义向古典文化的敌人宣战。是呀,哥特人有什么权利抢夺拉丁人的学问、拉丁人的首都呢?罗马城本身就是拉丁文化呀。

伊拉斯谟追随坎布雷主教的前途以失望告终。新朋友巴特帮助他另觅出路。巴特曾经在巴黎游学,如今去罗马的路既然走不通了,伊拉斯谟就转而去巴黎求学。主教同意放行,补贴又有希望,于是伊拉斯谟就决定去这所最著名的巴黎大学了。他动身的日期很可能是1495年夏末。巴特的影响和努力使他得到这个幸运的机会。

第三章 巴黎大学求学

→1495—1499

巴黎大学——哲学和神学的传统与流派——蒙泰古学院——厌恶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者罗伯特·盖冈的关系:1495——如何谋生——几部论教育著作的初稿——在荷兰和法国之间穿梭——巴特与维尔的安娜夫人——随同蒙特伊勋爵赴英格兰:1499

巴黎大学是舆论和政党冲突和斗争的重镇,在这一点上,它勇冠整个基督教世界。一般地说,中世纪的大学生活是喧闹、焦躁的。科学交流的形式本身就包含急躁的成分:永不停息的争论、频繁的选择和学生的吵闹。各种教派、学派和团体的新旧分歧和争吵犹如火上浇油。不同的教士团队互相竞争,俗教士与修道会教士往往意见相左。在半个多世纪里,神学界一直在巴黎进行激烈的争论,托马斯主义者和司各脱主义者的古典派为一方,神恩有限论者或近代派为另一方,所谓近代派即是奥卡姆^①和比里丹^②的追随者。到1482年,两派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和解,两派都江

20

① 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 1285? —1349),英国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中世纪唯名论主要代表,反对教皇干预世俗政权,著有《逻辑大全》。

② 比里丹(Jean Buridan, 1300—1358),法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家,曾在巴黎大学追随唯名论思想家奥卡姆研究哲学。

郎才尽、智穷力竭,陷入毫无成果的技术性争论,陷入系统化和细分化、围绕术语和词语使用方法的争论之中,但科学和哲学都不能从这样的争论中获益。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这两个神学派别在巴黎走向衰落;接掌神学教学的是纳瓦拉神学院和巴黎大学的世俗教派,不过这两个世俗教派的教学仍然是老套的风格。

在15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随处可见的传统主义未能阻止人文主义深入巴黎。拉丁文的风格更加精致,对古典诗歌的鉴赏也更加精致,这两种情绪都有人热情提倡,兴起于意大利的柏拉图主义也在此复兴了。巴黎的人文主义者有意大利人,比如吉洛拉墨·巴尔比(Girolamo Balbi)和浮斯特斯·安德烈利努斯(Faustus Andrelinus)。不过,他们的领袖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罗伯特·盖冈^①,他是圣马蒂兰即三位一体教派的领袖、外交家、诗人和人文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涌现出来,对亚里士多德更加清楚的理解深入人心,这个思潮也来源于意大利。伊拉斯谟抵达巴黎之前不久,勒费弗尔·戴塔普尔^②从意大利回到法国。他在意大利与柏拉图主义者过从甚密,他接触过的柏拉图主义者有马西利奥·费奇诺^③、皮柯·米兰多拉^④,还有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埃尔默拉奥·巴尔巴罗^⑤。一般地说,巴黎的理论神学和哲学趋于保守,然而和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不乏改革教会的运动。巴黎大学校长让·热尔松(Jean Gerson,约1400年在

① 罗伯特·盖冈(Robert Gaguin,1433—1501),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兰克人的起源和事业纪要》。

② 勒费弗尔·戴塔普尔(Jacques Lefevre d' Etaples,1455—1536),法兰西人文主义者、神学家、翻译家,将拉丁文《圣经》译成法文,翻译出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形而上学和政治学著作,对年轻一代学者影响很大,常被誉为宗教改革前夕的宗教改革家。

③ 马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

④ 皮柯·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

⑤ 埃尔默拉奥·巴尔巴罗(Ermolao Barbaro,1548—1622),复兴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学者。

任)的权威尚未被人遗忘。不过,改革绝不意味着脱离教会的教义;其首要目标是恢复并纯洁修道会,接着的目标是清除已经得到教会承认并悔恨的弊端。在精神生活改革的氛围里,荷兰的“近代虔敬”运动也可以在巴黎感觉到了。提倡者主要有梅希林的约翰·斯汤东克(John Standonck),少年时代的斯汤东克在荷兰高达的共同生活兄弟会里接受教育,他生机勃勃的改革精神溢于言表。他提倡苦行禁欲,胜过荷兰的温德舍姆教派的修士。他的修行极其严格,但又要求适度。他的盛名超越了教会的圈子,因禁欲而闻名遐迩,不沾肉食。他负责为蒙泰古教士团采购食物时,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连最小的差错也要惩罚。他在蒙泰古修道院附近准备了一个学生之家,接受穷困潦倒的学生,让他们过兼有求学和隐修性质的生活。

坎布雷的主教把伊拉斯谟介绍给约翰·斯汤东克。伊拉斯谟没有加入穷困学生的行列,因为他快三十岁了,但是他体会到了那里的穷困和匮乏。这家修道院的经验使他对巴黎初期的日子感到失望,使他终身厌恶禁欲和苦行。他到巴黎的目的难道是以更加严厉的方式去体会他青年时代那种令人沮丧和压抑的经验吗?

22

伊拉斯谟去巴黎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因为拿学位对他而言并不难:这是因为他是修士,可以免修文学院的必修课程,而且他的学习能力强,精力过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准备考试并完成必修的辩论课。尽管如此,他却未能在巴黎拿到博士学位,因为他在巴黎的居留断断续续,第一次逗留在1499年结束;总体上说,这几次旅居的经历困难重重,令人恼怒。在那个时代,获取博士学位总是困难重重,为此目的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总是令人感到羞辱。可望而不可即的博士学位犹如破晓前的黎明,不能令他满意。

遭受挫折的第一个原因是身体不适。他无法忍受蒙泰古修道院的艰辛生活;腐败的鸡蛋和肮脏的宿舍令他终身难忘;他认为,那里的艰辛就是他后来身体虚弱的种子。在《对话集》(*Colloquia*)里,他以憎恶的态度

追忆斯汤东克隐修制度的禁欲、苦行和惩罚。他在蒙泰古修道院的逗留在1496年春就结束了。

在此期间,他开始研修神学。他修读的课程包括《圣经》和《神学手册》(*Book of the Sentences*),那个时代,《神学手册》仍然是最常用的教材。他还获准参与讲授《圣经》;或许,他还应邀到附近的热纳维埃夫教堂去做过纪念圣徒的布道。然而,他不能全心全意投入这里的生活。修道院里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使他感到不快。他讨厌一切经院哲学,予以抨击,完全排斥,这样的情绪在他的脑子里深深扎根;他的视野开阔,不过凡是他那脑子难以容忍的东西,他都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那些研修会使人固执己见,它们能够使人聪明吗?它们枯燥、贫乏的琐细拷问使人心智枯竭,而不是提供丰富的营养,也不能激发人的灵感。那种研修的文风磕磕碰碰、污迹斑斑,古人雄辩滔滔、熠熠生辉的神学被它们玷污了。那种学问试图解决一切问题,从而使一切问题纠缠不清。”伊拉斯谟把司各脱主义^①当作标签,把一切经院哲学家甚至一切过时的东西都叫做“司各脱主义”。他宁可失去司各脱的一切东西,也绝不愿意放弃西塞罗^②或普卢塔克^③的著作。他觉得这些作品耐读。他在经院哲学的研究中成名,僵硬地偏向于真正的美德;由于厌恶修道院生活,他养成了喜欢争论的脾气。

在当时的巴黎大学,贫瘠的传统主义思想盛行。伊拉斯谟要在这里找到经院哲学和神学极盛期的思想,无疑是有困难的。他从巴黎大学的

① 司各脱主义(Scotism),与托马斯主义对立的经院哲学派别,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1265—1308)主张把哲学和神学分开,接近于两重真理的观点,尤其主张唯意志论、逻辑实在论、个体性原理、实体形式多样性原理。

②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作家、演说家,有大量哲学、政治学、演说辞存世。

③ 普卢塔克(Plutarch,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哲学家,著作宏富,代表作为《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辩论中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只带回了嘲笑神学博士们的习惯:他总是以讥讽的语气称呼他们“我们的大人物”。不得不陪坐的时候,他忍不住连连呵欠;辩论的时候,博士们眉头紧锁、目光茫然、满脸狐疑。回到荷兰后,他致信年轻的朋友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诉说他在巴黎大学与神圣教士们为伍时,常常是长睡不醒,像古希腊的埃庇米尼德斯^①一样。埃庇米尼德斯一睡就是47年(亦说他沉睡57年),但埃庇米尼德斯会醒过来,而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神学家却永远睡不醒。埃庇米尼德斯在沉睡中做什么梦呢?还不就是司各脱主义者那一套难以捉摸、钻牛角尖、形式主义之类的东西吗!埃庇米尼德斯在司各脱主义者的身上获得了再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埃庇米尼德斯就是司各脱主义者的原型。在他的神学著作里,他归结了不少自己解不开的三段论疙瘩,难道不是吗?巴黎大学保存了埃庇米尼德斯的羊皮纸书稿,上面写着神秘的文字,只有那些修炼了15年以上的“大人物”才有资格看那上面的神喻。

伊拉斯谟这种漫画似的讥讽比较像巴黎大学的“大人物”,离拉伯雷笔下那些司各脱似的人物也相去不远。这封致托马斯·格雷的信,以辛辣讥诮的话结尾:“据说,凡是极少与缪斯女神^②和美惠三女神^③打交道的人,都无法一探这一门学问的奥妙。你在典雅的文献里学到的一切都必须首先忘掉。如果你喝过缪斯山里的泉水,你必须先吐出来。我根据拉丁学者的胃口,尽量不说话,不说优雅而风趣的话;我在这方面的修炼有所进步。看来有希望,他们总有一天会承认伊拉斯谟的学问。”

24

伊拉斯谟厌恶的不仅是巴黎大学枯燥的教学法和无趣的体制。他脑

① 埃庇米尼德斯(Epimenides),希腊预言家、作家、传奇人物,长寿,长睡57年,据传曾在雅典主持涤罪仪式。

② 缪斯女神(Muses),希腊神话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总称。

③ 美惠三女神(Graces),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赐予人魅力与美丽的女神,妩媚、优雅、美丽,三姐妹分别名为阿格拉伊亚(Aglaiia,)、欧佛洛绪涅(Euphrosyne)和塔利亚(Thalia)。

子的倾向和这种厌恶情绪也有一定的关系。他博学敏锐,但他的脑子不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辨和教义辨析。他厌恶经院哲学,但勒费弗尔·戴塔普尔传授的富有青春活力的柏拉图主义和重振雄风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也未能引起他的注意。当时,他仍然是具有审美偏向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根基是《圣经》和道德倾向,他的兴趣以他喜爱的圣哲罗姆为基础。

一到巴黎,伊拉斯谟就试图和人文主义的大本营接触。他这位不为人知的牧师致信大本营的首脑罗伯特·盖冈,盖冈不仅是三一教会的首脑,而且是巴黎人文主义者的首脑。这封信篇幅很长,满纸颂扬之词,附有一首精雕细刻的诗歌。盖冈的回信非常亲切:“我从你这首抒情诗断定,你颇有学问;我愿意和你交朋友;请不要用如此慷慨的赞誉之词,那有点像阿谀奉承。”刚开始通信,伊拉斯谟就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为这位光彩照人的人物效劳,同时又在盖冈大名的荫庇之下在读书界获得了小小的名气。这件事至关重要,因为这使他首次注意到文人生涯和朝气蓬勃的印刷术之间的关系。他的文学生涯和学者生涯与充满活力的印刷艺术从此联系起来。

25 盖冈多才多艺,他用拉丁文撰写的《法兰西历史纲要》(*De origine et gestis Francorum Compendium*)已经付印。这是用人文主义史观撰写的第一部法兰西历史。1495年9月30日,该书排印完毕,全书136个对页,却剩余了两页空白。按照当时人的观念,书中留白是不允许的。凑巧盖冈生病,不能进行补救。排字工人小心翼翼地加大字钉间距,用盖冈的一首诗填满了第135页,又把浮斯特斯·安德烈利努斯和另一位人文主义者的颂词排在最后一页。即使这样,最后一个对页还是剩下了一点空白。伊拉斯谟赶忙救急,用一封赞誉信去填补这个缺口。^①就这样,伊拉斯谟一举成名,有兴趣阅读盖冈《法兰西历史纲要》的许多读者突然之间知道

① 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43号,第145页,在《伊拉斯谟年谱》里的巴黎生活部分,这件事的细节和结论都阐述得非常清楚。——英译者注

了伊拉斯谟的名字,接触到他的文风。与此同时,他获得了受盖冈庇护的名分。伊拉斯谟胜人一筹的文字能力显然给盖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盖冈的《法兰西历史纲要》成为伊拉斯谟一举成名的跳板,这本书为后世铭记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伊拉斯谟的名气,这倒是盖冈始料未及的。

伊拉斯谟追随盖冈,进入巴黎人文主义者的圈子,然而凭借印刷机走向成功的道路来得并不容易。他把《反蒙昧主义》的手稿送盖冈审阅,盖冈予以赞扬,至于是否建议出版却只字未提。1496年,伊拉斯谟一本篇幅不大的拉丁文诗集在巴黎出版,这部集子献给苏格兰人赫克托耳·波伊斯(Hector Boys);波伊斯是他在蒙泰古神学院结识的朋友。然而,他旅居巴黎期间撰写的比较重要的著作很久以后才有机会出版印行。

与罗伯特·盖冈和浮斯特斯·安德烈利努斯这样的名人交往使人感到荣耀,但并非直接有利可图。坎布雷主教的经济支持比预期的菲薄。1496年春,伊拉斯谟疾病缠身,于是决定离开巴黎。他先回卑尔根,受到主教坎布雷的欢迎。病愈不久,他又回到荷兰去探视老朋友。他说想要留下不走。但在朋友们的敦促之下他于当年秋天回到巴黎。他随身携带朋友威廉·赫曼斯的诗作,同时转交了赫曼斯致盖冈的信。一位印刷商愿意出版赫曼斯的诗歌。伊拉斯谟又把威廉·赫曼斯介绍给浮斯特斯·安德烈利努斯。

26

在那个时代,想要靠脑力劳动谋生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并非随时能够维护个人的尊严。著书容易,卖书却难,文人的生活要么靠获得牧师的俸禄,要么靠慷慨的赞助,或者同时依靠这两种经济收入。但牧师的薪俸难以获得,赞助人又不是稳定的依靠,且常常令人失望。出版商只给著名的作家支付比较优厚的稿酬。惯例是作者得到几册书,仅此而已。只有将作品献给某某地位显赫的人士,作家才能够得到比较大的好处,因为这样的人士可能会给他优厚的回馈。有的作家把同一作品反复献给不同的人士。后来,伊拉斯谟公开为自己献书的做法辩护,以免除人们对他谋利的怀疑。他仔细记录并指出许多收到献礼却未曾给他回馈或回赠很少的人士。

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伊拉斯谟的第一需要就是寻找一位米西纳斯^①那样的赞助人。米西纳斯们和人文主义者的关系几乎就相当于衣食父母的关系。勤奋的牛不应该饿死(*Ne bos quidem pereat*)。在《格言集》里,伊拉斯谟描绘了争取赞助的体面方式。由此观之,今天看上去好像失去体面的行为实在是时势使然,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他那股钻营的劲头。那些岁月是他身处弱势地位的岁月。

回到巴黎以后,他没有再去蒙太古修道院借宿。他尝试依靠给富家子弟授课谋生。商人诺托夫(*Northoff*)的三个儿子吕贝克(*Lubeck*)、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和亨利是他的学生,他们在奥古斯丁·文森特(*Augustine Vincent*)家借宿。他为学生代拟书信,这些书信风趣、流畅,略带一丝香艳。他的学生还有两位英格兰人:托马斯·格雷和罗伯特·费希尔(*Rober Fisher*)。他溺爱格雷,引起格雷监护人的不满。这位监护人是一位苏格兰人,伊拉斯谟遇到很大的麻烦,他感到非常烦恼。

27 巴黎对伊拉斯谟的影响使他的文笔趋于精致。他的风格细腻,略有造作,却熠熠生辉。与此同时,后来使他闻名世界的作品开始成长,不过从中获益的只有少数人,因为当时这些著作并未付印出版。他给诺托夫家的几个孩子编写了一本拉丁文小册子《常用通俗语手册》(*Familiarium colloquiorum formulae*),这本小册子成为他日后世界知名的《对话集》(*Colloquia*)的核心。他又为罗伯特·费希尔编写了《论书信艺术》(*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的第一稿,这部论拉丁文书信艺术的名作,或许以洛伦佐·瓦拉论纯正拉丁文的《论典雅》(*Elegantiae*)为蓝本,经过一番改写而成。《论典雅》是伊拉斯谟青年时代文化导航的指路明灯。《丰富多样的词语》(*De copia verborum ac verum*)也是启蒙书,提供了大量的语汇,并成为日后篇幅较大的《论学习方法》(*De retione studii*)的雏形。《论学习方法》讲如何安排功课,走的是同样的路子。

① 米西纳斯(*Gaius Maecenas*,前70?—前8),罗马贵族,巨富,皇帝奥古斯都密友和顾问,著名的文学赞助人,与诗人贺拉斯、维吉尔等友谊深厚。

伊拉斯谟的生活不稳定,多动荡。坎布雷主教给予的资助很少。伊拉斯谟身体欠佳,常感压抑。他打算去意大利,却看不到多少实现的可能性。1498年夏天,他回到荷兰,回到坎布雷主教身边。荷兰的朋友们不喜欢他从事的研究。朋友们担心他在巴黎负债。有关他的传闻对他不利。他找到坎布雷主教时,主教正忙于准备动身去英格兰办理教务,颇为恼怒,不断抱怨。情况越来越明显,他必须要寻找另一位赞助人。或许他可以转向(波尔斯林的安娜)维尔的夫人(Lady of Veere, Anna of Borselen),伊拉斯谟的好朋友詹姆斯·巴特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巴特正在她图尔内翰城堡的家中担任她儿子的家庭教师,该城堡在加来和圣奥梅尔两城之间。

回到巴黎之后,伊拉斯谟回归原来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是令人憎恨的、受奴役的生活。巴特邀请他去图尔内翰城堡,可他又舍不得巴黎。在这里,他有一位年轻的学生,是蒙特伊勋爵威廉·布隆特(Lord Mountjoy, William Blount)。这就是说,牵拉他的有两根弓弦。巴特已经被调动起来,他正在为伊拉斯谟到维尔夫人安娜那里去工作进行准备。威廉·赫曼斯负责致信蒙特伊爵士举荐伊拉斯谟,他将在信里赞扬蒙特伊爵士对文学的热爱。伊拉斯谟向赫曼斯求助:“你应该展现博学宏才,称赞我,表示你愿意效劳。相信我,威廉,这对你的名气亦有好处。他年纪轻,却在身边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你将得到帮助你在英格兰推销著作的人。我反复重申我的请求,如果你爱我,那就把这件事牢记在心。”

28

1499年初,伊拉斯谟到图尔内翰城堡造访维尔的安娜夫人。自此,维尔的安娜夫人就被视为他的赞助人。接着,他回到荷兰去探望老朋友威廉·赫曼斯,他准备复活节一过就去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故乡之行来去匆匆;他急于回巴黎,不想失去可能的机会,因为蒙特伊爵士对他颇有好感。经过整个冬天的奔波之苦以后,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苦攻已经动笔的几部书稿。他忙于筹集去意大利的经费,把动身的时间推迟到8月份了。但巴特为他募集的经费显然不如预期,所以到5月份时,伊拉斯谟突然放弃了去意大利的计划。他应邀偕同蒙特伊爵士去英格兰。

第四章 初访英格兰

→1499—1500

初访英格兰:1499—1500——牛津游学:约翰·科利特——伊拉斯谟
心向神学——文人本性未变——费希尔与莫尔——离开英国前夕在多佛
遭遇不幸:1500——回到法国写《格言集》——艰难岁月

29 伊拉斯谟在英国的居留从1499年夏开始,至1500年初结束。这是他心灵逐渐成熟的一段时期。抵达英国时他是博学的诗人,受一位贵族的庇护,正在走向一个知人善用的伟大世界,将要与这个世界密切接触,这里的人知道如何欣赏并奖赏文学英才。他离开英国时非常渴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只要环境允许,他就要承担更加严肃的任务。这一变化是结识两位英国朋友的结果,这是他人人生旅途中邂逅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人格远远超越了过去的朋友。他们是约翰·科利特^①和托马斯·莫尔^②。

① 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 1467?—1519),英国神学家,伦敦圣保罗学校创建人,提倡文艺复兴文化和古典文化,著作《圣经》注解等。

②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7—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天主教圣徒,曾任下院议长、内阁大臣,著《乌托邦》,因对国王亨利八世离婚案和教会政策持异议,被诬陷处死。

在英国旅居期间,伊拉斯谟始终兴致很高,精神抖擞。起初,伊拉斯谟还是昔日那个伊拉斯谟,说话很有文采,一定要炫耀自己的天才。显然,他过去见过贵族生活,在坎布雷主教家里、在维尔的安娜夫人家里都见过,但很少。英国的贵族生活似乎令他非常满意。他以轻快的调子致信浮斯特斯·安德烈利努斯:“我们在英格兰却是有很大的进展。你认识的伊拉斯谟几乎是打猎高手了,骑术也不错,再也不是不知如何奉承人的新手。他招呼应酬时更加彬彬有礼,脸上的笑容更加友善。如果你精明,你也会在这里发光。”安德烈利努斯性情活泼,颇有诗才。伊拉斯谟揶揄朋友说,英国姑娘妩媚迷人,风俗习惯值得赞美,恭维人时伴有亲吻。^①

他有幸结识了皇室成员。蒙特伊勋爵的宅邸在格林威治,一次散步期间,莫尔陪他从这里走到埃尔特姆宫(Eltham Palace),皇家的儿童在这里接受教育。他们巧遇皇室全体成员,全家簇拥着九岁的亨利,充满青春活力的亨利将要成为亨利八世,伊拉斯谟还看见两位小公主和一位小亲王,小亲王还在襁褓之中。伊拉斯谟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没有带礼物,一回到家,他就赋诗一首献给小亲王,这篇颂词一挥而就(并非不吃力,因为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写诗了)。

30

当年10月,伊拉斯谟造访牛津大学。起初他并不特别高兴,但蒙特伊勋爵随之而来。蒙特伊爵士举荐他去约翰·科利特身边工作。科利特却说,他不需要推荐,他早就知道伊拉斯谟。从盖冈的《法兰西历史纲要》收录的伊拉斯谟致盖冈书简,他已经了解到伊拉斯谟的文采,并给予很高评价。在牛津逗留期间,伊拉斯谟和科利特进行活跃的交流,既有面谈也有通信,这样的交往对伊拉斯谟那多维脑子的倾向产生的影响是很清楚的。

① 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103、117号,比较Chr. Martrim. Inst版《伊拉斯谟书简》第五卷第678号和《世纪小说选》(*Cent nouvelles nouvelles*)第二卷第63页“英格兰的淑女和小姐很大方,恭维人时常亲吻”(un baiser, dont les dames et demoiselles du dit pays d'Angleterre sont assez liberales de l'accorder)。——英译者注

约翰·科利特和伊拉斯谟的年纪不相上下,但他比较早的时候就找到了精神生活之路,他的求索之路也比伊拉斯谟顺利。他出身小康之家(父亲是伦敦地方法官,两届伦敦市长),他能够在悠闲的氛围中做学问。他的天赋或许不如伊拉斯谟,却没有因此从事文字消遣,而是始终集中精力研究神学。他熟悉柏拉图和柏罗丁^①,对早期基督教学者的著作也非常熟悉,他对经院哲学的了解令人钦佩,他对数学、史学、法学和英国诗人的了解更令人景仰。1496年,他已经在牛津大学牢牢扎根。他没有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但他能够阐释使徒保罗的书信。他不通古希腊语,只熟谙通俗拉丁语,但他努力吃透经典文本的元典意义,并抛弃后人解经所做的评注。

31 科利特生性严肃,总是控制自己好动的倾向;他有一丝傲气,喜欢游乐,但都能够控制在恰当的范围。他非常诙谐,无疑这使他容易亲近伊拉斯谟。他热心学问,每当捍卫自己的神学观点时,他会因为热情而提高嗓门,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一种崇高的精神充溢他的全身。

和科利特交往之后,伊拉斯谟写出了他的第一部神学著作。在一次交谈中,围绕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的痛苦,伊拉斯谟捍卫一般人认可的观点,认为耶稣对受难的惧怕来自于人的天性。会话结束时,科利特劝他再进一步考虑。在接下来的书信里,他们两人进一步交换意见。未了,伊拉斯谟撰文录下两人的观点,文章题名《关于耶稣痛苦、惧怕和悲伤的论辩实录》(*Disputatiuncula de tedio, pavore, tristitia Jesus*),文章是他们通信的进一步阐述。

这本小书调子严肃而虔诚,但并不热烈。伊拉斯谟的文人气质不会立即而彻底地被取而代之。在第一封信的末尾,伊拉斯谟以略带自嘲的口吻说:“你瞧,科利特,在这封信里神学辩论的结尾,我怎么能够用诗意

① 柏罗丁(Plotinus, 205? —270?), 古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主要代表,提出“流溢说”,著有《九章集》。

的寓言(他在信中用了一些神话比方)来确保书信的礼仪呢?不过,诚如贺拉斯云:自然之道排除节外生枝,但节外生枝总是要冒出来(*Naturam expelllas furca, tamen usque recurret*)。”

在精神活动领域,伊拉斯谟仍然保持这种暧昧的立场。在他致新朋友的信中,这一立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位新朋友叫弗里西安·约翰·西克斯廷(Fritian Jhon Sixtin),和伊拉斯谟一样,他也是拉丁诗人。信中叙述了另一次争论,大约是在马格达伦学院进餐时发生的争论,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大概也在场。这封信是一首诗,格律不太严谨,有一丝斧凿痕。他喜欢这样的餐会,后来的《对话集》里经常描绘当时的情景:赴宴者彬彬有礼,吃的是美味佳肴,适量的觥筹交错,高谈阔论。主持者是科利特。在他右边就座的是圣母玛利亚学院的院长沙诺克(Charnock),伊拉斯谟就住在这个学院(沙诺克也参加了围绕耶稣痛苦的辩论)。在他左边就座的是一位牧师,他提倡经院哲学,但沙诺克没有介绍他的名字。伊拉斯谟接着说话,号称是“不想赴宴的诗人”。争辩的话题是该隐的罪孽,他谋害兄弟亚伯,因而使上帝不快。科利特的观点是:该隐怀疑造物主的仁慈,他靠自己的力量耕地,所以他伤害了上帝;亚伯牧羊,让羊群自然生长,而他却自得其乐。牧师争辩用的是三段论,伊拉斯谟争辩用的是“修辞”。科利特大放异彩,占了上风。争论一阵以后,众人的态度渐趋严肃,气氛就有一点不适合饭局了——“于是我说,为了履行我诗人的角色,为了给论辩降温,让我用故事来活跃气氛:‘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是从很古老的著作里挖掘出来的。如果诸位首先答应我,不把它当作寓言,我就向诸位报告,我在文学中发现的意义是什么。’”

32

于是,伊拉斯谟就讲了一个在非常古老的羊皮纸抄本中读到的故事。该隐经常听见父母讲天堂里的故事:草木葱茏,玉米棒子像桤木一样高大,照看玉米的天使经不住该隐的花言巧语,就给了该隐一些玉米。倘若该隐不去摘苹果的话,上帝本来会不太介意。该隐怂恿天使违背无所不能的上帝那一番花言巧语,是伊拉斯谟机智的极品之作。该隐说:“你佩带一柄重

剑在大门口站岗舒服吗？我们已经在用看门狗看家护院。地上的生活不错，而且会越来越好。毫无疑问，我们将学会治病。上帝说的禁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思，我看并不清楚。不过，在禁忌的知识方面，只要坚持不懈地辛勤劳动，我们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如此，守护天堂的天使终于禁不住诱惑。该隐把农事管理得出奇地好，然而上帝还是对他的违规进行惩戒。这个故事把《圣经·创世纪》里的天堂故事和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故事巧妙地结合起来，过去的人文主义者还没有编造过这样的故事。

33 伊拉斯谟继续以诗人的身份示人，在同仁中以诗人的面目行事。然而，他的心已经不在文学里畅游。这就是伊拉斯谟思想发展的特点之一：他没有遭遇过剧烈的危机。许多思想大师都经历过内心的挣扎，我们却没有发现他有过类似的思想斗争。他的兴趣从文学转向宗教，但那不是信仰的改变。伊拉斯谟生平没有塔尔色斯^①那样的经历。他的过渡是渐进的，从来就不曾彻底转变。在未来的岁月里，伊拉斯谟可以率性而为、信马由缰——这样说不会使人疑为虚假。他任由兴趣或情绪而变，交替扮演诗人或神学家的角色。他让心灵深处的潜流逐渐浮出水面；他在环境的压力下而不是在心血来潮之上升到了伦理意识的高度。

转向信仰问题的欲望在他的早年生活中已经初露端倪。在修道院生活期间，他在给高达的科尼利乌斯的信中表示：“我决定将来不再写诗，除非是为了讴歌圣贤或圣洁。”不过，这样的表白是年轻人一时想要表达的虔诚。在他初访英格兰之前的岁月里，他的著作与其他的书信还是显露出世俗的倾向。只有在生病或疲惫的时候，他才不去碰世俗的文学。在那样的时刻，世俗使他不快，他鄙视自己的抱负，于是就渴望在神圣情怀中尽享安宁，静静地默念《圣经》，反省过去的错误而潸然泪下。不过“不再写诗”的文字是一时的兴致使然，我们不应该太认真。

① 塔尔色斯(Tarsus)，土耳其南部城市，使徒保罗(Saint Paul)的出生地。保罗传教时经常给人洗礼。这里的塔尔色斯比喻信仰或思想的急剧变化。

科利特的高论和榜样使伊拉斯谟为之一变。他过去的神学研究散漫杂乱,此后,他决心把神学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目标。科利特敦促他诠释摩西五经^①或以赛亚^②书,就像他科利特注解使徒保罗的书信一样。伊拉斯谟谢绝了;他不能从命。这显示了伊拉斯谟的洞察力和自知之明。在这一点上,伊拉斯谟比科利特高明。科利特不通晓《圣经》的初始语言,他依靠直觉解释《圣经》,伊拉斯谟对此不满:“我亲爱的科利特,你行事不太谨慎,你这是在火山岩里取水(普劳图斯^③语)。我自己没有学过的东西就去教学生,那不是太轻率吗?我自己冻得发抖时怎么能够给别人温暖呢?……你抱怨说,你对我的期待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但我从来没有答应过担任这样的课程。我向你坦言自己的真实情况时,你拒不相信而欺骗自己。我到这里来也不是要教诗学或修辞(科利特曾做过这样的暗示)。这些领域不再使我感到甜蜜,因为它们不再是我之所需。我谢绝其中之一的教学任务,那是因为它达不到我的人生目标。我不能接受另一个教学任务,那是因为它并非我力所能及……不过,倘若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具备必需的内功,我也会选择你这样的角色,去献身于神学,即使不是做得很好,至少也要做出真诚的努力。”

34

伊拉斯谟从这一件事得出的结论首先是,他应该更加通晓希腊语,那时他仅仅是初通希腊语而已。

与此同时,他在英格兰居留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巴黎。动身之前,他给旅居意大利的学生罗伯特·费希尔写信,高调表示他对英国之旅非常满意。令人愉快、有益健康的气候(他对气候很敏感);很有人情味,讲究学问——不是那种老掉牙的鸡毛蒜皮的摆设,而是深奥、纯正、古

① 摩西五经(Pentateuch),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的前五卷。

② 以赛亚(Isaiah),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的预言家。

③ 普劳图斯(Plautus,前254?—前184),罗马喜剧作家,代表作有《一罐金子》、《驴子的戏剧》、《吹牛军人》等。

色古香、具有拉丁和希腊印记的学问。他不再需要到意大利去。他认为，他在科利特的身上看到了柏拉图的影子。像威廉·格罗辛^①这样的希腊文化学者，托马斯·利纳克尔^②这样博学的医师，谁不佩服啊！和托马斯·莫尔相比，他们的精神不是更柔韧、甜蜜、愉快吗！

正当伊拉斯谟 1500 年 1 月准备离开英格兰的土地时，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遗憾的是，这件事不仅使他令人愉快的记忆变得朦朦胧胧，而且在他的生涯中构成了另一个障碍，在他非常敏感的心灵里留下了伤痛，而且是多年困扰他的伤痛。

35 他后来在巴黎的生活很不稳定。坎布雷主教的资助大概已经撤销；维尔的安娜夫人的资助仅存一点涓涓细流，且随时都可能干涸；他也不能够太倚重蒙特伊爵士。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度的经费、未雨绸缪的应急储蓄是极其重要的。他在英格兰的积蓄大约有 20 英镑。不久前，亨利八世恢复了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的一条法律，禁止金银出境。不过，莫尔和蒙特伊要他放心：只要他带出境的不是英格兰金属币，应该会安然无事。到了多佛码头出境时，他才知道海关坚持的是另一种意见。他只能携带 6 枚印有“天使”像的辅币，其余的全扣在关员的手里，显然是被没收了。

这件事造成的震撼大概造成了他的幻觉。从加来到巴黎的路上，他觉得受到匪徒和杀人犯的威胁。在英国海关失去金钱之后，他再次陷入了寅吃卯粮的困境，迫使他不得不再次卖文为生，他本来已经厌恶这样的生涯。本来付出之后应该得到的酬劳，他却不得不向他的赞助人讨要，这使他倍感屈辱。最难以忍受的是，这打破了他的心理平衡，刺伤了他的尊严。然而，这样的厄运却使世人深受其惠，对伊拉斯谟而言，这也是他塞

① 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 约 1446—1519), 英国学者, 在英国传授希腊语的第一人, 和伊拉斯谟过从甚密, 但作品甚少。

② 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 约 1460—1524), 英格兰医师, 古典学者, 亨利八世御医, 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首任会长。

翁失马的契机。世人得到的好处是他所著的《格言集》，他得到的好处是名气。这是他在这段时间的卖文生涯里的第一部作品。

多佛海关的不幸激起伊拉斯谟的愤怒，他渴望报复。几个月后，他致信巴特说：“我的情况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在英格兰受到的伤害现在才发作，始终挥之不去，而且感觉很沉重，因为我没有一点报复的办法。”又过了6个月之后，他在信里说：“我现在忍气吞声，但毫无疑问，总有机会报复的。”然而在此期间，精明的洞见总是告诉他：他的力量并非总是能够达到他的理想。此前他对英国人的印象并不错，英格兰人并非这次不幸事件的帮凶，他的朋友更说不上干了坏事。他从未指责莫尔和蒙特伊，没有抱怨他们不准确的信息给他带来的伤害。与此同时，他总是能够看到美德外表之下的利益，利益告诉他，眼下尤其不能和英格兰人绝交，这次不幸反而成了极好的机会，使他能够加强和英国朋友的关系。在后来的著作里，他对整个事件的解释非常天真，常常使人觉得像是他的忏悔录，尤其当他想要压抑或遮掩的时候，更像是他在忏悔。

36

“回到巴黎时，我是个穷光蛋。我想，许多人指望我写文章报复，写一点攻击英王或英格兰的东西；那毕竟是文人的时尚之举。同时我害怕，由于威廉·蒙特伊间接造成了我的损失，他可能会担心失去我的友情。我决定尽快发表一点东西讲清楚事情的原委，目的是要让指望我报复的人感到羞愧，是要表明我的态度：我不会由于个人的委屈而抱怨整个国家，不能因为一点小小的损失就不体谅朋友，就冒险让英王对我不满，或让朋友感到不快；同时我想要向朋友蒙特伊证明，我对他的好感不减分毫。因为我没有现成的东西发表，我急忙用几天的时间读书，集结一些格言编成小书，无论结果如何，希望这本小书对学生有用。这就证明，我的友情没有冷却。稍后，我在附录的一首诗里争辩说，我并没有因为金钱被人剥夺就迁怒于英王或英国。我的种种安排没有引起不好的反响。我的节制和直率使我在英国拥有许多朋友，他们都是博学、正直和有影响的人物。”

这是比较典型的合乎伦理规范的处事态度。他比较成功地控制住了

自己的愤怒,所以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时,他可以这样说:“一记重击之下,我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但我泰然处之,回头去啃书时,兴致更浓,热情更高。”但他的朋友知道,那种伤害很深。蒙特伊 1509 年致信伊拉斯谟说:“此刻(听说亨利八世加冕),一切怒气想必都离开你的灵魂、烟消云散了。”这封信的捉刀人可能是安德鲁·阿莫尼乌斯(Andrew Ammonius)。

从英国回到法国的那 10 年里,伊拉斯谟生活艰辛。他的手头极其拮据,凡是能够找到的工作他都不得不干,他还是靠才能和知识谋生。他又不得不去干诗人和修辞家的行当。他的书信文采斐然,常引用大量的神话,透露了许多以谦恭寻求赞助的情节。他的诗作很有名气;故以诗歌会友时,他可以得到资助。在此期间,神学活动上升的景观常常在他的脑海里浮现。这使他鼓起勇气,提起精神,坚持不懈做学问。他致信巴特说:“真的难以想象,我的心强烈渴望完成一切想要撰写的著作,同时又提高希腊语水平,然后就全心全意去从事神圣的学问,这是我在灵魂里的长期渴望。我的健康情况相当好,所以我要调动每一根神经把我们那本书付梓出版。这是我今年(1501)的任务。这本书讲的是神学,我将揭露那些人数众多的挑刺人,那些神学问题值得我去研究。如果上帝再给我 3 年的时光,嫉妒就无法奈何我了。”

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心态是干大事的心态,这并不纯粹是献身精神引起的冲动。在他的心目中,恢复真正的神圣学问是他的重任;遗憾的是,这样的直抒胸臆也表现在一封信里,其实他写信的目的是告诉忠实的巴特如何与维尔的安娜夫人打交道,以便为他争取到一点资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谋生的工作常常使他历尽磨难,且有衣食之忧。他无法再继续忍受,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离开。1500 年的部分时间是在奥尔良度过的。有一个故事盛传他和奥古斯丁·文森特·加米内德(Augustine Vincent Caminade)的关系。加米内德是小有名气的人文主义者,后来当上了米德尔堡的市政官。加米内德接纳青年人住宿。故事难以尽述,但足以揭示伊拉斯谟的心态,足以显示他非常不信赖朋友。还有人盛

传他和雅各布·沃克特(Jacobus Voecht)的关系,显然他在沃克特家借宿不花钱,而且他为沃克特招揽了一位富有的房客。这位房客是坎布雷主教的私生子兄弟。在这一段时间里,伊拉斯谟断言,坎布雷主教派斯汤东克在巴黎跟踪他。此间,伊拉斯谟把坎布雷叫做吝啬鬼。

这个时期的书信表现出愤愤不平的情绪。伊拉斯谟疑虑重重,脾气急躁,对人苛求,有时对朋友粗鲁失礼。他不能忍受威廉·赫曼斯转向伊壁鸠鲁的学说,对赫曼斯缺乏冲劲也不能忍受,他感到伊壁鸠鲁很陌生。最令我们难过的是他对老实本分的巴特说话的方式。当然,他高度赞扬巴特,并允诺要使他声名不朽。然而,当巴特不能立即顺从他颐指气使的命令时,他竟然气得七窍生烟。他吩咐巴特对维尔的安娜夫人如何说话、说什么话,以便为他本人争取资助,那真是有点不知羞耻。1502年上半年,忠实的巴特不幸去世,他失去了一位至交,但他哀悼巴特的话却是那样的吝啬。

看起来,伊拉斯谟似乎要报复巴特,因为和巴特的交往无意之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他需要朋友帮助的程度远远超过了 he 表面上做出的样子;为了得到那点微薄的资助,他不愿向维尔的安娜夫人宣示他的根本信念和高雅的品味。他用沉闷的勃艮第文风向她致意,那是历代荷兰人熟悉的文风,世世代代的荷兰人憎恨他使用这样的文风。伊拉斯谟恭维她表面上的虔诚。“我送上几段祈祷文,凭借这几段祈祷文,你就可以召唤女神,哪怕她不情愿,她也会应召下凡,你召唤的不是月亮女神,而是诞生了公正阳光的女神。”

你禁不住莞尔一笑吧?呜呼,《格言集》的作者伊拉斯谟竟然写下这样肉麻的书信。你的感觉再坏不过了吧?

第五章 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

《格言集》与后期类似作品的意义——解释古典文化——拉丁文——
疏远荷兰——荷兰人伊拉斯谟

39

在法国旅居期间,伊拉斯谟声名日盛。使他出名的是文学成果,这是他不再那么喜爱的领域。1500年,《格言集》问世;这本书问世在他多佛海关折钱之后,但他还是把书献给了蒙特伊勋爵。《格言集》收录了大约八百条古拉丁作者的箴言警句,再加上伊拉斯谟的阐述发挥,其读者对象是渴望学习优雅拉丁文风的人。献辞指出,一书在手,学习写作的人就掌握了大量的历史名句,既可以装点文章的风格,也可以加强文章的论述。伊拉斯谟给予读者的就是这样的帮助。然而实际上,他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只于此。和以往的人文主义者比较,他吃透的古典精神和熟悉的领域都胜人一筹。

此前,人文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古典文化,目的是要炫耀大众匮乏的知识,是想要成为令人称奇的饱学文雅之士。由于教学的急需,由于他对人类及其文化真诚的爱心,伊拉斯谟介绍的古典精神是要能够反映16世纪基督徒的心灵,是要引起广大民众的反响。当然它不可能进入

一切人的心灵,因为一旦用拉丁文写作,受他直接影响的就只能够是受过教育的阶级,那时有文化的人只限于上层阶级。

伊拉斯谟使古典精神得到广泛的传播。人文主义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据庇突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记述,《格言集》即将问世时,一些人文主义者指责伊拉斯谟,说他泄漏天机,揭开写作艺术的神秘面纱。但他渴望打开古典之书,让所有人学习。

40

伊拉斯谟的文学著作和教育著作大部分是在巴黎居留时期开始创作的,但大多数要多年以后才刊行于世。这些著作使一般人的表达和论述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反复指出,这一点突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无数的其他作家当时也在做类似的工作。然而,只需要扫视一眼现在广泛流行的《格言集》和《对话集》的各种版本,我们就立刻意识到,他在这个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人贡献的总和。今天,在所有人文主义者中,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只有伊拉斯谟的名字。

让我们用一点时间展望伊拉斯谟稍后的生活,列举他的文学著作和教育著作。几年之后,《格言集》从几百条增加到几千条,于是拉丁智慧和希腊智慧都透过这本书向人们说话。1514年,他出版了用类似方法搜集的《寓言集》(*Parabolac*)。这是他心中想到的《格言集》的续集,含暗喻、谚语、典故、诗歌寓言、《圣经》寓言等,全都用类似的方式编纂处理。晚年他出版了一本“同类语汇编”,搜录的条目含机智诙谐的趣闻轶事和古代智慧闪光的言行,该书名为《箴言集》(*Apophthegmata*)。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他编写的偏重语法性质的书。这些书很多,且十分珍贵,有《丰富多样的词语》(*De copia verborum et rerum*)、《书信指南》(*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等等。他把一些希腊文献翻译成拉丁语,使那些不希望攀登高山之巅的人看到了一线能够登顶的希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应用上述各方面知识的过程中,他形成了难以模仿的风格,他用这种风格撰写了《对话集》和无数的书简,这些书信源源不断从他的笔端流泻出来。

这些著作构成了当时的古典研究的总体水平(在质和量上都达到了

41

16世纪能够达到的高度),仿佛陈列在大百货商店里的食品,可以“零售”。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胃口各取所需;作者设计了多种方式,学生可以借此得到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谈及增订本《格言集》时,伊拉斯谟说:“你可以这样读我的《格言集》:读了一条格言之后,你就好像通读了全书。”这是因为他亲手做的索引促进读者去对条目进行互相参照。

在整个经院哲学界,他被认为是唯一的权威,他掌握了这个哲学体系的一切技术细节,熟悉它的一切思想和细腻的表达方式,他通晓《圣经》、逻辑和哲学。在经院哲学用语和自发产生的通俗语文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自彼特拉克^①起,人文主义者进行论述时用古典、奔放、隽永、自由的风格取代了讲话的三段论。就这样,做学问的语言接近了日常生活里自然的语言表达方式,即使在继续使用拉丁文的情况下,通俗语言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伊拉斯谟的著作涉及的题材极其丰富,在这一点上,无人能出其右。一切生活知识、一切伦理主题,都用不可争辩的古典权威来支持,一切内容都用细腻、轻盈的形式来表达,使人不得不佩服。而且,他的古代知识真可谓浩瀚无际!他对现实生活中不同凡响事物的渴望是难以模仿的,他吸收非凡事物的能力也是难以模仿的。这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伊拉斯谟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头脑对重要事件、奇异细节、稀罕事物和异常现象的渴望永无止境。那个时代还不存在后世那种精神上食古不化的现象,后世的人不再去消化现实、欣赏现实。那时的人喜爱的却是现实知识的多多益善。

然而,伊拉斯谟及其同道在文明领域走错路了吗?他们瞄准的是否就是真实的现实呢?他们引以自豪的拉丁文学问不是致命的错误吗?这

^①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著有《爱情诗集》、史诗《非洲》等。

正是历史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要害问题。

今人捧读《格言集》或《箴言集》以求丰富自己的生活(这正是这两本书的宗旨,也是其价值所在)时,很快就难免自问:“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历史思考之外,有关古代社会的那些朦朦胧胧的人物的那些无穷无尽的细节和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和我没有丝毫关系呀。”而且,读者还会继续沿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这些人物对伊拉斯谟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关系呀。当然,16世纪卷帙浩繁的历史并不是用古代的语言和语汇写就的,这一段历史并没有建立在古人的兴趣或观点之上。16世纪里没有佛里吉亚人^①、萨洛尼卡人^②,也没有阿格西劳斯^③、狄奥尼修斯^④之类的人物。人文主义者从这些研究中创造了一种精神境界,这是从时间局限里解放出来的精神境界。

人文主义者影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吗?这才是重要的问题,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之类的问题,我们并不准备去进行解答。

无论如何,伊拉斯谟及其同道使文明的国际性大大提高;这样的国际性始于中世纪,促成国际性的因素有拉丁文和教会。倘若他们自认为正在把拉丁文变成日常国际交流里真正的工具,那显然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在巴黎学界的那种国际氛围里,倘若有人策划把拉丁文用作运动模式和游戏模式的通用语,那无疑是有趣的幻想和智慧的操练。然而,伊拉斯谟会不会认真地思考,下一代人可能会用拉丁语来玩弹子游戏呢?

尽管如此,精神交往无疑在广阔的范围内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自从

① 佛里吉亚人(Phrygians),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佛里吉亚的居民。

② 萨洛尼卡人(Thessalians,今Salonikans),希腊中北部港口城市萨洛尼卡的居民。

③ 阿格西劳斯(Agesilauses,前444?—前360),古斯巴达国王,崇尚武功,精于谋略。

④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前430?—前367),古希腊叙拉古的国王,曾经征服意大利和西西里岛。

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国际交往还没有过如此之大的规模。自那时起，与伊拉斯谟邂逅的，就不仅是教士了，偶尔还有文人；为了在市政部门谋到一个职位，许多市民和贵族的子弟也到文法学校里去求学，他们在求学的路上也会邂逅伊拉斯谟。

43 如果不是用拉丁文研究和写作，伊拉斯谟不可能达到世界知名的程度。他不可能把自己的母语荷兰语变成世界通用语言。他的同胞也许会问：以伊拉斯谟的天才、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表达能力、兴致勃勃的胃口、大量的作品，如果他用母语创作，那对荷兰文学会做出多么重要的贡献啊！试想《对话集》用16世纪鲜活的荷兰语写成，那会是什么样子！倘若他不从古典文献里搜集格言，而是到通俗荷兰语里去收罗格言，他写出来的书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我们荷兰人而言，不错，这样的格言警句可能比他有时过分讲究的拉丁箴言更有滋有味，但那只会对我们荷兰人有滋有味。

这样的推理是有悖历史事实的推理，因为那样的通俗荷兰语作品并非时代之需要，也并非伊拉斯谟力所能及。显然，伊拉斯谟只能够用拉丁文写作。何况，通俗语写成的作品对他的胃口而言，似乎太率直、太个性化、太真实了。如果没有那层朦朦胧胧、似隔非隔的面纱，如果他不把一切思想包裹在拉丁文中来表达，他就绝不可能那样随心所欲地挥洒。如果是那样，他那精细如丝的头脑就会萎缩，就不会有拉伯雷^①那种言简意赅的粗犷，也不会有路德风格的德语那样的猛烈了。

疏远母语的情绪早在他幼年学习读书写字的时候就开始了。当他离开斯泰恩修道院的时候，他就疏远了自己的故土。用拉丁文写作驾轻就熟之后，他和母语的距离更加拉大了。他用拉丁文和用母语一样得心应手，甚至可能更加如鱼得水。毕竟，他缺乏只用母语和同胞交流的经验，用母语反而觉得不那么随心所欲了。不过，另一个心理因素也产生了影

① 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83? —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巨人传》。

响,并使他疏离故土。在巴黎,他看到他发挥聪明才智的前途,深信同胞们不能够充分赏识他的才能。也许,他这个想法真有点道理。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受伤的自恋情绪做出的反应。荷兰人对他太熟悉了。他们看见过伊拉斯谟幼小孱弱的身子。他在故土不得不对许多人表示服 44 从,但他首先想要的是自由。他讨厌狭隘、粗俗、酗酒,这是他熟悉的民风。他心里把这种民风归纳为应该非难的荷兰民族性格。

此后,他说起荷兰时老是带有一丝自贬的鄙夷之情。和老朋友科尼利乌斯·奥里利乌斯一样,老朋友威廉·赫曼斯用最优秀的才智献身于荷兰历史的研究。于是他就写信规劝说:“我看你满足于在荷兰的名气。”在另一个场合他写道:“荷兰的空气有益于我的身体,但饮酒作乐的狂欢使我厌烦;更令人厌烦的是粗俗、缺乏修养的性格,对学习的极端鄙视、没有学问和极端的嫉妒心。”他对自己的少小之作表示歉意:“那时,我写作的对象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荷兰人,是那些耳不聪目不明的荷兰人。”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求荷兰人口才流利,那就无异于要求比笨蛋还笨蛋的人去参加雄辩。”更加刻薄的话还有:“如果你听到的故事没有风趣,请记住,那就是荷兰人的故事。”毫无疑问,以上言论透露出他虚假的谦虚。

1496年之后,他的故乡之行全都是行色匆匆。没有迹象表明,1501年之后他还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他劝国外的同胞不要回去。

尽管这样,对故土的亲切怀念偶尔之间还是会在他心里涌动。有机会的时候,他还是会抒发对故土的深情。在解释《格言集》里收录的马提雅尔^①著《巴塔维人^②的耳朵》(*Auris Batava*)时,他就利用这个机会颂

① 马提雅尔(Martial),罗马诗人,活跃于公元前1世纪,被视为警句诗的开山祖师,代表作为警句诗1500首,其中一些作品有淫秽之嫌。

② 巴塔维人(Batava),荷兰王国荷兰省人,赫伊津哈常常用以泛指所有荷兰人,详见下文。

扬他最亲爱的荷兰：“这是我永远崇敬的国土，它赋予我生命。正如我不必为它而自惭形秽一样，我能够为它增光吗？”荷兰人有名的粗俗使他们受人尊敬。“倘若‘巴塔维人的耳朵’意味着马提雅尔淫秽的笑话使人感到恐怖，我倒是希望一切基督徒都长着荷兰人的耳朵。如果考察荷兰人的道德，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民族的人性和仁爱堪与其比，没有一个民族的野蛮和残忍不超过荷兰人。他们思想正直，没有一丝狡诈和欺骗。如果说他们有一点耽于色欲，饮食过量，那是因为他们物阜民丰：进口食品之便利、物产之丰富无人能敌。碧绿的草地一望无际，来往的舟楫不绝于江河与海洋！小镇鳞次栉比，这个小国城镇之密度堪称世界之最；城镇固然不大，管理却极其完善。市井洁净，人见人夸。非凡精湛的学问固然稀罕，但如此之众的平民粗通文墨，其他的地方却是难以企及的。”

这些理想是伊拉斯谟最珍视的理想，他把这些理想和品格赋予同胞；他珍视的品格有：温和、诚挚、淳朴、纯洁。在其他场合，他也高唱对荷兰的热爱。说到慵懒的女人时，他做了这样的比较：“在法国，你看见许许多多慵懒的女人；在荷兰，你看见的却是不计其数的勤劳女人，她们辛勤操持家务，支持她们无所事事、狂欢作乐的丈夫。”在《对话集》里一篇文章《沉船》里，慈善为怀的荷兰人安置了所有的海难幸存者。“他们周围是喜欢暴力的国家，但他们是最富有仁爱之心的人民。”

既然《伊拉斯谟传》英文版的对象是英语读者，指出伊拉斯谟用“巴塔维人”这个译名指称荷兰人的习惯，也许不是多余之举。其实，巴塔维仅仅是荷兰当时的一个省，含今天荷兰王国的南北两个荷兰省，范围从瓦登群岛到穆斯河口。即使巴塔维人的近邻比如西兰人和弗里斯兰人也不包括在内。

然而，当伊拉斯谟说到祖国(*patria*)和同胞(*nostras*)时，那就是另一种情景了。在那些年月里，民族意识才刚刚开始在整个低地国家萌芽。荷兰人仍然自称为荷兰省人、弗里斯兰人、弗莱明人、布拉邦人。不过，语言和习俗的社群、强大的政治影响则是另一回事。一百多年来，在勃艮第

王朝的政治影响所及的所有低地国家地区,凝结成了一种团结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没有止步于比利时的边界。那种感情是一种强烈的勃艮第爱国情怀(即使在哈布斯堡王朝^①实际上取代勃艮第王朝控制低地国家以后),而不是低地国家民族的爱国情怀。人们喜欢用“狮子”纹徽来指称低地国家。伊拉斯谟也用这个符号。在他的著作里,我们看见的爱国情怀逐渐从狭隘的荷兰省情怀过渡到勃艮第情怀。起初,他笔下的祖国指的是荷兰省,不久祖国就成了整个的低地国家。追溯他兼有厌恶和依恋的感情逐渐从荷兰省迁移到整个低地国家的过程,实在是饶有趣味的。1535年,他重申“年轻的时候,我写东西的对象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布拉邦人和弗莱明人”。于是这两个地方的人就有了率直的名气。后来,他又把对荷兰省人的描绘迁移到卢万人的身上:三朋四友喝酒的情景随处可见;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事。他反复抱怨,没有美好文学感觉的地方,莫此为盛;做学问受鄙视的地方,莫此为盛;当布拉邦的隆格利乌斯(Longolius)扮演法国人的角色时,伊拉斯谟感到恼怒:“我在他身上差不多花了3天的时间;他令人愉快,但他的法国味太重,其实人人都知道,他就是和我们一样的荷兰人。”^②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登基时,伊拉斯谟写道:“他运气好,我则为祖国祈祷,但愿他的登基不仅对荷兰省是福,而且对我的整个祖国都是福。”当他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时,他越来越想要回归祖国。1528年,他在巴塞尔写道:“费迪南国王邀请我到维也纳,做了种种许诺,但布拉邦是我最好的安息地。”

① 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Dynasty),哈布斯堡皇室是一个德意志皇室家族,皇室成员曾分别担任欧洲各国统治者,王朝的统治从中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在查理大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建立的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统治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时,哈布斯堡王朝因此而达到其鼎盛时期。

② 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1026号,比较第914号序,第473页。稍后伊拉斯谟相信,隆格利乌斯是荷兰人。比较第1507A号。——原注

第六章 渴望神学

→1501

在图尔内瀚城堡:1501——复兴神学成为生活目的——学习希腊语——让·威特里耶——《基督徒士兵须知》

47 贫困的日子还是挥之不去,伊拉斯谟的生计不稳定,住所不固定。他的收入岌岌可危,然而他迁移的原因始终是考虑健康而不是考虑生存;他做学问的动力是强烈渴望深入到最纯洁的知识领域,而不是为了谋利。这实在是令人惊叹。对瘟疫的恐惧驱使他不断迁移:1500年从巴黎到奥尔良,在那里先在奥古斯丁·文森特·加米内德家里借宿;但一位宿客生病之后,伊拉斯谟立即离开。之所以这么害怕瘟疫,恐怕和他青年时代在德文特的印象有关系,那时的瘟疫流行实际上从不间断。浮斯特斯·安德烈利努斯派一位仆人去指责他是懦夫。伊拉斯谟把朋友的指责顶回去:“倘若我是瑞士士兵,那是不能容忍的侮辱。可是人的灵魂热爱安宁与平和的地方,这是抵御胆怯的最好的武器。”1501年春,他再次离开巴黎,原因还是害怕瘟疫。他致信奥古斯丁说:“频繁的葬礼使我惧怕瘟疫。”

他先回荷兰。在斯特恩修道院,他告假再离开一年,以便学习;在外漂泊这么多年之后,如果没有获得威望就回国,朋友们会为他感到羞愧。

接着他到哈勒姆去看望老朋友威廉·赫曼斯,然后又到南方其拜望坎布雷主教,会晤的地点大概是在布鲁塞尔。随后从那里转到图尔内翰城堡去拜访维尔的安娜夫人,但他没有机会和这位赞助人交谈。1501年6月,他在这个城堡里和忠实的朋友巴特度过了一段安静的时光。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奔波中,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献身学问的理想。从英国回来之后,他有两个首要的欲望:一是编纂圣哲罗姆这位伟大教会领袖的著作,二是精通希腊语,精通希腊语的欲望尤其强烈。1500年底,他从奥尔良给巴特写信说:“你知道这一切计划对我的名气多么重要,不对保存古典学术多么重要。”倘若伊拉斯谟仅仅是一般追求名利的人,他或许能够找到许多其他的权宜之计。他热望深钻古典的源头,即使在借此争取一点赞助的时候,他也想让人知道他的动力是什么。他致信巴特说:“听我说,我还要请你帮忙。你一定要想办法从(圣伯廷修道院的)修道院长那里给我搞到一点资助。你知道院长的脾气;你可以编造一点不大不小、说得过去的理由向他讨钱。告诉他我的宏图大志,无论圣哲罗姆是多么的浩瀚无际,我都要恢复他的一切学问;他的学问被过去的牧师糟蹋、肢解了,被愚昧者搞得像一团乱麻。我要重新确认那些希腊经典的地位。我敢说,我能够解释圣哲罗姆的经典,阐释他的风格,我对他的理解是前无古人的。告诉他,为此目的我需要很多书,还需要借助希腊语做学问,因此我需要帮助。亲爱的巴特,你这样告诉他绝不是说谎。因为我真的要做好这一切。”

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非常认真的,他将很快向世人证明他说话算数。他克服重重困难掌握希腊语是名副其实的壮举。在德文特修道院的时候,他学过一点基础知识,但根本就说不上掌握。1500年3月,他致信巴特:“希腊语快要我的命了,可惜我既没有时间学,也没有钱请老师教。”奥古斯丁·加米内德把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借给他学习,加米内德要他还书时,他抱怨说:“你剥夺了我烦恼时的唯一安慰。虽然我看不懂,但我热爱荷马的激情熊熊燃烧,看一看他的书也大饱眼福,我能够在脑子里重

49 塑他的形象。”伊拉斯谟说这句话时，他是否知道他完全复制了一百五十年前彼特拉克表达的感情呢？虽然困难重重，他毅然开始攻读希腊语。他是否请了老师，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清楚，但老师可能还是有的。起初他觉得希腊语很困难。然而不久他就可以冒昧地夸自己是“掌握希腊语的候选人”了；他开始自信地在书信里用一些希腊语。希腊语使他魂牵梦绕，他请所有的朋友代他购买希腊语的书。到1502年秋，他宣告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希腊语写作而且是即兴地写东西了。他期待希腊语可以使他大开眼界，使他正确理解《圣经》；他没有失望。三年坚持不懈的学习使他的心血得到报偿。但他同时学习的希伯来语却被迫放弃了。与此同时（1504），他着手翻译希腊经典，借以用批判的眼光研究神学；他教希腊语，学生之一是法国医师、人文主义者威廉·柯普（William Cop）。几年之后，他发现意大利再也没有使他提高希腊语水平的余地了；后来他相信，在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这两种语言上，他给意大利的贡献多，他从意大利学到的反而少。

他热情高涨地学习希腊语，最好不过的证据是他要朋友分享幸福的热情。他断定，巴特应该学希腊语，但巴特没有时间学，对巴特更有吸引力的是拉丁文。伊拉斯谟到哈勒姆去看望威廉·赫曼斯，可他的目的也是要让威廉研究希腊文学。他随身携带着一大袋希腊语书籍。但他的心血只得到了痛苦的回报。威廉根本就不热心，这使他非常失望，所以他认为，他不仅浪费了金钱、白费了心血，而且还失去了一位朋友。

在此期间，他拿不定主意近期应该到哪里去。去英格兰还是去意大利亦或是回巴黎？最后，他在法国北部羁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从1501年秋天到次年夏天，先在圣奥梅尔的圣伯廷修道院做客，然后在附近科特波恩城堡做客。

50 伊拉斯谟在圣奥梅尔结识了修道院院长让·威特利耶（Jean Vitrier）。他认为，威特利耶堪与科利特比肩，是真正的圣贤。威特利耶是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但他直率地抨击修道院生活的弊端，因而他受到巴黎

大学的谴责。伊拉斯谟因惺惺相惜而接近威特利耶。威特利耶并没有因为受谴责而放弃修道院的生活,但是他致力于改良男女隐修院的制度。他的学问从经院哲学回溯到使徒保罗,他的基督教生活观念很开明,他强烈反对传统的积习惯例和繁文缛节。毋庸置疑,威特利耶对伊拉斯谟的《基督徒士兵须知》^①的源起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伊拉斯谟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伊拉斯谟后来坦承,这本《须知》是偶然的产物。这本书没有反映出创作冲动的外部情况。当时的外部情况是:图尔内瀚城堡的一位常客是一位军人、巴特的朋友,他行为放荡,对虔诚的妻子态度粗暴,既没有文化,又仇恨基督徒。^②除此之外,他倒是脾气不错,而且把伊拉斯谟排除在他仇恨的教士之外。妻子利用自己和巴特的关系请伊拉斯谟写一点东西规劝她的丈夫,使她的丈夫对宗教感兴趣。伊拉斯谟接受了她的请求。让·威特利耶院长高兴地赞同书里表达的观点。稍后,伊拉斯谟在卢万逗留期间对书稿做了加工。1504年,《须知》在安特卫普出版,出版商是迪尔克·米尔滕斯(Dirck Maertensz)。

这就是《须知》问世的外部环境。但内心的动因则是:伊拉斯谟必然要就时人对宗教的态度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是或早或迟的事情。讲究仪式、没有灵魂的基督徒承担义务的观念是他的眼中钉,他必然要表示自己的态度。

在形式上,《须知》是为一位没有文化的士兵准备的手册,目的是要他学会与基督徒身份相称的心态,仿佛伊拉斯谟要用手指头为这个士兵指

51

① 《基督徒士兵须知》(*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格言集,对象为受过教育的军人,包罗宏富。

② 艾伦认为,这位军人是特拉津尼斯的约翰(John of Trazegnies),雷诺特(Renaudet)同意这一判断,但这未必可靠;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164号,第373页;比较雷诺特著《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Prereforme et Humanisme*)。——原注

出通向耶稣的捷径。他笔下的朋友厌倦宫廷生活——这是当时文学里的常见主题。写这本书的过程只中断过几天，他应朋友的请求去讲神学，因为写书的过程就是纯洁神学的过程。为了维持军人的风格，他把《须知》的书名定为 *Enchiridion*，因为古希腊语的 *Enchiridion* 有两个意思：一是短剑，一是手册^①，书名可以直译为“基督教士兵的短剑”^②。伊拉斯谟提醒士兵注意自己的职责，历数耶稣民兵的武器。自知之明是智慧的开端。书中先讲基督徒行为举止的一般规矩，接着讲如何矫正具体的罪孽和过失。

这就是《须知》的外部框架。但在这个范围内，伊拉斯谟首次发现了提出自己神学主张的机会。他号召我们回归《圣经》。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努力理解《圣经》纯粹的、原初的意义。为此目的，基督徒要从学习古人、雄辩家、诗人和哲人开始，尤其要学习柏拉图。学习创教的神父、圣哲罗姆、安布罗斯^③、奥古斯丁等人也大有裨益，但稍后的大批注经者却不能望其项背。伊拉斯谟瞄准的主要是推翻宗教里固守仪轨的观念。僵化繁文缛节是犹太教的仪式主义，是没有价值的。他的主张是：宁可正确理解《圣经》里的一首赞美诗，以便加深对上帝的理解和教徒自己的理解，以便吸取道德寓意和举止准则，而不是读完《诗篇》后仍然心不在焉。如果仪式不能够使灵魂更新，它们就毫无意义，而且有害。“许多人常常计算自己每天听了多少次弥撒曲，把这一习惯说成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好像他们不需要在其他方面感谢耶稣的教诲；一旦离开教堂，他们又回归老习惯。”“也

52

① 在第 1500 条（第一卷第 123 页第 21 条）里，伊拉斯谟阐述奥古斯丁教士的职责（*Enchiridion*），比较第 135、138 条。在第 1501 条里，他把西塞罗受到的伤害叫做“短剑”。由此可见，他玩味“短剑”这个意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原注

② *Miles* 这个词在中世纪拉丁文里的意思是骑士，它在这里已经失去骑士的意义，只剩下“士兵”的意义了。——原注

③ 圣安布罗斯（Ambrose, 340? —397），米兰主教（374—397）、作家、作曲家。

许你每天都在奉献,但你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生活。你崇拜圣徒,喜欢触摸他们的遗物;你想效仿彼得和保罗吗?那你就模仿他们的信仰和善行吧,那比你到罗马朝觐十次还更重要。”伊拉斯谟并不排斥程式和积习,他不想动摇平民的信仰,然而如果仅仅用惯常的仪式来崇拜耶稣,他就难以容忍了。使信仰受贬损的为何首先是修士呢?“我羞愧地告诉你,大多数修士以迷信的态度紧守琐屑的仪式,他们(愚蠢得连仪式都不能发明的人)拘泥于头脑贫弱的人发明的仪式;可是他们却想强迫别人服从,他们相信别人会顺从,他们放肆地指责不顺从的人——这实在是令人憎恨。”

他要让保罗给人们传授真经。“因此坚定地站在自由的立场,这是基督给我们的自由,不要再受枷锁的约束”,保罗向迦拉太人说的这番话包含了基督教自由的教义。在不久之后爆发的宗教改革里,这句话响彻云霄。伊拉斯谟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并没有贬损天主教会的意思。不过,《基督徒士兵须知》指出,许多人准备放弃的许多东西却是他们需要保存的东西,这的确是事实。

《须知》的调子成为伊拉斯谟终生奋斗的调子:在这个世界上,实质和影子别若泥云;世人崇敬他们不该崇敬的人;愚蠢、陈规、轻率的藩篱使人看不清事物的实质——这一切多么令人恶心啊!在稍后的《愚人颂》和《对话集》里,他也表达同样的调子。给他激励的不仅仅是宗教感情,还有同样重要的社会感情。在《值得基督徒学习的意见》那一章之下,他悲叹极端的阶级豪情、民族敌意、职业嫉妒和教派竞争,这些东西把人分割开来。他要让每个人真诚地关怀自己的兄弟姐妹。“你掷骰子一晚上可能会赌输一千个金币,这个时候,一位悲惨的小姑娘却迫于贫困而不得不卖身;基督赋予的灵魂就这样失去了。你也许会说,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照看我自己的事情不就行了,我有我自己的指路灯。如果你抱定这样的念头,你还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吗?你连人都不够格!”

在《基督徒士兵须知》里,伊拉斯谟首次说出了他一直很想说的话,那是用热情和气愤、真诚和勇气说出来的话。然而你很难说,这本小书是他

冲动一时的作品,是在难以抗拒的虔诚的驱使之下写成的。我们又看到,伊拉斯谟把这本书看作小事一桩,他应朋友的请求在几天之内一挥而就,这是从他多年的学问中“窃取”的(严格地说,这仅仅是初稿,以后还要打磨)。他治学的主要目的早已成竹在胸,那就是恢复神学。以后他还要阐释使徒保罗呢。“那些诬蔑我们的人认为,这本书仅仅是虔诚高涨时候的应景之作,他们不懂高雅的文字为何物。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年轻时热爱古人高雅的文字,我们学会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种语言,那是夙兴夜寐苦读的结果,那不是为了幼稚的虚荣心,而是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要装点主的圣殿(有人因为无知已经使它失去了很多神圣的气象),我们要竭尽绵薄之力,同时又借用外来的材料,目的是要在高尚的头脑里激起对《圣经》的热爱。”难道这不是那位一如既往的人文主义者在说话吗?

我们还听见他自我辩护的调子。1504年末,伊拉斯谟致科利特的信也响着这样的调子。他随信赠送的《挑灯夜读》(*lucubrationes*)里首次刊印了《基督徒士兵须知》。“我写《须知》的目的不是炫耀我的发明或辩才,而是为了纠正时弊而尽绵薄之力。这个时弊是,有人的宗教信仰不限于犹太教的仪式和仪轨,还有人忽视了有助于产生虔诚信仰的事物。”他接着说的话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者的话,“我试图给读者一种虔诚的艺术,就像他人著书立说要建立科学理论一样”。

虔诚的艺术!倘若他知道,大约六十多年前就有一部低地国家的著作讲同样的艺术,且比他略胜一筹,他一定会感到惊讶。这本书比他的《须知》的魅力更加持久,向世人呼吁的口气更加迫切,这就是坎普滕的托马斯^①写的《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

《基督徒士兵须知》加上其他几篇著作合订的《挑灯夜读》不如《格言集》成功,并没有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伊拉斯谟论虔诚信仰的思考被认

① (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à Kempis, 1379? —1471),德意志天主教修士,在尼德兰奥古斯丁会修道院受神职,可能是灵修著作《效法基督》的作者。

为是过分大胆,但原因不在这里。因为书里并没有与教会抵触的东西,所以即使到了反宗教改革的时期,当教会怀疑伊拉斯谟写下的一切东西时,起草《禁书目录》(*Index Expurgatorius*)的教士们也只删掉了《须知》里的几段文字。而且,书中还收录了一些毋庸置疑的天主教著作。《须知》闻名遐迩,经久不衰,尤其受神学家和修士欢迎。安特卫普一位著名的布道人说,《须知》的每一页都是一篇布道辞。不过,这本书的广泛影响多半是在有学问的圈子里,伊拉斯谟在世界范围内的名气推动了这样的影响,因为它被翻译成了英语、捷克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后来,当路德^①发动宗教改革时,《须知》却受到怀疑。1526年,伊拉斯谟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今,他们也开始啮噬《须知》了,可它曾经深受神父们的欢迎。”在其他时候,正统的批评家反对的只有书中的两段话。

① 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抗议宗(新教)路德派的创始人,主张“因信称义”,即只要有信仰即可获得拯救,而不须借助于教会的典籍和仪式。1517年10月31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举起改革旗帜。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第七章 艰难岁月：在卢万，巴黎，英格兰

→1502—1506

巴特之死：1502——初访卢万：1502—1504——翻译古希腊文献——再访巴黎——刊印瓦拉的《新约评注》——再访英格兰：1505—1506——更多的赞助人和朋友——去意大利：1506——《阿尔卑斯颂歌》

55

有一段时间，伊拉斯谟的环境仍然不是很顺。1502年秋，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今年的运气总是处处和我作对。”好朋友巴特春天去世。遗憾的是，伊拉斯谟失去朋友后写的书信亡佚。伊拉斯谟为了纪念巴特而编订了《反蒙昧主义》(*Antibarbari*)，如果他能够再给巴特立一方纪念碑，我们当然会更加高兴。除此之外，维尔的安娜夫人再婚，她继续赞助伊拉斯谟的可能性可以不再考虑了。1502年10月，卑尔根的亨利即坎布雷主教去世。“我写了三篇墓志铭悼念坎布雷主教，两篇用拉丁文，一篇用希腊文。他们为这三篇墓志铭只支付了6个荷兰盾，在他身后，这对他的吝啬也名副其实。”布斯莱顿的弗朗西斯即贝桑松的主教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可能会提供赞助的人。伊拉斯谟仍然觉得危险的瘟疫使巴黎、科隆和英格兰对他关上了大门。

1502年夏末他去卢万，他说“被瘟疫驱赶到卢万”。1425年创建的卢万大学目的是要让荷兰人在精神生活上断绝依靠巴黎哺育的传统。在16

世纪初，卢万大学成为神学传统的堡垒之一；与此同时，它也没有妨碍古典研究领域的进展。否则，时任圣彼得学院院长和神学教授的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怎么可能为伊拉斯谟谋到卢万大学教授的职位呢？阿德里安就是后来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① 56

但伊拉斯谟总得想办法谋生。卢万的生活费用昂贵，而他却没有经常性收入。他为别人作序，把自己翻译的利巴尼奥斯^②的《讲演录》(*Declamationes*)献给阿拉斯的主教、卢万大学的校长，这是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本子。

1503年秋，美男子腓力(Philippe le Beau)即将从西班牙回荷兰时，伊拉斯谟写了一篇颂词，庆贺他的平安，颂词里流露出无奈的叹息。这篇颂词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伊拉斯谟全身心投入写作，其速度和流畅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我日以继夜地写这篇颂词。以厌恶的心情写，还有比这更难的差事吗？你写的文字败坏了你优雅的文风，还有比这更加无用的东西吗？”应该承认，他的确尽量少用阿谀奉承之词，但颂词本身就必然会非常恶心，所以在颂词的序文里，他痛快地承认，这一类文章并不合他的胃口。

1504年底，伊拉斯谟终于回到巴黎。也许他始终想回巴黎，他把卢万之旅仅仅是当作暂时的出行而已。我们对他离开卢万的背景一无所知，因为他1504年的书信几乎完全没有留下来。无论如何，他希望迟早能够在巴黎实现完全献身神学研究的目标。这一年底，他致信科利特：“亲爱的科利特，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如何开足马力、满帆前进，向着神圣的文学奋进；我憎恨一切阻挡或延迟我前进的东西。可是命运女神不垂青，她总是以那样的表情注视我。我总是无法摆脱令人苦恼的事情，原因恐怕就

① 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 1459—1523)，前任荷兰乌特勒支主教，后任教皇(1522—1523)，成为唯一一位荷兰籍的教皇。

② 利巴尼奥斯(Libanius, 314—393)，希腊诡辩家、修辞学家，在君士坦丁堡等地办学讲演，无视基督教的存在，试图维护希腊传统。

57 在这里吧。所以我回到法国的目的是,即使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至少可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摆脱这些苦恼的纠缠。此后,我就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神圣的文学,把余生献给对经典的研究。”倘使他有必要的经济收入,能够维持几个月的生活,倘若他能够摆脱世俗文学的纠缠,那就是万幸了。他用生活费给科利特寄送几百册《格言集》,难道科利特看不出来,他的处境是多么窘困吗?要不了几个钱就可以换取几个月的自由啊!

伊拉斯谟鄙视用自己的才华和令人羡慕的人文知识去挣钱,他挑战穷困,目的是要实现恢复神学的光辉理想。这的确是英勇的壮举。

在他的青年时代,意大利神学家洛伦佐·瓦拉是他走上纯正拉丁学问和古典学问的向导和典范;当他进入批判神学的领域时,同一个洛伦佐·瓦拉凑巧又成为他的标兵和前哨。这样的巧合真是令人惊叹。1504年夏,伊拉斯谟到卢万附近的普雷蒙特雷修道院(Premonstratensian)的藏书室里去搜寻资料,他发现瓦拉用拉丁文写的《新约评注》。这些手稿批注的是《新约圣经》里的《福音书》、《使徒书》和《启示录》。早在13世纪,罗马就承认,拉丁文圣经的文字并非白璧无瑕。修会和教士个人都致力于改善其文本,但使之纯正的努力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就,虽然15世纪时(吕拉的)尼古拉^①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伊拉斯谟爱上了瓦拉的《新约评注》。这大概是使他转向总体上研究《新约圣经》的牵引力。他过去的灵感是编订圣哲罗姆和评注使徒保罗(稍后他完成了这两项任务)。1505年3月巴黎的若斯·巴迪乌斯为伊拉斯谟印制了瓦拉的《新约评注》,这成为他本人想要达到成就的预热广告。这是他英勇的壮举。人文主义者瓦拉在神职人员中的口碑不好,伊拉斯谟不掩饰这个事实。“这位只讲语法的人,以难以容忍的愚鲁行事,

① (吕拉的)尼古拉(Nicholas of Lyra, 1279—1340),法兰西方济各会神学家和《圣经》评注家,是第一部印刷版的《圣经》评注的作者,他是中世纪到宗教改革时代过渡期的重要人物,著有《普世圣经评注》(50卷)。

他骚扰一切学问，而且斗胆盗用他人之笔肆无忌惮地攻击《圣经》。”伊拉斯谟印行瓦拉的《新约评注》，引起了广泛的抗议。他这个计划比《基督徒士兵须知》更加明显，更加大胆。

1505年秋，伊拉斯谟离开巴黎去英格兰，但他再访英格兰的原因并不清楚。他提到一些重要的原因，提到朋友明智的建议，特别提到的理由是：缺钱。1505年，约翰·菲利普在巴黎重印的《格言集》或许有助于他暂时渡过难关。但这个版本不能够使他满意，他想增补一些有关希腊智慧的新内容。从荷兰传来了一个告诫的声音，这是比他年纪稍长的朋友塞瓦提乌斯的声音，塞瓦提乌斯要求他解释为何离开巴黎。显然，国内的朋友对伊拉斯谟及其成就和前途尚无信心。

到此为止，许多方面显示，伊拉斯谟在英格兰的前途似乎比在其他地方好。他在那里的老朋友体贴人且有地位：蒙特伊、科利特和莫尔；他在蒙特伊家居留了几个月。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在研究希腊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和他们的交谈既有益于人又令人愉快。科利特不在其列，因为他不通希腊语；这些朋友是：莫尔、格罗辛、拉蒂默^①和滕斯托尔^②。伊拉斯谟很快和一些高级教士建立了联系，他们成为伊拉斯谟的朋友和赞助人。这些朋友是：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e)、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拉姆(William Warham)。不久，他又结识了一位气质和兴趣相投的朋友，这位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失去巴特的痛苦：他就是卢卡的安德鲁·阿莫尼乌斯(Andrew Ammonius)。最后，英王赐给他一份教士的薪俸。不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③又

① 威廉·拉蒂默(William Latimer, 1460? —1545)，基督教教士、古典学者，同情托马斯·莫尔，翻译古典文献。

② 滕斯托尔(Cuthbert Tunstall, 1474—1559)，英格兰高级教士，曾任伦敦主教、达勒姆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拉姆的秘书。

③ 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 1443—1513)，以武力恢复全部教皇国，致力于政教合一，鼓励学术和艺术，建圣彼得大教堂，委托米开朗琪罗装饰西斯廷教堂。

特许他在修院外过世俗的生活,那是1506年1月4日,这就清除了他在英国接受薪俸的障碍。

59 对伊拉斯谟而言,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是轻而易举的,这也是他得到宠爱和赞助的谋生手段。第一部译作是卢奇安^①的对话,接着是理查德·福克斯翻译一些作品,为威廉·沃拉姆翻译欧里庇得斯^②的戏剧《赫卡柏》^③和《依菲琴尼亚》^④。与此同时,他开始考虑出版自己的书信。

显然,他和国内朋友的关系并不令人满意。塞瓦提乌斯不回信。伊拉斯谟觉得他的生涯和自由面临着威胁,因为他的生涯和自由体现在这位朋友的形象之中。早年在斯特恩修道院时,他和塞瓦提乌斯形成了柔情蜜意的关系。修道院的朋友都指望他或早或迟能够回去,并且把他当作指路明灯。院长知道教皇特许他在修院外过世俗的生活吗?院长知道教皇特许伊拉斯谟不必遵守“荷兰斯特恩修道院、圣奥古斯丁会的规章制度吗”?可能知道的。1506年1月4日,伊拉斯谟致信斯特恩修道院的院长:“在伦敦这里,似乎英格兰所有最杰出、最博学的人都很敬重我。国王允诺赐给我一份带薪俸的教士职位;但腓力亲王的突然造访使豁免我教士职责的仪式不得不推迟。”^⑤

① 卢奇安(Lucian),希腊讽刺家,活跃于2世纪,主要作品用喜剧性对话体,讽刺各派哲学和神话。

②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5—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作品达90多部,但仅存《美狄亚》、《希波吕托斯》、《特洛伊妇女》等19部,要者有:《赫卡柏》、《圆目巨人》、《安德洛玛刻》、《海伦》、《希波吕托斯》、《疯狂的赫刺克勒斯》等。

③ 赫卡柏(Hecuba),据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赫卡柏是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Priam)之妻,赫克托耳、帕里斯和卡桑德拉之母,特洛伊战争中几乎失去了一切亲人,后复仇。

④ 依菲琴尼亚(Iphigenia),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和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女儿,被阿伽门农献作祭品但被阿尔特弥斯救出,后来成了女祭司。

⑤ 见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189号,由于遭遇风暴,腓力亲王(Philip le Beau)突然来到英格兰,蒙特伊勋爵就不得不到宫廷去当差。——原注

他急忙补充说：“我在此严肃地思考，如何将余生（余生能有多长，我不知道）最好地完全奉献给虔诚的生活和基督。即使寿命长，我也视之为转瞬即逝、风中残烛。我知道，我的体质孱弱，体力损耗不小；做学问消耗精力，厄运也消耗精力。我知道我们没有希望从学问中获得拯救，我们似乎每一天都得从头做起。因此，既然满足于那一点平庸（尤其在学会了足够我使用的希腊语之后），我决定冥想死亡的问题和训练灵魂的问题。我早就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了，应该在精力最好的时候用好那些宝贵的岁月。人们往往是在年月不多时才注意过好余生，因为余生在质和量上都不如前了，我们要更加注意量入为出。”

这一番懊悔自弃的表白是心血来潮的惆怅伤感吗？在孜孜追求人生目的的过程中，他突然意识到拼搏的徒劳和身心的疲惫，他因此而感到吃惊吗？这是他心灵深处最深的根基吗？这是他一瞬间向亲密的老朋友袒露的真心话吗？这一点可以存疑。这段话和该信开头的几句话很不协调，他在那里关注的是成功的前景。在第二天给高达的好朋友的信中，他那凄楚的情绪就一扫而光了：他又一次谋划未来。他做学问那火一样的热情经久不衰，我们看不见有片刻松懈的迹象。

60

此间，英王允诺赐给他的牧师的俸禄不见踪影。但突然之间，伊拉斯谟长期以来憧憬的机会出现了：意大利之旅。亨利八世的御医热那亚的乔万尼·巴蒂斯塔·比尔里奥（Giovanni Battista Boerio）正在寻找一位家庭教师送他的几个儿子回意大利去上大学。伊拉斯谟接受了这个差事，他既不负责照管他们的学费，也不必照料那几个年轻人，而是只需要监管和指导他们的学习。1506年6月初，他又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夏天的两个月里，师生一行在巴黎逗留，伊拉斯谟利用这个机会出版了从英格兰带来的几本书。如今，他功成名就，闻名遐迩，受到读者的喜爱，朋友们也欢迎他并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听说伊拉斯谟已经去世）。若斯·巴迪乌斯印行了伊拉斯谟提供的所有书籍：他翻译的欧里庇得斯和卢奇安的著作和他撰写的《格言集》的增订本。

61 当年8月,师徒几人又上路了。伊拉斯谟在阿尔卑斯的山路上骑马行进,写下了他生平最佳的诗篇,这是他放弃世俗追求的回声,有新意。他已经厌倦同行的年轻人,不再和他们交谈,他在吟咏诗歌中寻求慰藉。这是一首颂诗,定名为《阿尔卑斯颂歌》(*Carmen equestre vel potius alpester*),它喟叹老年之不灵便,献给老友威廉·柯普。

伊拉斯谟是那种很早就感到垂垂老矣的人。他不到四十岁,可他却心想自己跨入老年了。真是不知老之将至!他在《阿尔卑斯颂歌》里回顾人生的情景:看到自己儿时如何玩坚果、少小时如何渴望学习、青年时如何迷恋诗歌、如何迷恋经院哲学和会话。他回眸自己丰厚的学养,回忆学习希腊语的情景,回味自己渴望功成名就的包袱。在人生历程中,老年悄然而至。在余下的时光里,他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再次听见他舍弃尘世、献身基督的调子。再见了,俏皮的笑话、琐屑的小事。再见了,哲学和诗歌。从此以后,他渴望的全然是一颗纯洁的、装满基督的心。

此刻,在万籁俱寂的阿尔卑斯山里,除了在书信中向塞瓦提乌斯流露的哀婉之外,他的心灵深处升起了另一种渴望。但在这样的感怀里,他的渴望也是灵魂里一种迷离的因素,而不是那种强烈的冲动;给他指引方向、赋予他丰满人生经验的是那种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给予他难以抗拒的压力,敦促他不停地探索新的学问。

第八章 在意大利

→1506—1509

伊拉斯谟在都灵获神学博士学位——博洛尼亚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威尼斯结识阿尔杜斯：1507—1508——印刷术——亚历山大·斯图尔特——去罗马：1509——亨利八世登基的消息——离开意大利

1506年9月4日，伊拉斯谟抵达都灵，立即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他并不太看重这个学位，原因不难理解。不过他还是把它看做官方对他神学著作的认可，这加强了他抵挡批评者攻击的地位。他笔下谈及这一学位的语气鄙夷不屑，即使在给荷兰朋友的信中，他也流露出这种轻蔑的语气，虽然朋友们帮助他的目的就是想要他获得博士学位。1501年，他致信维尔的安娜夫人：“去意大利拿博士学位？愚蠢的计划，去意大利和拿学位都愚蠢。不过，你不得不顺应时尚的习俗。”在致塞瓦提乌斯和约翰·奥布雷克特的信里，他又略带歉意地说：“我拿到了神学博士学位，这和我意向相悖，仅仅是由于禁不住朋友们祈求的压力。”

62

他此时的目的地是博洛尼亚。到达博洛尼亚时，他遭遇到一场战争，被迫暂时退回佛罗伦萨。与法国人结盟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亲率大军，从本迪沃格利进军去夺取博洛尼亚。博洛尼亚很快平服，又回复到安全

状态。1506年11月11日,伊拉斯谟目击了一身戎装的教皇的凯旋仪式。

63 这些日子只留下了简短、匆匆草就的信件,信中述说的是动荡的局面和战争的谣传。没有迹象表明,正值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美景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意大利居留期间留下的信很少,信中没有提及任何建筑、雕塑或绘画。过了很久,当他回忆造访帕维亚的查尔特勒修道院时,他提到的也是修道院的荒废和宏大的景观。在意大利旅居生活期间,占据伊拉斯谟时间、引起他注意似乎只有书籍。

在博洛尼亚,伊拉斯谟担任比尔里奥兄弟的精神导师,直至年底。他不能忍受对他自由的侵犯,觉得他被那个合约套进了一张罗网。即使不像伊拉斯谟初次印象那样有才气,几位年轻人倒是蛮聪明的。至于他们的家庭教师克里夫顿(Clyfton),起初伊拉斯谟对他赞誉有加,可是不久他们就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博洛尼亚,他遇到很多烦恼;他和保罗·邦巴西乌斯(Paul Bombasius)建立的关系也只能够起到略微缓减的作用。他在博洛尼亚进一步增编《格言集》,使其容量从八百余条增加到数千条。

1507年10月,伊拉斯谟从博洛尼亚致信威尼斯著名的印刷商阿尔杜斯^①,请求他重新刊印他翻译的两部欧里庇得斯戏剧,因为巴黎的巴迪乌斯出版社那个版本已经绝版,而且错误很多,他不喜欢。吸引伊拉斯谟的无疑是阿尔杜斯的名气,虽然他的印刷所那时正在苦苦挣扎;除此之外,阿尔杜斯美丽的字钉也吸引伊拉斯谟:“那些字钉太美了,那些小字号尤其好看。”伊拉斯谟是那种真正的爱书人,他的心思在书的样式或开本上,这不是出于什么艺术上的偏爱,而是考虑书读起来是否顺畅和方便,爱书人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要求阿尔杜斯出的这两出悲剧是低价格、小版次。到年底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所以伊拉斯谟放弃了预

^① 阿尔杜斯(Aldus),即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1450—1515),意大利学者、印刷出版业名人,在威尼斯创立阿尔定(Aldine)印刷所,刊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比如但丁的《神曲》以及荷马、柏拉图等人的著作。

定好的罗马之行,决定暂时移居威尼斯,亲自去督导出版事宜。此时的问题不再是印一本小书,阿尔杜斯宣告愿意印制那本大大增编后的《格言集》了。

比亚图斯·雷纳努斯^①讲述的一个故事无疑是伊拉斯谟本人告诉他的。伊拉斯谟一抵达威尼斯就径直前往印刷所,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见到阿尔杜斯。阿尔杜斯正在校对一些清样,以为他的不速之客是令他不胜烦恼的一般的好奇之士。但一看到是伊拉斯谟,他就表示亲切欢迎,并保证提供食宿,让伊拉斯谟住在他岳父安德里亚·阿索拉尼(Andrea Asolani)的家里。伊拉斯谟在那里住了整整八个月。在阿尔杜斯印刷所的这一段时光将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害。他总是处在狂热的匆忙工作之中,常常为工作叹息,但这种快节奏的工作和他的秉性很相宜。“起初我很莽撞,我们同时开始工作,我负责写书,阿尔杜斯负责印书。”在此期间,他在威尼斯结交的新学园(New Academy)的文友纷纷给他送来希腊文手稿,给他正在增订的《格言集》提供新的素材。这些文友是:约翰·拉斯加利斯(Johannes Lascaris)、巴蒂斯塔·埃格拉提乌斯(Batista Egnatius)、马库斯·穆苏卢斯(Marcus Musurus)和年轻的杰罗姆·亚利安达(Jerome Aleander),杰罗姆是他在阿索拉尼家借宿的室友。增编的材料非常珍贵,不可等闲视之,有柏拉图的原文、普卢塔克的《生命与道德》(*Lives and Moralia*)、品达^②的诗歌、保萨尼阿斯^③的《希腊纪事》等。送材料来的人有些他并不认识,但都是对他的著作感兴趣的人。令出版商惊奇的是,伊

64

① 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 1485—1547),德国人文主义者、作家,支持宗教改革,编订了大量的古典文献,著有《日尔曼事物三论》,是为伊拉斯谟著作编目和编订的第一人(1540)。

② 品达(Pindar, 前522?—前443?),希腊田园诗诗人,尤以颂歌著称,作品存世不多。

③ 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活跃于2世纪,著有《希腊纪事》。

拉斯谟在机器轰鸣的厂房里端坐写作,而且一般是凭记忆写。他全神贯注,文字如画,根本就不需要抓耳挠头去思索。他成了印刷所的主人和老板。他有一位搞校对的助手,他只做最后一校。阿尔杜斯也参加校对,伊拉斯谟问他:“你何苦呢?”阿尔杜斯的回答是:“因为我也想学习。”在此期间,伊拉斯谟初次遭遇肾结石阵痛。他把这病痛归之于阿索拉尼家的饮食,他的报复是给那家借宿的房子及其房东描绘一幅画,里面的色彩令人厌恶,这幅画后来收进了他的《对话集》。

65 1508年9月,增订后的《格言集》准备付梓。阿尔杜斯想要伊拉斯谟多逗留一段时间,再写一点东西。伊拉斯谟留下来工作到12月,又编订了普劳图斯、泰伦斯^①和塞内加^②的著作。他希望与阿尔杜斯合作出版一切古典,挖掘埋藏的宝藏,并出版希伯来和迦勒底^③故事。这些念头始终在他的脑子里浮现。

伊拉斯谟那一代人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印刷术一道成长。对那些日子里的人们而言,印刷的书籍就好像是一种新的人体器官;人们觉得富有、强大、幸福,觉得自己掌握了一种“几乎是神圣的工具”。伊拉斯谟及其著作的形象只有在印刷术诞生之后才能够出现。伊拉斯谟就是印刷术辉煌的胜利果实,在一定意义上,他又是印刷术的受害者。如果没有印刷机,伊拉斯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广泛传播古典文献、净化并恢复这些文献是他终身的激情。他知道印制得一模一样的书籍肯定会进入读者的手中,这使他感到慰藉,这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印刷术确立了一批以作者的名字出现的人物,伊拉斯谟就是其中之一。一旦这样的名分确立之后,他就继续不断地为印刷机工作。这是他

① 泰伦斯(Terence,前185?—前159?),古罗马剧作家,代表作有《安德罗斯女子》、《自责者》、《阉奴》、《两兄弟》、《婆母》等。

② 塞内加(Seneca,),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哲学著作有《论天命》、《论忿怒》、《论幸福》,悲剧有《美狄亚》、《奥狄浦斯》等9部。

③ 迦勒底(Chaldea),古巴比伦王国南部一地区,迦勒底王国。

的长处,也是他的弱点。这使他立即对整个欧洲的读者产生影响,这样的影响前无古人。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焦点、思想的枢纽、时代精神的试金石。印刷术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供他调遣使用。试想如果一位头脑胜过伊拉斯谟的人,比如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斯^①掌握了印刷术,那将意味着什么样的成就啊!尼古拉斯在印刷术的婴儿期哺育了它,但他未能用好印刷术。

时势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局面。印刷术使伊拉斯谟成为中心和权威之后,他就不得不立即处理周围发生的事情。毕竟,他后期大量的脑力劳动其实是重复同样的题材、反刍式的离题、应付他人攻击的自我保护;其实,他的威名本身就足以驳斥任何攻击;其实,一些劳而无功的小事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他直接为印刷机写的许多东西说到底仅仅是新闻。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放进永恒魅力的行列里去进行检验,那对他是有有点不太公平的。我们的著作可以立即送达世人手中,这样的意识刺激我们,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表达方式,这是前无古人的奢侈,唯有最高贵的心灵才能够承受这样的奢侈而不受惩罚。

66

伊拉斯谟和印刷出版的纽带是拉丁文。倘若不是他无与伦比的拉丁文水平,他著名作家的地位是不可能确立的。印刷术无疑推动了拉丁文的使用。在那些岁月里,唯有拉丁文能够保证出版商的成功和大量的销售,才能够确立印刷商的名望,因为拉丁文书籍在世界上广泛流通。主要的出版商本人就是满怀人文主义豪情的学者。有学养的小康人士担任校对工作;著名的校对员有:伊拉斯谟和莫尔的朋友彼得·吉尔斯(Peter Gilles),他是安特卫普的公务员,为出版商狄尔克·梅尔滕斯(Dirck Maertenz)做校对工作。大型印刷所对当地而言就是思想交流的中心。那时英格兰的印刷术滞后,

① (库萨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 1401—1464),德国枢机主教、科学家、哲学家,认为人类的认识必须依靠经验,发展实验科学,著有《论有学问的无知》,指出唯有自知之明的人才是有学识的人。

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伊拉斯谟定居英格兰;须知,他在英格兰有那么多纽带,英格兰又有那么多诱惑人的有利条件。

除了以上事实之外,寻找一个永久居住地址对伊拉斯谟真的是非常之难。1508年底,他接受了给少年亚历山大·斯图尔特(Alexander Stewart)当家庭教师的职位。这位少年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私生子。虽然年轻,但他已经是圣安德鲁斯的大主教,当时在帕多瓦留学。不久,战争危险迫使师徒二人从意大利北部来到意大利中部的锡耶纳。到锡耶纳之后,伊拉斯谟告假游览罗马。1509年初他抵达罗马时,再也不是北欧一位默默无闻的教士,而是闻名遐迩、受人尊敬的作家了。这座永生的城市向他袒露出所有的魅力,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们对他关爱有加、彬彬有礼,他一定感觉非常满意。这些显贵有: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即后来的教皇利奥十世^①、多梅尼柯·格利马尼^②和里亚利奥^③等人。他似乎还被委以长老院里的职位。但他承诺在身,必须要回到年轻的大主教亚历山大·斯图尔特身边去履行导师的职责。随后,师徒二人隐姓埋名同游罗马,然后又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库迈(Cumae)游览女预言家的洞穴,但游览洞穴的经验对他有何意义,我们却不得而知。从他离开帕多瓦到1511年春天的这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是他生平最重要的时期,可是这段时间的经历在他留存下来的书信里却没有丝毫的记述。多年以后,他才偶尔之间提及他对罗马的印象^④,但总体上说,这段时间

① 利奥十世(Leo X,1475—1521),耗费巨资资助艺术事业,保护拉斐尔等艺术家,续建圣彼得大教堂,发行赎罪券,把马丁·路德革出教门。

② 多梅尼柯·格利马尼(Domenico Grimani,1461—27 August 1523),大主教、收藏家。

③ 里亚利奥(Raffaele Riario,1460—1521),红衣主教,修建坎塞勒里亚宫殿(Palazzo della Cancelleria)。

④ 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1175号,约1375年,述及造访格利马尼的情况。——原注

的整个经历是模糊不清的。这是《愚人颂》孵化的时期，这一段经历被《愚人颂》遮蔽了。

1509年4月21日，英王亨利七世驾崩，继任的国王亨利八世是伊拉斯谟1499年敬献颂诗的小王子，他在颂诗里讴歌大不列颠。在他旅居博洛尼亚期间，十五岁的拉丁文造诣很高的亨利王子致信伊拉斯谟，使他感到不胜荣幸。^①如果说他有什么机会从英国皇家得到赞助的话，这位热爱文学的亨利八世继位可能就是她最好的时机。蒙特伊爵士这位最忠实的赞助人也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蒙特伊1509年5月27日致信伊拉斯谟，指明这个最好的时机。他说，亨利八世精力旺盛、治世公正，对文学和文人满腔热情，看到这位年轻有为的君主，真使人高兴。蒙特伊这封信有可能是阿莫尼乌斯代笔的。这封信欢呼雀跃，天欢笑、人欢呼、热泪盈眶是其主题。伊拉斯谟获悉亨利七世驾崩之后，显然很快去信蒙特伊，试探获得赞助的可能性，其中当然也少不了生计的忧虑和病痛的叹息。蒙特伊来信告诉伊拉斯谟：“坎特伯雷大主教不仅继续捧读你的《格言集》，把你捧上天，而且允诺你回来后提供教士的薪俸，还要给你送来5英镑的盘缠。”蒙特伊又把这笔旅费提高了一倍。

68

我们不知道伊拉斯谟决定离开意大利之前是否真的有些犹豫。据他自己说，红衣主教格利马尼试图劝阻他，但未成功。1509年7月，他告别罗马和意大利，再也没有回来。

他第二次翻越阿尔卑斯山不是到法国去，而是从斯普吕根山口(Splügen)到瑞士去。他灵感袭来，天才再现，就像三年前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去时一样。但这一次的灵感并不是穿着拉丁文缪斯的外衣，而是要他对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誓言进行富有艺术性的、情动于中、充满诗意的沉思。这一次的思想更加细腻、更加宏大。他把思考的结果写成《愚人颂》。

① 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206号，从艾伦的序文看，你可以得到的印象是，亨利王子参与了书信的写作。——原注

第九章 《愚人颂》

作为艺术作品的《愚人颂》:1509——作为生活动力的愚行:不可或缺,有益社会,愚行成就国家和英雄主义的事业,愚行是支撑国家和英雄主义的要素——愚行使世界运转——生命活力和愚行的融合——愚行或缺不利于生活——人需要一点自满——虚伪战胜真相——知识“灾祸”——对一切世俗职业和基督徒天职的讥讽——贯穿《愚人颂》的两大主题——最大的愚行:喜极入迷——作为嬉笑怒骂的愚行——愚人和疯人的混淆——伊拉斯谟轻视自己的《愚人颂》——《愚人颂》的价值

69

在骑马翻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路上^①,由于没有固定任务的羁绊,伊拉斯谟不平静的心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思考过去几年研究和阅读的心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么严重的自欺和自负啊!他想到托马斯·莫尔,莫尔(More)的希腊词 *Moros* 就是傻瓜啊,这个名字不可思议地成了莫尔的人

① 伊拉斯谟明确告诉我们,这本书是在他骑马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构思的。进入瑞士之后,他改为乘船游览。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216号序文。——原注

格。他期待与莫尔交谈,这是他最风趣幽默、最有灵性的朋友。他期待在欢声笑语中夹杂的笑话和讥讽,他的脑子里酝酿着那一部充满幽默和反讽的杰作《愚人颂》(*Morriae Encomium*)。世界是愚行无所不在的舞台;愚行是生活的要素,对生活和社会都不可或缺,并且使生活和社会正常运转;这一切都通过愚夫人“斯图尔狄提亚”(Stultitia)的嘴巴说出来的,这位愚夫人是米涅瓦^①名副其实的对立面。她颂扬自己的力量和效能,自吹自擂。《愚人颂》采用论辩的形式,仿照伊拉斯谟从希腊语翻译的利巴尼奥斯^②颇有价值的文风;其神韵犹如卢奇安再世,其主题得到的启示来自于他三年前翻译的卢奇安的《罗马人》(*Gallus*)。《愚人颂》酝酿的时机正值伊拉斯谟这位流光溢彩的天才那灵感奔放的无与伦比的时刻。过去一年里增订《格言集》时通览的古典作品的一切细节就像不竭的清泉,汨汨流淌,储存在他那永不衰竭、容量惊人的记忆里,随时供他调遣使唤。他驾轻就熟地反思古人的智慧,不绝的文思犹如清冽的甘泉,成为他劝诫世人的无穷智慧。

70

到伦敦后,他在巴克勒斯伯里的莫尔家借宿。肾结石的绞痛使他备受折磨;即使这样,他还是在几天之内一挥而就,完成了这部完美的艺术作品,他毋须参照任何书本——腹稿一定是早已就绪了。愚夫人“斯图尔狄提亚”诞生的方式和她严肃的姐妹雅典娜^③女神,实在是一模一样。

《愚人颂》的形式和意象白璧无瑕,那是创作冲动激发灵感时的产物。愚夫人面对公众雄辩滔滔的形象栩栩如生,直到这部杰作的最后一页。愚夫人在讲坛上露面时,听众欢呼雀跃、容光焕发;我们听见他们拍手呼应,掌声不绝。作品的幻想奇异瑰丽,夹以冷静的思路和丰富的色彩,蕴

① 米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掌管智慧、发明、艺术和武艺的女神。

② 利巴尼奥斯(Libanius,314—393),希腊诡辩家、修辞学家,生活在罗马帝国东部,在罗马崛起的情况下,力图保持希腊传统,作品描绘了当时的教育情况,颇有价值。

③ 雅典娜(Pallas即Athena),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藏着大量的发挥余地,展现出一个完美的范例,贯穿着和谐的思想,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表情达意的精髓所在。尽管题材和思想丰富多样,但其结构却不见枝蔓丛生、叠床架屋;整个作品的调子温和适中,风格如行云流水,文字飘逸清丽、明白晓畅,读之令人喜悦而轻松。为了完全看清楚韵律模式在这本书里达到的完美的艺术境界,我们应该将其和拉伯雷的《巨人传》比较。

愚夫人说:“如果没有我,世人一刻也不能生存。世人所做的一切难道不是充满愚蠢之举吗?世人所做的一切难道不是愚人之所为,并且是为愚人之所为吗?”“如果没有愚蠢之举,社会交往和共同生活就不可能愉快,也不可能持久。如此,倘若人们不偶尔犯相同的错误,不偶尔互相恭维,他们就不能够共同生活;倘若他们不偶尔按照自己的感觉共做一些事情,不偶尔以甜蜜的愚蠢之举互相诋毁,他们就不能够共同生活。如果不是这样,人民就难以忍受其君主;主人就难以忍受其仆人;女仆就难以忍受其女主人;老师就难以忍受其学生;朋友就难以忍受其朋友;妻子就难以忍受其丈夫。”这一段文字里包含了《愚人颂》的概要。这里的愚行是老于世故的智慧、辞让和雅量。

71 在生活的喜剧中撕下面具的人必然被驱逐出场。凡人的生活难道不是一出戏吗?每个人戴着自己的面具登台、扮演自己的角色,直到舞台总监叫他下场。如果他适应现存的环境,如果他要求那场游戏不再继续进行下去,那就是错误之举。真正懂道理的人的角色就是和所有人打交道,或者以共谋的角色参与众人的愚行,或者亲切友善地和大家一道犯错误。

“愚行”是一切人类行为必要的推动力。“愚行”的同胞姐妹是“自恋”。不讨好自己的人几乎会一事无成。拿走了生活这个必需的调味品,雄辩家的话就会冷冰冰,诗人的作品就会被人嘲笑,艺术家的艺术之花就会凋谢枯萎。

以骄傲、自负、虚荣为外表的愚行是世界上一切高雅和伟大的东西能够深沉不露的源泉。给光荣、爱国情怀和民族团结以地位的国家,富丽堂

皇的仪式和典礼,以及卑贱种姓和高贵血统的幻觉——难道这不是愚蠢之举吗?战争是登峰造极的愚行,可它成了一切英雄主义的源头。什么力量推动德西乌斯^①们和库尔提乌斯^②们去自我牺牲?虚荣。正是这样的愚蠢之举产生了国家,通过这样的愚蠢之举,帝国、宗教、法庭才得以生成。

这样的言论比马基雅弗利^③的《君主论》更大胆泼辣、更令人不寒而栗,比蒙田^④的散文更超然物外。使世界运转的力量、生活的源泉是愚行。爱情不是愚行吗?如果不是出于愚蠢,人们为何要结婚呢?为何没有人反对结婚呢?一切享乐和娱乐只不过是愚行的调料。聪明人想当父亲时,他首先扮演的是愚人的角色。还有什么游戏是胜过生殖游戏的愚蠢游戏吗?

不知不觉间,书中的雄辩家把生命的活力和勇气糅合进了愚蠢之举。愚行是自发的能量,谁也不能或缺。完全理性和严肃的人是不能生存的。人们越是远离我“愚夫人”,就越是难以生活得好。如果我们不是在傻乎乎的举动中取乐,我们为什么要亲吻孩子、搂抱孩子呢?

72

请看那些认真严肃、知书达理的人。他们总是笨手笨脚,吃饭、跳舞、游戏、社交都不够精明。如果他们不得不买东西、签合同,事情必然会出错。昆体良^⑤说,雄辩家也怯场,证明他也有弱点,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弱

① 德西乌斯(Deciuses, 201—251),罗马帝国皇帝(249—251),与入侵的哥特人交战阵亡。

② 库尔提乌斯(Marcus Curtius, 1814),罗马神话中的英雄,罗马广场裂开一条无底深渊,按照预言师的判断,如果把罗马最宝贵的东西扔进深渊,深渊就可以填平,于是库尔提乌斯骑着战马跳下深渊、填平深渊。

③ 马基雅弗利(Nicola M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

④ 蒙田(Michel Eychem de Montaigne, 1533—1592),法国散文大家,代表作为《随笔集》,其著作已经有许多译本。

⑤ 昆体良(Quintilian, 35? —96?),罗马修辞学家,著有12卷《雄辩术原理》。

点。此话有理！他公开承认，智慧是善政的障碍，难道不是吗？智者出于羞耻和羞愧而不愿意去干的事情，在同样的情况下，愚人却蛮干；在这样的情况下，“愚人”就没有权利站出来宣称自己审慎吗？

说到这里，伊拉斯谟深入到了愚行的心理学根源。实际上，达不到预期成就的意识起到了制动器的作用，是迟滞世界进步的惰性。只要伊拉斯谟不再埋头学问而是面对他人和日常事务的时候，他就是手足无措的人，他是否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呢？

愚行是快乐，是轻松，愚行对幸福不可或缺。纯理性、无激情的人宛若石头，没有感觉，没有感情，就像人人躲避的妖魔鬼怪；这种人对自然流露的情绪熟视无睹，爱心和怜悯都无法使之心动。这种人明察秋毫，从无过错；他看穿一切，准确掂量一切，决不宽恕别人，他只对自己满意；唯有他才是健全的人；唯有他才是君主，唯有他才应该享受自由。在这里，伊拉斯谟笔下的人是令人憎恶的教条主义者。他说，哪一个国家渴望这种绝顶聪明的人去掌管行政呢？

73 凡是用精明的洞察力去验证一切生活苦难的人，无不剥夺了自己生活的机会。只有愚行能够成为这种人的矫正剂：犯错误、被误解、有愚行，人人难免，这是人的本性。在婚姻生活中，对妻子的弱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因为嫉妒而自杀，不因此而使世界充满悲剧，那该有多好啊！恭维是美德。没有一点恭维，就没有友好的忠诚。恭维是口才的灵魂，是治病的良药，是宜人的诗歌，是一切人类习俗的蜜糖和甘露。

同理，一连串珍贵的社会品性不知不觉间融入了愚行：仁义、善良、赞许和钦佩。

然而，尤为重要者是赞许自己。如果不稍许赞许自己，那就说不上去讨好别人。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的名分、职业而感到自豪，如果谁都不愿意在打扮、喜好、门第或地产上和别人换位思考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呀！

虚伪是正确的选择。何苦要争当博学鸿儒呢？能力越差的人，生

活越是愉快,且越是令人羡慕。试看教授、诗人、雄辩家活得多苦啊。人的脑子容易刻上印记的是谎言而不是真话。请到教堂里去看一看就明白了:如果牧师讲严肃的教义,全场的教徒就会打瞌睡、打呵欠,就会感到厌烦。但如果他讲荒诞的故事,全场就会精神一振,挺直腰板,洗耳恭听。

诚如哲人所言,被欺骗是不幸,但不被欺骗则是最大的不幸。如果人皆有过错,当一个人有过错时,既然他是这样出生、这样成长的,为什么要说他不幸呢?不幸是每个人的命运吗?如果一个人不会飞,如果他不会手脚并用走路,我们会因此而说他可怜吗?如果这样去看问题,我们就可能说马不幸福,因为它无法学会语法,不会吃蛋糕。如果生灵顺应自然,它们就不会不幸福。各种科学、各门学问发明出来了,但它们却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它们非但不促进我们的幸福,甚至会妨碍我们的幸福。借助妖魔的力量,它们和其他害人精一样偷偷潜入人的生活。黄金时代的古人并没有科学的支持,仅仅依靠自然和本能的指引,难道他们不是生活得很好吗?既然他们不争吵,又没有意见分歧,那辩证法又有什么用处呢?既然没有败坏的道德,而好的法律却必须在败坏的道德里产生,那么法学又有什么必要呢?古人满怀虔诚的宗教感情,他们不会用不虔诚的好奇心去寻找自然的秘密,不会去拷问星球的体积大小、运动规律和对万物的隐性影响,也不会去探究万物深藏的原因。

74

这是一个古老的念头,远古时代已经萌芽。伊拉斯谟仅仅是略有触及,卢梭^①后来则明确宣告:文明是灾祸。

智慧是不幸,但自负却是幸福。如果我“愚夫人”不用一点点甜蜜的

①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激励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浪漫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他的“社会契约论”超过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孟德斯鸠的实证论。提出“世俗的宗教”和“自然教育”等伟大思想。所著《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疯狂来减轻语法学家的痛苦,挥舞语法权杖的语法学家即教书先生就可能是最不幸的人。教书先生的痛苦同样是诗人、雄辩家和作家的痛苦。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一切的幸福仅仅存在于虚荣和虚幻里。律师的命运不见得更好,接下来是哲学家,再往下是一大群的神职人员:牧师、修士、主教、红衣主教、教皇,这一队不幸的人中插入了君主和朝臣。

《愚人颂》各章^①逐一检阅这些职位和职业,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讥讽的立场稍微有一点游移。贯穿全书的两个主题互相纠缠:有益的愚行即真正的明智是其一,被骗的明智是其二,所谓被骗的明智就是纯粹的愚蠢。这两个主题都是通过“愚夫人”的嘴巴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主题的表述颠倒过来,才能够了解真理:愚行……不是明智。显然,第一个主题是首要的主题。伊拉斯谟从这个主题着手,然后又回到这个主题。只有在书里过半的地方,伊拉斯谟以人类普遍存在的愚行来批评人的成就和尊严,只有在这一部分,第二个主题才占据主导地位,《愚人颂》是对人类愚行的普遍的讥讽。人类的愚蠢之举五花八门,但很少有什么愚蠢之举是令人愉快的。在书里的其他部分,作者的讥讽要深刻得多。

偶尔,讥讽的调子略微有一点偏离主线。这样的时刻,“愚夫人”直接站出来谴责,这就是伊拉斯谟需要谴责的东西。这样的例子有:放纵、相信奇迹的愚行和出于自私的圣人崇拜;或者“愚夫人”应该谴责的赌徒;或者追求系统条理化和平均化的精神,或者对修士的嫉妒。

75 对当代读者而言,《愚人颂》的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直截了当的讥讽。该书的永恒价值存在于其中的一些段落中,在这里我们真的可以承认,愚行是智慧、智慧是愚行。伊拉斯谟懂得万物根基的超然性质:一切固守信仰教条的思想必然会走向荒诞。只需看一看大器已过的经院哲学钻牛角尖的路子就可以明白什么叫荒诞。连

^① 伊拉斯谟没有给《愚人颂》分章,现在的章节是1765年才由一位编辑划分的。——原注

耶稣的使徒也不会懂经院哲学说些什么；在后来教士们的心目中，使徒是愚人。《圣经》本身就站在愚人一边。使徒保罗说：“上帝的愚行胜过人的智慧”；“上帝选择了世上愚蠢的东西”；“用（布道的）愚行拯救信徒使上帝高兴”。基督喜欢的人是人头脑简单的人和愚钝的人，比如儿童、妇女、贫穷的渔夫，基督甚至喜欢最远离狡诈的动物，基督想骑的是蠢驴，他喜欢鸽子、羊羔和羊群。

在这看似轻松戏谑的背后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思想：“一般地说，基督教似乎和某种愚行有亲和力。”信徒们不是相信，使徒身上带了许多新酒吗？犹太士师不是说：“保罗，你发疯了吗？”我们什么时候发疯呢？当精神挣脱束缚、试图逃离囚笼并渴望自由的时候——这就是疯狂，但这又是出世的智慧、最高的智慧。真正的幸福是自私的，表现在恋人的狂热爱恋中，柏拉图把这种狂热叫做至高无上的幸福。爱情越是绝对，迷恋就越是疯狂。天堂里的至福本身是最严重的疯狂；在尘世的沉思静虑中，真正虔诚的人已经享受到这种至福的影子。

说到这里，“愚夫人”停止讲演，表示歉意，以防自己太莽撞和说得太多。她离开讲台说：“再见，请为我鼓掌，祝你们生活幸福，痛饮美酒吧，愚人行列里了不起的新手。再见。”

即使在最后的章节里，《愚人颂》也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水准，既不失轻松的喜剧幽默，也不曾落入露骨的粗俗窠臼。只有能够在诡辩术的钢丝上名副其实地翩翩起舞的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在《愚人颂》里，伊拉斯谟自始至终在深刻真理的边缘上翱翔。虽然《愚人颂》是献给那个时代的作品，但它能够以轻松活泼的调子驾驭如此浩繁的内容，所以它仍然使今天的我们受用无穷。我们应该记住：《愚人颂》是名副其实的嬉笑怒骂之作，但它的笑声值得玩味、发自内心，在这一点上，它绝不会输给拉伯雷的《巨人传》。“遒劲有力，令人击节，栩栩如生，荡气回肠。”“处处可见这样的普通人，他们的愚行千姿百态，没有一千位德谟克

利特^①不足以表现这些愚行（而且，它们也需要一千位德谟克利特来嘲笑）。”

莫尔的《乌托邦》给我们留下非常严肃的印象，其实它是《愚人颂》的姊妹篇，莫尔和伊拉斯谟都把《愚人颂》当作单纯的戏谑之作。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够以正襟危坐的态度去看待《愚人颂》呢？《愚人颂》有一段似乎兼有莫尔和拉伯雷的韵味。“愚夫人”说起她的财神爷父亲普路托斯^②，他吩咐把一切事物颠倒过来；一切人事根据他的意志来调控，包括战争与和平，管束与协商，司法与条约。普路托斯以宁芙女神^③为模特生出“愚夫人”之后，再也不是那个老态龙钟、几乎失明的普路托斯，而是精神抖擞、青春四溢、热力四射的普路托斯，犹如另一位高康大^④再世。

“愚夫人”的形象在文艺复兴时期身材高大。她总是头戴傻瓜毛，身佩傻瓜铃。人们放声大笑，毫无顾忌，不区分不同类型的愚行。即使在细腻的《愚人颂》里，伊拉斯谟也不区分不智和痴愚、傻瓜与狂人。霍尔拜因^⑤为伊拉斯谟作插图时，也只知道一种愚人：手持木杖，长着一对驴耳朵。伊拉斯谟诉说愚人时并没有在两种愚人的切换之中表现出明显的过渡，他一会儿说愚人，一会儿说只知道狂人，并没有将两者做明显的区分和过渡。这些人都是最幸福的人，他通过“愚夫人”的嘴巴说：愚人们不怕鬼怪幽灵；他们不会害怕即将来临的灾难而倍受折磨；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欢声笑语、戏谑嘲弄带到哪里。显然，伊拉斯谟的意向是写无害的低能

①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前460—前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一，政治上主张奴隶制民主，伦理学上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心神宁静。

② 普路托斯(Plutus)，希腊神话里的财神。

③ 宁芙女神(nymph)，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山林水泽仙女，有时化身为树木、山水等自然之物。

④ 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巨人传》里的主人公。

⑤ 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1465?—1524)，德国画家、插图家，以操作宗教作品为主，在著名教堂创作了许多壁画。

人,低能人常常是给人乐趣的小丑。愚钝和疯狂划等号的倾向贯穿全书,戏剧性与纯粹的荒诞混为一谈,但一切都在精心策划之中;今天我们觉得,在面对愚行时,我们和伊拉斯谟嬉笑怒骂的能力似乎有着天渊之别。

77

后来,伊拉斯谟总是以轻慢的口吻说起他的《愚人颂》。他说这本书不足挂齿,不值得出版;然而他的其他著作从未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总是说,那只是小事一桩,和他性格根本就不协调;那是因为莫尔坚持要他写这本书,好比是要强迫他这只蹩脚的骆驼起舞。不过,这些自贬之词并非没有第二位的目的。《愚人颂》没有给他带来功名或愉悦。那个敏感的时代很不痛快地看待其中的讥讽。虽然伊拉斯谟在序文里捍卫自己,批驳对他亵渎圣贤的指控,有人还是觉得他以轻慢的目光看待圣职和教派。对许多人而言,他以轻盈的游戏之笔处理《圣经》里的文本太冒险了。他的朋友马丁·范·多普(Martin Van Dorp)指责他嘲弄永恒的生活。伊拉斯谟竭力要那些往坏处想的人相信,《愚人颂》的目的只不过是告诫人们要培养美德。在这样的断言里,他小看了自己的作品:它远远不只是具有这样的意义。1515年的伊拉斯谟再也不是1509年的伊拉斯谟了。他不得不反复捍卫这部最风趣的作品。1517年,他致信卢万一位友人说,倘若他早知道《愚人颂》会开罪于人,他可能就将其束之高阁、不会出版了。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不得不进行自我辩护,阿尔博托·皮奥^①在一篇冗长的劝诫文里对他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以后,伊拉斯谟不再冒险用《愚人颂》的样式来写作。你可能认为,他的另一部著作《语言》(*Lingua*)是《愚人颂》的姊妹篇,那是1525出版的作品,全名是《丰富多样的语言》(*De copia verborum et rerum*),开篇的几页文字使我们想起《愚人颂》的风格,但它在形式和思想上都缺乏《愚人颂》的魅力。

^① 阿尔博托·皮奥(Alberto Pio,1475—1531),意大利卡尔皮地区的王子。

78 伊拉斯谟的著作多达 10 大卷,但只有这一本《愚人颂》才是真正意义上流行的著作。我们应该为此而怜悯他吗?除了《对话集》之外,《愚人颂》恐怕是唯一一部为了它本身的价值而有人阅读的作品。人们阅读他其余的作品时,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进行研究,仅仅是为了了解他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在我看来,这似乎正好说明了它的价值。《愚人颂》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他的其他著作或博学,或虔诚,其中一些对他那个时代产生了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影响。每一部著作都曾经风光一时,但唯独《愚人颂》具有永恒的价值。这是因为,只有在幽默照亮了他那颗颖慧的头脑之后,它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思想深刻的头脑。在《愚人颂》里,伊拉斯谟给世界留下的财富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

第十章 三访英格兰

→1509—1514

三访英格兰:1509—1514——两年生活不为人知:1509年夏至1511年春——经济困境——在剑桥大学——与巴黎出版商巴迪乌斯的关系——巴塞尔出版商约翰·弗洛本的意外收获——离别英格兰:1514——《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反战书简

1509年夏天,伊拉斯谟从意大利回到英格兰。他一直待在莫尔家里,从那时起直到两年以后在去巴黎的路上露面,世人难得看见他。他到巴黎去委托吉尔·吉尔蒙(Gilles Gourmont)刊印他的著作。这两年生活的蛛丝马迹淹没得干干净净,两年中来往的书信全部散佚。也许,这两年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期,因为其中一部分时间是和可靠的资助者蒙特伊爵士一道度过的,是在莫尔家度过的,那是一个高尚和颖慧的圈子,伊拉斯谟视之为理想的圈子。经常到莫尔家来造访的还有他上一次结识的、也许和他更加意趣相投的朋友安德鲁·阿莫尼乌斯。在此,他能够不受干扰地做学问,全心全意献身于极具诱惑的学问,而不必担心近期可能有的隐忧,也没有过分响亮的声名给他带来的包袱。后来的名气所带来的麻烦,使他失去了大量的欢乐。

未来的情况尚不明朗。一旦失去了莫尔家欢乐的时光,伊拉斯谟的

80 困难和抱怨就接踵而至。长期的穷困、缺乏稳定和依附的关系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在他的诸多追求中，自由始终是高于一切的。在巴黎，虽然阿尔丁版的《格言集》尚未售罄，且书价不高，但他委托巴迪乌斯刊印新版的《格言集》。《愚人颂》由吉尔蒙出版社推出不久之后，1511年斯特拉斯堡就有人重印了；出版商雅各布·温普费林（Jacob Wimpfeling）来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信，但事先并未征得他同意。那封信来时，他已经回到英格兰了。他在伦敦病倒，出大汗；稍后前往剑桥大学的女王学院，以前他曾经在那里居留。1511年8月24日，他从剑桥致信科利特，带着喜剧似的绝望调子。从伦敦到剑桥是一场灾难：跛脚的马，沿途没有食品，风雨雷电交加。“但我几乎为此而高兴，我看到了基督徒贫困的轨迹。”他看不见任何挣钱的机会，因此他不得不花掉从资助者那里得到的每一个便士——他是在愤怒的墨丘利^①来临时降生的。

这样的调子似乎比他想要传递的调子更加灰暗，不过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在信里说：“如此的乞讨，奈何。我知道你在笑话我。我真的恨自己这样的无奈，我决心想办法发一笔大财，以免不得不奉承别人，要不就仿效第欧根尼^②的简朴生活了。”伊拉斯谟翻译了巴西里乌斯对《圣经·以赛亚书》的评注，他感叹的奈何是把这本书献给罗彻斯特的主教约翰·费希尔。

科利特从未吃过金钱匮乏之苦，所以他不懂伊拉斯谟这些俏皮话。他的回信有不少细腻的讽刺和隐晦的责备，反过来，伊拉斯谟也假装不懂他说的意思。伊拉斯谟说自己过的日子是“富足中的匮乏”。他正在完成为巴黎的巴迪乌斯出版社撰写的《丰富多样的语言》，这本书在巴黎时已

① 墨丘利神（Mercury），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信使，又是商业、技艺、辩才、旅行及盗窃的守护神。这句话比喻他命定的困境。

② 第欧根尼（Diogenes，前412—前323），希腊哲学家，哲学犬儒学派奠基人，强调自制、追求德行、崇尚简朴，相传他生活在一只木桶里，自称在雅典大街上提着灯寻找诚实的人。

经动笔。他准备把书献给科利特。“我问你,像我这样长期在英格兰公开乞讨的人,谁能够像我这样既傲慢又无礼呢?”

在致阿莫尼乌斯的信里,他非常懊悔离开罗马和意大利。在那里的時候,富足的生活像幸运女神那样对他微笑!同样,后来他又叹息自己没有能在英格兰定居。但愿他抓住了机会!这是他的想法。难道伊拉斯谟不是那种好运帮不上忙的人吗?

他始终处在困境中,他的调子越来越痛苦。他致信阿莫尼乌斯说:“我正在准备一些粮草,以备新年之用,但几乎可以肯定那是徒劳一场。”他所说的是出版翻译卢奇安和普卢塔克的著作。

81

伊拉斯谟在剑桥授课教神学和希腊语,但那几乎毫无成就,物质利益就更少。长期渴望的教士薪酬终于给他兑现了,肯特郡阿尔丁顿教区委任他为牧师,是大主教威廉·沃拉姆 1512 年给他兑现的。他不必住进教区,但每年可以领取 10 英镑的薪金。大主教明确宣示,这样的委任和他们的惯例矛盾,但他还是决定给伊拉斯谟赞助,因为伊拉斯谟这“一盏拉丁文和希腊文文学的明灯,出于对英格兰的热爱而不屑在意大利、法兰西和德意志生活,然后又回到英格兰与他的朋友一道颐享天年、安度余生”。在这句话里,我们看见国家之间已经开始争夺伊拉斯谟,为他提供安居之地并因此而感到光荣。

牧师的职位和薪酬并没有减轻生活的烦恼。在戏谑与亲切的轻松面纱之下,由于经常缺钱,他与科利特的交流和通信有一点苦涩的味道。撰写新的著作以获得新的生活资源,准备旧作出新版,这始终是伊拉斯谟生计之必需。在剑桥大学,他一心研究伟大的著作,为此而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但这样的研究不可能立即给他产生物质利益。他严肃的神学著作压倒一切。在这几年艰难的岁月里,他把最充沛的精力用来准备圣哲罗姆著作的评注和编订,同时又校勘《新约圣经》,科利特始终激励、鼓励并促进他这个宏大的工程。

为了谋生他还得写其他的书。他已经有好几本,印刷商们都急于争

82

夺他的手稿,但他的稿酬却不多。告别威尼斯的阿尔杜斯以后,他回头让若斯·巴迪乌斯刊印他的著作,巴迪乌斯 1505 年就为他印书。巴迪乌斯是荷兰布拉邦人,在巴黎开办了阿希恩出版社(出版社以他的家乡阿希命名)。巴迪乌斯本人是学者,他在经典校勘的精确性上和阿尔杜斯竞争。伊拉斯谟把《愚人颂》交付给吉尔蒙出版社,同时又委托巴迪乌斯刊印他正在增订的《格言集》。为什么把《愚人颂》交给吉尔蒙出版社?原因我们并不清楚。也许,巴迪乌斯起初并不喜欢它吧。巴迪乌斯允诺《格言集》获利更多,但其篇幅很大,巴迪乌斯还在等待伊拉斯谟的修订和新序。巴迪乌斯觉得蛮有把握,因为人人都知道巴迪乌斯准备出新版。然而有谣传说,德国的阿尔丁版本准备重印。所以 1512 年 5 月,他致信伊拉斯谟要他赶快杀青。

在此期间,巴迪乌斯还有伊拉斯谟的其他著作在手,或已经得到伊拉斯谟的首肯:《丰富多样的语言》不久就印行了;《愚人颂》新版即第五版已经推出;卢奇安的《对话》、欧里庇得斯和塞内加的译著纷纷推出。关于《愚人颂》的第六版,双方同意 15 荷兰盾的稿费。关于圣哲罗姆的书信,巴迪乌斯愿意支付同样多的荷兰盾。巴迪乌斯致信伊拉斯谟说:“你会说,啊,稿酬太少啦!我承认,无论多少酬劳都不能补偿你的天才、辛勤、知识和劳动。但神会给你回报,你自己的美德就是最好的奖赏。你已经在希腊罗马文学上取得了极其卓越的成就;你同样值得神灵的嘉许;你可以帮助小小的巴迪乌斯,他有一大家子人要赡养,除了日常印刷业务之外,他没有其他的收入。”

83

收到巴迪乌斯的信时,伊拉斯谟想必后悔得苦笑一场。但他还是爽快地接受了巴迪乌斯的提议。他答应把写的一切书稿交给巴迪乌斯出版。1513 年 1 月 5 日,他在伦敦完成了《格言集》增订本的新序,巴迪乌斯正翘首以待。然而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奔走于作家和出版商之间的经纪人把他《格言集》的增订本取走之后,不是按照伊拉斯谟的委托把书稿交给巴黎的巴迪乌斯,而是交给了德国巴

塞尔的约翰·弗洛本。这位经纪人叫弗朗西斯·伯克曼(Francis Berkman),是科隆人。原来,弗洛本不经伊拉斯谟同意,已经在巴塞尔刊印了他威尼斯版的《格言集》!伊拉斯谟假装对这样的错误和背信弃义表示愤怒,不过他显然并不后悔。六个月之后,他打点行装来到巴塞尔,和这位弗洛本先生建立了最亲切的关系,从此以后,他们两人的名字就连在一起了。庇突斯·雷纳努斯后来的记述并不掩盖其中的秘密:自从他听说《格言集》在巴塞尔被弗洛本重印之后,和弗洛本建立关系对伊拉斯谟就有吸引力了。

我们没有掌握能够说明谁参与了密谋的铁证,我们不愿意指控伊拉斯谟对巴迪乌斯的背信弃义,不过至少可以说,他的态度有一点奇怪。但我们要记住巴迪乌斯,他严格遵循当时的版权观念办事。伯克曼后来登门解释时,巴迪乌斯高调宣告,他对双方的关系表示满意,虽然自印刷《格言集》以后,伊拉斯谟又使他蒙受了更多的损失,比如伊拉斯谟又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刊印了一个新版的《丰富多样的语言》。巴迪乌斯宣告:“如果这符合你们的利益和荣誉,我愿意蒙受损失,而且是平静地接受损失。”双方的关系并没有破裂。在叙述这一段事实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的情况:作为商业现象的出版业刚刚兴起,新的商务形式和关系往往带有不稳定和混乱的特征,而且缺乏既定的商业道德准绳。

在剑桥的居留逐渐使伊拉斯谟厌烦。1513年11月,他致信阿莫尼乌斯说:“几个月来,我们的生活真的像蜗牛一样爬行,待在家里,艰难前进。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大多数人害怕瘟疫已经离开,不过即使人人都在,你还是感到寂寞。”生活费用难以承受,他根本就没有收入。如果那个冬天他能够找到另一个栖身之所,他肯定就飞走了,虽然他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哪怕没有其他目的,也可以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却残生。”

除了环境的压力、瘟疫的不断爆发、肾结石的不断折磨之外,战争威胁又雪上加霜,使伊拉斯谟感到压抑和惊恐。1513年春,英格兰人奇袭法

国,这场蓄谋已久的袭击终于发生。英格兰人和德皇马克西米连一世^①的军队联手,在根盖特(Guinegate)附近战胜了法国军队,迫使特鲁安城(Therouanne)的法军投降,继后又攻陷图尔内城。在此期间,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但在弗洛登(Flodden)附近遭遇到决定性的失败。苏格兰王詹姆斯四世及其私生子亚历山大大战死,这位王子是伊拉斯谟在意大利游历时的学生,阵亡前任圣安德鲁斯大主教。

亨利八世乘武功盖世的盛名回到伦敦去议会庆功。伊拉斯谟没有分享英格兰全民的欢乐,也没有表现出热情洋溢的敬仰。他说,“我们在这里受瘟疫的包围,强盗的威胁;我们喝的酒糟透了(因为从法国进口的酒是买不到的),可是,这就叫凯旋吗?这是在征服世界!”

他对战争叫嚣深恶痛绝,战争叫嚣的各种表现激发了伊拉斯谟的讥讽才能。诚然,他用一首讽刺诗描写法国人在根盖特的溃败,这是对英格兰民族豪情的恭维,然而不久他就深化了这个题材。他回忆战争如何妨碍他在意大利的行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博洛尼亚如何使他感到气愤。“那位高级教士尤利乌斯发动战争,他征服,获胜,他是名副其实的尤利乌斯(恺撒)”,这是他留下的文字。他认为,教皇尤利乌斯是欧洲一切战争的根源。1513年初,这位教皇驾崩了。

伊拉斯谟忙于编订《新约圣经》和《圣哲罗姆文集》。在极其繁忙的治学过程中,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伊拉斯谟报复尚武的教皇,哀叹时代的悲惨遭遇。他写了一首令人击节的讽刺诗《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Julius Exclusus*)。在这首诗里,教皇身披盖世武功的光辉来到天堂门口为自己辩护,可是他却被堵在大门之外。这样的主题对他并不陌生;在牛津大学的一次饭局上,他就即兴编造了一个有关该隐的寓言,令众人捧腹,那样的锋芒不是异曲同工吗?不过,那是直率的讥讽,饭局上虔诚的

85

^① 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 1459—1519),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朋友们乐意听。至于讥讽去世的教皇,无疑也有人乐意听,但伊拉斯谟不得不小心行事。世人的愚行是可以讥讽的,但新近去世的教皇的世俗倾向是不能够讥讽的。因此,虽然他本人半推半就地让人们传阅几份手稿,但他终身竭尽全力隐匿作者的身份。当其闻名遐迩、刊布流行、世人猜想出自他笔下以后,他总是以谨慎的措辞予以否认,虽然他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不明确予以否认。《尤利乌斯》的第一版在巴塞尔印行,出版商不是平常刊印伊拉斯谟著作的弗洛本,而是克拉坦达(Cratander),时间大概是1518年。

写《尤利乌斯》还不能完全满足伊拉斯谟反战的需要。1514年3月从剑桥到伦敦时,他致信过去的赞助人卑尔根的安东尼圣伯廷修道院的院长,充分阐述了战争的愚蠢。基督徒君主们缔结基督教的和平,那该有多好啊!或许院长可以利用自己对年轻气盛的查理五世尤其对其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影响,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做出贡献吧。伊拉斯谟坦率地说,战争使英格兰的精神突然为之一变。如果荷兰国王能够给他提供生活资料,他是想回国定居的。伊拉斯谟十分天真,他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兴趣和他对战争暴行的义愤混杂在一起,因为战争暴行使人感到羞耻,使基督教丢脸。“这场战争突然改变了这个英格兰岛国的精神。生活花销天天上涨,慈善精神不断消减。由于缺少美酒,肾结石几乎要了我的命,这种病是饮劣质酒染上的。我们被禁锢在这个岛子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封闭,所以连书信都不向国外投递了。”

这封信是伊拉斯谟的第一篇反战文章,他将其扩写成箴言集《无甜蜜战争经验》(*Dulce bellum inexpertis*),编入1515年弗洛本刊印的《格言集》,稍后也出过单行本。此后,我们将追踪伊拉斯谟这一条思想演变的路子。

虽然1514年夏天,英格兰将与法国媾和,但伊拉斯谟还是决心离开英国。他把行李箱托运到安特卫普,由彼得·吉尔斯收,然后到法国北部加来(Calais)附近的哈姆斯城堡去拜望蒙特伊勋爵,然后从那里回荷兰。就在离别伦敦前夕,有一位神秘人物来访,他是教皇的外交使节,肩负着

和平使命。这位使节是意大利的卡诺萨伯爵(Count Canossa),会晤安排在泰晤士河岸边阿莫尼乌斯的住宅里。根据阿莫尼乌斯的介绍,卡诺萨伯爵乔装的身份是商人。饭毕,来人试探伊拉斯谟是否可以返回意大利,他在那里将以天下至尊的地位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伊拉斯谟回答说,他生活在杰出学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跻身于这些博学鸿儒之中,哪怕最简陋的住所也令他满意。这句恭维话是他对英格兰的告别辞,这个国家曾经施惠于他。几天以后,1514年7月上旬,他已经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他曾经三次造访英格兰,且有过短暂的居留,他不会再回来了。

第十一章 神学之光

→1514—1516

踏上成功与满足之途——斯特恩修道院院长召唤伊拉斯谟回去——拒不服从——初访巴塞尔:1514—1516——在德国受到热情欢迎——出版商约翰·弗洛本——《圣哲罗姆文集》和《新约》版本——担任查理亲王的咨议:《基督教君主的教育》,1515——教皇特许伊拉斯谟过世俗生活:1517——闻名遐迩——伊拉斯谟成为思想核心——书简——书信艺术——书信艺术的危险——辉煌时代就在眼前

和往常的离别一样,伊拉斯谟离别英格兰的情况也笼罩在神秘色彩之中。公开发布的消息是,他要到罗马去履行诺言。也许,他早已决定回低地国家,不是回荷兰省,而是回到布拉邦省王府附近什么地方。然而,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造访巴塞尔的弗洛本印刷所,他要亲自去督办几本书的出版。这些书有新有旧,他总是随身携带;书稿里包括《新约圣经》和《圣哲罗姆文集》的素材,他希望借以复兴神学,这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任务。在横渡海峡时,他发现随身的宝贝手提包被误送上了另一只船,那里面可是他的手稿啊,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着急。他觉得仿佛遭遇到丧亲之痛,那是多年来呕心沥血的成果呀。在留传下来的文字里,他说那种刻骨铭心的绞痛就像失去了亲生的儿女。

然而,令他惊喜的是,登岸以后他发现手稿竟安然无恙。他在加来附近的哈姆斯城堡逗留了几天,那是在蒙特伊勋爵家里做客。此间的7月7日,斯特恩修道院院长4月18日的一封信辗转送达他的手里,院长是他的朋友塞瓦提乌斯·罗杰;罗杰在信中召唤他回去,说他离开修道院的时间太久了。这封信送到他的手里前,已经被人偷看了,他收到信反而是纯属偶然。

召他回修道院的一纸文书犹如晴天霹雳,正在他气贯长虹、即将登顶的时候轰然在他的头上炸响。伊拉斯谟用一天的时间听取朋友们的意见,然后回信表示拒绝。他给罗杰的信一贯用最严肃的口吻,这一次的拒绝既是为自己辩白,也是深刻的反思,比他写《阿尔卑斯颂歌》时给罗杰的信更加严肃、更加真诚,那次登临阿尔卑斯山及其创作是他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他请上帝作证,他将追随最纯洁的神灵感应。让他回归修道院却是难以想象的。他请塞瓦提乌斯注意他进修道院时的具体情况,昔日种种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亲戚的压力、他自己的假谦虚。他指出修道院的生活非常不适合他的体质,并且和他对自由的热爱抵触;他又指出,如果重回修道院,那对他孱弱的身体非常有害。虽然离开了修道院,难道他的人生变坏了吗?文学使他远离许多弊端。他浪迹天涯的生活不会给他带来耻辱。他惴惴不安地以梭伦^①、毕达哥拉斯^②、使徒保罗和他喜欢的圣哲罗姆为榜样。难道他不是处处受到朋友和赞助人的赞赏吗?他列举的朋友和赞助人有: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蒙特伊勋爵、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还有约翰·科利特。那么是否有人反对他的著作比如《基督徒士兵须知》

① 梭伦(Solon,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家、诗人、执政官,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②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教团创始人,提倡禁欲主义,认为万物和谐、万物皆善、万事健全、万象丰盈,认为数为万物之本。

和《格言集》呢？（他没有提《愚人颂》。）最好的著作将陆续出版：圣哲罗姆的文集和《新约圣经》。现在的事实是，自从他旅居意大利以来，他已经搁置了在修道院养成的习惯，现在他穿的是普通教士的道袍，他还可以寻找若干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他的结论是：我不能够回荷兰。“我知道，那里的空气和饮食令我吃不消；人人都会瞪着眼睛看我。我回国时将是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老人，离开时那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已经不复存在；我回去时将疾病缠身；我已经习惯了享受最高贵者的尊重，回去后却会遭到最卑贱者的鄙视。”信的结尾说：“纸短信长，不可能详细坦承一切。我准备去巴塞尔，也许再去罗马，但我回来时一定来拜望你……听说威廉、弗朗西斯和安德鲁（他在国内的老朋友）已经去世。请代我向亨利教长和你周围的修士们致意，我对大家心怀美好的感情。我将过去的幸灾归之于自己的错误，或者说我自己的命运。别忘了在你祷告时向上帝表彰我。倘若我心里的感觉使我肯定回到你们身边会使上帝高兴，我今天就会启程回国的。再见了，昔日我最甜蜜的老伙计，如今我尊敬的神父。”

89

在高调宣示的神学抱负的直接动机之下，加重这封信情绪的无疑是他长久的、刻骨铭心的厌恶和羞辱的心理刺激。^①

他横穿低地国家南部，造访朋友和赞助人，重访卢万大学，然后转道莱茵，最后于1514年8月下旬到达巴塞尔^②。在巴塞尔，从未体会过的那种盛名之下的愉悦正在等待他。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把他当作世界的明灯来欢迎——欢迎的书信、招待会、宴会应接不暇。这些接风活动庄严而

① 这封信颇为重要，全文请见本书《伊拉斯谟书信选》书简10。——原注
经互相参照发现，这里的摘要和本书收录的书简10的文本不完全一致，显然英文版的文字工作不是很严谨。

② 巴塞尔，今属瑞士，位于瑞士、法国和德国交界地区，历史上的归属有过变化。

热情,伊拉斯谟在法国、英格兰和意大利的学者中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场面,在他的同胞中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赞赏伊拉斯谟,强调他就是德国人,说他为德国增光。首次与弗洛本会晤时,伊拉斯谟听任他去玩弄使人愉快的欺骗:弗洛本假装是他的朋友和经纪人,弗洛本尽情享受着他认可的喜悦。德国人营造的气氛相当合他的心意:“我的德国!我后悔,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

不久,他来德国要做的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他又能够得心应手工作了,亦如六年前在威尼斯那样:在一间大型印刷所里伏案工作,吸引着各路学者;在难得的片刻休息时间里,一波又波的人来表示敬意,表达善意,伊拉斯谟也心安理得地一一领受下来。“我在一个最宜人的学术殿堂里徜徉,如此之多的饱学之士,如此非同寻常的学问!”

就在伊拉斯谟到达巴塞尔的1514年8月,弗洛本推出了他翻译的普卢塔克的几本小书。《格言集》新版正在付印之中,新版做了一些矫正和增订,增加了新序,就是本来为巴黎的巴迪乌斯写的那篇新序。与此同时,卢万的迪尔克·米尔滕斯也在刊印伊拉斯谟的书,路过卢万时,伊拉斯谟委托他出版一集拉丁文简易读本。同时为伊拉斯谟工作的其他出版商还有斯特拉斯堡的舒尔(M. Schurer),他准备刊印《寓言集》(*Parabolae sive similia*)。伊拉斯谟正在为弗洛本翻译塞内加的文集,写一本拉丁语语法书。尽管这样忙,《圣哲罗姆文集》和《新约圣经》始终是他执著追求的首要目标。

少年时代的伊拉斯谟就喜爱圣哲罗姆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书信。为这位教会之父校勘编纂著作的计划是1500年做出的,自此,伊拉斯谟就一直在准备,只是偶尔被迫间断。1513年,他致信阿莫尼乌斯说:“我对校勘和评注圣哲罗姆的著作满腔热情,我觉得有神灵激励。经过比照许多古代的手稿,我已经完成校勘工作。这一工作使我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1512年,他和巴迪乌斯协商出一部圣哲罗姆书信集。弗洛本的合伙人约翰·阿梅尔巴赫(Johanne Amerbach)花了几年的时间准备刊

印圣哲罗姆的一个文集,可惜在伊拉斯谟抵达巴塞尔之前他已经去世。伊拉斯谟主持这个刊印计划、提供一切准备就绪的手稿时,几位学者参与了这个工程,其中之一是罗伊希林^①。实际的编辑工作是由伊拉斯谟完成的。1916年,弗洛本刊布了圣哲罗姆的文集。在这9卷文集中,前4卷是伊拉斯谟编订的书信;其他各卷也由伊拉斯谟校勘并作序。

伊拉斯谟为《新约圣经》做的校订编纂工作仍然是他呕心沥血的工作。在逐渐成形的过程中,这本书的性质起了变化。接触到瓦拉的《新约评注》之后,伊拉斯谟就开始注意校勘拉丁文本的《新约圣经》。此前,在第二次造访英格兰的1505—1506年期间,他接受科利特的建议,从希腊文原文把《新约圣经》翻译成拉丁语;他这个拉丁语版本和已有的拉丁语版本差别很大。除了科利特之外,很少有人见过伊拉斯谟拉丁语《新约圣经》的手稿。稍后,伊拉斯谟意识到,刊印他的新版希腊语《新约圣经》并附上他的注解也是必要的。关于这个新版的希腊语《新约圣经》,他到巴塞尔不久就和弗洛本做了初步的安排。稍后,他觉得在意大利刊印这个版本比较好,便动身去意大利。大概弗洛本提出了新的优厚条件,伊拉斯谟在即将动身去意大利时突然改变了行程。他不是去意大利,而是去英格兰。1515年春,他匆匆去了一趟英格兰,主要目的大概是去取回他留在那里的希腊语《新约圣经》手稿。夏天,他回到巴塞尔,继续在弗洛本的印刷所编订这个手稿。1516年初,伊拉斯谟编订的《新约圣经》(*Novum Instrumentum*)出版,这个版本是希腊语、拉丁语双语版本,希腊语文本是经过他净化后并加上注释的文本,拉丁语文本是经过他修订和原来的拉丁语版本迥然有别的文本。

91

《圣哲罗姆文集》(9卷)和双语版《新约圣经》具有至尊的地位,伊拉

^① 约翰·罗伊希林(Johanne Reuchlin, 1455—1522),德国人文主义者、古典学者,研究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的先驱,著有《希伯来语语法纲要》,他推进了希伯来语和《旧约》的研究工作。

斯谟的《新约圣经》是极具胆略的神学著作。这两部书问世之后,我们就可以说,伊拉斯谟业已成为科学研究神学的中心。与此同时,伊拉斯谟成了古典学问和文学鉴赏的中心和试金石。他的权威在各国不断上升,他的通信大大增加了。

伊拉斯谟的思想成果大大增加,然而他的经济地位却没有保障。1515年到1517年是他生平最不安定时期。他还是需要抓住每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图尔奈的牧师薪俸、英格兰的牧师俸禄、西西里的主教补贴。他总是半开玩笑地说,他后悔以前失去的好机会,嘲笑自己对命运的追逐,叹息他那“如影随形、令人诅咒的贫困,至今无法从肩头上甩掉的‘配偶’”。毕竟,与其说这是命运的作弄,不如说他是自己焦虑不安情绪的受害者。此时,他年届五十,但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在播种,却不知道收获什么”。当然,他所谓的收获是他的治学生涯,而不是指他的谋生手段。

1515年,布拉邦省省长约翰·萨瓦热(John Le Sauvage)为伊拉斯谟谋到一份差事,他成了年轻的查理五世的咨议,约翰·萨瓦热是伊拉斯谟的赞助人,他青春勃发,前程锦绣。1515年初,伊拉斯谟的任命正式公布:这是纯粹的荣誉头衔,每年200荷兰盾的津贴。为了取得这个资格,伊拉斯谟撰写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阐述他关于君主教育的思想。这本书符合伊拉斯谟的气质和倾向,论述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和稍早问世的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il Principe*)形成鲜明的对照。

1516年春,伊拉斯谟在巴塞尔的工作稍事停顿,他趁机回一趟低地国家。他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布拉邦省省长萨瓦热;除了查理五世的津贴,省长还为伊拉斯谟争取到科特雷(Courtray)教区的牧师薪俸;这笔薪俸和英格兰的牧师薪俸一样是用钱支付的。接着,伊拉斯谟在安特卫普拜访了一位终身挚友:彼得·吉尔斯,年轻的公务员。每次到安特卫普,伊拉斯谟都在他家借宿。彼得·吉尔斯是莫尔《乌托邦》里水手的原型,水手在

自己的花园里讲述了乌有乡的经历。在伊拉斯谟造访的几天里,彼得·吉尔斯正在为卢万出版商狄尔克·梅尔滕斯校对《乌托邦》。稍后,昆廷·梅奇斯(Quentin Metsys)将为吉尔斯和伊拉斯谟画像。这一幅折叠双连画,是送给托马斯·莫尔的礼物,也是伊拉斯谟最值得怀念的生动记忆:三位朋友的友谊。

1516年夏天,伊拉斯谟再次短暂造访英格兰。他在莫尔家借宿,会见了科利特、沃拉姆、费希尔等朋友。但这趟旅程不是看望老朋友。迫使他去的是一件紧迫而微妙的事情。到那时,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牧师和教会要人,有鉴于此,妨碍他自由基督徒前程的一切障碍都应该被一劳永逸地清除了,而且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紧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已经恩准他接受英格兰的牧师职位,又恩准他可以穿圣奥古斯丁会的道袍。但这两种恩准的自由度毕竟有限,他不满足。他急于把这件事办妥,争取豁免圣奥古斯丁会的纪律。根据艾伦博士的分析,自从他拒绝院长召回他的要求后,修道院坚持召回他的威胁使他忧心。这个威胁是他最害怕、最厌恶的事情。

93

他和朋友阿莫尼乌斯在伦敦起草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文件,向教廷文书院(apostolic chancery)陈情。陈情书详细描述了伊拉斯谟的生平,说他身在外却心在教会:他被强制送进修道院,在修道院生活遭遇到困难,环境迫使他脱下修士的道袍。陈情书是一篇满怀激情的辩护词,调子哀怜,文辞华丽。我们看见的书信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出什么请求。但其附录用密语写了请求,密码用另一封信寄出,伊拉斯谟请求教廷文书院扫除他非婚生子身份给他造成的障碍。收信人是教廷文书院的秘书朗伯图斯·格鲁尼乌斯,这个名字可能是虚构的。^① 当重大利益处在危急关头时,伊拉

① 格鲁尼乌斯(Lambertus Grunnius)这个名字可能取自圣哲罗姆的书信,原来是鲁费努斯(Ruffinus)的绰号,圣哲罗姆不喜欢这个绰号。格鲁尼乌斯这个名字又出现在1532年3月5日的信里。——原注

斯谟的文字总是罩上重重神秘的色彩。

沃斯特主教希尔韦斯特罗·吉格利(Silvestro Gigli)将作为英格兰的代表去出席拉特兰会议^①,他自告奋勇去送信并为伊拉斯谟求情。在此期间,伊拉斯谟已于8月底回到低地国家,他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教廷的裁示。直到1517年1月,事情才得到最后的解决。在红衣主教保罗·萨多雷(Paul Sadolet)署名的两封信里,教皇利奥十世宽恕了伊拉斯谟违背教会法的错误,准许他不必穿圣奥古斯丁会的道袍,特许他过世俗的生活,允许他担任牧师,并不因为他是非婚生子而剥夺他担任牧师的资格。

94 伊拉斯谟的盛名如日中天。除以上赦免和特许外,教皇还接受了他敬献的《新约圣经》,并且通过萨多雷表达对伊拉斯谟著作的欣赏。罗马似乎在各方面推动着伊拉斯谟的事业。

此时,伊拉斯谟考虑回到低地国家永久定居,一切情况都指向这个结局。卢万似乎是最好的地方,那是荷兰的学术中心,而且他曾经在那里住过两年。不过,卢万对他并没有吸引力,因为那是保守派神学的堡垒。他的同乡马丁·范·多普在卢万大学担任三一神学教授,曾经在1514年用神学系的名义谴责过他。在一封信里,他指责伊拉斯谟的《愚人颂》胆大妄为,抨击他对神职人员的嘲弄,谴责他肆意修改《新约圣经》。伊拉斯谟回信做了详细的自我辩护。1516年,他们的论战蔓延到更加广阔的领域:捍卫和反对伟大的希伯来学者罗伊希林的论战。捍卫罗伊希林的学者在《蒙昧人书简》(*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里举起了讨伐伊拉斯谟的匕首和投枪。伊拉斯谟不信任多普和卢万地区的教士,反之,他也令人生疑。1516年的其余时间和次年的上半年,他在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根特逗留,常常在彼得·吉尔斯家借住。1517年2月,法国传来几种颇具诱惑

^① 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 1123—1151),天主教在罗马拉特兰宫举行五次公会中的任何一次会议。

力的邀请,布多伊斯^①、艾蒂安·庞彻^②等人致信伊拉斯谟传达法王的邀请,如果他愿意到巴黎定居,青春勃发的弗朗西斯一世恩准他一份优厚的牧师薪金。伊拉斯谟总是不愿意受到束缚,所以他的回信彬彬有礼却躲躲闪闪,他没有去巴黎。

在此期间,他听说教皇赦免他的消息。与此有关的是,他再次去英格兰,但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大不列颠的土地。1517年4月9日,在阿莫尼乌斯家所在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圣斯蒂芬教堂里,举行了教皇的赦免礼,永远驱散了自青年时代起就压抑着伊拉斯谟的噩梦。他终于自由啦!

95

盛情的邀请和慷慨的允诺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蒙特伊和沃尔西谈起英格兰授予他基督教的崇高荣誉,这样的仪式随时等待着他。布多伊斯反复敦请他移居法国。红衣主教希梅内斯(Ximenes)想聘请他到西班牙的阿尔卡拉(Alcala)大学执教。萨克森公爵请他到莱比锡大学去担任教授。皮尔德海姆^③向他吹嘘纽伦堡作为帝王之都的完美无缺。伊拉斯谟的处境和过去一样,写作、编辑,他始终忙得不亦乐乎;根据他一贯的脾气,他并不明确拒绝任何邀请,也不明确接受任何邀请。他总是想要多留几手。1517年初夏,西班牙皇室请他陪伴年轻的查理王子离开低地国家返回西班牙。他谢绝了。倘若去西班牙,他和巴塞尔、卢万、斯特拉斯堡和巴黎等出版中心的亲密接触就会中断,那就会使他终身为之奋斗的工

① 布多伊斯(Guglielmus Budaeus, 1467—1540),亦名比代(Guglielmus Bide),法国古典学者、外交家,法兰西学院创始人之一,两次担任法国驻教廷大使,后任皇家图书馆馆长,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希腊语言评注》。

② 艾蒂安·庞彻(Etienne Poncher, 1446—1524),巴黎大主教、人文主义者、外交官。

③ 皮尔德海姆(Pirckheimer, 1470—1530),德国的人文主义者、文学家、纽伦堡的政治家。

作推迟。王子7月初去米德尔堡乘船回西班牙时,伊拉斯谟出发去卢万。

虽然卢万大学在许多方面使他感到不快,但他还是命定要回到这个环境。他在那里承担教学任务,年轻的拉丁学者追随他,请他帮助修改诗歌和书信,近距离观察他。但这样的生活只过了几个月。他致信坎特伯雷大主教说:“我将决定在什么地方安居适合颐养天年,老年已经叩响我的大门,纠缠不去了。”

96 结果,他在卢万住了4年。此间,他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但这样的安定是外在环境的安定,而不是内心的宁静。在这四年里,他一直在思考是应该去英格兰、德国还是法国,希望最终找到他光彩照人的地位,他一直渴望这样的地位,但始终不能或不愿去抓住机会。

1516年到1518年可以说是伊拉斯谟生涯的巅峰时期。热烈欢迎他的人群总是簇拥在他的周围。人们做好心理准备企盼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无数人的企盼中,伊拉斯谟就是那个伟人!在布鲁塞尔逗留期间,他不断受到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搅扰。他们都喜欢吹嘘目睹伊拉斯谟的风采。西班牙人既饶舌又庄重,尤其使他厌烦。热情洋溢的德国人文主义者歌功颂德,他们致信伊拉斯谟表示敬意。这样的歌颂早在他1514年初访巴塞尔时就开始了。最简单的溢美之词就有“伟大的鹿特丹人”、“德国的光彩”、“世界的光彩”。市议员们伺候他,美酒佳酿的礼品和公共的宴请成了家常便饭。弗赖堡的法学家乌尔里希·扎修斯(Ulrich Zasius)的奉承登峰造极、无与伦比:“有人在公共场所指名道姓地说,我收到伊拉斯谟一封信”,“你是三重意义上的英雄,你是伟大的朱庇特^①”,但这还是扎修斯送给伊拉斯谟的比较有分寸的称号。茨温利^②1516年写

① 朱庇特(Jove, Jupiter),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② 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 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提出《六十七论纲》,否认罗马教廷权威,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解散修道院,将弥撒改为圣餐礼等。

道：“瑞士人认为一睹伊拉斯谟风采不胜荣幸。”沃尔夫冈·卡皮托^①写道：“我熟悉伊拉斯谟、传授伊拉斯谟，其他东西一概不教了。”乌尔里希·胡腾^②和亨利·格拉雷阿努斯^③两人幻想他们是伊拉斯谟的左右手，就像站在苏格拉底^④身边的亚西比德^⑤一样。庇突斯·雷纳努斯是终身忠实的朋友，真心实意地钦佩和帮助伊拉斯谟，他的友谊弥足珍贵，远远胜过那些过分的颂扬之词。德国人对伊拉斯谟的热烈颂扬有一种举国兴奋的要素：这就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绪，路德宗教改革呼号即将来临。

其他国家也加入这样的颂扬，只不过稍晚、稍微冷静而已。科利特和滕斯托尔保证伊拉斯谟将享有不朽的美名；庞彻颂扬伊拉斯谟，认为他的地位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之上；热尔曼·德·布里(Germain de Brie)宣告，法国学者除了伊拉斯谟外，谁也不读了。布多伊斯甚至宣告，伊拉斯谟的名字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响彻云霄。

日益增加的荣光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几乎每一年都会谣言蜂起，盛传他已经去世，他自己却认为这怀有恶意。而且盗用他名字的各种书籍纷纷出笼，其实这些书和他毫无关系，其中一本叫《蒙昧人书简》。

97

-
- ① 沃尔夫冈·卡皮托(Wolfgang Capito, 1478—1541)，德意志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在巴塞尔大教堂布道，并在巴塞尔大学执教，支持宗教改革。
- ② 乌尔里希·胡腾(Ulrich von Hutton, 1488—1523)，德国骑士、人文主义者，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作为骑士，他留恋中世纪，作为改革家，他又向前看，以文学形式讽刺诸侯、教廷、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是《蒙昧者书简》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 ③ 亨利·格拉雷阿努斯(Henry Glareanus, 1488—1563)，瑞士人文主义者、桂冠诗人、音乐理论家、新人道主义的卫道士，著有《12 教堂调式》。
- ④ 苏格拉底(Socrates, 前 469—前 399)，希腊哲学家，善辩，重面授，强调口头交流和口传文化，首创问答教学方法，认为哲学在于认识自我，美德即知识，反对文字撰述，其学说仅见于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转述。被控毒害年轻人而被处死。
- ⑤ 亚西比德(Alcibiades, 前 450? —前 404)，雅典政治家、著名将领，钦佩哲学家苏格拉底，两人曾并肩作战。

然而,首先大大增加的是他的书信。昔日他曾经请莫尔介绍笔友通信,这样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四面八方的书信汹涌而来,封封都恳请他回信。昔日的一位学生眼泪汪汪地扼腕痛惜,哪怕是伊拉斯谟一张便笺他都不曾收到,所以,他无法向人展示老师的书信。学者们恭恭敬敬地首先通过伊拉斯谟的朋友介绍,然后才敢给他写信。在通信方面,伊拉斯谟之慷慨大方如英雄之义举,他尽量多多回信,但每天的信压得他难以分身,他甚至没有时间看信。伊拉斯谟说:“如果我不回信,那似乎心肠太狠。”不回信的念头是难以容忍的。

我们要记住,当时书信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报纸,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相当于现在的文学月刊,应该说文学月刊是直接从小雅书信中兴起的。正如古代的通信一样,此时的书信是一门艺术。在这个方面,写信时的模仿胜过其他方面的模仿,也更加获益。早在1500年旅居巴黎的时候,伊拉斯谟就写了《书信指南》(*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该书1522年刊行。一般地说,人们写信时心里想到将来要发表,并使之广泛流通,写信人至少敢肯定收信人将会以信示人。一封精美的拉丁文书信是一颗宝石,会引起邻里的羡慕。伊拉斯谟致信布多伊斯:“滕斯托尔一口气把你给我的信看完,至少看了三四遍;我不得不从他的手里抢回来。”

98 遗憾的是,命运并非总是体谅写信人公开、半公开或严格保密的意向。许多信常常是经过许多人的手之后才到达目的地,塞瓦提乌斯1514年致伊拉斯谟的信就遭到这样的命运。伊拉斯谟在信中不止一次说:“写信时务必小心,拦路打劫者总是在寻找拦截的机会。”然而,尽管他的名声异军突起,他写信时还是非常粗心。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保存书信,喜欢通信,然而由于他居无定所,许多信亡佚不存。他本人又控制不住这些书信的发表。早在1509年,一位朋友就送来一卷他的书信集手稿,这些信是朋友在罗马的市场上买到的。伊拉斯谟立即把这些信付之一炬。自1515年起,他本人开始督察自己书信出版的情况。起初发表的仅仅是少量重要的书信;1516年发表的是友人致伊拉斯谟的书信选,此后的书信集

越来越厚；到了他的晚年，几乎每年他都有一本书信集问世。书市上需求最旺的书莫过于他的书信集，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们是精美文风的典范，用品位高雅的拉丁文写成，满纸都是风趣的文字，洋溢着精深的学问。

半私密、半公开性质的书信往往会开罪于人。本来在信里私下向朋友说的话，一旦许多人阅读之后，就可能伤害人。伊拉斯谟没有意识到，他说的话可能会很伤人，所以他的信反复引起误解和隔阂。可以说，当时的风尚还来不及适应新近出现的印刷术，它使文字的公开性成千上万倍地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逐渐适应之后，意在发表的公开话和私下交流用的话才实现了分离，私密话保留在信纸上，只有收信人才能够看到。

与此同时，随着伊拉斯谟的名气与日俱增，他的早期著作在公众心目中的估价也随之攀升。《基督徒士兵须知》到了1515年才洛阳纸贵，离它初版时已经过去了11年，因为11年后时机才更加成熟。1516年，约翰·华生(John Watson)致信伊拉斯谟说，“《愚人颂》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而受到欢迎”。同年，我们发现有人首次使用一个词“伊拉斯谟追随者”(Erasmiani)。据约翰·萨皮杜斯(Johannes Sapidus)记述，这是德国朋友们的自称。一年多以后，约翰·埃克^①博士换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字眼，他说“所有的德国学者都是伊拉斯谟(Erasmians)”。但伊拉斯谟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他回应说：“我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为什么有人想要成为伊拉斯谟似的人呢？我痛恨诸如此类的派别名字。我们都是基督的信徒，我们大家都是为主的荣光而辛勤工作，每个人都在尽力。”不过他明白，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支持他，就是反对他！青年时代，他是才华横溢的拉丁学者、才智过人，如今他成了一位国际的枢纽人物，时代的文明要依靠他。他禁不住要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是时代的大脑、心脏

99

① 约翰·埃克(Johannes Eck, 1486—1543)，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宗教改革中站在路德对立面，坚持传统教义，为教皇的权威辩护，批判路德的《奥格斯堡信纲》，编订德意志方言的《圣经》。

和良心。他甚至可能觉得，他的天命是传达伟大的救赎讯息，或许他已经传递了这样的讯息吧。纯洁的知识轻易取胜的信念、基督徒顺从基督的近景，是伊拉斯谟在他《新约圣经》的序言里传递的讯息。

在那些岁月里，他的前途是多么光明啊！在那个时期，伊拉斯谟反复回归昔日黄金时代令人高兴的母题，此时，另一个黄金时代又破晓了。永恒的和平就在门口。世界上最高贵的君主们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和平有保障了。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西班牙的查理国王、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德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都媾和了。普世的公义和基督徒的虔诚将得到弘扬，文学和科学将繁荣昌盛。宛若在某一个既定信号的调动之下，无数最聪明的头脑共同奋斗，为恢复高水平的文化而努力。我们要庆贺这个时代，它将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不过，伊拉斯谟这个调子并没有吹得太久。1519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见他这样的调子。此后，普世幸福即将来临的梦想就让位于抱怨了，我们再次听见他悲叹时事之艰辛。

第十二章 伊拉斯谟的思想

伊拉斯谟的思想：伦理和审美倾向，厌恶一切不合情理、愚蠢和累赘的东西——他心目中基督教渗入古典文化的景象——优秀学术的复兴——安详和谐与快乐智慧的理想生活——热爱稳重与安详的生活——非哲学非史学的头脑，强烈的语文学倾向和道德倾向——自由，澄明，纯净，质朴——对自然的信念——教育理念与社会理念

那时的人把获救的希望寄托在伊拉斯谟身上，他们聆听伊拉斯谟说的每一句话，以便领会获救的信息。何以至此呢？他的头脑似乎承载着一种新的自由，装满了一种清丽、纯净、质朴的新知识，承载着一种健康、正确生活的新型的和睦。对他们而言，伊拉斯谟掌握着新发现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等他分配给大家。

100

这位伟大的鹿特丹人的脑子里究竟有什么思想给世界带来无穷的希冀呢？

从负面看，伊拉斯谟的脑子可以做这样的界定：他对一切不合情理、枯燥无味、纯粹形式的东西深恶痛绝。中世纪文化的稳步发展使思想的世界不堪重负、拥挤不堪。他青年时代学习拉丁文的课本荒唐可笑。每

当想到这些教本,他的厌恶之情就油然而生,他痛恨马梅特勒图斯(Mammetrectus)、布拉吉罗格斯(Brachylogus)、埃布拉杜斯(Ebrardus)之类的教科书,认为它们是垃圾一堆,应该予以清除。但他对这种过时、无用、无灵魂的教科书的厌恶延伸到非常宽广的领域。他发现社会生活尤其宗教生活里许多东西已经过时、应该废除,大量的积习、仪式、传统和观念似乎失去了应有的精神食粮。他并不盲目排斥、完全摒弃一切:使他恶心的是,人们在追随积习、仪式、传统和观念的过程中并不理解其意义,并不怀有正确的情感。他对愚蠢和荒谬的东西很敏感,他需要高雅的礼仪和内在的尊严;对他而言,一切仪式和传统的领域呈现出的景象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愚蠢和自私的,令人厌恶的。虽然他知识渊博,鄙视愚昧,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那些宗教仪轨毕竟包含着有价值的成分,有些成分是未经表达的、未经系统化的。

通过他的论著、书信尤其《对话集》一书,我们仿佛看到一系列愚昧而贪婪的修士鱼贯而行,仿佛看到一个勃鲁盖尔^①作品的画廊。凭借他们的假正经和愚昧,修士们欺骗轻信的人们,炫耀自己。贯穿该书的是一个混合的母题(这类母题在他的作品里为数众多),讥讽迷信的母题在书里一再重现,得救的人总是身穿方济各会或多明我会道袍而死亡的修士。

当然,斋戒、严格的祷告辞、宗教节日的仪式不能够一概忽视,然而当我们把信仰寄托在它们身上,反而忘掉博爱时,它们就会使上帝不悦。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忏悔、豁免和各种各样的赐福。朝觐徒劳无益。对圣徒及其遗物的崇敬里充满了迷信和愚蠢。人们认为,如果早晨参拜了圣克里斯托夫的画像,白天他们就能消灾弭难。“我们亲吻圣徒的靴子和手

① 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1525? —1569), 佛兰德斯画家, 擅长风景画, 其代表作有《农民的婚礼》、《盲人的寓言》等, 两个儿子继承其衣钵, 皮埃特(1564—1638?)被称为“小勃鲁盖尔”, 继承乃父风格, 让(1568—1625)擅长静物画。

绢,我们去触摸他们用过的《圣经》、他们最神圣、最灵验的遗物。”

伊拉斯谟不喜欢看上去过时和陈旧的东西,这样的厌恶情绪不限于上述情况。他不喜欢的领域还包括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整个思想范围。在三段论里他看见的仅仅是细腻和干瘪的机巧。一切象征手法和寓言对他都格格不入,他全然不感兴趣;他偶尔尝试写一点寓言,但他从来就没有神秘主义的倾向。

现在看来,他自己的头脑颇有不足,缺乏系统的品质,这使他不能够欣赏整个系统。他以极大的义愤和辛辣的讥讽抨击宗教仪式和教会积习,但他又说不上具有值得骄傲的反讽精神,所以他的反讽压倒了他对经院神学的谴责,因为他本人并不完全理解经院神学。嘲笑当时保守的教士,讥讽他们是“我们的大人物”,那总是不费力气的。

102

他的义愤只会刺痛那些值得谴责的人和事,并能够加强那些有价值的人和事;然而他的讥讽刺伤的却不仅是邪恶的东西,同时他还伤害了美好的东西,尽管他没有这样的意向;他抨击制度和个人,造成了损伤却不能使之提升。个人取向的伊拉斯谟一点也不理解,当他抨击教职、教派、体制的荣誉时,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不懂他抨击的制度是最神圣的教会时,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伊拉斯谟的教会观念不再是纯天主教会的观念。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具有恢弘的结构,有它神秘的基础、严格的教阶体制、极其相宜的对称。然而,在这气象万千的文明面前,除了外在细部和装饰的重负之外,伊拉斯谟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看见的不是阿奎那^①和但丁^②描绘的世界,他看见的世界不符合他们描绘的世界;伊拉斯谟看见的是另一个世界,充

①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哲学家,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应用于神学研究,代表作为《神学大全》,他的哲学和神学统称托马斯主义。

② 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因反对封建贵族和教皇而被终身放逐,著诗集《新尘》、史诗《神曲》。

满魅力和升华情感的世界，他把这个世界奉献给他的同胞。

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古典的世界，同时又是被基督教信仰照亮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世界。这是因为，用历史的真实情况来比照，君士坦丁和教会之父们表现出来的世界，既是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退化的世界，又是新兴的非基督教文化和拜占庭^①精神来临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里没有共同的东西。伊拉斯谟幻想的世界是纯古典主义和纯圣经文化的基督教的混合体；他所谓的古典主义是西塞罗、贺拉斯和普卢塔克，至于拉丁文化之前的灿烂辉煌精神他却始终知之甚少。这个混合体能够融为一体吗？看来不太可能。在伊拉斯谟的脑子里，我们看见一盏明灯交替照亮非基督教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我们在他的生涯里也能够看见这样的交替现象。他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他的古典主义仅仅是形式；他从古典文化吸收的成分仅仅是在伦理上符合他的基督教理想的要素。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伊拉斯谟登场的时候，早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亮相一百多年，但对他那个时代而言，他的思想还是崭新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是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梦寐以求的理想，可他的弟子们却看不见这样的理想，因为他们痴迷的是古典形式美那难以抗拒的辉煌。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要等到伊拉斯谟来完成。

纯拉丁文化和古典精神所指为何物？我们不可能有伊拉斯谟那样的感觉，因为对他而言，这意味着艰难的征服和光荣的胜利，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要获得他那样的感觉，你必须要有在一所纪律严厉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对非基督教文化的仇恨。他早年的著作《反蒙昧主义》就含有这样的仇恨。书里用“哥特式的”、“哥特人的”贬义词来描写一切陈旧的和粗鲁的东西，但伊拉斯谟所谓的“蒙昧主义”却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中世

① 拜占庭(Byzantium)，后称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帝国首都；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

纪精神。伊拉斯谟关于他所处时代的严重精神危机的观念显然是二元主义的。他把这场精神危机看成是新与旧的斗争,对他而言也就是善与恶的斗争。在传统倡导者的身上,他只看见蒙昧主义、保守主义,只看见对“典雅的文学”(*bonae literate*)愚昧的反抗,而他所谓的“典雅的文学”又是他和他的同仁为之奋斗的美好事业。伊拉斯谟已经形成了关于高雅文化兴起的观念,这个观念始终主导着文艺复兴的历史。文艺复兴在他之前两三百年就已经开始了,除了文学之外,所有的造型艺术实现了复兴。关于“文艺复兴”的观念,除了 *restitution* (恢复) 和 *reflorescence* (再开花) 之外,伊拉斯谟著作里反复出现的还有 *renascence* (再生)。“世界开始恢复知觉,就像从沉睡中醒来一样。然而,有人还是要顽固反抗,死死抓住过去陈旧的东西不放,仿佛患了痉挛症的人手和脚都不由自主一样。他们担心,如果典雅的文学再生、世人变聪明,他们无知的事实就会大白于天下。”顽固者不知道,古人是很虔诚的,苏格拉底、维吉尔^①、贺拉斯或普卢塔克的《道德》(*Moralia*) 都是很圣洁的;他们不知道,古代历史里宽恕和美德的范例有多么丰富。凡是虔诚的、有助于美德的东西,我们都不能说是亵渎圣贤。西塞罗的《论老年》阐述生命的尊严,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加庄重的观点了。

104

为了理解伊拉斯谟的思想及其对同时代人的魅力,你必须要从他的生活理想着手,这个理想呈现在他的心中,是一个华美的梦境。这不是他独有的美梦。所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都珍视这个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在花园里的树荫下和朋友交谈,安详、愉快而严肃地和睿智的好友交谈,他们希望三两知己的交谈能够在祥和、和谐的氛围中进行。他那个时代的人渴望达到质朴、诚恳、率真和天性的境界。他们的想象浸泡在古代文化的精华里,不过在心灵深处他们和中世纪理想的联系更加紧密,或许他

①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 Virgil, 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牧歌》、《农事诗》、史诗《埃涅阿斯纪》。

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美第奇家族^①的圈子里,这个理想是加雷基(Careggi)的田园风光;在拉伯雷的笔下,这个理想是“德兼美修道院”(abbey of Theleme);这个理想在莫尔的《乌托邦》和蒙田的散文里发出声音。在伊拉斯谟的著作里,这个理想总是反复以三五知己在乡间别墅里散步、餐叙的形式出现。这是他《反蒙昧主义》里的第一景,这是他与科利特把酒共饮的场面,也是他《对话集》里无数餐叙的情景。尤其在他宗教题材的餐叙里,伊拉斯谟详尽地描绘了他的梦想。把他的梦想和其他人的理想做一番对比,是颇有价值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他的梦想和拉伯雷的“德兼美修道院”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他的梦想和帕利西^②的游乐园神奇的设计进行比较。18世纪荷兰的乡间小椅和玲珑别墅是荷兰民族精神里津津乐道的理想,这样的景观就是伊拉斯谟理想的实现。《宗教餐叙》篇的主人说:“对我而言,简朴的乡间小屋、一个居家的小窝胜过任何宫殿,倘若国王能够自由生活、根据自己的愿望率性而为,无疑我就是那位国王。”

生活真正的快乐寓于美德和虔诚之中。如果说以上这些人是伊壁鸠鲁^③式的享乐主义者,那么谁也比不上那种真正生活在神圣情怀和虔敬心理中的人。

105

生活中理想的快乐也是完美的田园诗似的生活,它需要你对世俗的关怀抱超脱的态度,需要鄙视一切肮脏卑贱的东西。对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那显然是愚蠢之举;为自己掌握的有关市场的知识而感到骄傲,因为了解英王的计划、罗马的新闻和丹麦的情况而感到骄傲,那也是

① 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意大利贵族家庭、佛罗伦萨统治者,出了三个教皇(利奥十世、克莱蒙七世和利奥十一世),支持学术,赞助艺术。

② 帕利西(Bernard Palissy, 1510—1589),法国胡格诺教派制陶师、作家,著有《令人惊喜的论述》、《黏土的艺术》等。

③ 伊壁鸠鲁(Epicurus, 前342?—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讲究生活情趣。后来,伊壁鸠鲁式的人衍生出享乐主义者、美食家的意义。

愚蠢之举。在《老人的对话》里,理智老人有一个体面而轻松的岗位、一种安稳的中和境界,他不对任何人、任何物做出判断,他笑对这个世界。他在宁静的环境里生活,以书为伴——这是最令人渴望的境界。

在这种安详、和谐理想的外围,无数美丽的鲜花绽放;这些美丽的鲜花有:伊拉斯谟的礼仪意识,他对彬彬有礼的强烈需求,他在温文尔雅、热心助人中求乐的秉性,他那儒雅、随和的风度。他讨厌猛烈的情感宣泄和奢靡的文辞。因此,希腊喜剧中豪华的合唱队使他不快。他认为自己诗作的长处是,他绕开激情,禁绝悲悯哀怜:“我的诗作里没有风暴,没有山洪冲决河岸,没有任何夸张的豪言壮语;语言极为俭省。我的诗作紧守疆界,而不是超越疆界,我宁可拥抱海滩,而不去劈波斩浪。”他又说:“凡是离散文不远的诗歌,总是令我高兴,当然我所谓的散文是最优秀的散文,我所谓的诗歌是让人能够读懂的诗歌。菲洛克塞努斯^①认为,最美味的鱼不是正宗的鱼,最美味的肉不是正宗的肉,最愉快的航行是沿着海岸的航行,最宜人的散步是水边的散步;同理,我特别喜欢讲究修辞的诗歌和诗意的演说,所以我说诗歌的味道可以到散文中去品尝,反之,散文的味道也可以到诗歌中去品尝。”伊拉斯谟是善用半音半调、细腻色调的人。他的思想留有余地,他绝不把话说尽说绝。他又说:“牵强的奇想可能会使其他人高兴;但对我而言,主要的关切似乎是,我们的言词来自于事实本身,不是炫耀自己的发明,而是陈述事情本身。”这就是唯实论者的画像。

这样的观念产生了他那令人钦佩的、淳朴而清朗的文字,他的论辩段落明晰、层层推进。不过,这也造成了他缺乏深度和冗长的特点。他那台机器运转得太顺畅了。在他晚年无穷无尽的论辩中,他不断推出新的论

106

① 菲洛克塞努斯(Philoxenus of Mabbug,约440—约523),叙利亚主教、神学家、古典文学作家、基督一性论雅各派教会首脑,编订古叙利亚文《新约》,这个版本的《新约》成为古叙利亚教会的主要经文。

点,不断写出新的文字,并引用箴言警句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赞扬简洁,但从未将其付诸实践。伊拉斯谟从来不用创新的句子;他没有留下一句精雕细刻、言简意赅、传诸后世的格言警句。如今没有伊拉斯谟的语录流行。他搜集别人的箴言警句编成《格言集》,却没有创造自己的格言警句。

这样一个脑子真正关心的是释义,他确实非常喜欢解释别人的思想和文辞。舒缓地展开他人的文字正是他的爱好。典型的表现是,他对《新约圣经》从头到尾进行解释,只留下“启示录”那一章没有改动。

伊拉斯谟的脑子从来就不是哲学家的或历史学家的脑子。他的著作既不注重准确、逻辑的辨析,也不能够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把握世界运行的深层意义,这是因为只有把握丰富多样的具体细节,你才能够形成广阔的历史视野。伊拉斯谟的脑子完全是语文学的脑子。不过只凭这一点他是不可能征服和俘虏这个世界的。他的脑子还具有深刻的伦理倾向和强烈的审美倾向。以上三个特征造就了伟大的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的思想基础是对自由、澄明、纯净、质朴和宁静的强烈渴望。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活理想,但他用丰富的思想财富赋予它新的内容。没有自由,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没有宁静就没有自由。他从来不在论战中明确站到哪一边,这肯定是出于完全精神独立的紧迫需要。伊拉斯谟觉得,每一次约定即使是暂时的约定都是一种枷锁。《对话集》里的一位人物揭示的生活理想,就是他常常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生活理想。这个人物宣示,他绝不结婚、绝不接受牧师的命令、绝不进修道院,也绝不会建立以后无法摆脱的任何联系——至少在不完全了解自己之前绝不会这样做。“什么时候建立联系呢?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吧。”“我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附属于任何派别。”这是伊拉斯谟在接近人生终点时说的话。

107

自由首先应该是精神自由。使徒保罗说:“有精神追求的人评判一切事物,但他不需要别人的评判。既然他比律法的要求做得好,为何需要用

规定来约束他呢？当他显然在神的精神激励指引下前进时，再用制度去束缚他，那是多么傲慢的举动啊！”

在伊拉斯谟身上，我们已经看见乐观主义的端倪：正直的人有资格摆脱固定程式和规章的束缚。正如莫尔、拉伯雷和伊拉斯谟依靠自然的指令一样，既然自然造就向善的人，那么只要我们心怀信仰和虔诚，我们就可以顺应自然而不受束缚。

伊拉斯谟的思路是相信自然，渴望质朴与合理，他的教育理念和社会理念就寓于这样的思路中。在这里，他远远走在时代之前。更加充分地探讨伊拉斯谟的教育理念，颇具吸引力。它们正好预示了18世纪的教育理念。儿童应该在游戏中学习，借助和头脑相宜的东西学习，用图画学习。儿童的错误要用温和的方法去矫正。伊拉斯谟痛恨体罚和虐待儿童的老师。老师的职位本身对儿童来说是神圣的、应该崇敬的。教育应该从儿童降生那一刻开始。在教育方面，伊拉斯谟也许同样赋予古典文化太高的价值。我们看见这样的一幕：他的朋友彼得·吉尔斯给他两岁的儿子灌输几种古典语言的基础，以至于这个婴儿能够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向爸爸问好。伊拉斯谟关于教学和教育的言论放射出温文尔雅的气息，富有非常澄明的理性。

伊拉斯谟关于婚姻和妇女的观点也很有价值。在两性关系上，他以深刻的信念站在妇女一边。《对话集》里有一位姑娘和修道院院长的对话非常风趣，这位姑娘对一位恋爱中的、有修养的妇女抱有深厚的同情；伊拉斯谟对其他人物的刻画从来就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同情。他关于婚姻的理想真的是有益社会的、健康的。书中那位恋人说，让我们为国家和基督生孩子，让正直的父母赋予孩子健康的性向，让他们在家里看见学习的好榜样。他一次又一次回头说母亲哺育孩子的天职。他明示如何理家，既要朴素，又要干净；他探讨儿童衣服有益健康的问题。他为被迫卖淫的女孩子伸张权利，在那个时代谁能够像他提出这样的主张呢？他痛恨性病，这是欧洲的新灾难；谁能够像他那样清楚看见性病患者结婚带来的社会

危害呢？他希望，教皇能够立即宣告这样的婚姻无效。在他那个时代，流行的社会理论谴责通奸和淫荡时把责任全部推到妇女身上，这个理论在文学里也很流行；他不赞同这样的理论。他说，野蛮人在自然状态下生活时，因通奸而受惩罚的是男人，女人则被宽恕了。

在这里，虽然他可能用的是半认真、半俏皮的口吻，但伊拉斯谟似乎了解野蛮人关于自然美德和幸福的观念，比如裸体的岛民就没有野蛮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久以后将要从蒙田的散文中冒出来；在以后的几百年里，这个观念将发展成为一种文学教条。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的思想(续)

伊拉斯谟的思想：精神倾向——世界不堪信仰与外在形式的重负——真理必然是质朴的——回归纯净的源头——初始语言版本的《圣经》——《圣经》里的人文主义——《圣经》文本校勘——实践重于教条——伊拉斯谟的才能与智慧——在语词和事物中寻求乐趣——冗赘——细腻的观察——面纱之下的唯实论——歧义性——“细微的差异”——万物终极的深不可测

当我们从他的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念过渡到他的思想观点时，我们看到，质朴、自然、纯净与合理这些要素对伊拉斯谟的思想而言是同样的要素。实际上，他的伦理、审美观念和思想观点是密不可分的。

109

伊拉斯谟说，世界负载过多的制度、主张和经院哲学教条，负担着过多教派的专横的权威。由于这样过分的负重，福音教义的力量萎靡不振。他认为信仰需要简明。土耳其人对我们繁琐的经院哲学有什么评论吗？科利特曾经在信里对他说：“书籍和科学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让我们离开所有的弯路，径直走捷径通向真理吧。”

真理必须简明。“塞内加说，真理的语言简明；所以再也没有比基督

更加简明、更加真实的了。”在这里，伊拉斯谟的论述和他在其他地方一样：“我希望，简明而纯净的基督可以在人们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认为，凭借对《圣经》初始语言的了解，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理源头的道理；这就是达到真理的最佳途径。”

110 在这里，一条箴言赫然进入了最显著的位置：回到源头去！这不仅是精神上和哲理上的需求，而且同样是生活中伦理和审美之必需。原生性的、纯净的而不是枝蔓丛生的、经过了许多手传递的东西，就具有强大的魅力。伊拉斯谟把这样的道理比喻为我们自己亲手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回溯古代知识质朴的世界，从现今混浊的水潭回溯到活生生的最纯净的源头，回到福音教义最清澈的源头，这就是伊拉斯谟理解的古典学术的任务。清澈水源的比喻并非没有意义，他揭示了伊拉斯谟热望的原理具有的心理属性。

他问道：“人们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议论各种不着边际的哲学体系，却还是回到基督教的源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基督教源头这几本福音书就像水晶一样透明，我们从中吸取的智慧将使当今世界的智慧自惭形秽，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论问题。这样去求真遭遇的麻烦少、成果多，不像亚里士多德的智慧，那是从许多荆棘丛生的书籍中演绎出来的……回到源头的旅程简单容易，人人都能立即完成。这样的哲学容易懂。基督希望，他的神迹能够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我希望，所有的贤妻良母都能够读《福音书》和保罗的《使徒书》；我希望《福音书》和《使徒书》能够翻译成一切语言；我希望所有的农夫都能够一边耕地一边唱圣歌，所有的织工都能够一边织布一边唱圣歌；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帮助出门在外的人减轻旅途劳顿之苦……这样的哲学是神的倾向问题而不是三段论问题，是生活的问题而不是争论的问题，是神启的问题而不是深奥的学问，是人的转变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基督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复兴的哲学，他的哲学难道不是造化创造的善的非饱和态吗？——而且，虽然谁也不像基督那样如此绝对而有效地传授了这样的知识，但是在非基督教

的书里也可以发现许多与之符合的知识。”

这就是伊拉斯谟这位《圣经》人文主义者的人生观。每当伊拉斯谟回头论述这一类问题时,他的声音都是最清脆嘹亮的。在他编订《新约圣经》的序文里,他说:“读者手捧这本书时,不要像捧读格利乌斯^①的《雅典之夜》(*Noctes atticae*),也不要像捧读波利齐亚诺^②的《杂感》……我们面对的是神圣的事情;这里不需要口才,这些问题要用质朴和纯净的形式向世人推荐;在这里,炫耀学问是荒唐可笑的,以口才自负是不虔敬的表现。”不过,伊拉斯谟在其他地方从来不曾表现出如此滔滔雄辩之才。

111

这样的论述使他超越他平常的力度和热情,因为他是在这里战斗,以非同一般的热情为《圣经》做评注而奋斗。人们知道,《圣经》有不同的版本,也知道这些版本都有错讹,可是人们还是在继续研究通俗拉丁语版本的《圣经》,这使他感到厌恶。他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希腊语版本去探究其原生的形式和原初的意义。

伊拉斯谟倍受责备,他只不过是懂一点点语法呀,可他竟敢抓住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错误和不符合规则的地方就攻击《圣经》! 他的回答是,从学理上去推敲细微末节是必要的。“不错,这些东西是细节,但正是由于这些细节,我们有时看到,即使伟大的教士也有摔跤和瞎说的時候。”“为什么我们在衣食住行、金钱问题上追求精确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圣经》文献里追求精确就使我们不高兴呢? 上帝在地上悠悠而行,自言自语,劳心费神,推敲每个词、每个音! 既然我们崇敬他、崇拜他,我们为什么要忽视他推敲的字眼呢? 让那些攻击者不高兴吧! 让那些人去凭空想象我伊拉斯谟不能够改进《圣经》吧! 让他们说,我承担这种最低下的工

① 格利乌斯(*Anlus Gellius, ? — ?*),拉丁作者,活跃于2世纪,代表作杂文集《雅典之夜》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② 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 1454—1494*),佛罗伦萨诗人、古典学者、人文主义者,尤其精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作,那是因为我的脑子笨、我的心冷、我没有学问吧!凡是以虔诚的热情所做的工作都是好的工作——这样的念头是基督教的思想。我们把砖头运来,目的就是修建上帝的庙堂。”

他并不想固执己见。让现行通俗拉丁语版本的《圣经》用于圣餐礼、布道和课堂吧。然而,在家里读我们这个新版本的人会明白,我伊拉斯谟的新版《圣经》更准确。如果有人证明他伊拉斯谟错了,他准备做出说明并承认错误。

112 也许,伊拉斯谟做梦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语文学校勘法必然要动摇教会的基础。他的对手“不得不相信,当人们可以读到形式上净化之后的《圣经》时,当人们尝试到原文里去理解《圣经》时,他们的一切权威就会立即灰飞烟灭”。对手这样的反应使他感到吃惊。他没有感觉到,圣典所谓的不能攻击的权威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之所以高兴,那是因为现在研究《圣经》的方法比过去仔细多了。况且,如果不仅考虑字面上说了什么,而且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谁说的、对谁说的、何时何地说的、上下文如何,那么各种各样细腻的含义就可以揭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语文学的校勘批评法。他认为,如果读《圣经》遇到似乎与基督教义或基督圣性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应该相信,读者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或者文本本身可能有错讹。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从校订不同版本过渡到了纠正内容方面的错讹。《圣经》使徒书简并非全部是使徒之作,只是后人把这些书简归之于使徒罢了。况且,使徒自己有时也会犯错误。

对他自己而言,精神生活的基础再也不是一个统一体。一方面,这个基础是对正直、质朴、纯净、朴实信仰的强烈渴望,是真诚希望做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另一方面,这个基础也是难以抗拒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伊拉斯谟需要优雅的品位、和谐的境界、古人清晰而准确的表达,他不喜欢冗赘和繁杂的语言。伊拉斯谟认为,优秀的学问有助于使信仰及其形式得到净化。教堂赞美诗的节拍应该修正。他从来不相信,基督教文献的表达和古典文献的表达是不可调和的。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人拷问每

一位作者的资格时,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承认了古人的权威。他反复诉诸古典文献去他证明大胆的设想,这是多么幼稚啊!人们说他在研究工作中持批判的态度。难道古人就不持批判的态度吗?他允许自己添加离题的批注吗?须知,古人也添加离题的批注啊。

伊拉斯谟非常同情他尊敬的古典文献。他有一个根本的信念:真正重要的是生活实践。他不是伟大的哲学家,不是熟记斯多葛学派^①或逍遥学派^②原理的伟大的哲学家。相反,他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道德来表达哲学的意义,因为这正是哲学的宗旨。他是真正的圣贤,不用讲究技巧的三段论来传授知识,而是用他的性向、表情、眼神和生活本身来传授知识,他教导学生应该蔑视财富。他认为,人生要达到基督所谓的再生(*Renascentia*)标准。伊拉斯谟只把这个词用于基督教的意义。但在这个意义上,再生这个词和历史现象中的文艺复兴观念是密切相关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世俗观念和非基督教观念总是被人们估计过高了。伊拉斯谟是他那个时代精神的代表,在这个方面,他的典型性远远胜过阿雷蒂诺^③和卡斯蒂廖内^④两人。古典学术甜蜜的清风吹拂着他的基督教情怀。伊拉斯谟把强烈的基督教情怀与古典学术精神结合起来了,这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伊拉斯谟何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

113

如果语言表达形式不配套,仅仅靠思想的意向和内容是无法影响世

-
- ① 斯多葛学派(*Stoics*),希腊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主张普世主义、恬淡寡欲,重视理性和逻辑,是对智者派即诡辩派的反动。
- ② 逍遥学派(*peripatetics*),即亚里士多德学派,传说亚里士多德常常边散步边授课,师生在轻松的气氛中探讨学问,故名逍遥学派。
- ③ 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 1492—1556*),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擅长写讽刺作品。
- ④ 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意大利外交家、侍臣、作家,著有《侍臣论》(*Il Cortegiano*)。

界的。伊拉斯谟才干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的文字清晰、流畅，他的活泼、风趣、想象、兴味和幽默使他的文字富有魅力；他的一切作品对同时代人都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直到今天，一旦开卷读他的著作，我们也会沦为他的俘虏。他的全部才能使他成为文艺复兴精神的完美代表。首先是他形之于外的论述。他的文字绝不模糊、晦涩——总是容易理解的。一切如行云流水，如一股清泉。其调子、修辞特征和语气听上去总是那么恰到好处。他的文字轻快和谐，堪与阿里奥斯托^①媲美。正如阿里奥斯托一样，伊拉斯谟的文字绝对没有悲剧的色彩，绝不是真正悲壮的文字。它使我们陶醉，但它自身绝不会忘情。

114 虽然伊拉斯谟才干里更富有艺术性的一面随处可见，但其才能最彰显的作品是《愚人颂》和《对话集》，这两部作品花了他更多的心血。但仅就这两部作品就足以使他对那个时代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圣哲罗姆的文字送达的读者只能够说数以十计，《新约圣经》的读者只能够说数以百计；相反，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和《对话集》却拥有数以千计的读者。而且，这两部作品的地位之所以特别高，那是因为它们的文字是伊拉斯谟最流畅自如的拉丁文。

在《对话集》的每一个篇目里，即使在那些公式性的篇目里，每一篇总是要勾勒一出喜剧、一个短篇小说或一个讥讽故事。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一句话没有“要意”，没有一句话没有生动的想象。其精湛细腻无与伦比。在《修道院长和文人的对话》(*Abbatis et eruditae collquium*)里，院长是一位蠢汉。应该指出，伊拉斯谟总是善于栩栩如生地刻画人物和场景，因为他描写的对象仿佛就在他的眼前。在《产妇》(*The woman in childbed*)里，他时刻不忘产妇是艺术家。在《指骨游戏》(*The game of knucklebones*)末尾，两位对话人阐明游戏用的拉丁语术语后，决定一齐玩，其中一位说：“先关

① 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代表作为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

门吧,要不厨师会看见我们两人像小孩子一样玩耍。”

正如我们希望德国画家霍尔拜因给《愚人颂》做插图一样,我们希望拥有荷兰画家勃鲁盖尔做插图的《对话集》,因为伊拉斯谟对事件的睿智而清晰的观察和这位伟大的插图画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棕枝主日^①酒鬼的游行,拯救海难中的船员,老汉们翘首盼望巡游车时赶车人却还在痛饮——所有这些荷兰风情都是荷兰风俗画最佳的画面。

我们喜欢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主义。伊拉斯谟无疑是写实主义者,因为他如饥似渴地探求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他想要知道事物及其名称:每一件事物的具体情况,比如古罗马人的游戏用语和游戏规则,即使这些事物离他的生活比较遥远,他也要穷究不舍。请仔细阅读《宗教会饮》(*Convivium religiosum*),注意他对别墅墙上那些装饰画的描绘是多么细腻啊:那简直是一堂实物教学课,是写实主义的精雕细刻的画面。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喜爱物质世界和柔韧、可塑的语词,喜欢使用大量的意象和生动的表达。用铿锵有力的语词——历数人的名字和事物的名称,这是拉伯雷一以贯之的特征,伊拉斯谟也不乏这样的手法,不过伊拉斯谟把铿锵语词用于精神追求和实用目的。在《丰富多样的语言》里,多种表达的妙语扑面而来:为说明表达以下两句话的不同表达法,他为每句话各列举 50 种不同的句式:“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我想快要下雨了”。这里的审美冲动是主题及其变异形式的冲动:展示语言逻辑极其丰富和变异的形式。在其他地方,伊拉斯谟也喜欢展示这样的癖好,他喜欢大量积累他天赋语言能力的珍宝。伊拉斯谟及其同时代人禁不住要详尽无遗地展示一切可能的表达而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在神学原理、法律、语言和教会的论述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格言集》、《寓言集》和《箴言集》全都以文艺复兴时代(顺便指出,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的继承)人的热望为基础,他们尽情享受物质世界的财富,享受语词和事物的丰富多

115

^① 棕枝主日(Palm Sunday),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样性。

文艺复兴人敏锐地注意观察奇异事物的细微末节。伊拉斯谟没有意识到人们需要证明自然的秘密,但凭借他敏锐的观察,他还是保存了那个时代的童真童趣。比较而言,自然的秘密给达·芬奇^①、帕拉切尔苏斯^②和维萨里^③却提供了灵感。伊拉斯谟善于观察各国风俗习惯的特点。他注意到瑞士士兵的步态、花花公子的坐姿、法国北部的庇卡底人发音的特点。他留意到古代肖像画模特的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的,嘴唇总是抿得紧紧的,这是谦恭的标志;他还注意到生活中一些西班牙人往往也有这样的表情;相反,德国画家却喜欢表现撅着的嘴唇,仿佛画中人想要接吻。他对趣闻轶事的感知非常鲜活,很适合他用来观察奇风异俗,他在一切著作里都尽情发挥了这样的感觉。

尽管伊拉斯谟讲究写实,但他看见和表现的世界并非完全是16世纪的世界。一切都笼罩在拉丁文化的面纱之下。在他的头脑和现实之间,他使用的古色古香的语言起到中介的作用。说到底,他脑子里的世界是想象出来的世界。他反应的16世纪是经过简化的有限的世界。虽然它带有未经加工的色彩,可他笔下的世界缺乏那个时代狂热和率直的特征。和艺术家、路德及加尔文^④等宗教界人物、政治家、航海家、军人和科学家

-
- ①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学家、工程师,主要作品有《最后的审判》、《岩间圣母》、《蒙娜丽莎》等。
- ② 帕拉切尔苏斯(Philippus Aureolus Paracelsus,1493—1541),瑞士医生、炼金术士,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著有《外科大全》等。
- ③ 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时医师、解剖学家和外科大夫,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人,代表作为《人体结构》(7卷)。
- ④ 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神学家,创建加尔文教派,著有《基督教原理》、《信仰教程》等;是16世纪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曾经把日内瓦变为“新教的罗马”;加尔文教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重要教派,表现出宗教上的不宽容倾向。

比较,伊拉斯谟面对世界时的身份是隐士。他表现的世界仅仅是受拉丁文化影响的世界。虽然他善于吸收并敏于表达,但他从来没有充分接触现实生活。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没有鸟鸣,也没有风吹树木花草的婆娑起舞的意象。

但他这种含蓄或对率直的担心并非纯粹是负面的品格。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含蓄,那是因为他意识到,万物之根基有不确定性,他敬畏万物的歧义性。如果说伊拉斯谟常常在认真和讥讽的边界上方盘桓,如果说他难得做出有锋芒的结论,那不仅是由于他小心谨慎或害怕明确表态。无论在哪里,他都看见细腻的差别,看见语义的混合。事物的称谓再也不像对中世纪人那样一清二白,不像黄金上镶嵌的水晶、天幕上镶嵌的星星那样分明。“我不喜欢下断语,我很容易就站在怀疑论者一边,凡是《圣经》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和教会律令允许的地方,我都会表示怀疑。”“什么东西能够免于错误呢?”一切神学思辨的细微争论都来源于危险的好奇心,都导致不虔敬的胆大妄为。有关三位一体和圣母玛利亚的大辩论有何收获呢?“我们下定义的事情太多了,其实许多事情并不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危险,我们不妨让这些事情不为人知或不被决定……我们的宗教的实质是和睦相处与意见一致。除非我们尽可能少下定义,除非我们把许多问题留给个人进行判断,和睦相处的氛围和意见的一致就不可能实现。许多问题可以推迟到主教特别会(oecumenical Council)上去审议。如果横巨的玻璃被移走、朦朦胧胧的雾罩被驱散之后再去讨论这些问题,那就好多了,届时我们将面对面看见上帝。”

“有一些圣所是上帝不希望我们去探索的。如果我们尝试去深入探索,那么我们越是努力,就越是要钻进更加黑暗的深渊,所以我们承认上帝智慧的威严是不可思议的,人的理解力是非常低能的。”

第十四章 伊拉斯谟的性格

伊拉斯谟的性格：对纯净与清洁的需要——娇弱的身体——讨厌论争，需要和谐与友谊——厌恶任何骚乱——过分关切他人的意见——需要自我辩白——自认为从不会错——心理倾向与信念的关系——自我的理想形象——对自己的不满——自我中心——孤寂的心——对细节的挑剔——猜忌心理——病态的怀疑——郁郁不乐——焦躁不安——难以解决的矛盾——惧怕谎言——含蓄与暗讽

117 伊拉斯谟强大的思想引起同时代人强烈的心灵回应，对文明进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他并不能称为历史的英雄。他的性格没有达到与他的思想匹配的高度，这和他的性格没有一定的关系吗？

虽然他自认为是世界上最质朴的人，但他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决定他思想结构的因素同样决定着他的性格取向。在他的性格取向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和他的思想信念相关的因素。

在他的道德根基里，我们发现他极端需要纯净的品质，这是驱使他研究神圣知识之源的需要，也是我们解读他性格的钥匙。他需要的既是物质上的纯净，也是道德上的纯洁，这样的渴望既是对他本人的渴望，也是

对他人的渴望,他总是渴望万物的纯净。酿酒人勾兑和食品商掺假的积习使他深恶痛绝。他不断净化自己的语言和风格,并为自己的语言错误开脱,其冲动和他对清洁和明亮的强烈渴望是一样的,他渴望身体清洁,家居环境卫生而明亮。他痛恨不流通的空气,痛恨有霉臭味的东西。他经常绕道回避有霉臭味的小巷,他讨厌肉店和鱼档。他觉得恶臭滋生传染病。他提出消毒预防传染病的理念;在这一点上,他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他想给拥挤小巷里的空气消毒,给忏悔人呼出的空气消毒,给洗礼用的水消毒。他恳求人们扔掉共用的杯子;按照他的建议,人人都必须自己刮胡须,床单要清洁,招呼问候时不要亲吻。那个时代传入欧洲的性病使他感到恐惧,眼看着性病迅速蔓延,他感到忧心忡忡;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纯净和清洁的渴望。他认为,阻止性病蔓延的措施实在是太少了。他希望采取步骤去阻止梅毒病患者结婚。他对乌尔里希·胡腾(Ulrich von Hutten)的态度不够庄重,显然和他在身体卫生和道德上对胡腾的厌恶有关,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

118

伊拉斯谟的身体纤弱、心理脆弱,虚弱的身体使他的心理脆弱。他极度敏感,很容易受凉感冒,他把伤风感冒称为“书生的不适”。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受肾结石的折磨;但即使工作压力大时,他也仍然忍痛工作。他总是用溺爱的口气诉说他那瘦弱的身体,斋戒使他的身体吃不消,他必须要靠锻炼即骑马来维持健康,他总是选择宜人的天气骑马。有的时候,他非常详细地描述身体的病痛。^①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证睡眠;一旦醒来总是难以再入睡,因此他常常失去了早晨的时间,而早晨正是最好的工作时间,他非常珍惜这段时间。他不能忍受寒冷、刮风和浓雾,更怕暖气太足的房间。他厌恶德国人一年四季不灭的火炉,这一点使德国难以忍受。上文已经提及他对生病的恐惧。他不仅要逃离瘟疫地区,他甚至要躲避可能会患感冒的地方;本来他准备去看望服丧中的朋友彼得·吉

① 参看伊拉斯谟致庇突斯·雷纳努斯信,即本书收录的书简13。——原注

尔斯,但由于怕感冒而放弃了从卢万到安特卫普的打算。虽然他意识到“许多疾病常常只存在于幻想中”,然而他自己的幻想还是让他不得安宁。尽管如此,一旦患上重病,他却不惧怕死亡。

119 他的个人卫生习惯包括不沾烈酒、勤于盥洗沐浴和呼吸新鲜空气,不过他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却有所节制,因为他觉得滨海地区的空气不见得好,他怕吹风。他对病中的朋友吉尔斯说:“不要服药太多,静养,不动怒。”虽然他有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医药赞”,但他对医生的评价并不高,而且在《对话集》里还不止一次讥讽医生。

此外,他的外形也显露出纤弱的一面。他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眼睛湛蓝、面容开朗、吐字清晰,但声音单薄。

在道德方面,伊拉斯谟的纤弱表现在非常需要友谊与和谐,他不喜欢争论。对他而言,安宁与和谐高于一切,自认这是他行为举止的指针。倘若可能,他想要世间所有人成为他的朋友。有的时候,他情绪多变,苛求朋友,但总体上他实在是很忠实的朋友。那么多朋友从来不背弃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有人暂时疏远之后,他也总是能够再次赢得他们的友谊。莫尔、彼得·吉尔斯、费希尔、阿莫尼乌斯、布多伊斯等等,他的诤友不胜枚举。庇突斯·雷纳努斯说:“他总是勤于写信,维护友谊。”雷纳努斯本人对伊拉斯谟的友情就证明,他能够激起朋友深厚的感情。

他之所以渴望友谊,那是因为他真诚地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请读者回忆他在修道院生活时对塞瓦提乌斯爆发出来的几乎是带有女性气质的感情。与此同时,使他形成这种气质的是道德上对宁静的追求,他讨厌扰攘,讨厌一切刺激人的、不和谐的东西。他把这种感觉称为“一种神秘的天然的感觉”,这样的倾向使他痛恨一切冲突。他难以容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他说,他总是希望他的笔不沾染血腥味,即使受到攻击,他也不攻击任何人,不刺激任何人。但他的敌人却没有这样的愿望。进入晚年,他被动地习惯了激烈的论争。和他争论的人有勒费弗尔·戴塔普

尔、爱德华·李^①、巴普蒂斯塔·埃格蒙达努斯(Baptista Egmondanus)、胡腾、路德、贝达^②,还有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起初,他看上去很痛苦,争论使他深受伤害,以至于他无法在沉默中忍受。他请求勒费弗尔说“我们还是言归于好吧”,勒费弗尔却不回信。他觉得花在论辩上的时间白白浪费了。1520年,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不是因为年纪大,而是因为研究工作使我没有喘息的机会,更加准确地说,不是因为工作累,而是因为争论使人疲惫不堪;工作本身是令人愉快的。”他还不知道,很多争论还在等着他呢!

120

要是他不那么关心公共舆论,那有多好啊!但那似乎不可能:他怕被人误解,我们不妨说,他很需要为自己辩护。他总是预估自己的言行对别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且他的预估常常带有夸张的色彩。关于他自己的性格,他自己写下的话无疑很准确:刺激他的动力与其说是对名望的追求,不如说是对耻辱的恐惧。和卢梭一样,他不能够忍受良心的愧疚,这是出于精神清白的追求。不能加倍回报他人使他感到羞愧和难过。他不能忍受“催债人的追讨、未完成任务、对朋友需要的忽视”。如果他不能够履行义务,他一定要为自己开脱。荷兰史学家弗卢因^③说得好:“凡是他与自己责任相反的举止,凡是他和理解的利益相悖的举止,都是由于客观环境出了问题,或者是因为听取了错误的意见。他绝不会责备自己。”而且,他为自己的开脱成了一种普遍的规律:“只要后悔,上帝就会宽恕人们有害的誓言”,这是他违背誓言以后说的话。

伊拉斯谟身上有一个危险的倾向,他把自己的倾向和信念混为一谈。他的个人癖好和行为准则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否认的。这个关系特别是指

① 爱德华·李(Edward Lee),详见下文。

② 贝达(Beda,470—537),即诺埃尔·贝迪埃(Noel Bedier),法兰西神学家、索邦大学评议会委员,曾经与伊拉斯谟论战。

③ 弗卢因(Robert J Fruin,1824—1899),著有《八十年战争》。

他关于斋戒和忌荤的观点。他还常常发泄对鱼肉的反感,提及他不能推迟进餐的习惯,抱怨自己不能把这个习惯对大家说清楚。同样,他个人在修道院的经验就成了他原则上不赞成修道院生活的立场。

在伊拉斯谟的记忆里,他青年时代的形象是扭曲的,上文已经提到这一点。这种扭曲是出于自我辩护的需要。这是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所做的全然是无意识的解释,目的是适合他自己树立的理想,他真诚地相信,这是他对理想做出的回答。这种自我描绘的形象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令人称奇的、质朴的真诚和坦率,因为这是不可能掩盖的,另一个特征是他在日常生活里缺乏经验、粗心大意、缺少抱负。这一切都是他的真实写照。首先是表面上的伊拉斯谟,他符合这个形象,但这又不是他的全部写照。还有一个深层的伊拉斯谟,几乎和表面上的伊拉斯谟相反的伊拉斯谟,这是他本人不知道的伊拉斯谟,因为他并不想了解这个深层的伊拉斯谟。也许,在这个形象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沉的伊拉斯谟吧,那是地地道道善良的伊拉斯谟。

他是否把这些弱点归之于自己呢?的确是这样的。他虽然有自恋情绪,但他永远不满足于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他说自己是自怨自艾的,意思是说对自己的水平永远不满意。这一特点使他对自己的任何著作都不满意,刚一发表他就不满,所以总是不断修订和增补。他致信科利特时说自己优柔寡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这种性格称之为优点,不,他还是将其转换为一种美德:谦虚,和自吹自恋相反的谦虚。

这就是他的羞怯,也是他不喜欢自己相貌的原因。他的朋友好不容易才劝他画一幅肖像画。他觉得自己的相貌既不伟岸又不够高贵。看见霍尔拜因给他的《愚人颂》作的插图时,肖像画家骗他说:“呵呵,假如伊拉斯谟还是那样年轻,他肯定会立即讨老婆。”正是这种性格特征使他在自己的画像上写下这样的题款:“他的著作会向你显示更好的形象。”

伊拉斯谟谦虚,他鄙视不期而至的名气,当然这带有一点点修辞的性质。但我们不应该将其视之为伊拉斯谟个人的性格特征,而是视之为一切人文主义者共同的表现形式。但有人却把他这种情绪说成是矫揉造

作。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孩子,他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是很健壮。他并不看重自己的书信:他出版这些书信是因为朋友们坚持要他发表。他写诗歌往往是为了试一支新笔。他希望很快就有天才超过他,而他伊拉斯谟却吭哧吭哧、笔头滞涩。什么是名气?名气只不过是异端的遗产。他极端厌恶名气,非常乐意抛弃一切名望。

有的时候,他无意之间流露出另一种调子。倘若爱德华·李帮助他抛弃名气,他会使爱德华·李万古留名,这是他们首次见面时他对李说的话。对一位匿名的攻击者,他说:“如果你继续这样厚颜无耻地诋毁我,你要小心提防,不要把我的君子雅量压垮了,我将使你万古留名,成为最会拍马屁、最会瞎吹、最无能的江湖郎中。”

然而,伊拉斯谟身上的自我中心成分却偏偏在与日俱增,这是因为他的确成了思想和文化的中心和客观参照标准。有一段时间,客观情况出现的兆头表明,世人都仰赖他,期待着他发出拯救的信息。热情的追随者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大军,热心的朋友和崇拜者使他门庭若市。他觉得必须要款待所有的朋友,这似乎有一点幼稚。在一封致朋友的公开信里,他详尽介绍了从巴塞尔回到卢万时生病的情况,详尽得容易使人反感。他越来越从自己的角色、地位和名誉去看世界,看正在发生的事情。总有一天,他那数量惊人的书简就会成为一篇持久的自我辩护词。

然而,朋友众多的伊拉斯谟内心却是孤寂的。他的内心深处渴望独处,他有非常喜欢离群索居的情绪,他应该是一位隐士。“我总是希望独处,我最恨的是结成死党。”他是那种与人接触反而会力量减弱的人。如果他不得不打交道的人少一些,他不得不考虑的朋友和敌人少一些,他灵魂的呼声反而越真实。和具体的人打交道时他不会小心谨慎,他不会有意意识地去顾忌礼节、献媚、缄默、含蓄、敌意或规避。因此我们不应该想,我们能够从他的书信去了解他的内心。以他这样的性格与人接触,他的内心反而不容易宁静;他的诉说对象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所有的人时,内心深处的东西反而表现得最清楚。

早年他总是向人倾诉感情，后来他就不再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了。他在内心深处觉得与人有距离，所以他对所有人都警觉。他很怕别人触摸他的心灵，怕别人扰乱他给自己勾画的形象。挡开别人触摸的态度表现为他的挑剔和羞怯。布多伊斯的玩笑话击中了要害：“挑剔！你这挑剔的小个子！”伊拉斯谟对自己主要性格特征的解释是小姑娘似的羞怯。对自己出身的过分敏感就源于这样的羞怯。

阿莫尼乌斯谈到他那种乡下人似的羞怯。小个子的伊拉斯谟身上的确是有羞涩的成分，了不起的成就反而成了他的障碍，因此他躲避伟大的东西；他内心觉得，伟大的东西困扰着他，对他有敌意。

很难说真诚的忠实和热烈的感激会使他感到不习惯。但这的确是他的性格。在他这种人身上，一种痉挛性的精神现象似乎会钳制内心情绪的流淌。他赞同这样的警句：“该爱就爱吧，仿佛你有一天要恨；该恨就恨吧，仿佛你有一天要爱。”他难以忍受别人的施惠。面对每个人时，他的心灵深处都是退隐的。他自认为是质朴无猜忌的楷模，实际上他对所有的朋友都是最猜忌的。已故的阿莫尼乌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但阿莫尼乌斯也难逃他的猜忌。布多伊斯抱怨说，“你总是不信任我”。伊拉斯谟却惊讶地回答说：“你说什么呀！你到哪里去找我这样对朋友不猜忌的人啊。”

到他声名远扬、如日中天之际，世人全都在关注他说什么、做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似乎有理由觉得，大家都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无意中对他构成了威胁。然而，即使他还在巴黎那默默无闻的岁月里，我们也看到他怀疑人的迹象，这只能被看成是病态的感觉。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这种感觉特别与两位冤家联系在一起：埃朋多夫的亨利（Henry of Eppendorf）和亚里安达^①。他觉得埃朋多夫雇用的间谍到处监视他和

^① 海罗尼姆斯·亚里安达（Hieronymus Aleander, 1480—1542），意大利学者、天主教主教，反对宗教改革。

朋友的通信；亚里安达不断挑动人和他作对，到处跟踪他。他对攻击者意图的解释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中心成分，这样的心理在疯癫的边缘跳动。他看见的世界充满诽谤，无处不在的埋伏威胁着他的安宁：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摇唇鼓舌地到处攻击他，在吃饭、谈话、同行相聚、布道、授课、宫廷、乘车、乘船时无不对他发起攻击。稍次一点的敌人和讨厌的害虫一样使他的生活疲于奔命，或者用失眠症来害死他。他把自己比喻为殉教的圣塞巴斯蒂安^①，圣塞巴斯蒂安万箭穿心，但他伊拉斯谟更惨，因为他遭受的折磨没有止境。多年来，他每年都要无数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是因为即使朋友也由于嫉妒而不再表示友谊了。

他一一数落赞助人，说他们太吝啬。有的时候，他突然出乎意料地流露出隐藏很深的厌恶和仇恨。他在哪里享受过在英格兰时享受到的那种好运呢？哪一个国家给予他更多的赞许呢？可是他突然流露出忿忿难平情绪，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英格兰使他无法忠于早年在修道院立下的誓言，“就为这一点，我就恨英国，虽然这样的情绪总是威胁着我的健康”。

当然，他很难得这样走极端。一般地说，他仇恨或鄙视的话仅限于暗中的联想。这些话既对敌也对友，既针对布多伊斯、马丁·李普西乌斯(Martin Lypsius)，也针对胡腾和彼得。偶尔之间，我们会看见他幸灾乐祸的一些话。至于如何看待他这一切表现，我们不能用今天矜持和优雅的观念去衡量伊拉斯谟的恶意。和大多数的同时代人比较，他始终是比较温和而优雅的人。

125

伊拉斯谟从来不觉得快乐，从来不感到满足。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总是想到他乐呵呵的表情、他使不完的精力、他那使人快乐的讥讽和幽默。但仔细一想，他不高兴的感觉又符合他的性格。其源

① 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 ?—288?), 罗马军官, 早期基督教徒, 劝许多士兵入教, 事发后皇帝命令以乱箭射之, 并被乱棒打死。

头是他总体上对人采取的防范态度。即使在兴致最好的时候,他也认为自己各方面都是不幸的人。他用精湛的希腊语说自己是“最不幸的人,最倒霉的伊拉斯谟”。他的生活是“灾难的《伊利亚特》^①,不幸遭遇的链条。谁会羡慕我啊?”幸运女神总是敌视他,发誓要毁灭他伊拉斯谟,所以年轻时他就用诗歌写信给盖冈抱怨:从婴儿时代起,悲惨和艰难的命运就对他穷追不舍。潘多拉^②的盒子似乎把一切灾难都倾倒在他的头上了。

这种郁郁不乐的感觉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出来:灾星强制他要像赫拉克勒斯^③那样劳作,却又不能够获利,也得不到快乐^④:无穷无尽的艰难困苦和烦恼。如果他抓住了机会,他的生活可能会容易得多。他不该离开意大利;他应该留在英格兰。“但我无限热爱自由,这使我长期与不忠实的朋友抗争,和死死缠身的穷困抗争。”不过在其他地方,他的语气又比较无可奈何:“我们都受命运的驱使。”

126

对自由的无限热爱几乎就像他的宿命。他终身不渝地追求安静和自由,但他很晚才发现自由,终身却得不到安宁。无论如何他不能让自己被捆住手脚,无论如何他不能让义务成为自己的枷锁,他始终恐惧被生活的乱麻死死纠缠。于是他成了非常焦躁不安的人。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感到满意,最不满意的是他自己的著作。有一位卢万人不解地问道:“那你为什么写这么多书让我们感到读不完呢?”伊拉斯谟借用贺拉斯的话

-
- ① 《伊利亚特》(*Iliad*),希腊史诗,喻苦难的历程,与《奥德赛》(*Odyssey*)齐名,同为荷马所作。
- ② 潘多拉(*Pandora*),宙斯惩罚人类而送给厄庇墨透斯(*Epimetheus*)的女人;厄庇墨透斯是普罗米修斯的兄弟,他不听普罗米修斯忠告,接受潘多拉的爱,潘多拉擅自打开宙斯的一只盒子,各种灾祸从中飞出,给人类带来灾难。
- ③ 赫拉克勒斯(*Hercules*),天王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天后赫拉迫使他完成12项艰苦卓绝的任务。
- ④ 《格言集》第二卷第2001条、第717B、77C、58A条。书里有霍尔拜因在朗弗德城堡为伊拉斯谟作的肖像画,伊拉斯谟手捧一本书,封面上的配文是希腊语:赫拉克勒斯苦工。——原注

回答说：“首先，那是因为我睡不好。”

他不睡觉也能工作，精力充沛，这的确是他多产的原因所在。他不能安静地休息。过英吉利海峡刚下船时，他还在恶心欲吐，装书稿的手提箱又不知去向，可他已经在考虑给多普回信了；他刚收到多普责难《愚人颂》的信。伊拉斯谟生性喜爱安静，十分胆怯，喜欢舒适、清洁和美食，他讨厌舟车劳顿、害怕危险的旅行尤其怕坐海船，可是为了做学问，他却不怕路途的艰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一次次冒险对他的重大意义。

他不仅性情焦躁不安，而且情绪会急转突变。他的记忆力持久、容量大，他写的东西常常是率性而为。他从来不会前后不一；他的才能精巧而稳定，不可能前后矛盾；但他的确重复较多、描写叙事太细致。他说：“我的文字是倾泻而出的，而不是慢慢写成的。”他把自己写书出书比喻为一次又一次的分娩，不，比喻为流产。他并不刻意挑选主题，而是突然撞上主题；一旦开始写，他就一气呵成、不会中断。有很多年，他读的书很杂，什么样的文献都读；他没有时间靠阅读来保持脑子的活力，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是为了让自己高兴。在这一点上，他羡慕布多伊斯。

莫尔告诫他：“不要这样急匆匆地出书，众目睽睽之下，你的一切不精巧的地方都会被人抓住把柄。”伊拉斯谟懂这个道理：他事后会做必要的校勘，他总是不停地修订和润色一切文字。他讨厌修订矫正的苦功，但他规规矩矩地接受这样的工作，他写作时总是满怀激情。“在巴塞尔的‘磨房里’推磨，”他这样形容自己废寝忘食的情景，他在那里用八个月完成了六年的工作。

在伊拉斯谟焦躁不安、急转突变的笔耕过程中，我们再次看见他身上难以解决的矛盾。他急变陡转、大而化之；但他主观上想要细心，想要谨慎；他的脑子驱使他去争夺第一、独占鳌头，但他的天性又对他的抱负形成制约，不过制约他的天性往往是在书稿杀青问世之后起作用。于是，他的写作就在灵感爆发和养精蓄锐中交替进行。

伊拉斯谟总是试图推托他白纸黑字写下的话，这使我们感到不快。

他的《对话集》无意之间流露出他内心的许多信念。然而他总是煞费苦心地把这本书说成是无心插柳的游戏之作，他总是说那是听命朋友、为了让朋友高兴才提笔写成的。而且他说，这些对话是用来教拉丁文的！倘若里面有什么东西涉及信仰问题，那不是我说的话，对吗？在《格言集》里，他常常谴责阶级和教派，尤其谴责君主；每当出现谴责的文字时，他都告诫读者说，他的话不针对具体的人。

伊拉斯谟是留有余地的圣手。即使在他持有明确观点的时候，他也知道如何避免直接的决断，这不仅是出于谨慎，而且是由于他看到人事问题中存在着永恒的歧义性。

伊拉斯谟说他极其憎恨撒谎。他说，一看见撒谎者，他就浑身不舒服。小时候他就痛恨撒谎的小孩子，他在《对话集》里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吹牛皮的小伙伴。我们在他的著作里也看见一些不真实的情况，但暴露出来的不真实和他痛恨撒谎并不矛盾。在他的书信里，前后不一、奉承、狡黠、善意的谎话、严重掩盖事实、戏仿出来的尊敬或哀伤——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指出来。为了得到一点赞助，不承认自己的信仰以便奉承固执的波尔斯林的安娜。他要朋友巴特以他的名义撒谎。由于害怕遭遇麻烦，他坚定不移地否认自己是《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那篇对话的作者，即使对莫尔也不承认。之所以坚决否认，那是因为他不想直通通地说：“我没有写这篇文章。”了解其他人文主义者的人，知道他们常常肆无忌惮撒谎的人，或许不会把伊拉斯谟的错误看得太严重吧。

128

对不了解人文主义者的人而言，即使在他在世的时候，他也免不了要遭到惩罚，原因是他那永远含蓄的表达、欲了未了的结论、云遮雾罩的真话、旁敲侧击的隐射和诽谤色彩的暗示。有人指控他背信弃义，有时甚至为此而感到义愤填膺。爱德华·李就猛烈抨击他说：“你总是把人家置于被怀疑的地位。你胆大包天，居然篡夺总检察官的职位并谴责你没有品尝过的东西。你在《对话集》里暴露你的对手，对人家提出虚假的指控，肆无忌惮地侮辱你划定的对手。”接着，爱德华·李引用针对他本人的一段

话质问伊拉斯谟：“从你这些话，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位圣徒和检察官了；你就是那位谦虚、真诚的作者。这就是你伊拉斯谟的胆怯、认真、体面和诚恳！你的谦虚早已家喻户晓。你总是说人家搞‘虚假的指控’。你说：假如我因为这些错误指控里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应该问心有愧，我就不敢走到主的跟前！试问你是谁，你竟敢评判另一个人，你竟敢评判主的仆人在主的面前是挺立还是倒下？”

这是保守派一边发起的第一次猛烈的攻击，时间是1520年初，路德引起的争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世人越来越不安地等待着悬而未决的结果。六个月以后，激进改革派向他发动第一次攻击。感情冲动、头脑有点糊涂的骑士乌尔里希·胡腾态度陡转，抨击伊拉斯谟。他曾经热情歌颂伊拉斯谟是大众福祉的象征。此刻，胡腾想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功，并成为德意志的民族事业，他紧急呼吁伊拉斯谟不要放弃宗教改革，也不要妥协。“你害怕罗伊希林的追求；现在，在对待路德的事业中，你尽力要让你的对手相信，你不喜欢他的改革，但我们知道你的底细。不要对我否认你的立场。你知道有人多么洋洋得意地传阅你的书信，你是想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如果你现在怕为了我而引起一点小小的敌意，你至少要向我坦白，你不会出于害怕另一个人而禁不住来责备我；你对我的事最好是免开尊口。”

129

以上这些指控是很严厉的指控。在伊拉斯谟的身上，有一个弱小的伊拉斯谟应该受到指控，他很生气，但他并没有耿耿于怀，而是继续以审慎的缄默行事，直到胡腾那所剩无几的友好情谊变成了仇恨。但在他的身上还有一个伟大的伊拉斯谟。他知道，在派别斗争的激情和糊涂的掩盖之下，真理和关爱都被遮蔽得朦朦胧胧了；他要寻求的是真理，他希望爱心能征服世界。他知道，上帝不允许我们站在哪一边。让我们尽力去察看那个卑微的伊拉斯谟，同时又审视那个伟大的伊拉斯谟吧。

第十五章 在卢万

→1517—1518

伊拉斯谟在卢万:1517——希望优秀学术成果能够使教会复兴——与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的论争——再访巴塞尔:1518——修订《新约圣经》——与拉托姆斯、布里阿和李的论战——认为保守神学在搞反对优秀学术的密谋

130

1517年夏,伊拉斯谟在卢万住下来时隐隐约约预感到,巨大的变革即将来临。当年9月他写道:“我担心,如果上帝的宠爱、君主的虔诚和智慧不去关注人事问题,最大的颠覆性事变即将发生。”至于巨大的变革以什么形式发生,他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他以为在卢万的逗留不会久。“一直住到我决定到哪里去颐养天年,不过老年已经叩响我的大门,纠缠不去了。”他渴望安宁和自由,但由于他的性格焦躁,没有学会如何关心别人,所以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可以安居的住所,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独立的生活。这是他令人扼腕的一个性格特征。伊拉斯谟似乎是那种不断说“明天、明天”的人,他似乎总是在说,我一定要先做这件事,然后才休息……一旦《新约圣经》编订,一旦他从那些麻烦而不快的神学争论中脱身,一旦他摆脱这些与他的愿望相悖的争论,他就会好好睡上一觉,躲起来休息;“纵情唱歌,自娱自乐,让缪斯

也高兴”。但那样的时机不会到来。

到哪里生活可以安享自由呢？红衣主教希梅内斯召唤他，但西班牙对他没有吸引力。在德国的时候，他抱怨说，太热的火炉和不安全的感觉使他望而却步。在英格兰的时候，受人役使的感觉使他恶心。在低地国家，他也没有感觉到安逸闲适：“在这里，人们说话大声嚷嚷，做了事情得不到报偿；我强烈渴望留下来，但留下来又受不了。”但他在卢万一待就是四年。

131

伊拉斯谟在卢万大学有一些好朋友。起初，他在约翰·帕卢达努斯（Johannes Paludanus）家借宿；帕卢达努斯是该校的修辞学教授，那一年夏天，他刚好和卢万大学的黎里学院交换房产。马丁·多普是伊拉斯谟的荷兰省同乡；多普曾经就《愚人颂》和他论战，但并未因此而疏远他。多普的好心对伊拉斯谟非常重要，因为他在神学院颇有名望。最后一位朋友是他过去的赞助人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即后来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虽然他已经离开卢万去担任更高的教职，但他的影响不降反升，因为那一年他晋升为红衣主教了。

卢万大学的牧师们对伊拉斯谟的款待彬彬有礼。这些神学家的领袖是卢万大学副校长阿特的让·布里阿（Jean Briard of Ath）。布里阿反复赞扬伊拉斯谟编订的《新约圣经》，使伊拉斯谟非常满意。不久，伊拉斯谟就被聘为神学教授。不过，他身处卢万大学神学家之中并不感到自在。这里的氛围远不如生活在英格兰学者之中那样宜人。在这里，他觉得有一种精神他不理解，因此也不信任。

在宗教改革发轫的年代里，伊拉斯谟是被严重误解的受害者，原因是他那细腻、审美和徘徊不定的精神既不能理解宗教信仰的深刻，也不能理解人类社会严酷的必然性。他既不是神秘主义者也不是唯实论者，而路德则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伊拉斯谟而言，教会、国家和社会这个大问题的似乎很简单。只需要回归基督教原生的、未受损害的源头，恢复并净化基督教的真谛，其他的事就不必过问了。一些叠床架屋的东西，荒诞胜于恶心

132 的东西，是必须要清除淘汰的。一切都应该还原到信仰的核心，即基督和福音。形式、仪式、思辨应该让位于真正虔诚的身体力行。《福音书》是人
人一看就明白的，人人能够读懂的。达到这一切的手段是深厚的学问，即
典雅的文献。他编订的《新约圣经》和《圣哲罗姆文集》，此前编订如今出
名的《基督徒士兵须知》，难道不是做了大多数应该做的工作吗？“我希
望如今使正直人士高兴的著作很快就会使人人高兴。”早在1517年初致
沃尔夫冈·卡皮托的信里，伊拉斯谟就流露出了伟业既成的调子。“你接
过我们手中的火炬。从现在起，工作就容易多了，仇视和嫉妒也会少得
多。我们已经走出第一波的冲击了。”

1517年5月，布多伊斯致信滕斯托尔说：“既然伊拉斯谟已经净化了
圣典文献，既然它们已经恢复了古代的纯洁和光明，在幸运女神不惠顾的
情况下出生的人里，有谁不反感沉闷而朦胧的经院哲学呢？虽然基督教
精神尚未完全摆脱智者派的垃圾，但伊拉斯谟通过同样艰苦的努力使神
圣的真理本身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这一成就更了不起。如果这样的局面
即将出现，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开辟了新局面。”语文学家布多伊斯相
信，信仰是一个学问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比伊拉斯谟更为坚定。

并非人人都立即接受了经过他净化的真理，这必然使伊拉斯谟感到
恼怒。他认为，这样的真理像白昼一样分明而简单，怎么会有人继续反对
呢？他真诚地希望能够与世人生活在安宁的氛围中，可他却身不由己地
卷入了一连串的论争。要他假装没听见反对者的声音，那似乎为他的性
格所不容，他要在世人面前不断证明自己更有道理，况且时代的习俗也不容
他不表态，因为热望争论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133 首先是他和巴黎神学家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的争论。作为宗教改革
的铺路人，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的地位恐怕要超过其他人，应该和伊拉斯
谟不相上下。勒费弗尔的拉丁文转写是法布尔(Faber)。正当伊拉斯谟
登上马车动身去卢万的时候，一位朋友叫伊拉斯谟注意法布尔的批评，法
布尔刚刚发表了文章批评伊拉斯谟编订的使徒保罗书信集。法布尔不同

意伊拉斯谟在第二封致希伯来人书里为《赞美诗》第七所做的注释。伊拉斯谟立即买了法布尔的书,并且很快就刊印了《寓言集》(*Apologia*)做出答辩。这场争论围绕基督和上帝及天使的关系,焦点最终取决于如何看待伊拉斯谟从语文学角度进行的解释。

伊拉斯谟还不习惯于直截了当的争论,所以他很激动;之所以特别激动,那是因为他很尊重法布尔,认为他性情温和。他问道:“他究竟是怎么啦?有人挑唆他反对我吗?所有的神学家一致认为我是对的呀。”法布尔并未立即回应,这使他感到不安。巴迪乌斯告诉彼得·吉尔斯说,法布尔表示歉意。在一封庄重的信里,伊拉斯谟诉求于两人的友谊,他接受指教和批评,宁可自己吃点苦头。接着他又怒气冲冲地说:让法布尔小心行事。他认为两人的争论使世人为之担心:争论无处不在,连饭桌上也在争辩,人们不是站在他这一边就是站在法布尔那一边。不过,火药味终于散尽,他们的友谊又恢复了。

到1518年复活节时,伊拉斯谟考虑再次去巴塞尔,到那里去刊布他新版的《新约圣经》,这是几个月辛勤耕耘的劳动成果。他事先请卢万的保守派神学家领袖们对他的手稿提出批评。虽然事先有人对他说了许多这部手稿的坏话,但布里阿宣告,他没有发现任何开罪于人的地方。于是伊拉斯谟对布里阿说:“这个新版会使你更加高兴。”他的朋友多普和詹姆斯·拉托姆斯(*James Latomus*)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拉托姆斯是卢万大学的教士领袖之一。加尔默罗会修士^①埃格蒙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Egmond*)说,他尚无缘读伊拉斯谟的书。只有一位年轻的英格兰人提出了一些批评,他名叫爱德华·李,在卢万大学学希腊语。李把他的批评归纳成十个结论。伊拉斯谟回信说,他尚未看到那些结论,无法加以利用;他准备把这件事了结。但年轻的批评家不能忍受这样的怠慢,他用一篇论

134

① 加尔默罗会修士(*Carmelite*),该修会1155年成立于叙利亚的加尔默罗山,含男修道会和女修道会。

文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1518年5月,伊拉斯谟再次去巴塞尔。他囊中羞涩,只好向英格兰的朋友们(阿莫尼乌斯误以为他已于1517年去世)求助,以解决路费问题。他告诉他们,一旦准备好的书稿刊布之后,他就回英格兰。在去莱茵的路上,他致信马丁·李普西乌斯,信里回答了爱德华·李的批评。李的批评使他极其恼怒。在修订《新约圣经》时,他不仅几乎不考虑李的意见,而且冒险重印了1506年的译本,一字不变。与此同时,他得到教皇赞许这个新版《新约圣经》的圣示,这成了他回击挑刺者的强大武器。

在巴塞尔,伊拉斯谟像老牛推磨一样地辛勤工作,但他真的是如鱼得水。在《新约圣经》第二版问世之前,《基督徒士兵须知》和《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已经在重印了。整个夏天,他都身体欠佳,写作进度受到影响,无法及时完成写作计划。在回程的路上,他患了重病。好不容易才平安回到卢万(1518年9月21日)。他可能染上了瘟疫。他怕传染别人,用尽办法保护他的朋友们不被传染。他不回黎里学院的住所,而是到好朋友出版商狄尔克·梅尔滕斯那里去借宿。不过,虽然谣传他染的是瘟疫,虽然他警告有传染的危险,多普和布里阿还是立即来探视他。显然,卢万大学的教授们对他的批评毕竟是没有恶意的。

然而,伊拉斯谟与卢万大学老师们的分歧根深蒂固。而且,爱德华·李还在准备写一篇新的批评。伊拉斯谟的怠慢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批评暂时对伊拉斯谟保密,这使伊拉斯谟恼怒和紧张。在此期间,一位新的对手站了出来。一回到卢万,伊拉斯谟就花了大量的精力推进“三语学院”的建立;杰罗姆·布斯莱登(Jerome Busleiden)的遗嘱提出规划并提供经费,在卢万大学增建这所学院。詹姆斯·拉托姆斯围绕这三种语言和神学的关系写了一篇对话,他怀疑这三种语言的实用价值。伊拉斯谟认为他有责任发表意见,于是就写了一篇答辩辞。大约与此同时(1519年春),他和副校长让·布里阿本人发生了争执。伊拉斯谟认为,布里阿本人公开批评了他刚刚写的《婚姻赞》(*Praise of Marriage*)。虽然布里阿

立即收回了他的批评,伊拉斯谟还是禁不住写了一篇答辩辞,尽管他答辩的语气比较温和。与此同时,他和李的争吵逐渐升温,表现形式愈加令人讨厌。伊拉斯谟的英格兰朋友们试图给他们年轻气盛的同胞降降温,但未能成功。伊拉斯谟暗地里的动作又使李气恼。在和李的论战中,伊拉斯谟始终缺乏自制和尊严,这是他性格中最弱的一面。通常如此注重礼仪的伊拉斯谟却陷入了谩骂的窠臼:那位不列颠毒蛇、撒旦,甚至过去嘲笑英国人长尾巴的话都用上了。在对骂中,原来争论的问题不见踪影了。伊拉斯谟怒不可遏,用上了最不该用的武器。他怂恿德国朋友撰文攻击李,讥笑李的愚蠢和自大狂,然后又向所有的英格兰朋友担保,“全德国都对他怒气冲冲;我好不容易才让他们强压住怒火”。

他卷入的争论只能算是小巫啦!德国还遭遇到其他的扰攘和动荡:这一年是1520年,路德的三大论题把全世界点燃了。

我们可以原谅伊拉斯谟在这场争端中表现出来的激烈言词和不大不小的恶意,这是他过分敏感、缺少男子气的结果。然而难以否认的是,他既没有理解对手的论点,也没有弄懂那个时代伟大的社会运动。

136

思想褊狭的保守牧师们认为,如果试图校订《圣经》文本,那就是信仰的终结。伊拉斯谟嘲笑他们当然很容易。“‘他们修改神圣的《福音书》,甚至修改我主的书!’牧师布道时气愤地说,教徒听到这样的布道辞也感到吃惊。好像我在攻击《马太福音》和《路迦福音》似的,好像我抨击的对象不是那些由于愚蠢和粗心造成的错误。人们希望的是什么?教会要不要使《圣经》尽量正确无误?”伊拉斯谟需要的是纯净,对他而言,这样的说理能够彻底打败对方的反驳。但直觉骗不了他的对手,而是告诉他们,如果让一个人从语言角度所做的修订来决定圣典文本的正确与否,教义本身就处在危险之中。伊拉斯谟避免对教义构成攻击的演绎。他没有意识到,他有关教会、圣礼和教义的观念已经不再纯粹是他个人的观念,因为它们已经被放在语文学之下。之所以意识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尽管他有天然的虔诚心态和强烈的伦理情感,但他缺乏神秘的洞见,而神秘的

洞见正是一切教义的基础。

正是伊拉斯谟个性上的欠缺使他不能够理解天主教正统派抵制他的真正原因。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多人反对他，那么多很受敬重的人不接受他认为清清楚楚、不容置疑的观念呢？他从个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对立。他渴望息事宁人、与世无争、安享宁静的生活，渴望同情和承认，难以忍受敌意，可是他看见的却是成群结队的、与日俱增的敌视者和反对者。他不能够理解他们为何害怕他的讥讽，也不知道他的《愚人颂》使多少人伤痕累累。真实的和想象的敌视使他不得安宁。他把敌视者看成是一个派别。多明我会和加尔默罗会尤其不怀好意。就在此时，卢万冒出了一位新的敌视者，此人是他的同乡埃格蒙特的尼古拉斯，加尔默罗修道院的院长，伊拉斯谟特别讨厌他。奇怪的是，伊拉斯谟在卢万发现，一些最激烈反对他的人是他的荷兰同胞：哈勒姆的文森特·迪尔克斯、维亚能的威廉（William of Vianen）、塔佩尔的卢尔德（Ruurd of Tapper）。对他的迫害与日俱增：恶毒的诬蔑成燎原之势，杀伤力越来越大；最恶毒的谎言肆无忌惮地鼓动；他请副校长让·布里阿出面抗击。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益；隐蔽的敌人暗中嘲笑；让他为学究写书好了，那毕竟是一小撮；我们要高声呼号，唤起人们抵制他。1520年以后，他反复写下这样一句话：“每天都有人向我扔石头。”

伊拉斯谟自认为处在这一切论战的中心，这不无道理。到了1519年和1520年，他再也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这一场大规模的斗争不仅仅涉及他一个人。四面八方都在进行这场斗争。这场围绕精神问题和信仰问题的骚动究竟是什么样的骚动呢？

伊拉斯谟做出的解答是这样的：这是保守派的精心策划、肆意妄为的密谋，他们要窒息精深的学问，要使过气的愚昧取胜。这个想法在1518年夏天以后的信里出现过无数次。在1519年3月21日给一位德国朋友的信里，他说：“我敢肯定，四面八方的愚昧之徒阴谋竭尽全力压制典雅的

文学。”“在这里,我们还在和愚昧的保护人作斗争”;我们不能请沃尔西^①劝教皇出面制止吗?一切和古代文献相关的东西都被这些心胸褊狭的家伙叫做“诗歌”。他们用这个词来指一切带有典雅教义的学问,也就是他们还没有学到手的学问。这一切喧闹、整个的悲剧都来自于他们对高尚学问的仇恨——顺便需要说明的是,他所谓的“喧闹”和“悲剧”指的是那场声势浩大的神学斗争。“这就是一切悲剧的根源和温床;这是对语言研究和高尚学问的仇视。”“路德挑动那些敌人,虽然敌人的事业是不正义的,但要战胜他们又是不可能的。在此期间,他们嫉妒并骚扰着典雅的文学,受路德唆使的好斗之徒攻击典雅的文学;他们处境不妙时的攻击真令人难以容忍;但如果他们获胜,谁又能够忍受他们的张狂呢?要么是让我假装什么也看不见,否则就让他们把路德之外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准备征服缪斯的千军万马。”

138

这是伊拉斯谟 1529 年 12 月写给莱比锡大学一位老师的信。这是他对重大事件的偏见,是他从学术观点形成的看法,是他深居简出、钻故纸堆形成的观念;他之所以不够理解宗教改革真正的性质和意义,这个观点恐怕构成了最大的障碍。

① 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 1475? —1530),英国枢机主教、大法官、政治家,控制英王亨利八世的内外政策,因(1529年)未能促成罗马教皇同意亨利与王后凯瑟琳离婚而以叛逆罪被捕。

第十六章 宗教改革的初期岁月

伊拉斯谟与路德的初期关系——美因兹大主教阿尔伯特:1517——
宗教改革的进程——路德试图修好与伊拉斯谟的关系,1518年3月——
伊拉斯谟置身事外,心想将来他能够担任调解人——态度逐渐变得暧昧
不清——越来越坚决地否认与路德的关系,决心作壁上观——论战双方
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阿里安达在荷兰——沃尔姆斯会议:1521——
离开卢万以维护个人自由:1521年10月

139

大约在1516年底,伊拉斯谟收到德国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①藏书室馆长和秘书的一封信,写信人是乔治·斯帕拉提努斯(George Spalatinus),他以崇敬的语气向大名鼎鼎的伊拉斯谟请教。“我们大家都很崇敬您,选帝侯收藏了您所有的书,而且准备买您将来出的一切书。”不过,斯帕拉提努斯写信是受一位朋友托付。一位圣奥古斯丁牧师很崇拜伊拉斯谟,希

①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Frederick of Saxony, 1463—1525),别名智者腓特烈,1500年任帝国行政会议首脑,1519年谢绝皇位,聘任马丁·路德和菲利普·梅兰希顿到维滕贝格任教,保护路德,拒绝教皇发布的逮捕令。

望提请他注意,在解释保罗的使徒书尤其保罗的致罗马人书时,伊拉斯谟对辩护的理解不正确,对原罪的注意太少:如果读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他也许会有所收获。

这位匿名的奥古斯丁修士就是马丁·路德,当时在维滕贝格大学之外还默默无闻,他在那里任教。路德的批评涉及他冥思苦想才获得的信念: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伊拉斯谟没有注意这封信。这类信太多,赞扬多,无批评。即使他回过信,斯帕拉提努斯也没有收到;稍后,伊拉斯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九个月以后,1517年9月,伊拉斯谟到卢万不久就收到帝国首席教士、年轻的美因兹大主教的邀请函,大主教名叫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Brandenburg)。大主教很乐意在适当的场合会见伊拉斯谟:他非常钦佩伊拉斯谟的著作(他其实知道得很少,只提到伊拉斯谟对《新约圣经》的校勘,而不是他编订的新版《新约圣经》);他希望,伊拉斯谟将来用优雅的风格写一些使徒传记。

140

这位年轻的霍亨索伦王子主张把古典研究作为新的明灯。或许他对伊拉斯谟的注意是受到胡腾和卡皮托的影响,他们两人正在其宫廷里做客。不久前,他刚刚完成了那个时代最大胆的一笔政治经济交易。他刚过二十四岁就晋升为美因兹大主教,这必须要得到教皇的特许,因为他想同时保留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德两个大主教的职位。三个大主教职位的积累必须要服从勃兰登堡家族的利益,以便和萨克森家族唱对台戏。教皇授予阿尔伯特特权,以换取大笔金钱的回报;为了敦促阿尔伯特付款,教皇给予他大量的赎罪券,在美因兹、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德三个地区发行。阿尔伯特悄悄地给自己留下一半赎罪券获利,同时向富格尔家族举债,而富格尔家族则负责赎罪券的交易。

1517年12月,伊拉斯谟回信告诉阿尔伯特,路德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已经公开了(1517年10月31日),这是由美因兹大

主教贩卖赎罪券的指令激起的反应，这些赎罪券在全国发行，使全国的教会为之一惊。路德《论纲》的矛头所指和伊拉斯谟抨击的弊端相同，都是机械的、原子论的、司法的宗教观念。然而，伊拉斯谟和路德两人产生的实际效果却截然不同，伊拉斯谟纯洁教会用的是宽容的手段以便息事宁人！

141 伊拉斯谟给阿尔伯特大主教的回信里说：“圣徒的传记吗？我以绵薄之力给圣徒的君主加上一盏小小的明灯。至于其他的工作，你的努力很值得赞许。你日理万机、小小年纪就着手清理圣徒的生平，把那种家长里短、令人作呕的风格驱除干净。除了完全纯洁或优雅的事情之外，教会不应该容忍其他的东西。”在信的末尾，他用华丽的语言赞颂这位有作为的大主教。

在151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拉斯谟忙于自己的事务，没有时间关心路德的事情，他要到巴塞爾去忙书稿的出版，后来又患了重病。3月份，他把路德的《论纲》寄给莫尔，但未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顺便向科利特抱怨罗马发行赎罪券的轻率决定。此时，路德已经被宣告为异端，他应召到奥格斯堡去接受教廷特使卡耶塔努斯(Cajetan)的盘问，路德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团结在路德周围的民众情绪激昂。大约在同一时间，伊拉斯谟致信路德的一位党羽约翰·朗格(John Lang)肯定他的工作，说路德的《论纲》使人人高兴。“我看现在的教皇是基督教世界的祸害，但我不知道现在公开来挑这个伤疤是否有好处。那应该是君主们的事情，但我担心君主们将和教皇沆瀣一气以分取一杯羹。我不理解埃克^①怎么会拿起武器反对路德。”这封信没有收入伊拉斯谟的任何文集中。

1519年1月，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驾崩，围绕选举新皇帝的斗争展开了，皇家法庭试图在宽恕裁定上夺回失去的

① 约翰·埃克(John Eck, 1486—1543)，德国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反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坚持传统教义，促使教皇宣布路德为异端。

地盘。德国人预料,约翰·埃克和安德里亚斯·卡尔施塔特^①的长期争论一定会涉及路德。伊拉斯谟预料,莱比锡的辩论会导致路德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最高权威,这场辩论会在世界史上具有持久的意义;相反,虽然他那一年被卷进许多争论,但他和爱德华·李的争论却会被人遗忘。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预测呢?

1519年3月28日,路德首次给伊拉斯谟写亲笔信。“伊拉斯谟,我经常和你谈话,你也经常和我谈话;我们谈到如何为主增光,谈到我们的希望,但我们还不深知。”他很高兴,伊拉斯谟使许多人感到不快,他把这当成天赐良机。此时,他路德的名气也开始传播开来,他觉得他和伊拉斯谟再保持沉默会被人误解。“因此,和蔼可亲的伊拉斯谟,如果你认为恰当,请以基督的名义承认你这位小兄弟;他钦佩你,对你怀有美好的感情。至于将来,由于他愚钝,只要能够默默无闻地安葬在一个角落里,他就满足了。”

142

这封信带有一丝乡下佬的狡黠和半带反讽的味道,当然是有其目的。路德想尽可能让伊拉斯谟亮出底色并赢得他的支持,因为对他推进的事业而言伊拉斯谟是强大的权威、科学和文化的试金石。路德在心灵深处早就知道,他和伊拉斯谟之间有一条鸿沟。早在1517年3月,即他公开亮相之前6个月,他就致信约翰·朗格说起伊拉斯谟:“对伊拉斯谟而言,人事比神事重要。”这是许多人对伊拉斯谟的判断——显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公平。

路德认为,伊拉斯谟试图促成各方和解,这是伊拉斯谟立即退出争论的原因之一。但凭借他世人指路明灯的权威,伊拉斯谟以极其模糊的政策来维持安宁的气氛,他要走中间道路,不卷入论战。以这样的态度,他

^① 安德里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约1480—1541),德国神学家、维滕贝格大学教授,在1519年莱比锡的辩论会上支持路德,反对赎罪券,是激进派的主要代表,著有《我们是否应当缓行》。

性格里伟大和渺小的两方面特质是纠缠不清的。大多数史学家评判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的态度都有错误，或者把他看成是误导人的一盏灯，或者认为他异常高大、富有远见——德国史学家卡尔柯夫(Kalkoff)就持后一种意见。评判错误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伊拉斯谟的心理特质是单一的。在这一点上，他并非只有单纯的一面。他在宗教改革期间的许多言论出自于他的惧怕心理，是由于他缺乏勇气，也是由于他非常不喜欢站在某个人或某个事业的一边。不过，在这种模糊态度的背后总是存在着他那深厚而热诚的信念：论战双方的意见都不能完全表达真理，仇恨的、独眼龙似的眼光浸透着人的头脑。和这种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他那高贵的幻觉：用温和、洞见和仁慈是能够实现和解、维护和平的。

1519年4月，伊拉斯谟本人致信选帝侯萨克森、路德的赞助人腓特烈。信的开头提到两年前把他写的《苏埃托尼乌斯^①小传》献给选帝侯的旧事，但真正的目的是评说路德。信里说，路德的著作给卢万的蒙昧主义者提供了攻击高尚学问和诋毁一切学者的理由。他本人不认识路德，但翻过路德的书，不过大家都赞赏路德的生活。在不了解路德的情况下就在不雅的平民面前抨击他，那很不符合神学温文尔雅的精神！路德不就是提出了争论的问题、让大家做出评判吗？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对他提出过劝告、教喻，也没有一个人说服他。并非每一个错误都是异端邪说呀。

基督教最优秀的遗产是不辜负基督的企盼。只要我们找到这样的生活，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怀疑人们在搞异端邪说。既然谁也难免会犯错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无情地揪住人家的疏忽呢？我们为什么想要征服而不是拯救、压制而不是教喻呢？

伊拉斯谟信尾的几句话使路德的朋友们高兴，他们希望得到伊拉斯

①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罗马历史学家，活跃于2世纪，著有《名人传》、《诸恺撒生平》等。

谟的支持。“请公爵保护这一位无辜的人,以免他屈服于少数人在虔诚外衣之下的不虔诚举动。这也是利奥教皇的希望,他心里最牵挂的就是要让无辜者安然无虞。”

与此同时,伊拉斯谟尽力阻止弗洛本印制路德的著作,“以免它们再煽动人们对高尚学问的仇恨”。他重申:我并不认识路德,我没有读过他的著作。收到1519年5月28日路德来信后,他于5月30日给路德的回信里也做了这样的宣示,本信已收入本书书信集。^①路德不知道他的著作在卢万引起的悲剧。卢万的人认为,伊拉斯谟在帮助路德起草文稿,并把路德当作改革派的旗手!这似乎是它们压制高尚学问的借口。“我已经表明,我全然不认识你,我没有读过你的书,因此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任何东西。”“我尽量养精蓄锐,以便在复兴学术上略尽绵力。审慎而温和的态度似乎比急躁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基督征服世界依靠的正是这样的态度。”^②

144

同一天,他给路德的朋友和追随者约翰·朗格写了一封短信,但没有公开发表的意思。“我希望,你和你朋友们的努力能够成功。这里的异教徒胡说八道……最优秀的人都因为路德的胆略而欢欣鼓舞:我不怀疑,他会小心行事,不至于使事情以派别争吵而告终!……除非我们首先废除罗马教区及其仆从的暴政,除非我们废除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加尔默罗会的暴政,否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战胜那些假冒的基督徒。但如果没有严重的骚乱,谁也不能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

随着两派鸿沟的加深,伊拉斯谟越来越频繁地抗辩说,他和路德没有关系。卢万大学内的人际关系日益不相宜,人们对他的态度不再那么和蔼。1519年8月,他直接转向教皇寻求保护,以免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他还没有

① 见本书《伊拉斯谟书信选》书简14。

② 这里的引文和书简14的文字不完全一致,看来英译本没有注意前后文字的呼应。

认识到裂痕之严重，仍然把争论当作学者的论争。英王亨利、法王弗朗西斯在国内强制争论者和诽谤者闭嘴。但愿教皇也命令一切争论停止！

当年9月，伊拉斯谟和卢万大学的教授们达成了和解。此时，科利特在伦敦去世，科利特或许是最理解伊拉斯谟立场的人物。德国类似的和解情绪也指望伟大的伊拉斯谟进行干预，他正在等待恰当的时机，只等朋友们给他适当的信号，他已经把温和当作处事的格言。

然而，随着战斗呐喊调门的升高，他温和的声音越来越没有力量。
145 1519年10月19日，他致信美因兹大主教，内容和当年春天致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的信相似，可是这封信很快就在路德的朋友中间流传。同时，这封信也在保守派中流传，但保守派不再像平常那样提出抗议，而是利用伊拉斯谟“我不认识路德”那句话来对付路德。

情况越来越明显，伊拉斯谟希望采取的调停和调和的立场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宗教法官雅各·胡格斯特拉腾(Jacob Hoogstraten)从科隆大学(他在那里任教)来到卢万大学，准备审理路德的材料，就像他过去审理约翰·罗伊希林一样。1519年11月7日，卢万大学的教授们效仿科隆大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庄重地谴责路德的观点。卢万大学将成为反对改革派的重镇，再也没有比卢万不适合伊拉斯谟居留的地方了。奇怪的是，他居然在卢万又逗留了两年。

世人都曾经期待他发出调和的声音，但这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至于其他方面，他也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1520年初的几个里，他的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到了和爱德华·李的争论上，在那场伟大的革命里，他们两人的争论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他置身事外的念头越来越占上风。6月，他致信梅兰希顿^①说：“我看事态的发展似乎正在走向反叛。丑闻的

^① 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ton, 1497—1560)，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发生看来势在必然,但我不希望我是始作俑者。”他个人认为,凭借他对沃尔西的影响,也许能够阻止英格兰焚毁路德的著作,但实际上焚书的命令已经发出。他错了。早在5月12日,焚书已经在伦敦实施了。

伊拉斯谟完全放弃了调停者的角色,以下事件足以为据。1520年夏天,三位君主举行了著名的会晤。亨利八世、弗朗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在法国加来聚会。伊拉斯谟随从他的赞助人查理五世前往。这是一次和平的秘密会议。倘若伊拉斯谟的理想仍然坚定不移,这一次聚会对于伊拉斯谟想象力的影响就难以估量了。这次会议的谈判涉及到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利益啊。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拉斯谟曾受到会议的影响。1520年7月在加来时,他和亨利八世有过交谈,和莫尔打过招呼;但他似乎并不重视这趟旅程,只不过把它当作会见英格兰老朋友的机会罢了。

146

此时,有关信仰问题的纷争越来越严重,查理五世从西班牙返回德国后就要加冕德意志皇帝。作为查理五世的顾问,伊拉斯谟不自由的身份更显突出,这使他的处境尴尬。1520年夏天,根据卢万大学教授们指控的材料,教皇发布诏书宣告路德为异教徒,除非他立即放弃异端邪说,否则他就会被革出教门。1520年9月9日,伊拉斯谟写道:“我担心倒霉的路德会遭遇最不幸的结果,到处都是这样的密谋,四面八方的君主都被激怒了,最严重的是利奥教皇被激怒了。他怎么不听我的劝告,不放弃那些敌对的、煽动的言行呢!……直到他们颠覆了语言研究和高尚学术研究,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由于修士们对语言研究和高尚学术研究的敌视,由于他们的愚蠢,才出现了这样的悲剧……我不干涉。至于其他方面,倘若我撰文反对路德,他们就会用主教的职位来犒劳我呢。”

事实正是这样,由于他的名气比天高,时势造成的局面使他成为皇帝和教皇制定政策时的宝贵财富。人们都想借用他的名义,都要他站在自己一边。但他无论如何不能站在任何一方。他致信教皇以回避他和路德的关系,但不完全否定路德。他花费很大的力气捍卫自己,竭力消除修士

们怀疑他支持路德的鼓噪，他们在布道时对伊拉斯谟冷嘲热讽，直截了当地把伊拉斯谟和路德联系在一起。

147 但另一方同样施加压力，要求他支持。1520年10月底，德皇在亚琛举行加冕礼。伊拉斯谟大约也在场，至少他陪同皇帝前往科隆。11月5日，他觐见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与路德面谈。腓特烈劝他把谈话的结果写下来，以二十二条的形式成为《有关路德主张的原理》。这个文件很快就在违背他意向的情况下发布了。

在那些日子里，伊拉斯谟对路德的态度在批判和嘉许之间徘徊，这并不是他的耻辱。这和他整个人格的严重不足有关：他从来就拒绝或不能做任何终极的结论。倘若他真的精于心计，自私自利，害怕丧命，他早就应该抛弃路德的主张了。他继续显示软弱的一面，这样不幸的一面影响了他的声誉；反之，他伟大的一面却被深深地埋藏起来了。

在科隆，伊拉斯还见到一位故旧，这是一位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比他小14岁，名叫海罗尼姆斯·亚里安达，印刷商阿尔杜斯的岳父。伊拉斯谟在威尼斯印书时，曾经在亚里安达家借宿。亚里安达如今是教皇派来会晤德皇的特使，他劝告德皇在基督教的重大问题上执行和教皇一样的政策，劝他用德皇敕令执行教皇把路德逐出教会的诏书。

亚里安达在权势地位上远远超过了伊拉斯谟，这一定使伊拉斯谟感到痛苦。亚里安达奉命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而他伊拉斯谟更喜欢靠理想的和谐、善意和宽容来解决教派的纷争。他从来就不信任亚里安达，始终抱戒备的态度。亚里安达是人文主义者，人很聪明，但他远远不及伊拉斯谟，根本就没有从文学研究的层次上升到严肃神学的高度。他之所以发迹，只不过是因他伺候教会的权贵罢了（伊拉斯谟早就放弃了这样的服务）。如今，此公竟然被委以最大的调停权力。

148 在卢万大学，最激烈反对伊拉斯谟的人已经对他厌恶之极，从伊拉斯谟致莫尔的信中我们可以略窥一斑。信中描绘了他在校长门前会晤埃格蒙达努斯的情况，笔调风趣，略带恶意。校长想要他们两人和解。但情况

并不像乌尔里希·胡腾想象的那样严重。胡腾致信伊拉斯谟说：“既然路德的书被焚毁了，你还认为自己安全吗？快飞走吧，为了我们你也得逃命呀！”

伊拉斯谟越来越强烈地抗辩说，他和路德没有关系。很久以前，他就请路德不要提及他的名字。路德答应说：“好吧，既然给你添麻烦了，我再也不提你的名字，我的其他朋友也不再提你的名字。”对修士们的攻击，他的抱怨之声也越来越响亮。他要求剥夺托钵僧布道的权利。

1521年4月，世界史上重要的一刻来到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盼望这一天：在沃尔姆斯会议^①上，面对帝国最高宗教权威，路德坚持己见，德国民众欢欣鼓舞。有一阵子，德意志皇帝的权力仿佛是岌岌可危，而路德及其追随者的处境并不危险。伊拉斯谟写道：“如果我在场，我一定会尽力使这场悲剧在比较温和的气氛里进行，以防止后来再次爆发这样的对抗，那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害。”

皇帝的裁决宣告如下：在帝国（和此前低地国家的勃艮第王朝一样）范围内，焚毁路德的书，逮捕他的教徒，没收他们的财产，路德交给教廷发落。“路德的悲剧在我们这里结束了，但愿它根本就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发生过。”在那些日子里，阿尔布雷特·丢勒^②听见路德死亡的误传后，在日记里留下了充满激情的叹息：“啊，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你将要去哪里？基督的骑士，你听我说，径直前行，陪伴我主基督，捍卫真理，去得到殉道者的桂冠。你是一位老态龙钟的小老头。我听见你说过，在精力尚存能够工作的时候，你让自己再活两年。过好每一天，以福音和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名义……啊，伊拉斯谟，站到这一边，上帝会为你而骄傲。”

149

① 沃尔姆斯会议(Diet of Worms),1521年在德国南部沃尔姆斯举行的会议,马丁·路德在此拒绝放弃其信仰,被罗马天主教廷视为异端。

②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德国画家、版画家和理论家,代表作有《四圣图》、《骑士、死神和魔鬼》等。

这篇日记表达了对伊拉斯谟力量的信赖，不过，其底层潜隐的期待是：伊拉斯谟会在这条道上毕生奋斗。丢勒对伊拉斯谟的理解是正确的。

斗争并未因此而降温，至少在卢万还是很火暴。卢万威望最高、能力最强的牧师拉托姆斯成了最激烈反对路德的人，他间接触及到伊拉斯谟。埃格蒙特的尼古拉斯是加尔默罗会教士，他也反对伊拉斯谟；加入到伊拉斯谟反对派行列的另一位荷兰同胞是哈勒姆的文森特·迪尔克斯，他是多明我会教士。伊拉斯谟在教授们的面前捍卫自己，驳斥攻击，解释他为何没有撰写著作反对路德。他承诺将要花时间去读路德，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平息争端。他请亚里安达出面干预，6月，亚里安达造访卢万，禁止鼓动反对伊拉斯谟。教皇仍然希望，亚里安达能够使伊拉斯谟回头，他已经和伊拉斯谟恢复友好关系，他希望伊拉斯谟走上正道。

然而，伊拉斯谟还是开始考虑自己剩下的唯一出路：离开卢万和低地国家以恢复受到威胁的自由。离开的机会早已出现：《新约圣经》的第三版需要他再次去巴塞尔。这不是永远的离别，他打算回卢万。10月28日（他的生日），他离开度过四年艰难岁月的卢万。卢万大学黎里学院的住房为他保留下来，他的藏书也留在这里。11月15日，他抵达巴塞尔。

不久，一个谣言不胫而走，说他因为害怕亚里安达而逃离卢万。伊拉斯谟竭力否认，但这个谣传现在又复活了。不过，亚里安达狡诈地故意把伊拉斯谟逐出低地国家的念头从本质上说是不太可能的。对教会而言，伊拉斯谟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危险性显然都要大于在卢万的安全性，因为卢万是保守派的大本营，就在勃艮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卢万，教会总有办法强制伊拉斯谟为反对路德的政策服务的，只是时间或早或迟而已。

正如艾伦博士正确指出的那样，伊拉斯谟害怕和躲避的是被迫去反对路德。他出走的原因不是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教会不会给他造成人身伤害，他太珍贵了，教会不会出此下策。他觉得受到的威胁是精神独立受到的威胁，精神独立对他来说是高于一切的；为了维护精神独立，他再也不曾回卢万去。

第十七章 在巴塞尔

→1521—1529

在巴塞尔几乎居住了八年：1521—1529——伊拉斯谟的政治思想——和谐与和平——反战著作——关于君主与政府的观点——早期基督教教领袖著作出新版——《对话集》——与斯图尼卡(祖尼加)、贝达等人的论战——与胡腾的争辩——与埃朋多夫的争辩

直到他的人生暮年，伊拉斯谟传诸后世的形象特质才逐渐清晰起来。到巴塞尔之后，他摆脱了各个派别要他支持的纠缠，逃离了卢万敌视者和反对者的环境，来到朋友、同仁、助手和崇拜者的圈子里，从君主的宫廷里解放出来，不必再依靠大人物的赞助，于是他能够不遗余力地把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工作是他的至尊至爱。只有到这时，他才变成了霍尔拜因画笔下描绘的那位伊拉斯谟。在晚年的岁月里，伊拉斯谟的生活最接近他的人生理想。

151

他没有想到，他的余生还有十五个年头。实际上很早以前，到1506年四十岁时，他就进入了垂暮之年的心态。1517年之后，他就经常说，“人生大戏的最后一幕开启了”。

在经济问题上，他觉得完全独立了。度过了许多年之后，他才敢说这样的话。然而，心灵的宁静并没有和才能的增长同时到来，从来就没有

来。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心宁神静，霍尔拜因为他作的肖像画似乎能够表现他这样的心态。他太关心别人对他的议论和想法。即使在巴塞爾这一段平静的岁月里，他也没有感觉到完全彻底地宾至如归。他照样反复说他即将去罗马、法国、英格兰或回到低地国家。环境给了他身体上安稳的条件，但他内心并不感到心灵的安康。他在巴塞爾居留的时间将近八年，然后他到弗赖堡^①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六年。

152 在巴塞爾的岁月里，伊拉斯谟有关世界和社会的理想并没有实现。他曾经以喜悦的心情企盼和平和光明，一直到1517年，他都在憧憬这样的黄金时代。如今，这样的理想所剩几何啊？他曾经相信人的善意和理性洞见，所以他写下《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如今，这样的信念又剩多少呢？对他而言，国家和社会的福祉只不过关乎个人的道德和思想启蒙问题。他推荐和传播这两个理念，曾经认为自己完成了伟大的革新。后来他看到，教派的冲突会引起令人厌恶的斗争。从那一刻起，他就不愿参与任何纷争，而是只作壁上观了。在基督教斗争的每一台大戏里，他这位演员都自动告别了那个大舞台。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理想。他在述及福音哲学的一封信的结尾处说：“让我们抵抗，但不是用嘲弄和威胁、武力和不义来抵抗，而是靠纯洁的理智、靠施惠于人、靠文雅和宽容来抵抗。”他晚年祈祷说：“上帝，如果您意欲强化人心里的圣灵，请您同时阻止那些外在的灾难……我主耶稣，请您使混乱变成秩序，让神灵覆盖在这一潭死水上，混乱的教义就像一潭浑水，令人痛心啊。”

伊拉斯谟高度珍惜和谐、和平、责任与和善，但他很难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这些价值。他感到理想幻灭。在短暂的政治乐观主义之后，他不再说起黄金时代，而是用沉痛的话说起罪孽深重的时代、最不幸的时代、最难以想象的堕落的时代。他一直在为和平而写作：《和平的控诉》(Que-

① 弗赖堡(Freiburg)，德国西南部城市。

rela pacis)、《未经战乱者的无知》(*Dulce bellum inexpertis*)等等。他对自己的和平努力评价很高：“那个用几种文字写作的人，他从未停止对战争的口诛笔伐。”这是他用《对话集》里的一个人物来替他说话。据梅兰希顿记述，传说教皇尤利乌斯曾经召见伊拉斯谟，听取他对教皇与威尼斯战争的意见^①。据说，教皇教他停止写君主关心的事情，生气地对他说：“你不懂那些事情！”

伊拉斯谟内心温和，且脑袋对政治性一窍不通。他生活在社会现实之外，非常天真地认为人是可以矫正的，他难以认识到治理社会的困难和必要。他关于善政的理念是极端质朴的，和大多数伦理倾向很强的学者一样，他这些理念骨子里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虽然他从不梦想演绎出实际的结论。他和政治和司法界的思想家莫尔、布多伊斯、扎修斯^②的友谊并没有使他改变。政府、法律或权利的形式问题对他而言并不存在。经济问题他则用田园风光的淳朴观点去看待。君主应该用不取于民的方针治国，尽量少征收赋税。“上乘的君主具有热爱君主的公民所具有的一切美德。”无业人员应该被驱逐。当他向君主们列举和平的善政时，我们觉得他和现实贴近了：清扫城镇、修路架桥、营建楼堂、清理水塘、疏浚河床、修筑河堤、开发沼泽。这里说话的伊拉斯谟是一位低地国家人，需要清扫洗涤的特性正是他基本的性格特征。

像伊拉斯谟这种关心政务、观念含糊的人往往用非常严厉的标准来评判君主，因为他们要君主为一切社会弊端负责。伊拉斯谟对君主的态度是：具体的个人可以颂扬，但总体上要予以谴责。长期以来，他指望自

① 梅兰希顿：《劳作、体制的改革》(*Opera, Corpus Reformatorum*) XII 266，传说所指的是伊拉斯谟的《和平的控诉》(*Querela pacis*)，不过《和平的控诉》是在1517年之后写的；参见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603封，第37、10页。——原注

② 扎修斯(Ulrich Zasius, 1461—1535)，德国法学家、人文主义者，主张罗马皇帝和现代统治者的权力无限，认为统治者不受法律的约束。

154 己时代的君主确保教会和国家的和平安宁。但君主们使他失望。然而，他对君主们的严厉评判标准取自他阅读古典的经验，而不是来自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验。在后期的《对话集》版本里，他常常回归君主及其重任和失职，但不提具体的名字。“有人撒播不和的种子，挑拨他们治下城镇的关系，以便放开手脚去榨取穷人，用无辜公民的饥饿来满足自己的贪婪。”在《屎壳郎寻找鹰隼蛋》(*Scarabeus aquilam quaerit*)这篇格言里，他用鹰隼描绘君主，塑造一个残酷强盗和迫害者的形象。在《唯有国王和傻瓜才不受惩罚》(*Aut regem aut fatuum nasci oportere*)和《未经战乱者的无知》里，他留下了一些常被引用的格言：“人们建造并开发城市，君主的愚蠢却毁灭城市。”1518年，他在致科利特的信里说：“君主和教皇密谋，或与土耳其人勾结，却不为人民谋福利。”

伊拉斯谟是学术性的批评家，书斋型的作者。革命目的对他是全然陌生的东西，正如莫尔写《乌托邦》时不知革命为何物一样。“坏君主也许应该偶尔吃一点苦头，但矫正剂却不应该用来尝试。”伊拉斯谟谴责君主，但他是否对同时代人真正有影响，那倒是值得怀疑的。人们乐意相信，他对和平的强烈热爱、对战争疯狂的强烈谴责产生了一些影响。毫无疑问，他的言论在阅读他的广大知识分子中传播了和平主义的情绪，然而遗憾的是，16世纪的历史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这样的情绪产生了什么实际的效果。无论其效果如何，伊拉斯谟的力量并不在于他这些政治宣示。在人们的激情和重要利益面前，他不可能成为领军的将帅。

他的生活和工作是在其他的领域。到了巴塞尔以后，他多年的老毛病又犯了，肾结石越来越频繁地发作。然而他可以更加从容地献身于既定的伟大任务：开启基督教纯净的源头，阐述福音的真理，并用他理解的最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他的著作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基督教的古抄本、古典学者的著作、《新约圣经》和《格言集》的新版本、他自己的书简，还要加上他对《新约圣经》的解释、对《诗篇》的评注以及他新近撰写的神学、伦理学和哲学著作。1522年，他连续几个月生病。但即使在这一

年,他也推出了不少书;先是圣西普里安^①的文集,这是1520年在卢万就已经完成注解和编辑的书稿;接着是阿诺比乌斯^②的文集和《新约圣经》的第三版。1523年,他出版了圣奚拉里^③的文集。1524年,新版的《圣哲罗姆文集》问世。稍后的几年里问世的著作有:1526年的圣伊里奈乌斯^④文集、1527年的安布罗斯^⑤文集、1528—1529年的圣奥古斯丁文集、1530年的克里索斯托文集^⑥的拉丁文译本。这些综合性的著作一口气问世说明,这样的出版工作正是伊拉斯谟一贯的特征:快速完成书稿,非凡的精力集中,令人惊叹的记忆力;但这些版本缺乏现代语文学要求的严格的校勘和呕心沥血的准确性。

好辩的伊拉斯谟也好,睿智和幽默的伊拉斯谟也好,都没有在博学的教士和理想幻灭的改革者身上失去踪影。我们高高兴兴地与这位纸上谈兵的斗士告别,但我们不会与那个幽默家告别,不会与他的许多文学宝典告别。不过,这两个方面的伊拉斯谟在《对话集》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

上文对《愚人颂》的评述不妨在这里再次重申:即使只有《对话集》和《愚人颂》两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继续保持活力,历史的选择也没有错。这并不是说,文学史上保存的只有伊拉斯谟最令人愉快、最轻松、可读性

-
- ① 圣西普里安(Cyprian, 220? —258), 早期非洲基督教神学家、迦太基主教, 在基督教受迫害时期被罗马皇帝斩首。
- ② 阿诺比乌斯(Arnobius 1—113), 基督教著述家, 著《反对异教徒》, 借以为基督教辩护。
- ③ 圣奚拉里(Hilarius, ? —468), 意大利籍教皇, 反对废黜君士坦丁堡牧首。
- ④ 圣伊里奈乌斯(Irenaeus, 9—34), 2世纪基督教神学家, 在基督教各派之间进行调停, 肯定犹太《圣经》(《旧约》), 初步区别《旧约》和《新约》。
- ⑤ 安布罗斯(Ambrose, 340? —397), 意大利作家、作曲家、米兰主教, 推行正统观念, 维护基督教的权力。
- ⑥ 约翰·克里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 347? —407), 希腊教父、君士坦丁堡牧首, 擅长辞令, 有“金口”之誉。

最强的作品,他严肃而深奥的神学著作就只能静悄悄地被束之高阁。毫无疑问,伊拉斯谟最了不起的成就活生生地表现在《愚人颂》和《对话集》里,这两部作品闪光的智慧令世人着迷。在16世纪,德谟克利特的追随者真的是群星璀璨,他们是拉伯雷、阿里奥斯托、蒙田、塞万提斯^①和本·琼森^②。但愿我们在此有足够的篇幅来阐述伊拉斯谟在这个星汉里的地位!他的《对话集》在这个灿烂的星汉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156 当伊拉斯谟在巴塞尔将《对话集》结集成书时,这些对话已经历了漫长而有趣的历史。起初的书名是《拉丁语对话范本》(*Familiarium colloquiorum formulae*),是他1500年之前在巴黎为学生写的教本。他那位穷酸的朋友奥古斯丁·文森特·加米内德喜欢寄生在伊拉斯谟的天才之上,加米内德把他的教材搜集起来赢利,在小范围内流通。加米内德去世以后,列日一位叫兰伯特·霍朗尼乌斯(Lambert Hollonius)的人把伊拉斯谟的手稿卖给巴塞尔的出版商弗洛本。伊拉斯谟的好朋友庇突斯·雷纳努斯也立即在巴黎刊印了这部手稿,却不让伊拉斯谟知道。这是1518年的事情。伊拉斯谟有理由非常生气,因为这本书很粗糙,错谬百出。所以他立即自己印行了一个比较好的本子,1519年由卢万的迪尔克·米尔滕斯出版。那个时候,这本书实际上只包含一篇真正的对话,题名《日常会话》(*Convivium profanum*),是后来《对话集》的核心,其余的篇目是礼仪和短小的对话。不过,他自己编订的这个本子已经成型,它对拉丁学者有用,充满了智慧和风趣,所以它很受欢迎。截至1522年,它已经印行25次,虽有新的增订,但主要是重印,印行的地方有安特卫普、巴黎、斯特拉斯堡、科隆、克拉科、德文特、莱比锡、伦敦、维也纳和美因兹。

①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西班牙文学家,代表作《堂·吉珂德》。

② 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戏剧家、诗人、评论家,剧作有《炼金术士》、《巴托罗缪市集》等。

到巴塞尔之后,伊拉斯谟自己动手修订《对话集》,1522年3月,该书交由弗洛本印行,献给弗洛本的六岁儿子、伊拉斯谟的教子约翰·伊拉斯谟·弗洛本。不久,他就不只对该书进行修订了。1523年和1524年,他先增补了10篇,以后又增补了4篇和6篇。到1526年,《对话集》的名字调整为《拉丁语对话大全》(*Familiarium colloquiorum opus*),仍然献给他的教子。在增补的过程中,《对话集》的每一个新版本都增加了篇幅,最后成了一部内容丰富、样式驳杂的会话集;每一篇都是文学形式上的拉丁文杰作,文章结构严密,文字自然天成、说服力强、轻快飘逸、活泼灵动、流利顺畅;每一篇都是一出构思精巧的独幕戏。

伊拉斯谟的脑子不失当年的机敏和鲜活。《愚人颂》问世多年之后,他又踏上了讥讽的领地。至于《对话集》的形式,表面上它声称其讥讽性不如《愚人颂》。由于《愚人颂》不言自明的主题,它显露的本色就是讥讽。乍一看,《对话集》似乎是不带刺的风情画;然而从内容上看《对话集》却更加辛辣,至少其辛辣更加直白。作为讽刺的《愚人颂》则带有哲理的、普遍的讽刺,而《对话集》则是针对那个时代的比较特别的讥讽。同时其中的对话把正反两面的要素都结合起来了。在《愚人颂》里,伊拉斯谟本人的理想隐藏在后台,并没有表达出来;在《对话集》里,他却不断且直白地把理想推到前台。在这一点上,虽然《对话集》满篇都是嘲笑和讽刺,其实它是一部深刻的道德专论,类似《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在《对话集》里我们可以看到:伊拉斯谟想要从世人和社会得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为自己描绘的基督教社会究竟像什么样子。他满怀激情渴望的、净化的社会是这样的:高尚的道德、虔诚的信仰、质朴与和气的处事态度、和善与宽容地待人、天下的太平;他理想中的一切在《对话集》里表现得清清楚楚、十分巧妙。在表现伊拉斯谟的理想方面,《对话集》胜过他其他的著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伊拉斯谟用他的一系列道德—教义专论,回到他在《基督徒士兵须知》里处理的主题:淳厚、质朴的基督徒行为举止;不受拘束的、自然而然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他传递给世人的获救讯

息。他以下的著作就传递了这样的讯息：《论忏悔之道》(*Exomologesis*)、《论戒荤食》(*De interdicto esu carniū*)、《丰富多样的语言》(*lingua*)、《君主的婚姻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matrimonii*)、《基督教寡妇的道德》(*Vidua chrisitana*)、《论教会的和谐》(*De amabili Eccelsiae concordia*)。不过，获救的讯息在《对话集》里表现得更加透彻。

《对话集》比《愚人颂》引起了更多的敌视和争论，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伊拉斯谟对具体的人发起了攻击。他嘲笑卢万大学的对手。在1519年的版本里，爱德华·李已经被作为谄媚者和牛皮客写进了1519年版的《对话集》；等到两人的争吵缓和之后，1522年版本里有关李的文字就删掉了。《葬礼》(1526)讥讽文森特·迪尔克斯，用漫画的形象把他写成一位贪婪的修士，这位修士扭曲临终者的遗嘱，以利于自己的修会。这个形象在以后的版本中继续保留。稍后的篇目里加上了对贝达等人的讥讽。厄科兰巴丢^①的追随者把一位长着大鼻子的人当作自己的领袖时，伊拉斯谟回答说：“不对，这是另一个人。”就这样，凡是与伊拉斯谟不和的人都可能在《对话集》里成为讥讽的对象。这本鞭挞讥讽的书不仅指向教派，而且指向个人，它引起争论就不足为奇了。

伊拉斯谟从来没有从争论中脱身。他说自己内心痛恨争论，从来不想争论，这句话无疑是认真的，但他辛辣讥讽的脑袋显然是占了上风；而一旦开始争论，他无疑喜欢信马由缰率性而为，喜欢挥舞他那一泻千里、雄辩滔滔的笔杆子。我们不必赘述他所有的笔仗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性格了。

自1516年起，反对伊拉斯谟的情绪就在西班牙酝酿。阿尔卡拉大学的神学家迭戈·洛佩兹·祖尼加(Diego Lopez Zuniga, 亦名斯图尼卡[Stu-

^① 厄科兰巴丢(Johannes Oecolampadius, 1482—1531), 瑞士神学家、宗教改革的一方领袖。

nica])准备评注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伊拉斯谟称他为“第二个爱德华·李”。起初,红衣主教希梅内斯禁止这本书的印行,但希梅内斯1520年去世之后,风暴突起。在几年时间里,祖尼加一直批评和骚扰伊拉斯谟,使伊拉斯谟非常恼怒。两人最后实现和解,大概是因为伊拉斯谟更加保守了,同时祖尼加的态度也更加友善。

伊拉斯谟和索邦大学评议会的贝达(诺埃尔·贝迪埃)的争论也持久而激烈。两人的争论始于1522年。根据贝达的建议,巴黎大学1526年指控伊拉斯谟的一些言论为异端邪说。路易·德·伯奎因^①因言获罪,受宗教裁判所审判,最后于1524年在火刑柱上被烧死。贝达想要把伊拉斯谟牵连到这个案子中,这就给他们的关系火上浇油。

显然,在巴黎大学和卢万大学的神学圈子里,厌恨伊拉斯谟的主要原因是《对话集》。艾格蒙达努斯和文森特·迪尔克斯都不能原谅伊拉斯谟抨击他们的立场和人格。

伊拉斯谟和高贵的阿尔博托·皮奥的抵牾和上述争论比较,就显得比较温文尔雅,但他和一些西班牙修士的争论却很激烈,他们想要把他送上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伊拉斯谟这个名字往往和比较自由的教义观点联系在一起。

159

就这样,争论给伊拉斯谟的《对话集》积累了很多素材。按照他的安排,书中的对话不是“原谅”,而是“辩白”。他叹息说:“可怜的我累死了,这些辩白多得把书塞得满满当当。”

有两场争论值得略微仔细地加以考察:他与乌尔里希·胡腾和路德的争论。

胡腾是骑上、人文主义者,他热情地预告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高涨,憎恨教廷,支持路德,做事莽撞,头脑有一点糊涂。伊拉斯谟快出名时,他鼓

① 路易·德·伯奎因(Louis de Berquin,1490—1526),法国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被罗马教廷处死。

掌欢呼，后来他试图说服伊拉斯谟支持路德。伊拉斯谟很快就发现，这个吵吵嚷嚷的好斗分子可能会连累自己。胡腾一篇轻率的讥讽文章不就是被人算到了伊拉斯谟的头上吗？有一段时间，胡腾再也无法容忍伊拉斯谟。他的骑士本能刚好对伊拉斯谟性格的弱点起到刺激的作用；伊拉斯谟的弱点是害怕连累自己，到了危险的时刻往往会批评支持者。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弱点。1521年，他致信理查德·佩斯^①说：“并非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去殉道。我担心混乱发生时，我会学习使徒彼得的榜样。”但他坦诚这个弱点并不能使他摆脱胡腾的批评，1521年他又用火药味很浓的语言反击胡腾。在这场争吵中，伊拉斯谟的弱点使他的声誉受到惩罚。他的《用海绵抵挡胡腾的泥潭》(Songe against Hutten's mire)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屈尊和虚弱的一面，不过胡腾有生之年没有读到这篇文章。胡腾感到幻灭，觉得被人抛弃，于1523年就夭折了。胡腾去世之后，他毫无顾忌地刊发了这本小书攻击他的朋友。

160 然而，死去的胡腾还是对活着的伊拉斯谟报了一箭之仇。他的一位追随者埃朋多夫的亨利(Henry of Eppendorff)继承了胡腾对伊拉斯谟的厌恶，多年里一直抨击伊拉斯谟。他揪住伊拉斯谟一封信不放，对伊拉斯谟在信中的攻击提起诽谤罪诉讼。埃朋多夫的敌视使伊拉斯谟极其恼怒，使他觉得处在密谋诡计的包围之中，即使埃朋多夫停止攻击他以后，他还觉得到处有人盯梢。

^① 理查德·佩斯(Richard Pace, 1483—1536)，英国主教、外交家，英王亨利八世大臣。

第十八章 与路德论战,走向保守

→1524—1526

听人劝说转而反对路德——《论自由意志》:1524——路德的答辩:
《论意志的不自由》——伊拉斯谟暧昧的立场与路德极端的立场——伊拉
斯谟站到保守主义一边——巴塞爾主教与厄科兰巴丢——伊拉斯谟半心
半意的教义:忏悔,仪式,圣人崇拜,圣餐——《论基督教婚姻》:1526——
他觉得四面受敌

最后,伊拉斯谟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他长期竭力避免的局面:他不得
不撰文反对路德。然而那“壮举”绝不像伊拉斯谟曾经深思熟虑的壮
举,绝不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信仰的一致;他过去的理想是劝
阻急躁的路德,让世人恢复理智。在宗教改革的大戏中,他们两人的争论
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后戏”。不仅伊拉斯谟感到理想幻灭,而且路德也
早就过了他那英雄气盛的时代,为时势所困,他也被迫随大流,也感到心
灰意冷了。

伊拉斯谟曾经决意做这出悲剧的旁观者。伊拉斯谟曾做过这样的推
理:“如果路德的辉煌业绩是上帝的意志——看来是这样的,如果上帝判
定路德的大手术对医治时代的弊端是必要的,那么劝阻他就不是我的责
任。”尽管他抱这样的态度,他还是不得安宁。他继续抗辩说,他和路德没

有关系,而且和路德有重大的分歧,但老教会的捍卫者还是坚守尼古拉斯过去表示的立场。1520年,埃格蒙特的尼古拉斯对卢万的校长说:“只要他不白纸黑字表明反对路德的立场,我们就把他当成路德分子。”事态就是这样。1522年,比维斯^①从荷兰写信告诉他:“你在这里被认为是路德分子,这是肯定的。”

162 要求伊拉斯谟撰文批判路德的压力越来越大。英王亨利八世通过伊拉斯谟的老朋友滕斯托尔转达了他的要求,萨克森公爵乔治提出要求,罗马也提出要求,伊拉斯谟昔日的赞助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去世前不久也敦促他表示反对路德的态度。

伊拉斯谟心想,他再也无法拒绝。他尝试用《对话集》的风格写了几篇对话,但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也许,这几篇对话不可能使那些渴望他效劳的人满意。自从1520年以来,路德和伊拉斯谟两人并没有直接通信,因为路德在那一年的回信里做了这样的承诺:“好吧,伊拉斯谟,我再也不提你的名字。”但就在伊拉斯谟准备抨击路德的时候,路德来信了。1524年4月15日,这位宗教改革家反过来借用伊拉斯谟的话提出请求:“请坚守你始终宣告渴望扮演的角色:我们这出悲剧纯粹的旁观者。”路德这句话有一丝讥讽而鄙视的弦外之音。不过,伊拉斯谟认为这封信“富有人情味;我没有勇气以同样的人情味去回信,因为有奉承者挡道”。

为了能够问心无愧地与路德论战,伊拉斯谟自然得挑选他内心与路德有分歧的一个观点。这不是有关教会结构的外表上的意见分歧。对于仪式、仪轨、斋戒之类的问题,他和路德都持反对态度,但他比路德略微温和。他对圣礼和彼得首位(the primary of St. Peter)持怀疑的态度。因此自然而然得出他们两人之间鸿沟在哪里的结论:他们的气质不同,有关信仰

① 比维斯(Vives Juan Luis, 1492—1540),西班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学生,曾在欧洲若干国家任教,险遭宗教裁判,以教育著作流芳于世,代表作有《论儿童教育的正确方法》、《论纪律二十卷》、《论心灵及生活三卷》。

实质的观念不同,有关善与恶、内疚与冲动、自由与束缚、上帝与人的观念也不同。路德回信说,伊拉斯谟的确触及到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1524年,伊拉斯谟的《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diatribie*)问世。他有资格写这样的主题吗?这篇论著符合他的一贯方法,目的显然是要证明他所论的权威性和深厚传统,其主张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早期教士们的断言、哲学家们的证实和人的理性,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如果不承认自由意志,表达上帝的正义和仁慈的语词就没有意义。倘若万物都是按照纯粹而难免的必然发生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的教导、责备和告诫又有何意义呢?假如不论好坏,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只不过像是斧头对木匠的关系,那么赞扬对上帝的顺从又有何目的呢?倘若情况就是这样,向众多的人解释真正的教义就有危险,因为道德仰赖自由意识。

163

路德收到对手的论著后感到厌恶和鄙视。不过,在撰写辩驳的过程中,他还是表面上压抑这样的感情,并遵守彬彬有礼的惯例。他内心的愤怒在《论意志的不自由》(*De servo arbitrio*)中显露无遗。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伊拉斯谟怎么责备他他就怎么责备伊拉斯谟,也就是拯救错位的人,把他往相反的方向上拉。他那带有乡野气息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头脑从他那火一般的信仰里演绎出令人震惊的结论。此时,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绝对决定论(*absolute determinism*)的一切极端论调。为了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批驳非决定论的观点,此时他被迫诉诸原始的夸张信仰的暗喻,以便表达难以表达的观点:上帝有两种不相重合的意志。一是上帝“对人类永恒的敌视,不仅是建立在人类的缺点和自由意志举动基础上的敌视,而且是人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敌视”。人类意志的比方好比是一匹坐骑,位于上帝和魔鬼之间,而骑手或者是上帝,或者是魔鬼,这匹坐骑不可能驰向上帝或魔鬼的方向,因为他们在竞争。如果《论意志的不自由》宣扬了路德的什么教义的话,那就是信仰的再生和宗教观念的滥用。

然而,路德站立在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信仰的基岩之上,永恒的绝对良心渗透到这种信仰的各个方面。在他的心里,一切观念就像干草,在上帝壮丽的光焰中燃烧殆尽;对他而言,人共同努力试图得到拯救是对上帝荣光的亵渎。路德批驳的观念是有关原罪与神恩和拯救的观念,是上帝作为万物终极原因的观念。但伊拉斯谟的头脑并非真正生活在这些被批驳的观念之中。

那么,伊拉斯谟追求的事业在各方面都略逊一筹吗?路德的核心思想是正确的吗?或许是吧。默雷(Murray)博士提醒我们注意黑格尔的论断:悲剧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冲突,而是正确与正确的冲突。路德和伊拉斯谟的论战超越了我们的判断所及;这一场论战不得不接受肯定和否定的等值性甚至兼容性。实际上,他们用语词和比方论战的领域超越了可以知道、可以表达的领域——伊拉斯谟了解这样的真相。伊拉斯谟是很细腻的人,对他而言,思想是互相混合、可以互换的;路德称他为普罗特斯^①。路德对一切事物都使用过分强调的语言。荷兰人伊拉斯谟看见的是海,他反对德国人路德,因为路德从山顶上眺望。

“我们谈到上帝时,用的是表达力不够的语词,事实就是这样。”“许多问题应该被推迟,不是推迟到主教特别会上去审议,而是等到横亘的玻璃被移走、朦朦胧胧的雾罩被驱散之后再去讨论这些问题,那就好多了,届时我们将面对面看见上帝。”“什么免于出错?”“圣典中有一些圣所是上帝的意志没有进入的,我们应该深入这些圣所。”

在自由意志这一点上,天主教会为自己保留了一方小小的天地,在神恩之下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了一点余地。伊拉斯谟构想的自由是相当宽泛的自由。相反,路德坚决反对这样的自由观念。起初,同时代的人对这场论战的看法主要是他们两人的论战本身:他们根据自己的同情所在,或赞赏伊拉斯谟,因为他猛攻路德;或赞赏路德,因为他猛攻伊拉斯谟。不

^① 普罗特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善变。

仅比维斯支持伊拉斯谟,而且更多正统的天主教徒比如红衣主教保罗·萨多雷也支持伊拉斯谟。大多数德国人文主义者不愿意与古老的教会决裂,伊拉斯谟对路德的抨击使他们感动,使他们更坚定地反对路德,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穆奇安努斯·鲁弗斯^①、扎修斯、皮尔德海姆^②。甚至梅兰希顿也倾向于伊拉斯谟的立场。其他一些人比如过去曾经热情支持路德的卡皮托也和路德断绝了关系。不久,辩才卓著的加尔文却完全站到路德一边了。

借用当代一位天主教学者对伊拉斯谟和路德两人关系的看法颇有价值,基弗尔说:“对教会而言,伊拉斯谟关于自由的、未经污染的人性的观点比路德的观点更加陌生。他仅仅以骄傲的怀疑主义反对教会:由于这个原因,心理细腻的路德抨击伊拉斯谟,指责他喜欢说基督教会缺点和苦难,而不是用适合在上帝面前陈述的、扼腕叹息的方式来抨击教会,路德说伊拉斯谟使读者禁不住发笑。”^③

伊拉斯谟的大部头的论著《驳马丁·路德所谓的意志不自由》(*Hyperaspistes diatribae adversus servum arbitrium Martini Lutheri*)也是针对路德的,不过这已是他们论辩的尾声,此处不赘。

于是,伊拉斯谟终于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教义的分歧之外,《论自由意志》明确表达了反对个人宗教观念的立场,明确支持教会的权威和传统。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1522年,他写道:“无论生死,什么力量也不能使我疏离天主教会的亲切感情。”在1526年的《驳马丁·路德所谓的意志不自由》里,他又写道:“我从来没有背叛天主教会。

① 穆奇安努斯·鲁弗斯(Mutianus Rufus,1471—1526),德国人文主义者,给路德一定的支持,但不愿意和传统教会决裂。

② 维利巴尔德·皮尔德海姆(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德国人文主义者、纽伦堡贵族、诗人。

③ 基弗尔(F. X. Kiefl):《路德的宗教心理》(*Luther's Religious Psyche*),Hochland XV,1917年,第21页。——原注

我知道,在你所称的‘教皇’教会里,有许多人使我不快,但在你的教会里,我也看见这样的人。对于习惯的弊端,人们比较容易忍受。因此,我忍受这个教会里的不足,直到我看清一个更好的教会,教会也不得不对我表示容忍,直到我更完美。面对多种弊端走中间道路的人,不会船毁人亡。”

166

但走中间道路行得通吗?两边的人都厌恶他。他写道:“昔日无数来信赞扬我是三重意义上的英雄、文学君主、学问的太阳、正宗神学的维护人;如今我却无人理睬,被人描绘得面目全非了。”多少老朋友和情投意合的人物已经离他而去啊!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怀有和伊拉斯谟相同的思想和希望。他笔耕不辍,不知疲倦地撰文,尤其用写信的方式把他那温和与净化的思想传遍欧洲。学者、教会大人物、贵族、学生和文官都和他通信。巴塞尔主教乌藤海姆的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 of Utenheim)很合伊拉斯谟的心意。他热情倡导人文主义,早在1503年就试图用宗教立法来改造他治下的教区,但成效不大。稍后,他邀请厄科兰巴丢、卡皮托、温普费林到巴塞尔,但那是在那场伟大斗争之前的事情;不久,厄科兰巴丢和卡皮托就狂热地卷入了宗教改革,超过了克里斯托夫和伊拉斯谟能够赞同的程度。1522年,伊拉斯谟将《论戒荤食》送克里斯托夫主教一阅。这是他直接反对现存秩序的最后努力。

克里斯托夫主教再也不能控制宗教改革运动。巴塞尔很大一部分平民和公会议的大多数教士已经站到激进改革派一边。伊拉斯谟到巴塞尔一年之后,厄科兰巴丢回到巴塞尔,意在阻止对旧秩序的抵抗;在第一次旅居巴塞尔时,厄科兰巴丢曾经帮助伊拉斯谟校订《新约圣经》里的希伯来文。1523年,公会议聘任厄科兰巴丢任巴塞尔大学的《圣经》教授,与此同时,四位天主教教授却失去了职位。厄科兰巴丢促成教会批准非委任牧师的布道。不久,一位更加头脑发热的鼓动者也来到巴塞尔,他积极地

167

在巴塞尔及其周边开展工作,这位鼓动者就是性子急躁的纪尧姆·法

雷尔^①。后来,法雷尔转往维也纳推动改革,劝说加尔文留在维也纳。

起初,厄科兰巴丢小心翼翼地在教会仪式里引进一些新奇的东西,伊拉斯谟看到这些革新后感到惊恐。他特别仇视法雷尔的狂热。正是这些人阻碍了他渴望并认为可能实现的妥协。他闪烁的态度从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意见;但在大多数争论问题上,他逐渐固定在半保守的中间立场。凭借这个中间的立场,在不否认自己最深层信念的条件下,伊拉斯谟竭力忠于教会。1524年,他撰写《论忏悔之道》,表达他对忏悔的情感。他在中间道路上接受忏悔:即使忏悔不是基督或使徒决定的,至少是由早期教士决定的。虽然忏悔有时沦为重大的弊端,但忏悔总是很有用的。伊拉斯谟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对争论的双方提出忠告”。“虽然他倾向于相信忏悔者一边”,但他对否定忏悔的人“既不赞同也不抨击”。

在长期的论战中,伊拉斯谟逐渐找到机会给自己的观点做了一定程度的界定;比如在1525年和1529年致阿尔博托·皮奥王子的信里,他就做了一些说明。因此,他的定义常常以对话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回答别人对《对话集》的攻击还是回击对《愚人颂》的攻击,他给自己观点下的定义都以对话的形式出现。最后,在1535年《论教会的和谐》里,他扼要重述了自己的观点;不过,这本书很难进入他旨在改革的著作之列。

在大多数问题上,伊拉斯谟都成功地找到了温和而保守的公式。即使在仪式问题上,他也不再简单地予以排斥了。甚至对他一向厌恶的斋戒,他都说了一些温和的话,至于对文物的崇敬和教会的节日,他也发表了温和的意见。他不想废除对圣徒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不会引起偶像崇拜的危险。他甚至愿意承认圣像:“如果把形象从生活中游离出来,你就失去了最大的生活乐趣,我们从形象里看见的东西常常会多于我们靠

168

① 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 Farel, 1489—1565),法国宗教改革家,使新教传入瑞士法语区,在巴黎改革操之过急而受迫害,逃往巴塞尔,与伊拉斯谟发生争执,又被逐出巴塞尔。

文字构想的东西。”关于基督在圣坛上的真实存在，他坚守天主教的观点，但没有狂热，仅仅是以教会的意见一致为根据。这是因为他不能相信：既然基督是真理和爱的化身，他怎么可能死守一个可怕的错误，竟然会崇拜面包屑而不是上帝呢？基督怎么可能让他的新娘因此而受难呢？不过由于这些原因，他不妨在需要的时候接受厄科兰巴丢的观点。

伊拉斯谟在巴塞尔旅居时期最纯洁、最富有教谕性质的论著之一是《论基督教婚姻》(*Institutio principis matrimonii*)。这是为英格兰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①写的书；除了显露年迈的痕迹、略嫌散漫之外，该书颇有《基督徒士兵须知》的遒劲之力。稍后问世的《论基督教寡妇》(*De vidua chrisitana*)是为匈牙利的玛丽^②而作，这本书同样白璧无瑕，只是趣味性稍次。

这一切并没有解除传统教会捍卫者的武装。他们死死揪住伊拉斯谟《对话集》里浮现出来的教义形象，那不能被认为是纯洁的天主教形象。那个形象太鲜明，无论伊拉斯谟如何千方百计紧守其字面意义，但他的内心并没有紧守天主教会至关重要的信念。因此，当他的书被删节和清洗时，《对话集》和《愚人颂》等几种被列入禁书目录。其余一些书被列入“小心提防”(*caute legenda*)的书目。《新约圣经》里的许多注释被删除，圣哲罗姆的《解释》和《寓言集》(*Apologia*)也大篇幅删除，《基督徒士兵须知》删得不多，但《神学原理》(*Ratio verae theologiae*)甚至《论忏悔之道》也删得不少。不过，对他的书的删节和清洗是伊拉斯谟身后才发生的事情了。

伊拉斯谟在巴塞尔等地始终是一个大型思想群体的核心。不过，这

① 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一任妻子，亨利与她离婚是他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的导火线，引发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② 匈牙利的玛丽(Mary of Hungary, 1505—1558)，查理五世(1500—1558)的妹妹，低地国家摄政王。

个群体的力量难以估计,因为它没有以一个党派的身份出现。只要它以思想群体的面目出现,它将来如何转向、伊拉斯谟的思想对教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就不会很清楚。伊拉斯谟待在安静的书斋里,但他始终是思想之王。许多人敌视他,密切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样的敌视和监察只能够落在公认的伟大人物身上。敌对者反对伊拉斯谟,把宗教改革的一切弊端全都算在他的头上,他们反对伊拉斯谟的大合唱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下蛋,路德和茨温利孵鸡。”伊拉斯谟以厌恶的心情继续引证对手心胸狭隘、满怀恶意和愚不可及的言论。康士坦茨^①有一位医生把伊拉斯谟的画像钉在墙上,每次路过时都向这幅画像吐口水。伊拉斯谟以戏谑的口吻把自己的命运比作被弟子乱棍打死的圣加西安^②。多年来,无数人对他伊拉斯谟口诛笔伐,难道不是像刀扎一样令他心痛吗?他不是生活在这样的折磨中但死亡却姗姗迟来吗?对批判的极其敏感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他总是禁不住要刺激人、使人反对他。

169

① 康士坦茨湖(Constance),瑞士、德国和奥地利交界的地区。

② 圣加西安(Saint John Cassian,约360—433),罗马人后裔,基督教教士,早期异端人物,活跃在东罗马教会和西罗马教会,在法国马赛附近创建埃及式的修道院。

第十九章 与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的舌战

→1528—1529

反对过火的人文主义；反对异教信仰和迂腐古典主义——《论西塞罗的语言》：1528——《论西塞罗的语言》使他遭遇新的对手——巴塞尔地区的宗教改革——移居弗赖堡：1529——对宗教改革结果的看法

170

在风起云涌的各种运动中，伊拉斯谟还是为自己留下了独立的一席之地，但他也和人文主义者争辩，这是他独立性的最重要的特征。1528年，弗洛本刊布了伊拉斯谟两篇对话的合订本。一篇对话论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发音，另一篇题名《论西塞罗的语言》(Ciceronianus)，亦名《最佳的炼词》(On the Best Diction)，所论均为拉丁语的写作和会话。两篇对话都说明，伊拉斯谟活泼风趣的文风不减当年。第一篇讲的是纯哲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二篇是讽刺文。这本书说来话长。

伊拉斯谟总是把古典研究当作文明的万能药方，条件是古典研究服务于纯洁的基督教。他真诚的伦理感情使他远离波焦(Poggio Baracciolini)的色情和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不道德倾向。与此同时，他那纤细自然的品味又使他明白，酸腐而奴性地模仿古典模式绝不能产生模仿者渴望得到的结果。他的拉丁文造诣很深，不可能去写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作品，他的拉丁文是生动活泼的，它需要自由洒脱。在他的早期著作里，我们看

见他嘲笑拉丁纯洁主义者过分精确的追求。他在一篇文章里宣告,西塞罗一个残篇的文风是狂放不羁的,于是他说:“在所有的古典作者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种亦步亦趋地模仿西塞罗的文风。”

他珍惜古典研究,对古典研究为纯洁基督教做出贡献寄予莫大的期望。然而他看见了一种危险:“在复活古典文献的外衣下,异教信仰企图重新抬头,在基督徒中,有人名义上承认基督,内心发出的却是异教的信仰。”这是他1517年致卡皮托信里说的话。意大利学者太唯我独尊,他们的异教伪装太明显,所以他们的成果不可能是“典雅的文学”。他认为自己有特殊的责任实现古典研究的目标:“意大利人迄今的古典研究几乎就是异教的信仰,我要让他们习惯于述说基督。”

171

在此期间,意大利人竟然异口同声、气急败坏地指控他伊拉斯谟搞异端,怀疑他堂堂学者的知识和品德。况且,指控他的不是其他国家,偏偏是意大利,这使他不胜恼怒。意大利人还指控他剽窃和欺骗。他致信阿里安达发泄不满,他认为阿里安达参与了对他的指控。

1527年10月13日,伊拉斯谟致信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位教授。在这封信里,我们发现他所谓的西塞罗似的粗野文风。他抨击对他为正统信仰而从事古典研究的敌视态度,此外他又指出,“近来,另一种敌人从他们埋伏的地方跳出来了。对高尚文学讲述的基督,他们感到不安,仿佛唯有异教的文学才能够是优雅的文学。他们似乎觉得,朱庇特至大无比的声音比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声音更加悦耳动听,早期牧师的著作比使徒传下的圣言更加悦耳动听……他们认为非西塞罗的风格比非基督徒的信仰更加让人丢脸,仿佛是说,倘若西塞罗再世,他只会用他那个时代的话说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说基督教的事情!……这种盗用西塞罗名义充满仇恨的狂言是什么意思呢?让我长话短说,你听一听。他们给异教信仰涂脂抹粉,对他们而言,异教信仰比基督的荣光更加亲切”。伊拉斯谟认为,西塞罗的风格绝不是理想的风格。他喜欢的风格是更加厚重、扼要、有力、较少虚饰、更加雄健的风格。有的时候,伊拉斯谟不得不

一天之内写一本书，他没有时间打磨他的文风，常常甚至没有时间去读一遍……“我怎么会喜欢空空如也的餐盘里，就搁着那么十来个从西塞罗那里窃取来的词语呢？我想要的是西塞罗的精神。”这些人是他嘲笑的模仿者，比这些事情更加严重的是甚嚣尘上的所谓新福音，信里接着说的就是新福音。

于是，就在论战和自辩中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伊拉斯谟又忙里偷闲，放飞了他对嘲讽的喜爱。不过，正如《愚人颂》和《对话集》一样，他的嘲讽是升华后的崇高的嘲讽，升华的力量来自于基督徒天性里那种富有激情的真诚，来自于他那天赋的对韵律的感觉。《论西塞罗的语言》出手不凡，那雄奇的辩才一泻千里，知识渊博、说服力强，那高屋建瓴、驾轻就熟的论点真令人目不暇接。艳丽、文静而活泼的气息在那长篇会话中自由流淌，其中的人物是布勒佛卢斯（Bulephorus）、希波洛格斯（Hypologus）、诺梭波努斯（Nosoponus），布勒佛卢斯代表伊拉斯谟的意见，希波洛格斯是饶有兴致的拷问者，诺梭波努斯是热情洋溢的西塞罗；为了确保脑子完美的纯净，西塞罗常常只以 10 颗葡萄当早餐。

伊拉斯谟笔下的诺梭波努斯显然代表那位再也不能回答他问题的人：克里斯托夫·隆格利乌斯（Christopher Longolius），他已经于 1522 年去世。

在《论西塞罗的语言》里，伊拉斯谟指出过分热情的古典主义会危害基督教信仰，这就是该书的核心。他以急迫的口吻宣告：“相信我，诺梭波努斯，在诸如此类的事情里，异教信仰使我们的耳朵和灵魂着迷。我们成了名义上的基督徒。”一句古典格言怎么会比《圣经》引语更加动听呢？“菜地里的卷耳草”怎么会比“先知中的扫罗^①王”更加动听呢？为了显示所谓西塞罗主义的荒谬，他把古代语言一句教条十足的话翻译成拉丁文：“Optimi maximique Jovis interpres ac filius, sevator, rex, juxta vatum responsa,

① 扫罗（Saul），以色列第一位国王，保卫以色列，抵御了无数外敌，其继位者是大卫王。

ex Olympo devolavit in terras.”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永恒圣父的圣言和圣子，依照先知的预言来到人世。”实际上，大多数人文主义者的文字风格就是这种叠床架屋的风格。

伊拉斯谟是否意识到，他在这里抨击的正是他的过去吗？毕竟，他曾经把逻格斯(Logos)翻译成交谈(Sermo)而不是言语(Verbum)，使对手义愤填膺。难道他过去不正是这样做的吗？难道他不曾渴望纠正教堂里赞美诗的韵律吗？难道他那些古典的颂词、对圣母玛利亚和圣人的讴歌不是更加彰显了古典主义吗？他在《论西塞罗的语言》里对偏爱古典箴言警句提出的警告，难道不能够用来分析他在《格言集》里表现出来的风格吗？

173

我们在这里看见苍老的伊拉斯谟踏上了回头路，这条路可能最终会把他引向远离人文主义的终点。在反对人文主义里的纯洁主义时，他预示了基督教清教主义的来临。

《论西塞罗的语言》的讥讽一如既往地遭到洪水泛滥般的谩骂。红衣主教普里特洛·本波^①和保罗·萨多雷这样的拉丁文大师可以会心一笑，但急躁的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哲^②却对他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斯卡利哲特别要为隆格利乌斯报仇。于是，伊拉斯谟受迫害的感觉又有了新的食粮：他认为这又是阿里安达在背后作怪。1530年，他写过一句话：“意大利人把帝国的宫廷挑动起来攻击我。”但一年以后一切又恢复平静。他又以戏谑的口吻写道：“相信我，我要放弃类似布多伊斯那样的文风，改为萨多雷和本波那种西塞罗似的文风。”然而，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还不得不与意大利人展开新的论战，因为他刺伤了意大利人的民族豪

① 普里特洛·本波(Pietro Bembo, 1470—1547)，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红衣主教、美第奇家族宠臣，曾任教皇利奥十世秘书，固守古典传统，编纂彼特拉克和但丁的著作，著有《威尼斯历史》、《通俗拉丁语散文》等。

② 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哲(Julius Caesar Scaliger, 1484—1558)，意大利古典学者、医生，移居法国，以科普和哲学著作闻名，代表作有《植物论》、《论拉丁语》、《诗论》等。

情；“他们用诽谤的标签从四面八方向我发起攻击，仿佛我是意大利和西塞罗的敌人”。

正如伊拉斯谟所云，对他影响更大的还有其他困难。巴塞尔局势的走向使他感到压抑和惊惧。1521年他到这里定居时，巴塞尔主教乌藤海姆的克里斯托夫非常佩服他，又很合他的心意。主教似乎能够推行伊拉斯谟希望的改革，似乎能够根除公认的弊端，却又能够维持教会既定的框架。然而就在那一年，巴塞尔市脱离了克里斯托夫主教的统辖，加入了瑞士联邦；这个进程开始于1501年，到1521年最后完成了。自此，市议会成了老大，而且其议员又不仅是贵族。克里斯托夫主教联合康士坦茨和洛桑的同事以便维持天主教主导的局面。在巴塞尔城里，新教逐渐占据上风。到1525年，新教公开发起骚动，反对天主教，市议会更加小心谨慎，试图推行改革时就更加小心翼翼了。

厄科兰巴丢也渴望新教占据上风的局面。他和伊拉斯谟的关系遭遇危险。过去，伊拉斯谟的思想曾经在这位冲动、敏感和焦躁的年轻人的头脑里占上风。1520年，他突然到一所修道院寻求庇护时，曾经明确宣告倾向伊拉斯谟，谴责修道院里束缚修士的誓约。如今到1522年，他们两人在巴塞尔相会了：厄科兰巴丢离开了修道院，成了虔诚的新教徒和传道的使徒，而伊拉斯谟仍然渴望紧守自己的旁观者身份。伊拉斯谟冷对昔日的同事，厄科兰巴丢不断前进，伊拉斯谟不断后退。然而他还是坚持走中间道路，到1525年，他还给市议会提出一些温和的建议，那时的市议会又越来越明显地回归天主教了。

老主教克里斯托夫已经多年不在巴塞尔居住。1527年，他请求教士会议同意他辞职，不久他就去世了。此后，事变不断，风起云涌。1528年，伯尔尼改宗新教，厄科兰巴丢也要求巴塞尔做出决定。自1528年底起，巴塞尔就处在内战的边缘。大规模的造反打垮了市议会的抵抗，天主教议员被踢出市议会。次年3月，天主教仪式被禁止，圣像被清除，修道院

被关闭,大学停止招生。厄科兰巴丢成为第一位新教牧师和巴塞尔教会领袖。他迅速为教会制定了改革法,新主教不到巴塞尔,而是留在波伦特路伊,教士会议迁往弗赖堡。

伊拉斯谟离别巴塞尔的时刻来到了。1529年他在巴塞尔的处境类似于1521年在卢万的处境,但情况刚好颠倒过来。在卢万的时候,天主教徒需要利用他,如今在巴塞尔,新教徒很乐意让他留在巴塞尔。这是因为他的名字仍然是一面旗帜。如果他留在巴塞尔,他能够加强宗教改革后的巴塞尔,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人们的推理是,倘若他不赞成改革派的意见,他早就离开了;另一方面他的形象似乎能够确保温和的气氛,还可能因此而吸引许多举棋不定的人。

175

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独立,伊拉斯谟再次迁居。这一次离别很痛苦。老态龙钟,疾病缠身,昔日急躁不安的伊拉斯谟成了如今足不出户的伊拉斯谟。他预计会遭到市议会制造的麻烦,于是就请阿克杜克·斐迪南^①给他颁发一张在整个帝国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以确保安全,同时请他发来斐迪南宫廷的邀请函,虽然他并不梦想得到这样的邀请;查理五世的兄弟管辖德意志帝国,他刚刚在斯派尔^②主持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伊拉斯谟选择布赖斯高^③地区的弗赖堡,因为弗赖堡离巴塞尔不远,而且直属奥地利皇室,治理严格,他不用担心遭遇到巴塞尔那种急转弯的时势。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德意志帝国的权威和天主教似乎在重新迅速

① 阿克杜克·斐迪南(Archduke Ferdinand, 1503—1564),即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58—1564),领有奥地利,执行其兄查理五世的政策,反对新教,1555年签署奥格斯堡合约,承认各邦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从而给德意志的敌对宗教派别带来半个世纪的和平。即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他把哈布斯堡王室的领土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

② 斯派尔(Speyer),德国西南部城市。

③ 布赖斯高(Breisgau),历史地名,德国西南部,现属巴登地区,含弗赖堡。

发展壮大。

伊拉斯谟不愿意也不可能对他的离别保密。他事先把最珍贵的东西送走,从而引起人们注意他的动向,此时他索性邀请厄科兰巴丢来进行话别。这位改革家宣示他真诚的友谊,伊拉斯谟并不反对维护两人的友情,但有一个条件,厄科兰巴丢要让他教义上保留不同意见。厄科兰巴丢劝他不要离开巴塞尔,看到不可挽回时又劝说他以后返回巴塞尔。然后两人握手道别。伊拉斯谟原来准备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登船,但市议会不同意:一定要他在莱茵桥附近人们通常使用的码头登船。于是,1529年4月13日,一大群巴塞尔人目送他登船离别。有些朋友来送行,令人不快的游行示威之类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176 弗赖堡对他的欢迎使他相信,虽然时移事异,他还是文学之王。市议会会让伊拉斯谟住进专为马克西米连皇帝建造的即将完工的行宫;一位神学教授请伊拉斯谟住进他家的花园。安东尼·富格尔试图用年度津贴的优待请他去奥格斯堡。但从其他因素来看,他认为弗赖堡绝非永久居留之地。“我决定今年冬天暂住弗赖堡,然后与候鸟一道飞到上帝召唤我的地方去。”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弗赖堡的最大优势。气候比他预料的要好,而他对气候是极其敏感的;而且弗赖堡城的位置极其便利,万一需要,他可以从这里移居法国,或沿莱茵河而下回到低地国家,那里有许多人随时在召唤他回乡。1531年,他在弗赖堡购置了一幢住房。

到弗赖堡以后,病痛使年迈的伊拉斯谟更加痛苦,此时的伊拉斯谟比1521年在卢万时的伊拉斯谟更加感到幻灭,他对基督教这场大斗争的观点更加坚定了。艾伦博士精心编辑的《伊拉斯谟书简》充分揭示了他在弗赖堡的生活;其中有一封他给巴塞尔老朋友波尼法齐乌斯·阿梅尔巴赫(Bonifacius Amerbach)的信,这是旧版《伊拉斯谟书简》未曾收录的书信。这些年的通信比哪一个时期的通信都更能够揭示伊拉斯谟日常的所思所想。在这位伟大学者的“作坊”里,工作不舍昼夜,他指导助手,助手为他搜寻、誊写和检查古代手稿。从这个作坊里送出的书信遍布欧洲。早期

教士的著作系列是巴塞尔时期工作的继续,克里索斯托姆和西普里安著作的新版本问世,古典作家的编订本里又添加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话集》又出了三个增订本,《格言集》和《新约圣经》又再版了一次。论道德或政治—神学的著作也不断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

此间,他比较远离宗教改革。他用蔑视的口吻说宗教改革是“假的福音主义”。1528年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也许我能够担任路德教会合唱队的领唱吧。我宁可遭到全体德国人的仇恨,也不愿意离开教会这个共同体。”教会权威人士起初本来应该少注意路德的一举一动,如果是那样,他点燃的烈火就不会烧得这么旺了。伊拉斯谟始终敦请神学家们对表面上虔诚的小问题弃之不顾,把注意力转向《圣经》的源头。现在已经太晚,火已经烧得太旺。城市和国家都结队站在某一边,支持或反对宗教改革。1530年,他致信萨多雷说:“但愿我祈祷避免的局面永远不会发生。如果你看到可怕的乱局发生,如果这致命的打击首先是针对教会的而不是针对德国的,请记住,我伊拉斯谟已经做过这样的预言。”他经常对庇突斯·雷纳努斯说,如果他早知道这样混乱的时代快要来临,他就不会写这么多书,甚至根本就不会写书了。

177

他颇为感慨地问道:“看那些福音派教徒,他们变得更好了吗?他们面对奢侈品、淫欲和贪欲的诱惑比别人坚强吗?告诉我,福音书把谁从酒鬼变成了滴酒不沾的人,把谁从暴躁的蛮牛变成了文雅的君子,把谁从吝啬鬼变成了慷慨的人,把谁从厚颜无耻的人变成了贞节自重的人。我可以让你看许多变坏了的人。”此时,他们把上帝的形象扔出了教堂,废除了弥撒(他心中想到的尤其是巴塞尔发生的变化),结果是否产生了更好的东西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的教堂,但我看见过他们听完布道回家时的表情,他们仿佛是有幽灵附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愤怒和凶狠;我和一些身份高贵的人擦肩而过时,除了一位老人之外,谁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和我打招呼。”

他讨厌改革派身上那种绝对自信的神情。“茨温利和布泽尔^①也许会受到圣灵的激励,伊拉斯谟只不过是一位凡人,弄不懂他们所谓的圣灵为何物。”

178 伊拉斯谟内心对改革派里的一群人感觉比较亲近,超过了他对路德派和茨温利派的感情,路德派和茨温利派的教义很僵硬。他比较亲近的是再洗礼派教徒。但伊拉斯谟拒绝再洗礼派鼓吹的“再洗礼”名称由来的教义,讨厌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始终是精神上讲究礼貌得体的人,不可能和这些非常规的信徒打成一片。然而,他并不无视这些人道德追求的真诚,对他们厌恶暴力、忍受迫害的耐心寄予同情。1529年伊拉斯谟写道:“在生活的纯洁上,再洗礼派受到的赞誉超过了任何人。”可是在伊拉斯谟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却爆发了疯狂的再洗礼派教徒的暴力革命;伊拉斯谟谈到这次革命时,唯一的感受就是极端的痛恨,这是毫无疑问的。

宗教改革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沃尔特·柯勒(Walter Kohler)把伊拉斯谟称为再洗礼教派的精神之父。再洗礼教在后期崇尚和平的发展阶段,的确和伊拉斯谟有许多共同之处:承认自由意志,某种程度的理性主义倾向,讨厌排他性的教会观念。德国南部再洗礼教派的汉斯·登克(Hans Denk)的一些思想直接来自于伊拉斯谟,看来是可以证明的。然而,再洗礼派教派很大一部分思想建立在低地国家独特的宗教意识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低地国家是伊拉斯谟的故乡,再洗礼教在这里找到了肥田沃土。伊拉斯谟一直未能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

下面这一段文字说明,伊拉斯谟对新旧教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① 马丁·布泽尔(Marin Bucer,1491—1551),法兰西基督教新教改革家,初入多明我会,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求学,受伊拉斯谟和路德影响,1523年被天主教会处以绝罚,入新教,主张因信称义,希望路德和茨温利在圣餐礼上和解,主张比较温和的改革。

过去他经常责备提倡保守主义的人,认为他们敌视并想要窒息他非常钟爱的典雅的文学。如今,他用高尚文学来反对激进的福音派教徒。“凡是路德派得势的地方,文学研究都被扑灭。”接着他用令人惊叹的智辩者策略质问:“路德和梅兰希顿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回头去热爱文学,除此之外,他们为何不做其他的事情呢?”“请把维滕贝格大学和卢万大学或巴黎大学做一番比较!……印刷商们说,路德和梅兰希顿的福音到来之前,他们销售3000册书也比现在销售600册书来得快。这是学术繁荣最好不过的佐证!”

第二十章 晚年

宗教和政治反差日益鲜明——德国即将来临的斗争暂时停顿——伊拉斯谟完成他的《论布道艺术》——费希尔与莫尔殉难——返回巴塞尔：1935——教皇保罗三世想要他撰文支持公会议的召开——伊拉斯谟婉拒教皇的恩宠——《论基督教会的纯洁》——终结：1536年7月12日

179

在伊拉斯谟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使世人心悬一线的重大问题迅速以势如累卵的形式出现。曾经看上去可能实现妥协和统一的地方，突然冒出了尖锐的冲突、界限分明的派别分野、束缚人的仪式，事态的变化堵住了和平的道路。在伊拉斯谟准备离开巴塞尔的1529年，斯派尔市议会里强大的天主教多数派在1526年“休会”以后，势力受挫，福音派得势，其中的路德派议员保住了他们得到的议席；于是福音派就使市议会通过决议，禁止进一步的变革或举措。决议不允许茨温利派和再洗礼派享受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宽容。这一举措立即遭到主要的福音派王公和城市的抗议，从此以后（1529年4月19日），一切反对天主教的教派都被统称为“抗议宗”，即新教。在帝国内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完全决裂随之产生。不仅如此，尚未等到年底，即使在新教内部，围绕主的晚餐产生的分歧就已经形成了茨温利派和路德派之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马格堡会议

上,路德与茨温利分手,路德说,“你们的精神和我们不一样”。

在瑞士,天主教派和福音教派之间的内战爆发,仅仅在卡佩尔之战和解后恢复过短暂的平静。1529年坎布雷和巴塞罗纳的和约暂时恢复了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和平,但这样的和约再也不能使年迈的伊拉斯谟欢欣鼓舞了,再也不会使他梦想黄金时代的来临。1516年的和解激发他梦想的局面再也不可能出现了。这两个和约签署之后一个月,土耳其人就打到了维也纳。

180

这一切事变不能不使伊拉斯谟感到压抑和震惊,但他置身事外。阅读他这段时间的通信时,我们得到的印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尽管他思路广阔、思想活跃,但他远离时代的重大事变。在某些兴趣范围之外,当他触摸到自己的思想或人格时,他的感知是模糊不清、并不可靠的。如果说他偶尔参与当时的论争,他也是用道德教谕方式提出问题,一般借用空泛的议论,并不突出任何重点:《关于对土耳其人宣战》(Advice about declaring war on the Turks,1530年3月)是用解释《诗篇》第28首的形式写成的,而且其态度并不鲜明;文章结尾时他本人预料,读者禁不住会问:“请你说清楚:你认为应不应该宣战?”

1530年夏天,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在奥格斯堡再次召开,由皇帝亲自主持,会议试图“实现美好的和平,求得基督教真理”。梅兰希顿宣读《奥格斯堡信纲》^①,将其提交会议审查辩论,但梅兰希顿的捍卫辞虚弱无力,于是皇帝宣布信纲无效。

伊拉斯谟一概不予理睬。许多人写信敦促他去奥格斯堡;他指望皇帝亲自召唤,却空等一场。他接受皇帝谋士的建议,把迁居布拉邦的时间推迟到秋天,等到奥格斯堡会议以后再做决定。然而,皇帝在11月宣布

^① 《奥格斯堡信纲》(Augsburg Confession),基督教路德宗的信仰纲要,执笔人梅兰希顿,共二十八条,1530年6月在奥格斯堡会议上宣读,被帝国议会和教皇本人否决。

会议结束时做出的决定是坚决压制新教，因此伊拉斯谟的效劳就用不着了。

德国的大战山雨欲来：奥格斯堡决议之后，所有新教的地区和城镇团结起来，组建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Shemalkalden League*），以联手反对皇帝。同年（1531），茨温利在与天主教教区盟军的卡佩尔战役中阵亡。不久，厄科兰巴丢在巴塞战斗战斗中阵亡。伊拉斯谟写道：“那两位首领死亡，死得正好。倘若战神马尔斯偏爱他们，我们就完蛋了。”

瑞士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无论如何，各种事端是停顿了。在德国，难以避免的斗争推迟了许多年。皇帝本人清楚，为了有效地和新教斗争，他首先要让教皇亲自主持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以清除公认的教会弊端。纽伦堡会议实现的宗教和平（1532），完成了帝国的政策转向。

事态的发展似乎出现了这样一个走向：不久，主张温和改革和妥协的人可能会有机会说话。但伊拉斯谟年老体弱，不可能积极参与决策（倘若他认真考虑积极参与的话）。不错，他1533年写了一篇文章《论教会的和睦》（*On the sweet concord of the Church*），但就像《关于对土耳其人宣战》一样，这篇文章也是用解释《诗篇》第83首的形式写成的。看起来，他那白璧无瑕、活泼轻快的文风和强大的表现力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句话也适用于他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论准备死神的来临》（*On the preparation for death*）。他的声音越来越虚弱了。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完成伟大的著述《论布道艺术》（*Ecclesiastes*）上。在他看来，这部著作最能够代表他的思想，是他道德—神学思想的总览和完整的阐述。他始终认为，布道是神职人员最庄重的任务。他最尊重的布道者是科利特和维特拉利乌斯（*Vitrarius*）。早在1519年，波尔斯林的约翰·贝卡尔（*John Becar of Borselen*）就敦请他一气呵成，乘着《基督徒士兵须知》和《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的余威，再写一本书论述基督教牧师传授的真正的教义。伊拉斯谟总是允诺这位朋友说：“稍后，稍后，目前事情太多，我希望不久有时间写这本书。”1523年，他拟定了提

纲并准备了笔记。这本书是为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写的,费希尔是他的挚友,与他情同手足,热切地期待他早日完成手稿。手稿的容量逐渐增加,最终成为他部头最大的原创性著作:“浩瀚的森林”,这是他自己给《论布道艺术》一书的称呼。该书共4卷,详细论述布道的艺术,思想精湛,装饰精美,例证、插图、图表宏富。然而这本书是1519年构思的,虽然他花了大量的精力,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他逐渐丧失早年的胆略之后,这本书还能够成为1533年的《启示录》吗?还能够像当年的《基督徒士兵须知》那样锐气逼人吗?

182

《论布道艺术》是精神疲惫之作,它再也不能对时代需求做出敏锐的回应。伊拉斯谟期待,以恰当方式布道而灌输的正确的、富有思想而美味可口的教导,符合福音书纯洁性的教导,将会使社会越来越好。“人民更顺从权威,更敬畏法律,更平和安静;夫妻更加和睦,更加忠诚,更加讨厌偷情;仆人更加甘愿顺从,工匠更加工艺精湛,商人更是童叟无欺。”

伊拉斯谟把这本书交给巴塞尔的弗洛本刊印。与此同时,一位法国年轻人委托巴塞尔的出版商托马斯·普拉特(Thomas Platter)印行了一本书,这就是加尔文所著的《基督教原理》(*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也是论信仰生活的书。

伊拉斯谟的《论布道艺术》尚未杀青,他准备奉献这本书的对象却已经不在人世。他再也不能把书献给罗彻斯特的主教约翰·费希尔了,于是就把书献给奥格斯堡的主教斯特拉迪恩的克里斯托夫。约翰·费希尔和伊拉斯谟有许多相似之处,费希尔给自己的精神追求做了一个盖棺定论,他给世人的证词是殉道精神;伊拉斯谟深知自己软弱,不具备费希尔的殉难精神。1535年6月22日,费希尔被亨利八世送上断头台。他因为忠诚于天主教会而殉难。他和莫尔一道坚定不移地拒绝宣示效忠国教优先条例(Statute of Supremacy)。费希尔殉难之后两个星期,托马斯·莫尔也走上断头台。这两位贵族朋友的命运使他深感悲痛,使他动用他多年

183

不再表现的诗才。但人们需要听到的不是《英雄赞歌》(*Carmen heroicum*)里那优美的拉丁文韵律,而是想要听见他书信里真诚的震惊与义愤。可他的书信里几乎不见哀伤的情感。在《论布道艺术》的前言里,他献给费希尔的话并没有表现出真诚的情感。此外,在那些日子的书信里,他说的话是比较含蓄的。“但愿莫尔没有参与那危险的事情,但愿他把神学留给了神学家。”这样的语气仿佛是说莫尔白死了,他仅仅是为了他的良心去慷慨赴死!

伊拉斯谟写这些话时已经不在弗赖堡。他已经于1535年6月去巴塞尔,一如既往地到弗洛本的印刷所去工作。《论布道艺术》终于开印了,需要仔细督察,也需要画龙点睛般的润色。《格言集》必须要重印;奥利金^①的文集需要准备。巴塞尔许多健在的朋友热情欢迎年老多病的伊拉斯谟。老弗洛本的儿子海罗尼姆斯·弗洛本(Hieronymus Froben)继承了家业,与两位亲戚合作。小弗洛本请他在家里安居。为他新修的专用住房,早就准备好了,装修符合他的胃口,一切为了他使用方便,因为他们一直在指望伊拉斯谟回去。伊拉斯谟发现,巴塞尔赶走他的基督教改革风暴已经平息。平静和秩序已经恢复。诚然,他仍然感觉到有那么一点不信任的气氛,“不过我想由于我的年纪、习惯和一点学问,我现在已经到了无论哪里都安全的境地了”。起初,他把前往巴塞尔当作初步的尝试,并没有想在此安居。如果他的身体无法适应这次迁移,他就回到弗赖堡那幢精巧玲珑、设备齐全、舒适惬意的住宅。如果他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剩下的可能性就是在低地国家(可能是布鲁塞尔、马林斯、安特卫普或卢万)和勃艮第之间进行选择,尤其是勃艮第的贝桑松。在生命的末期,他始终坚信长期误认为真实的幻觉:唯有勃艮第酒才有益于他的健康,能够

184

① 奥利金(Origene, ? —?), 基督教神学家, 活跃于3世纪, 试图根据《圣经》和柏拉图的路子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督教哲学。

控制住他的小毛病。酒这个问题上的一丝哀愁逐渐被放大：即使勃艮第酒在巴塞尔非常昂贵，他也满不介意过高的价格；可惜那些毛贼似的马车夫把进口酒喝光了，也把酒糟蹋了。

到8月份时，他已经在怀疑自己是否还要返回弗赖堡了。10月份，他卖掉弗赖堡的住宅和部分家具，把其余的家具运到巴塞尔。夏天一过，他就足不出户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卧床。

他那狂热工作的劲头仍然使他渴望多活几年，再工作几年，但他的灵魂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他一生从来就不曾感到幸福，但只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才明确表示渴望那个终点。奇怪的是，他仍然生活在激烈斗争风口浪尖的幻觉中。1533年他写道：“我将倒在这个疆场上。只有这样的结局才能够使我得到安慰，普天同庆的避难所就在眼前，如果上帝施恩，这将结束一切辛劳和苦难。”两年以后，他的语气似乎更加紧迫了：“上帝会施恩，会召唤我脱离这个混乱的世界，到他的身旁去安息。”

他的大多数朋友业已撒手人寰。沃拉姆和蒙特伊走在莫尔和费希尔的前头；比他年轻得多的彼得·吉尔斯已经在1533年去世；皮尔克海默（Pirckheimer）已经去世好几年。庇突斯·雷纳努斯曾描绘过伊拉斯谟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情景。他翻来覆去阅读几年里朋友们的来信，喃喃自语：“这一位也死了。”他越来越孤独，受迫害的猜疑也越来越强烈。1532年，沃拉姆去世之后，亚里安达的地位上升，他写道：“我的朋友在减少，我的敌人在增加。”到1535年秋天，他认为，昔日随侍左右的学生都背叛他了，连他最宠爱的学生基林·塔里西乌斯（Quirin Talesius）和查理·乌滕霍夫（Charles Utenhove）都背叛他了，他抱怨学生都不写信。

1534年10月，教皇克莱芒七世驾崩，保罗三世继位。保罗三世立即热情地推动公会议的问题，在许多人的眼里，公会议是唯一能够恢复教会

他同时又请教皇走中间路线。5月31日，教皇回信表示答谢，语气亲切。教皇对伊拉斯谟提出忠告：“上帝赋予你如此之多的令人称道的才能和学问，你也可以在这一虔诚的事业中助我们一臂之力；你在会前会后都可以用讲话和文字表达虔诚的愿望，和我们一道捍卫天主教的信仰，你可以凭借这最后一搏完成人生最好的结局；正如你选择宗教生活和著书立说一样，你可以驳倒指责你的人，可以激发仰慕者做出新的努力。”

在精力比较好的岁月里，伊拉斯谟能够找到与天主教领袖们的公会议积极合作的道路吗？毫无疑问，教皇的规劝正好表达了他的思想倾向。然而，一旦面临不得不做出严峻而清晰的决断时，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他那和睦与宽容、保守与妥协的精神能够缓解局势、避免即将来临的斗争吗？他没有机会去进行试验。

他知道自己太虚弱，已经无力再去思考吃力的教会—政治宣传。不久传来明确的证据，罗马的友好感情是真诚的。也有人考虑提名伊拉斯谟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被任命为红衣主教；教廷已经施恩授予他德文特教会的牧师薪俸。不过，伊拉斯谟请罗马的朋友们停止积极为他张罗的种种奖赏；他什么也不期待，他哪一天都可能撒手人寰，而且他自己还常常希望这一天来临，他已经困于卧室，难以下床了——人们竟然怂恿他去猎取教区职务和红衣主教的职位！他已经拥有足够的资产维持生活。他
186 想在精神独立的情况下去世。

然而，他的笔永远不会休息。《论布道艺术》已经出版发行，《奥利金文集》(Origenes)尚在编订。他最后一丝力气完成的这本书不是奉献给罗马，不是献给召唤他去完成重要而光辉业绩的罗马，而是献给一位朴实的友人。享受到这一份荣誉的朋友是对他没有丧失信赖的、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这个人既不是高级教士或君主，也不是伟大的智者或令人敬仰的神职人员，而是莱茵河波帕德海关的一位普通关员，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夫·埃森菲尔德(Christopher Eschenfelder)。1518年，伊拉斯谟过海

关时惊喜地发现他在读自己的书,且颇有文化修养。^① 他们的友谊经久不衰。埃森菲尔德请伊拉斯谟把一些《诗篇》的解释献给他(这是那些年里伊拉斯谟喜欢使用的一种撰写方式)。大约在1535年底,他想到了埃森菲尔德的请求。他忘记了埃森菲尔德是否表示过想要哪一首,于是就信手选中了《诗篇》第14首,将文章命名为《论基督教会的纯洁》(On the purit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1536年1月,他把文章献给“税务关员”。在他的著作中,这篇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这是他最后一件作品。

1536年2月12日,伊拉斯谟为人生做了最后的准备。早在1527年,他已经立下详细的遗嘱,委托弗洛本印行他的全集。1534年,他准备了一个详细的财产清单。他把自己的藏书卖给波兰贵族约翰·拉斯科(Johannes a Lasco)。1536年的遗嘱证明,有两件事情在他的生活中至关重要:一是他与弗洛本家族的关系,一是他需要友谊。波尼法齐乌斯·阿梅尔巴赫是他的遗产继承人,海罗尼姆斯·弗洛本和尼古拉斯·埃皮斯科皮乌斯(Nicholas Episcopus)是遗嘱执行人。他给每一位好朋友都送了一件小饰品,这些小饰品诉说着他与君主和世界名人交往的名气,首先得到礼品的是路易·贝尔(louis Ber)和庇突斯·雷纳努斯。伊拉斯谟没有忘记穷人和病人,尤其记住即将出嫁的女孩子和有出息的年轻人。送礼的具体细节他留给阿梅尔巴赫安排。

187

1536年3月,他还在考虑去勃艮第。财务问题使他挂心;他说需要结交新朋友,因为老朋友离他而去:克拉科的主教(Bishop of Cracow)、弗赖堡的扎修斯(Zasius at Freiburg)。据庇突斯·雷纳努斯转述,把布拉邦作为临终栖息地的打算是他最大的心事。摄政者匈牙利的玛丽不停地敦请他回到低地国家。伊拉斯谟临终说的话使我们怀疑,他是否已经拿定主意。“在这里,我生活在真诚的朋友们中间,这是我不能在弗赖堡享受到

① 见本书伊拉斯谟书简13。——原注

的友谊，然而由于教义的分歧，我宁可在别的地方度过余生。如果布拉邦不那么远就好了。”

这是他1536年6月28日写下的话。他已经有几天感觉到很衰弱，甚至连看书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封信里，我们再次看到幻觉的痕迹：亚里安达在迫害他，在挑动反对者与他斗，甚至为他的朋友设置了陷阱。他的脑子在最后的日子里是否也很衰弱了？

7月12日是他临终的日子。围绕在他的卧榻周围的朋友们听见他不停地呻吟着说：“哦，耶稣，可怜可怜我；主啊，拯救我；主啊，可怜我！”最后一句话是用荷兰语说的：“上帝万岁。”

第二十一章 结语

结语——伊拉斯谟与 16 世纪的精神——伊拉斯谟的弱点——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和温和的头脑——百年启蒙者——他预见到两个世纪以后的倾向——他对新教和天主教的改革都产生了影响——伊拉斯谟精神在荷兰的影响

回头看伊拉斯谟的生平,免不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的形象一直如此高大?从表面上来看他最终失败了。他惊呼着从那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退场,他不失正确地把这场斗争叫做悲剧。16 世纪勇猛、激越,如雷鸣闪电,这个时代从他的身旁呼啸而过,鄙视他温和与宽容的理想。对他而言,拉丁学问是一切高尚文化的典范,但这样的学问已经风光不再。就他的大多数作品而言,伊拉斯谟身居伟大作家之林,但今天的人已经不再读他的书,他只剩下一个名字了。然而,为何这个名字竟然如此清丽、嘹亮呢?为什么他继续顾盼我们,仿佛他掌握的知识胜过他愿意说出口的话呢?

对他那个时代而言,伊拉斯谟是什么样的人呢?对后代而言,他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被称为现代精神的先驱妥当不妥当呢?

伊拉斯谟被视为16世纪的儿童，他的确和时代的主旨不合拍。他那个时代的伟人里有许多是情绪激荡、精力威猛、脾气暴躁的人；相比而言，伊拉斯谟很少抱任何偏见，他的品味太娇贵，有一点他所谓生活之必需的愚人的缺陷，当然他并非各方面都不足。伊拉斯谟性情太敏感、太温和，他不可能创造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

189 伊拉斯谟的调子和路德、加尔文、特蕾莎^①的调子别若泥云、令人吃惊！他的人文主义调子和阿尔布雷特·丢勒、米开朗琪罗^②、莎士比亚^③的调子又是多么迥然不同啊。

有的时候，伊拉斯谟似乎不够坚强，不适合他那个时代的要求。那个充满活力的世纪所需要的似乎是路德那种橡树一样坚韧的力量、加尔文那种钢铁般的意志、罗耀拉^④那种白热化的激情；时代需要的不是伊拉斯谟那种紫罗兰似的柔软。那一百年需要的不仅是他们那样的力量和热情，而且是他们那种深沉厚重、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始终如一、真诚坦荡和直率敢言的品格。

他们无法忍受伊拉斯谟那种微笑。路德说，伊拉斯谟的五官看上去显露出一一种诈笑。对他们而言，伊拉斯谟的虔诚太平和、太柔弱。罗耀拉说，读《基督徒士兵须知》使他的激情松弛，使他的奉献精神趋于冷却。他心目中的基督教勇士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勇士闪耀着西班牙基督徒的

① 圣特蕾莎 (Saint Teresa of Avila, 1515—1582)，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秘主义者，倡导加尔默罗会改革运动，在阿维拉创建圣约瑟女隐修院，著有《到达完美之路》、自传《生活》等。

② 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 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刻家、画家、建筑师、诗人、科学家，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③ 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和两首长诗，他的作品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④ 圣依纳爵罗耀拉 (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西班牙教士，原为军人，创立天主教耶稣会 (1534)，制定会规，强调绝对服从会长，无条件听命于教皇，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之一。

光辉,具有中世纪骑士的理想。

伊拉斯谟从来没有经历过路德那种自我谴责式的深刻反省,没有体会到那种原罪的意识,路德经过艰难的跋涉才得到这样的体会。伊拉斯谟看不见需要战胜的恶魔,眼泪不是他熟悉的感情。他对最深层的神秘完全没有觉察吗?或者是另一种情况:神秘体验在他的心灵深处埋藏太深,所以他说不出来吗?

请不要匆忙假设:我们今天的人更加接近路德或罗耀拉,因为他们的形象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果说我们钦佩热烈的信仰和精神上的极端主张,部分的原因是时代造成的:不稳定的时代需要强烈的刺激。为了正确评价伊拉斯谟,我们首先应该放弃对过头言行的钦佩;对许多人来说,这还比较费力。我们在批评伊拉斯谟时很容易用力过猛。他的不足袒露在表面,虽然他有许多事情需要掩盖,但他从来就没有掩盖过自己的弱点。

他太担心别人的想法,而他又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他的大脑活动太丰富、太流畅,总是流淌着太多的论点、案例、例证、引语。他绝不会让事情从脑子里溜走而不顾。毕其一生,他都舍不得休息以恢复精力;只要他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他就会看到,周围乱糟糟、闹嚷嚷的事情是多么的鸡毛蒜皮。心宁神静、精神独立是他最渴望的需要,谁也不像他那样难以平静,那样渴望独立。评价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位身体娇弱却勇闯风暴眼的人。他的意志力很强,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忍受着最钻心的疼痛,眼前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从来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不会自满自足。

190

伊拉斯谟属于那种人数很少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他们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彻底的温和派。他们难以忍受世界上不完美的东西,总是忍不住要表示反对。然而极端言行和他们的志趣不同;他们在行动面前退缩,因为他们知道,破的东西和立的东西可能会一样多。所以他们

虽然退守而不参与,却又不断呼吁一切都应该有所变化;然而一旦危机来临,他们又不太情愿地站到传统和保守一边。在这里,我们可以管窥伊拉斯谟生平的悲剧:他看见新生事物和即将来临的事物,而且比谁都看得清楚;他必然要和旧事物争吵,但他又不能够接受新事物。他破坏了旧教会,却又拒绝接受宗教改革,同时还试图留在旧教会里。他呕心沥血推进人文主义,却在某种程度上拒绝接受人文主义。

上述最后一点看法说的是伊拉斯谟的负面品格,那么他正面的积极意义何在呢?

两个事实使现代人难以理解伊拉斯谟的积极意义:首先,他的影响广阔但不深透,因此在具体的时间点上就不容易看清楚;第二,他的影响已经终止。他做了自己的工作,不会再对世人讲话。和他崇拜的圣哲罗姆一样,和偶尔被人称为的伏尔泰^①一样,“他已经得到报偿”。但和他们一样,他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一条宽阔的文化溪流从他那里流淌出来,不舍昼夜。

191

法国革命的历史研究获得了一种越来越清醒的意识:那段时期真正的法国史应该到那些“中间派”、“沼泽派”^②里去寻找,但长期以来中间派似乎是一群群多余的人;研究者必须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不要被吉伦特派^③的闪电和山岳派^④的雷暴刺伤了眼睛。由此可见,宗教改革的历史研究应该注意伊拉斯谟精神渗透到的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史学界注意到

①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专制,信奉洛克的经验论,著有《哲学书简》等。

② “沼泽派”(Marais),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里的中间派。

③ 吉伦特派(Gironde),法国大革命期间温和的共和主义派别,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

④ 山岳派(Mountain),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里的激进派议员集团,他们在开会时坐在议会中较高的长凳上,故名山岳派。

这个领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伊拉斯谟的一位反对者说得好：“路德把一大批教徒吸引到自己身边，茨温利和厄科兰巴丢也吸引了一批教徒，但伊拉斯谟却吸引了大多数基督教徒。”他吸引的公众人数既多，文化水平也高。在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中，他是唯一真正为所有人写作的人，当然这里所谓所有人指的是有文化的人。他让所有人习惯于一种更加流畅的表达方式。他改变了人们的兴趣，他的影响依靠他完美而明晰的文字表达，甚至是依靠他的拉丁文；他的著作被刊印了无数的译本，除此之外，他驾驭几种通俗语言的风格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你可以说，对同时代人而言，他在人类语言表达的这一台管风琴上确立了许多新的音调，就像卢梭两个世纪以后的成就一样。

伊拉斯谟蛮可以得意地思考自己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前，他写道：“每天都有许多人对我表示感谢，因为我的书激发了他们的兴趣，无论他们的长处是什么，他们的热情都投向了向善的人性和神圣的文学。那些人从未见过伊拉斯谟，然而由于读了他的书，他们了解并喜欢伊拉斯谟。”令他高兴的是，他从希腊语翻译的著作已经显得多余，因为他已经到处把读者引向直接阅读希腊文著作和《圣经》的道路。“否则，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去读这些希腊文的著作。”他担任的角色是介绍者和发起人。他把要说的话说完之后，他可以离开舞台了。

他传递的信息预示着对经典意义和《圣经》天命的超越。他率先阐述了教育原则和完美的信条，阐明了温暖的社会感情和信赖人性的原则，论述了平和善良与宽容的原理。“基督无处不在；只要善良的天性并不缺乏，每个人都在践行虔诚的信仰。”

192

伊拉斯谟的这一切思想和信念实际上预示着一个稍晚的时代。在16世纪和17世纪，他这些思想形成了一股潜流；到了18世纪，他释放的讯息开花结果了。在这个方面，他无疑是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铺路人，他为卢

梭、赫尔德^①、裴斯泰洛齐^②以及英国和美国思想家奠定了基础。当然，他的这一切思想只能够代表现代思想的一部分。对现代思想的许多方面，伊拉斯谟全然是门外汉；他对自然科学、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一无所知。他的理想是道德教谕和普世的宽容，只要人们仍然相信他这个理想，人类就应该对他心怀感激。

这并不是说，伊拉斯谟的思想没有直接而富有成效地影响他那个时代。诚然，天主教徒在狂热斗争中认为他败坏了教会，新教徒却认为他背叛了福音，但是双方都没有对他主张的温和与仁爱充耳不闻。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排斥他的意见。罗马并没有给他贴上首要异端的标签，只不过是要虔诚的教徒以小心提防的态度读他的书而已。新教历史学家始终用心研究他，把他当作改革者之一。这样的态度说明，双方都尊重公共舆论的宣示，这个舆论超越党派，继续钦佩和崇敬伊拉斯谟。

和天主教会的重建和福音教会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是路德和罗耀拉的名字。那些态度温和、思想新锐、主张调和的人也各有其贡献；梅兰希顿和萨多雷几乎是伊拉斯谟的同盟，他们同情伊拉斯谟。虽然他们可能注定要失败，但他们反复尝试在重大的宗教冲突中实现妥协，他们的动力都来自于伊拉斯谟的精神。

伊拉斯谟的精神最容易在生养他的土地上扎根。一个饶有趣味的巧合说明，他的精神并非宗教改革中对立双方专有的权利。他晚年最宠爱的两位弟子都是荷兰人，伊拉斯谟把两人写进一篇对话《接子游戏》(*As-tragalimus*)里，使两人成为不朽的人物。一位叫基林·塔里西乌斯，他死

① 约翰·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狂飙运动先驱，主要思想是总体主义、民主主义和历史主义，著有《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

② 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教育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天赋能力，著有《隐士夕话》等。

于对西班牙和天主教的忠诚：他是哈勒姆市的市长，被该市的市民处以绞刑。另一位是查理·乌滕霍夫，他坚定地站在反叛者和宗教改革一边。在比利时的根特，他和奥兰治王子携手反对心胸狭隘的狂热新教徒的恐怖行为。

前不久，一位荷兰历史学家把荷兰人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斗争追溯到伊拉斯谟政治思想的影响上，因为他责难君主们。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伊拉斯谟的政治批评太学究气，太泛泛而论，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反抗和反叛欲望的产生完全是另外的原因。那一批造反的“乞丐”并不是伊拉斯谟的后裔。他们的领袖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富有伊拉斯谟的气质，他眼界开阔，能够超越宗教仇恨的局限。由一批市政官组成的阶级浸透着伊拉斯谟的精神，他们很快就接过了造反者的领导权，并确立了新共和国的式样。就像对其他贵族阶级一样，历史倾向于对这批造反者的缺点吹毛求疵。毕竟，除了威尼斯的贵族以外，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像奥兰治贵族统治那么长时间的情况，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治理得那样井井有条，亦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很少诉诸暴力。倘若在外国人的眼里，17世纪的荷兰的社会制度令人钦佩，倘若它在繁荣、慈善、秩序的社会制度和文雅、智慧的行为模式方面令人佩服，那么无论这些制度和模式有多少缺陷，那一切的光荣都应该属于那一批市政贵族。如果在那个时代的荷兰贵族身上，上述的渴望的确存在并付诸了行动，那么激发这些渴望的就是伊拉斯谟主张的社会责任。荷兰的历史远不如周围各国的历史那样血腥和残忍。伊拉斯谟赞美的荷兰人的性格特征并没有白费力气，我们可以把他赞美的这些特征称为真正的伊拉斯谟的特征：文雅、和善、温和以及相当普及的中等文化水平。你可以说这些特质并不是很浪漫的美德，但它们因此就不那么值得赞扬吗？

再举一例。在七省联盟建立的尼德兰联合共和国时期，处死巫婆和男巫的暴行比其他国家早停止一百年。这并不归功于主张宗教改革的牧师，他们和一般人一样相信那种迫害异端的举动是需要的，而是要归功于

那些市政官员，他们在 17 世纪初就主张启蒙，他们不能容忍迫害巫师的暴行。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说，虽然伊拉斯谟不可能参与 17 世纪反对迫害巫师的行动，但其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显然是伊拉斯谟的精神。

文明开化的人类有理由珍惜并铭记伊拉斯谟。他热情而真诚地提倡人人和善的美德，即使只因为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怀念他，因为这个世界仍然急需这样的美德。

本书从伊拉斯谟卷帙浩繁的书信集里撷取 20 余封,意在从几个方面展示他奋力笔耕、寝食难安的生活。他操劳过度、病痛缠身,总是疲于奔命地应付数不尽的写作计划。许多信的结尾总是有“匆草”、“无暇读以上的文字”之类的附笔。终其一生,伊拉斯谟总是顽强地死守中间路线。在宗教问题上,他既反对旧传统的腐败和僵化,又反对新变革里那不妥协的暴力。在治学问题上,他既反对新的异端,又在虔诚的借口之下拒绝使用批判的方法去研究古典文本。这里选用的第一封信是为了提供线索,解读他一生犹疑不决的态度:每当某一事业似乎需要他献身时,他总是不太情愿相信自己的感觉。这种不太情愿明确承诺的态度被他的对手解释为拒绝“做出任何让步”,自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197

注释沿用 P. S. 艾伦和 H. M. 艾伦编辑的《伊拉斯谟书简》(*Opus epistolarum Des. Erasmi Roterodami*, Oxford, 1906—1947), 书信的编号也沿用这个版本的编号。承克拉伦顿(Clarendon)出版社授权使用以下书信,特此致谢。



书简1 致塞瓦提乌斯·罗杰^①

[斯泰恩修道院,约1484年]

致塞瓦提乌斯·罗杰,问好:

……你说有一件事让你很难受,折磨你,使生活成为灾难。虽然你没有说出口,但你的表情和体姿透露出你的痛苦。你那习惯性的、让人喜爱的、豁达的表情到哪里去啦?你那英俊的身姿、活泼的顾盼到哪里去啦?你那悲伤、沮丧的眼神、永恒的沉默和你是如此地格格不入,它们来自何方?你那身体欠安的表情来自何方?诗人说得好,“病体暴露潜隐心灵的痛苦,同样能暴露心灵的欢乐:面孔的表情来自于心灵,无论其有恙还是无恙”。^②

我的塞瓦提乌斯,你肯定遇到了麻烦的心事,它正在损害你的健康。但我该做什么呢?该安慰你呢还是骂你呢?你为什么要把隐瞒你内心的痛苦不让我知道仿佛我们还是陌生人呢?你太深沉,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相信,连最值得信赖的人也不信赖。难道你不知道,隐蔽的火烧得更凶猛吗?……此外,我的塞瓦提乌斯,什么使你龟缩得像蜗牛一样呢?我猜想事情是这样的:你尚未使自己相信,我深深地爱你。所以,我想要借用你生活中最甜蜜的东西恳求你,用我们伟大的爱恳求你,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平安,如果你想要我不受伤害,请你千万不要如此痛苦地掩盖自己的感

198

① 进入斯泰恩修道院不久,伊拉斯谟结识了年轻的修士塞瓦提乌斯·罗杰(Servatius Roger, ?—1540),稍后,罗杰成为第八任院长。1514年,罗杰以院长的身份致信伊拉斯谟,敦促他回修道院,参见本书英文版第11页、第87页之后和第212页之后。——原注

② 《尤维纳利斯文集》,卷四,第19—20页。——原注

情。无论你遭遇到什么痛苦，请相信我会洗耳恭听。我将助你一臂之力，或给予帮助，或提出建议。即使我没有能力提供帮助或建议，只要我能够和你分享欢乐和悲泣，只要能够和你同生共死，那也是很甜蜜的人生。再见，我的塞瓦提乌斯，请保重身体。

书简2 致尼古拉斯·维尔纳牧师^①

巴黎，[1496年]9月13日

致尼古拉斯·维尔纳牧师，问好：

祝愿你万事顺心如意，这是我由衷的希望。感谢神助，我一切皆好。我已经用行动说明神学对我是多么重要，倘若这一点过去不明朗，如今别人应该是明白了。这一宣示有一丝傲慢，但对最可爱的朋友掩盖丝毫的真相都不是伊拉斯谟的脾气。我最近邂逅了几位英格兰人，他们血统高贵，富甲一方。前不久，一位年轻的牧师与我接近^②，他生活富足，说他谢绝了主教的职位，因为他自知学养不足，但国王要求他一年之内回国就职。虽然他没有主教的薪俸，但他年收入已经超过2000个斯库堤^③。一听说我的学问，他就与我接触，他忠诚的感情令人难以置信；他经常来造访，因为他尊敬我，有一阵子住在我的宅院里。他拜我为师，支付我的年薪是100个斯库堤；几个月之后，他为我提供了牧师的薪俸；如果我求职需要钱用的话，他愿意借给我300个斯库堤，直到我用牧师的薪俸偿清这

① 尼古拉斯·维尔纳(Nicholas Werner, ? —1504年9月5日)，后来任斯泰恩神学院院长。——原注

② 很可能是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他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的兄弟。1497年，詹姆斯·斯图尔特大约二十一岁。——原注

③ 斯库堤(scudi)，16—19世纪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流通的金币或银币单位和硬

笔借款。倘若我愿意,我可以全巴黎的英格兰人对我承担义务,这些人全都来自于名门望族;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通过他们让全英格兰对我承担义务。然而,我不为所动,我不考虑丰厚的收入和非常美妙的前程;我不关心他们的恳求和眼泪。我说的是实话,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这些英格兰人知道,整个英格兰的金钱对我都毫无意义。我的婉言谢绝并不是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我现在仍然坚持谢绝的态度。这是因为我不会让任何酬谢使自己脱离神学研究。我到巴黎来的目的不是聚徒授业,也不是要挣一座金山银山,而是为了做学问。实际上我遵从神的意志来这里是为了攻读神学博士学位。

坎布雷主教非常喜欢我:他做了许多慷慨的承诺;不过说实话他汇来的钱并不多。尊敬的神父,我祝你身体健康,请求你为我向上帝祈祷;我也会为你向上帝祈祷。伊拉斯谟草于巴黎书房。

书简3 致罗伯特·费希尔^①

伦敦,[1499年]12月5日

致旅居意大利的英格兰人罗伯特·费希尔,问好:

亲爱的罗伯特,我提笔写信颇为踌躇,并不是因为担心长久的人地两别磨损了你对我的感情,而是因为在你旅居的国家里,即使墙壁也比我们这里的人更有学问、更有口才;这里的人认为精雕细刻、儒雅得体、令人愉快的文字,在意大利只能算得上是粗糙、平庸、味同嚼蜡的文字。因此,你的英格兰无疑期待你不仅能够满腹经纶载誉而归,而且希望你能够操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我本来已经收拾好行装前往意大利,但朋友蒙特伊要我陪同他回英格兰,否则你早就看见我在意大利了。蒙特伊文质彬彬、善良谦

① 罗伯特·费希尔(Robert Fisher),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的亲戚,在意大利获神学博士学位,1507年回英格兰。——原注

和、逗人喜爱,难道我不能够陪同这样一位年轻人到天涯海角吗?我发誓,我愿意陪同他下地狱。你对他的赞许非常漂亮,对他的描绘非常准确;但请相信我,他每天都在超越你的赞许、超越我们对他的评价。

200 你问我造访英格兰是否感到高兴。亲爱的罗伯特,相信我,我想说生平尚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喜爱。我发现这里气候宜人、令人愉快;况且这里富有人情味的学养非常丰厚,不是那种陈旧而平庸的学问,而是深厚、精湛的古希腊学问和古拉丁学问。我乐不思归,除了渴望看看意大利的美景之外,已经很少考虑去意大利了。我听朋友科利特讲话时,仿佛听到柏拉图在耳边回响。谁不惊叹格罗辛^①百科全书似的完美知识啊!还有谁的判断力能够比利纳克尔^②的判断力更加敏锐、高明、精准呢?造化打造的人间性格还有比托马斯·莫尔更加儒雅、甜美、快乐的吗?我还有什么必要对英格兰其他令人愉快的气质进行分类呢?放眼四顾,处处可见学术繁荣,古典学问的收成遍布大地;这一切使你应该尽早学成,满载而归。你的朋友伊拉斯谟对你满怀深情,思念你,他常常谈起你,神采飞扬地谈起你。再见。12月5日匆草于伦敦。

书简4 致詹姆斯·巴特^③

奥尔良,1500年[约12月12日]

……如果你真诚地关心你的伊拉斯谟的命运,务请代我向尊敬的夫

① 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约1446—1519),牛津大学新学院董事,率先在牛津大学传授希腊语的教授之一。——原注

② 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约1460—1524),1484年任牛津大学全灵学院董事,翻译古希腊盖伦的医典,1518年参与创建牛津大学医学院。——原注

③ 詹姆斯·巴特(James Batt,1464?—1502),卑尔根市议会秘书。——原注

人^①美言,说我羞于启齿,仿佛我根本就不曾向她透露我的窘境。但你的信必须表明,我的现状是极度贫困,因为从巴黎到奥尔良的旅费高昂,而我又失去了在巴黎挣钱的机会。告诉她意大利最适合我去攻读博士学位,让她知道像我这样苛求细节的人,没有一大笔钱是不可能完成意大利之旅的,尤其是因为我学问上的名气,我不可能过手头拮据的生活。请向她解释,我给她带来的名气可能会大大超过她赞助其他神学家带来的回报。他们写的是华而不实的平庸之作,我写的是万古流芳的作品。他们无知的鸡毛蒜皮只有上教堂的少数人听到,我的读者却包括拉丁人、希腊人和全世界所有的种族。告诉她不学无术的神学家在世界各地有一大把,而我这样的人几百年也难得出一个。亲爱的巴特,除非你这样迷信我这位朋友,否则你为了帮助我而说几句无害的谎言时就会感到犹疑不决。你必须指出,几个金币对她而言是九牛一毛,但她却因此而帮助我恢复圣哲罗姆的真经和正宗的神学;目前的情况是,她的大笔财富却被受助人无耻地挥霍浪费了。用你惯常的才干详细介绍以上情况和我的性情、我的期望、我对她的感激之情以及我羞于启齿的感觉之后,你必须补充说明,我写信求助 200 个法郎。并请她现在就支付明年的赞助费。亲爱的巴特,我不是在编造什么故事;如果我去意大利只携带 100 法郎或低于 100 法郎,那似乎是充满风险的,除非我想要卖身为奴供人驱使,但那是宁死也不能干的事情。对她而言,今年或明年支付赞助费没有区别,但对我而言那却有天渊之别。然后,你可以敦请她留意为我争取一份牧师的薪俸,以便我回来时有一个地方去安安静静地继续做学问。请勿就此罢笔,你还要多写几句,请用最方便的办法告诉她,她应该把我当做首选人,请她为我争取即使不是充裕的至少应该是可观的牧师的薪俸,而且一旦有更

201

① 勃艮第的安娜(Anna of Burgundy), 维尔的夫人(Lady of Veere, 1469? — 1518), 伊拉斯谟的赞助人, 直至她 1501 年再婚。——原注

好的牧师薪俸时，请她允许我转求更好的薪俸。我很清楚，许多候选人想要获得牧师的薪俸；你必须要说我是不二人选，其余的人都是等而下之。你是老手，知道如何为伊拉斯谟撒谎……在信的末尾你要说，我的抱怨和圣哲罗姆多次在书信里的抱怨一样，而且我正在冒双目失明的危险做学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可能不得不步其后尘，只能够像他那样用耳朵和舌头做学问了。用你力所能及的最有趣的字眼说服她，请她送我一点蓝宝石或别的什么宝石，使我能够增强视力。本来我可以告诉你哪一种宝石有明目的功效，可惜普林尼^①的《博物志》不在身边，无从查找，请你代劳吧……请让我告诉你，你还可以做什么——争取修道院院长给我提供一笔赞助费。你认识他，编造一些有分寸的、有说服力的理据吧。告诉他我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编订圣哲罗姆全集，因为无知的神学家们糟蹋他的手稿，造成错讹、毁伤和错乱（我在他的著作里发现了许多错乱，还发现了许多伪书）。我要恢复他的希腊文本。^② 我将昭示古人的天才和知识，我敢说，我的工作的前无古人的。请向他解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很多书，包括希腊文的书，请你向他解释的目的是为争取到一笔经费。巴特，你这样说并没有撒谎。我全心全意献身这个任务。再见，我最贴心、最亲爱的朋友，请全心全意代我游说。我心中想到的是贴心的巴特，而不是行动迟缓的巴特。

①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ly, 23—79)，罗马作家，写书7部，惜仅存一部《博物志》，该书为百科全书式著作，共37卷。

② 这里所谓“恢复”就是用正确的希腊语词替换错漏的语词。伊拉斯谟可能指的是圣哲罗姆的书信。在1515年5月21日致利奥十世教皇的信里（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335号，卷五，第268页之后），伊拉斯谟说：“我净化了书简的文本……仔细恢复了错漏或错置的希腊文。”——原注

书简5 致卑尔根的安东尼^①

[巴黎?][1501年3月16日?]

致最杰出的安东尼教士、圣伯廷修道院院长,问好:

……我偶然找到了一些希腊文书籍,正夜以继日地忙着抄录这些书。有人会问我为何如此喜欢监察官加图^②的范例,为何这一把年纪了还要转而学习希腊语。这个问题问得好,杰出的神父,如果我童年时代就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不是忙得没有时间,我早已学会希腊语并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晚学比不学好,即使略微嫌晚,学习并掌握最重要的东西总是比对它们一无所知重要。我曾经品尝过希腊文学,但仅限于浅尝辄止。近来,经过一番略微深入的学习之后,我觉得,尽管拉丁学问很丰富,但如果不掌握希腊语,拉丁学问也是不完全的。最近阅读一些最权威的著作后,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这是因为我们常人掌握的知识好比是几条小溪、几个混浊的小水凼,权威们驾驭的知识却像是纯清的源泉和江河,里面翻滚的浪花像黄金一样珍贵。我认为,如果不掌握希腊语就去接触神学里研究的神秘现象,那就是彻底的疯狂,这是因为前人把《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时,他们以严肃审慎的态度维持了希腊语的形态,所以不懂希腊语的人连原文的原生意义(我们的神学家称之为字面意义)也无法理解。除非读过希腊语原文,谁能够理解《圣

① 卑尔根的安东尼是卑尔根的亨利(坎布雷主教)的兄弟,此时,安东尼已经是圣伯廷修道院的院长;坎布雷主教亨利强行委任他当该院院长。——原注

②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即老加图,罗马政治家、作家、执政官、监察官,维护罗马传统,为拉丁散文文学的开创者。

203 经·诗篇》(50章第4节、51章第3节)里 *Et peccatum meum contra me est semper*^① 那句话的意思呢？在这一点上，有些神学家可能会来一番长篇大论，阐述灵与肉永恒的冲突；他们误解了希腊语介词 *ενωπιον* 的双重意义，将其误读为 *contra*，但这个词并不指冲突 (*conflict*)，而是指位置 (*position*)。所以我们说，先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错误令人厌恶，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总是在他的眼前浮现，历历如在目前。再看另一节诗 (诗篇第50章第14节)。如果不通希腊语，人人都可能误解这句诗的拉丁文，其实这句诗的意思是：“我用施惠善待他们，帮助他们，他们会谈起我做的善事。”不过，既然我伊拉斯谟有教皇令人崇敬的威望支持我的主张，为何还要从许多重要的例证里挑选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呢？有一条教皇敕令^②规定，只有那些能够准确传授希伯来、希腊和拉丁文学的人才能够获聘进入那些主要的神学院；这些人相信，如果不通晓这些古典语言，理解《圣经》就不可能，讨论《圣经》就更说不上。迄今为止，我们忽略了这条健全而神圣的敕令，我们仅仅满足于拉丁语的粗浅知识；显然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从司各脱 (*Duns Scotus*) 的译本里抽取出一切意义，仿佛这个译本是取之不尽的甘泉。

我个人不会和这类人打笔仗；对我而言，各人自有不同，胃口必然殊异；那就让老汉娶老嫗吧。圣哲罗姆和无数古代圣贤召唤我，踏上他们开辟的道路令我不胜荣幸。上帝保佑，不久我就要疯狂地爱上这些圣贤，就

① 这句话的英译文是“*And my sin is ever before me*”(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拉丁文的 *contra* 有“前”或“后”的意思。如果查证希腊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希腊文 *ενωπιον* 的意思是“面对面”。——原注

② 显然，这里所谓敕令是比较松散的说法，指的是教皇克莱芒五世在维也纳公会 (1311—1312) 之后发布的一些规定。根据相关的条文，为了更好地教育归化的异教徒，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和萨拉曼卡这四所大学里，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迦勒底语都应该配备两位教师。希腊语包括在起初的清单里，稍后却被删除了。——原注

像你面对现代神学家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样。此外,我在从事一种极其艰巨、经天纬地的任务,我竭力恢复圣哲罗姆著作的原貌。由于不懂希腊文学和古典,半吊子水的人或者败坏了他的著作,或者忘记、错乱或损害了他的文本,至少在编订他的著作时留下了满篇的错讹和大谬。我不仅要恢复其原貌,而且要进行评注;我要让每一位读者认识到,整个基督教世界承认的伟大的圣哲罗姆、在神圣学问和世俗学问两方面都完美无缺的圣哲罗姆,是每个人都能够阅读的;不过只有饱学之士才能够读懂他。我正在下苦功夫,我发现必须首先学会希腊语,准备请一位希腊语老师^①学几个月;他是地道的希腊人,不,他应该是双料的希腊人,永远渴求新的知识^②。他收的学费相当高。再见。

书简6 致威廉·沃拉姆^③

伦敦[1506年]1月24日

致尊敬的威廉神父、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大法官,圣奥古斯丁会教徒、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向您致意:

卓越的神父,我决心翻译希腊作者的原著,目的是复兴或推动神学研究。永生的上帝呀,这些著作被貌似深沉的胡说八道搞得面目全非、令人心痛啊!我不想给人留下不会走路就想跑步的印象(希腊格言“一开始学陶艺就想做酒壶”就是这个意思),亦如另一俗语所云,我不能不洗脚就匆

① 他说的老师恐怕是斯巴达的乔治·赫默尼姆斯(George Hermonymus)。——原注

② 比较《尤维纳利斯文集》,卷三,第78页(《希腊人对知识的渴求》)。——原注

③ 威廉·沃拉姆(William Warham, 1450? —1532), 1503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504—1515年任英格兰大法官, 1506年任牛津大学名誉校长。这封信成为以下书的序文:《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赫卡柏……赫卡柏与依菲琴尼亚[迈锡尼王 Agamemnon 之女]》(*Hecuba in Euipidis... Hecuba et Iphigenia; Latinae factae Erasmo Roterodamo interprete, Paris, J. Badius, September 1506*)。——原注

忙登台献艺;这样的翻译工作是非常宏大的工程。我决定走的第一步是检验我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成果,用一篇困难而神圣的材料试一试身手。这一尝试遭遇的困难对翻译实践有好处,另一方面,即使我出一些错误,那也只是我个人能力经受的风险,而神圣的《圣经》则不会蒙受损失。我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两出悲剧《赫卡柏》(*Hecuba*)和《依菲琴尼亚在奥立斯》(*Iphigenia in Aulis*),希望神灵保佑我的冒险能一帆风顺。我发现,这样的译本受到通晓两种语言的饱学之士的喜爱(我毫无嫉妒之心地承认,英格兰无疑有这样的饱学之士,在任何学问里都值得所有意大利人钦佩的博学之士)。在缪斯的神助之下,我用几个月完成了译稿。那真是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啊,凡是进入这种翻译领域的人都会感觉到个中甘苦。

何以至此?因为把地道的希腊语翻译成地道的拉丁文需要译者具有非凡的艺术家才能,他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而且要有驾驭两种语言、玩赏语词于指尖的才干,况且他还必须具有极其机敏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译事之难到几百年间无一人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以诗译诗,而原诗又如此多变和陌生,译事之艰辛就不难想象了。欧里庇得斯不仅时间上离我们久远,写的又是悲剧,而且他的剧作文字洗练、结构紧凑、不尚虚饰,不多一词一符;所以即使改动或省略一词一符,那也是一种罪过。此外,他常常在剧中明明白白地阐述修辞问题,以致译者感觉到他处处在慷慨陈词。尤为棘手者是剧中的合唱,其意思极其朦胧,我不明白剧作家意向中谋求的效果;解释这样的合唱需要的与其说是普通的翻译人才,不如说是要依靠俄狄浦斯或阿波罗神庙里祭司之类的人物。雪上加霜的是,手抄本错讹甚众,可供比较和校勘的抄本又很稀缺,我又找不到通晓翻译的人助我一臂之力。即使在这个著作极其多产的年代里,意大利人也没有冒险去把任何一出希腊悲剧或喜剧翻译成拉丁文。相反,许多意

大利人倒是转向荷马,尝试翻译荷马史诗(其中一位叫波利齐亚诺^①的人对自己的译文也不满意);一位作家^②撰文阐述赫西奥德^③却不太成功;另一位作家^④尝试翻译忒奥克利托斯^⑤,结果却更加可悲。弗朗西斯科·法尔福翻译了《赫卡柏》第一幕里的悼词^⑥(我着手翻译这出戏以后才知道他翻译了一部分),他的译笔了不起,却也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继续前进,因为我在其他方面是非常讲究精准的。

对我而言,欧里庇得斯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他美妙的口才,即使敌人也承认他的雄辩滔滔。上述伟大作家的范例和翻译中的种种困难构成的威慑力,却不如欧里庇得斯的诱惑力那样迷人,所以我开始尝试前无古人的工作。我的希望是,即使翻译失败,我真诚的读者不至于认为我那可怜的努力完全不值得赞扬;我还希望,对我这位缺乏经验的译者初试的困难的译作,即使吝啬赞美的读者也会比较包涵。出于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在重重困难之外又增加了不小的负担;我竭力再现希腊诗歌的原貌和形状,逐行逐词地翻译,处处谋求最大限度的真实,让习惯于拉丁语的读者听见原作每一句的力量和价值。一方面,我不赞同西塞罗容许并实践的意译(我

① 波利齐亚诺把《伊利亚特》的部分章节翻译成拉丁文六音步诗行,把该书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Lorenzo),出版商为 A. Mai, Spicilegium Romanum, ii。——原注

波利齐亚诺(Poltian, 1454—1494),意大利诗人、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研究的先驱之一,著译颇丰。

② 尼古拉斯·德·瓦勒(Nicholas de Valle)翻译了赫西奥德的《工作与岁月》(*Works and Days/Georgica*),波尼努斯·蒙布里提乌斯(Bonnius Mombritus)翻译了赫西奥德的《神谱》(*Theogonia*)。——原注

③ 赫西奥德(Hesiod, 前8世纪),希腊最早的史诗诗人之一,活跃于前8世纪,名气极盛。《神谱》、《工作与岁月》为其代表作。

④ 马丁·费雷提乌斯(Martin Phileticus)。——原注

⑤ 忒奥克利托斯(Theocritus, 前3世纪),希腊最早的田园诗人。

⑥ 《赫卡柏》第三幕,法尔福翻译的《赫卡柏》悼词大约1481年在米兰印行。——原注

几乎要非常不客气地说不赞成)；另一方面,作为经验不足的译者,我宁可犯过分小心的错误而不是过分自由地翻译。我宁愿在沙滩徘徊踟蹰,也不愿意沉船在大浪中挣扎。我宁可让学界抱怨译文没有文采、没有诗意美,也不愿意缺乏对原文的忠实。最后需要表明心志的一点是,我不想采用解释的办法翻译,这是我自己寻求退路的办法,许多人以此作为掩饰自己无知的借口,他们像乌贼一样把自己包裹在黑暗之中,以免被别人抓住把柄。请读者注意,如果他们在我的译作里没有发现拉丁文悲剧那种浮夸的文风,如果他们没有发现贺拉斯^①所谓的“浮夸的字眼和半码长的单词”,如果我履行翻译职责时宁可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质朴和优雅,而不是用我不熟悉的夸大其词,他们就不应该抱怨我,因为我从来不会钦佩那种夸大其词的风格。

再者,我斗胆而肯定地希望,如果您杰出的神父赞同我的译作,我的艰辛成果将免于遭到不公平的责难,这些译作就会受到诚实和公平人士的欢迎。我把夙兴夜寐操劳的成果献给您,从许多杰出人士中,我选中您作为献礼的对象并不难,您就是那位不二人选。除了您出类拔萃的天赋之外,您的学问、辩才、判断力、虔诚的情感、谦虚的态度和完美的人格使您的天才锦上添花、熠熠生辉、光焰四射,何况您对培育优美文学的人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呢。大法官一词对您恰如其分,因为您占有这个至尊的地位并不是由于您公职的尊严,而是由于您的美德。同时,您给法庭增辉添彩,您是教士阶层不二的领袖。倘若我三生有幸,得到您的表彰,我肯定不会为自己付出的艰辛而后悔,我将继续开拓进取,以更大的热情推动神学研究。

再见,请将我伊拉斯谟纳入全心全意忠诚于您的教徒之列。

① 贺拉斯(Horace,前65—前8),罗马诗人,著有《讽刺诗集》、《歌集》、《书札》等,《书札》中的《诗艺》对西方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

书简7 致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①

博洛尼亚,[1507]年10月28日

致罗马的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问好:

博学多才的马努蒂乌斯,你把光辉照射到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上,不仅是因为你的印刷机和漂亮的字钉,而且是由于你的才华和非凡的学问。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你得到的报偿和你付出的心血相匹配。以名气而论,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无疑在献身神圣文学的学者中很有口碑,而且后世会永远铭记你。和你的名气一样,后世不仅将记住你闪亮的名字,而且会热爱你、珍惜你,因为正如我听说的一样,你在复兴和传播优秀的作家作品,你极其勤勉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报偿;你付出的艰辛无与伦比,你的心血绽放出绚烂的花朵,必将赋予你永恒的荣光;在此期间,你使他人的获益大大超过你个人之所得。听说你在刊印希腊文版的柏拉图著作^②,许多学者在翘首以盼。我想知道你刊布过什么样的医学典籍,我希望你能够印行埃伊纳的保罗(Paul of Aegina)的医典^③。不知道什么困难使你迟迟不能出版《新约全书》^④。如果我的猜想不错,即使普通人也会喜欢这本书,我这个阶层的神学家尤其会喜欢《新约全书》。

208

我奉上两出悲剧^⑤。我斗胆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是否成功则需要你自己判断。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利纳克尔、威廉·格罗辛、威廉·拉蒂默、库特伯·滕斯托尔(Cuthbert Tunstall)等人对你评价甚高。你知

① 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1449—1515)1494年在威尼斯创立阿尔定(Aldine)印刷所。——原注

② 1513年由阿尔杜斯刊布。——原注

③ 1528年由阿尔杜斯刊布。——原注

④ 原定1499年出版,1518年方由阿尔杜斯刊布。——原注

⑤ 《赫卡柏与依菲琴尼亚》,1507年12月阿尔杜斯在威尼斯重印,1518年和1524年弗洛本在巴塞尔重印。——原注

道,他们均为饱学之士,对你的判断不会出错,他们很真诚,不想对朋友盲目奉承,除非他们对我的情感使他们有一点盲目。我曾经向一些意大利人展示我想要翻译的悲剧,他们并没有提出非难。巴黎出版商巴迪乌斯刊印了这两出悲剧,他自己撰文称,这一版是成功的,因为书已经售罄,他感到满意。可惜我的名气并未因此而提高,因为书中排印错误连篇。他提出补救措施,准备印行第二版,但正如索福克勒斯^①所云,我怕他以病治病。如果我这本书能够用你的铅字尤其是小号的铅字印行,我将视自己的心血获得永生的机会,你的小号铅字是最美的铅字。这样印行的版本尺幅很小,成本很低。如果你认为方便一试,我将奉上校勘本,不要报酬,只要你愿意送我几册赠送友人就行。

倘若不是我不得不几个月内离开意大利,我本可以冒险自费印行。我想争取尽快让这本书面世,实际上你不出十天就可以完成印装的工作。如果你要我负责一两百册,只要你雇一匹马帮我驮运,我不会拒绝,虽然财神爷一般不会喜欢我,虽然搬运一两百册书很不方便,我也不会介意。再见,博学多才的阿尔杜斯,希望你知道,伊拉斯谟祝福你。

如果你有什么孤本善本,请通报,我将不胜感激。我在英国的学界朋友要我代为搜寻。如果你决定不刊印我的《悲剧》,请将书稿委托来人给我带回。

书简8 致托马斯·莫尔^②

[巴黎?],[1511年]6月9日

致托马斯·莫尔,问好:

几年前从意大利赴英格兰的路上,为了骑马时不至于在没有文采的

①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共写123部剧本,仅存《俄狄浦斯王》、《埃阿斯》、《安提戈涅》等7部。

②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本信是《愚人颂》序文,出版商是巴黎的Giles Gourmnt,1511年8月由斯特拉斯堡的出版商Schurer重印。

闲聊中浪费时间,我喜欢在脑子里反复琢磨我们研究的共同课题,或回忆与朋友度过的快乐时光,英格兰的朋友们既博学又可爱。亲爱的莫尔,你正是最先跳入我脑海的朋友之一。实际上,虽然我喜欢与你为伴,但我还是喜欢你不在身边时回忆你。我发誓,此生不曾有过更加甜蜜的回忆。当时我认为,我必须不顾一切危险在路上做一点什么东西,可时机反而不适合认真的思考。于是,我决定用酝酿《愚人颂》来自娱。你可能会问,什么缪斯女神把这本书的念头植入我的头脑。首先是因为你的家姓 More 接近 moria(愚蠢),正如你远离社会现实一样——人人都认为,你和社会现实的距离很遥远。其次,我想你首先会赞同我这种精神游戏,因为你本人就喜欢这样的诙谐和戏谑。我指的是有学养(如果我没错)的俏皮话、任何时候都不会索然无味的俏皮话。你也很喜欢像德谟克利特^①那样在社会生活中享受游戏的乐趣。由于你极其甜美和随遇而安的性格,即使你的知性使你 and 众多的人产生很严重的意见分歧,你也能够且乐意与任何人就任何事情打交道。所以我想,你不仅乐意接受老朋友宣示的这一个小小的纪念品,而且会呵护它,既然献给你,它不再是我的而是你的了。

高声嚷嚷的批评者将不乏其人,他们会认为书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哪能和神学家的修养相比,而我这些批评又太尖刻,不适合基督徒的谦虚;他们会高叫,我在复活古老的喜剧或古希腊的讽刺剧作家卢奇安,我在用刺痛人的讽刺攻击一切东西。然而,我要让我的调侃戏谑得罪的人们三思,开启这种讥讽的不是我,各个时代的伟大作家已成为很好的先例;我要让他们明白,两千多年前,荷马就小题大做地写过《青蛙与老鼠之战》,维吉尔就写了《小虫子》和《野菜食谱》,奥维德也写过《坚果》;我要让他

210

① 德谟克利特被誉为“欢笑哲学家”。——原注

们知道,布西里斯①受到波利克拉特斯②和伊索克拉底③的赞扬。他们应该知道,格劳孔④赞扬过非正义,法沃里努斯⑤赞扬过瑟赛蒂兹⑥和三日疟,辛尼西乌斯⑦赞扬过秃顶,卢奇安赞扬过苍蝇以及作为寄生虫的艺术,塞内加为克劳狄皇帝献过颂词,普卢塔克写过蟋蟀和尤利西斯的对话。卢奇安和阿普列尤斯⑧写过驴子。还有一位不太著名的作家写过小猪哼哼,连圣哲罗姆都提到这样的故事。

如果诋毁我的人愿意,他们可以想象我偶尔下下跳棋、骑骑马。我们允许各行各业的人娱乐,却不允许搞学问的轻松轻松,这实在是失公平。须知,微不足道的娱乐和游戏能够触发严肃的思考;琐细的事情如果处理得当,连缺乏感知能力的读者也可以大大获益,比有些作者那种华而不实、自命不凡的论说更能够给人裨益。比如,在令人痛苦和胡乱拼凑的演说中讴歌修辞和哲学、不厌其烦地颂扬某位君主、鼓动向土耳其人开战、预卜未来、提出钻牛角尖的方法等等就是华而不实、自命不凡的言论。用不厌其烦的态度去处理琐细的事情,那不值一提;同理,你可以用另一种态度去处理小事,使之丝毫不像是鸡毛蒜皮的事情,那就会令人开心。对我而言,判断掌握在他人手中——不过,除非

① 布西里斯(Busiris),希腊神话里的埃及国王。

② 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约前535—前522),爱琴海萨摩斯岛的僭主,提倡文艺。

③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5—前338),雅典雄辩家、教育家,希腊败于波斯后绝食身亡。

④ 格劳孔(Glaucón),柏拉图《理想国》中与苏格拉底辩论的人物。——中译者注

⑤ 法沃里努斯(Favorinus),罗马帝国时期的怀疑主义哲学家,是普卢塔克的朋友,曾经在皇帝哈德良麾下效劳,活跃于2世纪,著有哲学论文、讲演录、回忆录等,著名者有论文《论流放》,其余作品仅存片断。

⑥ 瑟赛蒂兹(Thersit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希腊士兵,喜欢骂人。

⑦ 辛尼西乌斯(Synesius,370—430),早期基督教教士。

⑧ 阿普列尤斯(Apuleius,约124—170),古罗马作家。

我完全受到自恋的误导,否则我就可以用赞誉的口吻来戏说愚行,那并不是完全愚蠢的赞誉。

我现在回答对讥讽的指控。自古以来,讥讽社会生活而不受惩罚一直是智慧的特权,只要那个特权不堕落为疯狂就是允许的。如今有些人却难以容忍庄严用语之外的东西,他们的耳朵太挑剔,听不得讥讽的东西,这使我更加感到惊诧不解。再者,我们看见有些人在宗教信仰上有悖常理,他们宁可忍受对基督的恶毒攻击,也不能容忍最轻微的嘲笑使君主或教皇蒙羞,尤其不能够容忍和金钱赢利有关的东西。然而,如果有人责难生活弊端时不指名道姓地责难任何人,请问你认为他是讥讽家而不是导师和训诫师吗?此外,我应该多频繁地责备自己呢?况且,如果讥讽之笔不遗漏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显然作者是不与任何人为敌的,他只与一切弊端为敌。因此,凡是拍案而起、惊呼自己受到侮辱的人,无不暴露了自己问心有愧,他无论如何是有一丝惧怕的。圣哲罗姆笔下的讥讽非常泼辣、入骨三分,而且他并非总是避免指名道姓。与之相反,我不但不指名道姓,而且我笔调温和,精明的读者不难明白,我的目的是给人欢乐而不是给人痛苦。我从来没有追随过尤维纳利斯^①去“煽动犯罪的黑暗底舱”,我谋求的是审视值得一笑的东西,而不是令人厌恶的东西。倘若这样坦荡的表态还不足以让什么人得到安抚,至少应该让他明白,受“愚人”讥讽是好事情。把“愚人”推上舞台时,我必须要让她的台词符合她的性格。但我有什么必要对你来这一番长篇大论呢?你提倡讥讽的成就令人惊叹,你甚至可以用讥讽之笔捍卫绝非完美的事业。再见,妙笔生花的莫尔,请你勤于捍卫自己的“愚行”。

211

^① 尤维纳利斯(Saint Juvenal, ? —458),基督教耶路撒冷主教。

书简9 致约翰·科利特^①

剑桥，[1511年]10月29日

致朋友科利特，问好：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点肯定会使你忍俊不禁的东西。在几位硕士在场的情况下，我发表了有关助理教师的观点，其中一位小有名气的硕士笑曰：“如果人能够在他喜欢的地方生活，他怎么能够忍受在学校里当‘娃娃头’的生活呢？”我语气和缓地回答说，培养年轻人得体的言行举止和儒雅的文学修养，那是很光荣的任务，基督本人并不小看年轻人，对各种年龄段的人而言，最大的权利都是助人为乐，其他领域找不到教书给予人的那种丰厚的回报，年轻人是民族赖以获取收成的田园和原材料。我接着说，一切真正虔诚的人都觉得，他们侍奉上帝的最好方式就是引导儿童信奉基督。他眉头一皱，轻蔑地比画着说：“倘若有人想要侍奉基督，让他进修道院、加入修会好了。”我的回答是，圣保罗说过，真正的宗教广结善缘，所谓善事就包括尽力帮助邻居。他驳斥说我这句话愚蠢：“瞧，我们放弃了一切：这就是所谓的完美。”我回答说：“人没有放弃一切。人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帮助许多人，之所以有人拒绝承担责任，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做善事微不足道。”为了防止争吵，说完这句话，我就让他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对话，你从中看到了苏格兰人的哲学！再见。

212

^① 约翰·科利特(1466?—1519)，1504年任圣保罗教会牧师，1510年创建圣保罗学院。——原注

书简 10 致塞瓦提乌斯·罗杰

哈姆斯城堡 [加来附近], 1514 年 7 月 8 日

致尊敬的塞瓦提乌斯神父, 问好:

最仁慈的神父, 你的信辗转经过许多人的手, 今天终于收到了, 你发信时, 我已经离开英格兰。来信令我不胜高兴, 它还散发着你的深情厚谊。我在此做简略的回复, 因为长途跋涉之后刚刚安顿下来, 稍后我将详细作答, 像你的来信一样切中要害。人的思想五花八门, “各唱各的调”, 不可能使每个人满足。我个人的感情是追随最好的事情, 因为上帝注视着我。年轻时候的感情已经有所修正, 部分原因是年岁的增长, 部分原因是人生的阅历。我从未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 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 而是为了避免出丑。你知道, 我不是因为循循善诱的方式被引进这种生活的; 相反, 由于我的监护人的倔强和其他人错误的敦促, 我是被驱赶进修道院的。后来, 当我意识到这种生活很不适合我(并非一切事情适合一切人)的时候, 沃尔登的科尼利乌斯的责备和少年人的羞怯使我留在修道院。由于体质弱, 斋戒一直令我吃不消。每次惊醒以后, 我都几个小时无法入睡。我非常喜欢文学, 可修道院里却不讲究文学。我丝毫不怀疑, 一旦我有缘享受自由的生活, 我将加入幸福者的行列, 甚至与出类拔萃的人为伍。

于是, 我意识到自己绝对不适合这种生活, 我是被迫而不是自愿接受这种生活的。然而公共舆论认为, 摆脱既定的生活是一种罪过, 所以我不得不用毅力去忍受这样的不幸——你知道我在许多方面是不幸的。不过, 我一直认为修道院的生活比其他的不幸更难忍受, 我被驱赶进入的那种生活对我的身心都是格格不入的。精神上的不适合是由于我讨厌仪式、喜爱自由; 在身体上, 虽然我满意修道院的生活, 但我的体质无法承受

其中的艰辛。你可能会反驳说,我当时享受了一年的见习期,而且我已经进入成熟的年龄。荒唐!我当时才十六岁。这好比是要求一位刚十六岁、只受过文学训练的少年做到知己(即使对老人而言,知己也算是一种成就),要求他在一年内学会许多白发人也不懂的东西。我从来不喜欢修道院的生活,经过尝试以后就更加不喜欢,我是掉进了这个陷阱,虽然我承认真正的好人无论干哪一行都会享受到美好的生活。我不否认,我容易沾染令人忧伤但不完全使人堕落的恶习;如果我找到了一位好心的向导、真正的基督徒而不是习惯于犹太人那种谨小慎微的向导,我还是会学有所成的。

在此期间,我寻找什么样的生活会使我沾染最少的恶习,我真诚地相信我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生活在清醒的人中,我从事文学研究,这使我与恶习无缘。我能够和真正的基督徒打交道,和他们交谈使我成为更好的人。我不吹嘘自己的著作,你在斯特恩修道院可能会鄙视这些书。不过,许多人读我的书后承认,他们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成了更好的人。捞钱的激情从来不会使我动心。对名望的渴求丝毫不能让我心动。虽然我以前倾向于追求快乐,但我从未成为欢愉的奴隶。我始终讨厌和避免放纵和酗酒。然而,每当想起回到你们的修道院时,我就记起了许多人的嫉妒、所有人的鄙视;修士们的交谈多么不符合基督的精神啊,那些大吃大喝也不符合修士的身份呀。总之,如果你除去修道院里的仪式,我看不见还剩下多少你渴望的东西。最后我想要说明的是我的身体。我的体质虚弱,年纪、病痛和辛勤的工作使之每况愈下,结果可能会使你失望,我也会郁闷而死。几年来,我受肾结石困扰,症状严重,痛得致命;几年来,我靠喝酒控制病症;我有肾结石,不是什么酒都有益于健康,不是什么酒都能喝。很多食品我不能吃,许多地方的气候我不能适应。肾结石很容易复发,对食谱的要求很挑剔。我熟悉荷兰的气候,也了解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处事方式就不用说了。由此可见,倘若我回来,我能做的一切都只能够给你带来麻烦,并使我自己早日完蛋。

也许你认为在同胞和同伴之中去世是莫大的幸福。这样的信仰不仅欺骗你、强加在你一个人身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把基督徒的虔诚建立在地域、服装、生活方式和某些微不足道的仪式上。有人由白衣换成黑衣、把斗篷换成便帽和偶尔迁居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堕落了。我敢说,虽然起初这些习俗是出于虔诚的热情,这些所谓基督教的习俗使基督徒的虔诚受到很大的伤害。以后,它们又日积月累,然后又逐渐分殊,形成数以千计的差别。在许多情况下,教皇的权威太松弛、太随和,反而助长了这个分化的过程。还有什么比这些宽松的仪式更加被污损、更加不虔诚的吗?即使你转向那些受称赞的、最受称道的习俗,除了一些枯燥的犹太仪式之外,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从中找到一丝基督的影子。他们对自己的赞扬就建立在这些习俗的基础上,他们就用这样的习俗来评判和谴责别人。把这个基督教世界看成一个家庭,仿佛这个基督教世界就像一所修道院,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身边的修士和兄弟,把洗礼当做至高无上的仪式,而不是考虑你住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这和基督的精神又有多少吻合之处呢?你要我找一个永久性住所安顿下来,我这把年纪也发出暗示,我应该走这样的路子。然而,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却经常漫游;使徒(尤其保罗)也云游四方;圣哲罗姆时而在罗马、时而在叙利亚、时而又在安提克,忽而在此,忽而在彼,直至老态龙钟了还继续从事文学研究。

当然我不能和圣哲罗姆相提并论——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我从来都是迫不得已才迁移,或者是迫于瘟疫,或者是出于研究和健康的原因。然而无论我身居何处(我可以自夸,或许有一点傲慢,但这是事实),我都受到最值得赞誉者、最受人赞誉者的赞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也好,英格兰、苏格兰也好,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召唤我去分享他们的殷勤好客之道。即使我并非受到一切人的喜爱(其实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无论如何,我的确在最高贵的地方受到人家的喜爱。罗马没有一位红衣主教不把我

当做兄弟；圣乔治的红衣主教^①、博洛尼亚的红衣主教^②、格利马尼的红衣主教、南特的红衣主教^③和现任的教皇^④尤其喜欢我，主教、大执事和博学多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荣誉不是归因于我的财富，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曾发财，更不渴望发财；也不是归因于我的抱负，这是我的欠缺之处，但抱负对我并不陌生。相反，这样的荣誉完全归因于我的学问；我们的同胞讥笑学问，意大利人却崇拜学问。在英格兰，所有的主教无不由于我的问候而感到高兴，无不渴望与我为伴，无不希望邀请我到家里做客。国王本人在先王去世前夕给我写过一封亲笔信，非常尊敬，情真意切，那时我在意大利。每当我问候他时，他都彬彬有礼地表示欢迎，以最友好的目光看着我；显而易见，他对我的感情和他的言词一样非常友善。他常常委托他的施赈官^⑤给我谋一份牧师的薪金。王后想要我当她的家庭教师。众所周知，如果我准备到宫廷里生活几个月，国王一定会随心所欲地为我谋到许多份牧师的薪俸。然而，我把个人的闲暇和钻研学问的劳动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大法官、国王秘书待人友善，博学多才，他与我情同手足，堪比父兄。你可以相信他是真诚的，他给我的生活津贴是100个金币。稍后出于辞让，我希望他把津贴减少到100个克朗。此外，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还给我追加了400多个金币。有一次，他一天之内就给我150个金币。其他主教送我的礼品也超过100个金币的价值。王室的男爵蒙特伊曾经是我的学生，他每年给我的津贴是

① 圣乔治的红衣主教即拉法尔·里亚利奥(Raffael Riario, 1461—1521), 利奥十世1513年竞争教皇时最强大的对手。——原注

② 博洛尼亚的红衣主教即伊莫拉的弗朗西斯科·阿里多西(Francesco Alidosi, ?—1511)。——原注

③ 南特的红衣主教即罗伯特·纪贝(Robert Guibe, 约1456—1513), 圣阿纳斯他西亚的红衣主教和南特主教。——原注

④ 现任的教皇即利奥十世。——原注

⑤ 即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原注

100个金币。国王和林肯的主教做了许多慷慨的允诺,这位主教对国王颇有影响。英格兰有两所著名的大学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想要我去任教。我在剑桥大学教希腊语和圣典文学,时间长达几个月,分文不取,我准备始终不要报酬。有一些大学非常虔诚,生活却非常朴素,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些学校,你可能会放弃其他的宗教信仰。伦敦这里有约翰·科利特,他是圣保罗学院的院长。他学识渊博,虔诚得令人惊叹,深受大家敬仰。众所周知,他非常喜欢我,所以他最喜欢和我交往。我不想再列举其他人,以免我的饶舌和自吹使你倍感烦恼。

216

现在说一说我的著作。我想你读过《基督徒士兵须知》^①。不少人承认受到它的激励去研究虔诚。我不张扬自己的成就,而是把它归功于基督,他假我之手完成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格言集》^②,由阿尔杜斯印行。《格言集》不是神学著作,对各门学问都有用;这本书耗费了我无数的心血和不眠之夜。我出了一本《丰富多样的语言》^③,献给朋友科利特,对渴望学习讲演的来说,这本书很有用。不过,凡是鄙视深厚学问的人都鄙视这些书。在过去的两年里,除了其他许多研究成果之外,我校勘了圣哲罗姆的书信,勘误、去伪、加注。我搜集了大量的古希腊文献等古代手稿,据此纠正了《新约全书》中的错误,做了一千余条注解,这样的努力对神学家们不无好处。我已经着手评注使徒保罗的书信。《新约全书》出版之后,圣保罗的书信也将准备就绪了。我决心为研究《圣经》而奉献终生。研究《圣经》既是我的工作又是我的休闲方式。身份显赫的人士

① 《基督徒士兵须知》(*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 printed in Lucubratiunculae*), 1503。——原注

② 《格言集》增订本名为 *Adagiorum Chiliades*, 1508年由阿尔杜斯印行。——原注

③ 《丰富多样的语言》(*De duplici copia verborum ac rerum commentarii duo*), Paris, Badius, 1512。——原注

断言,我能够在这个领域的作为乃他人所不能为。而在你那种生活方式中,我就会一事无成。在意大利和法兰西,我和许多庄重博学的人结为至交,我尚未发现任何人劝说我回到你的身边,也没有人认为回修道院是更好的路子。不,即使你的前任院长、令人怀念的尼古拉斯·维尔纳也总是劝我不回去,他劝我和某一位主教建立联系。他还说,他理解我的心思,理解他的小兄弟的路子。这就是他说的话,而且是用通俗拉丁语说的话。在现在的生活方式里,我知道应该规避什么东西,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217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满足你询问的衣着问题。我始终穿着修会的服装;在卢万居留期间,乌特勒支的主教允许我穿亚麻的无袖外衣,而不是完整的道袍,他允许我戴黑色的尖顶风帽而不是披黑色的斗篷,这是遵循巴黎的习俗。但在去意大利的路上,我看见僧侣们都身穿黑色道袍和无袖外衣,为了避免异常的服装开罪于人,我就仿照他们着装。后来,博洛尼亚爆发了瘟疫,护理病人时人们一律身披从肩头下垂的白布装,以免和病人的直接接触。有一天,我去拜望一位朋友,路上遇见一些恶棍,他们拔剑准备刺我,幸好一位老太太警告他们说,我是神父。第二天,我去见教会司库的几个儿子时,他们竟然手持木棍围住我狂吼乱打。于是,好心人建议我掩盖无袖外衣。同时,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又赦免我,允许我不穿道袍,恩准我着装视情况而定,只要是教士的服装就行。在他的赦免文书里,教皇宽恕我过去着装方面的一切罪过。回到英国之后,我决定穿平日的服装,请一位朋友到我的住处来看我决定穿的衣服是否合适;他在学问和生活方式上都富有盛名,我问他我在英格兰穿这样的衣服合适与否。他认为合适,所以我在公共场合就以这样的穿着示人。结果却受到老朋友们的警告,他们说这套服装在英格兰是难以容忍的,我最好把这套衣服藏起来。我遵命而行。但倘若被人发现了,它还是会引起流言蜚语,所以我就用箱子把它锁起来。迄今为止,我就按照教皇的赦免令着装。按照基督教会法的规定,放弃教规教俗在世俗生活中自由行动者应该被革出

教门,但我在意大利放弃信仰习俗是被迫为之,以免被杀害;在英格兰受到同样的压力,因为天主教的道袍使人难以容忍,尽管我很想继续穿。现在回头穿以前的天主教道袍遭到的非议,恐怕比起初改变衣装引起的非难还要严重。

以上就是我全部的生活内容,你了解我的打算了。如果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我愿意改变目前的生活。但我不知道我能够在荷兰做什么。我知道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方式与我不相宜,人人都会瞪着眼睛看我。我离开时还血气方刚,回去时却两鬓染霜——我将老态龙钟,以病体虚弱示人。虽然我赢得了最高贵者的尊敬,但我却会遭到最卑贱者的鄙视。我将不得不把埋头学问改为觥筹交错的应酬。你允诺帮我寻找一个收入丰厚的地方生活,我无法想象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除非你的意图是让我到女修道院里去生活,去为修女们服务——为女人服务是不可想象的,连王公贵族、大主教们我也不愿意去伺候。我不需要报酬,我没有获取财富的欲望,只要有足够的金钱维持健康和闲适的文学生活,只要足够自己生活而不给人造成负担就行了。希望我们有机会面对面商谈这些事情,一封信谈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虽然你的信是由最可靠的朋友传递的,但它居然满世界乱跑,要不是在这座城堡里偶尔看到它,我可能永远也收不到你这封信了。送到我手上时,许多人已经看过它了。因此,除非你知道我的确切地址,除非你有非常可靠的送信人,请不要在你的书信里提任何隐秘的东西。我正在前往德国的巴塞爾去出版我的书。今年冬天,我可能在罗马。在回程的路上,我将设法找个地方与你面谈。如今夏天即将过去,这是一趟漫漫的旅程。再见,我昔日的同伴,今日尊敬的神父。

书简 11 致·卡皮托^①

安特卫普,1516/1517年2月26日

致通晓三种语言的、杰出的神学家、哈根瑙的沃尔夫冈·法布利丘斯·卡皮托,问好:

如今我看到,地球上最强大的君主法国的弗朗西斯国王、天主教的国王查理、英格兰的国王亨利八世和马克西米连皇帝都一致大规模削减军备,而且坚定地缔结了和约,我希望这是牢不可破的和约,因此我觉得有理由和信心希望,不仅美德和基督教的虔诚将复兴并开花结果,而且真正的、经过净化的学问和精湛学科也会复兴并开花结果。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世界各地都在以同样的热情为这个目的而奋斗;在罗马是利奥教皇本人,在西班牙是托莱多的红衣主教^②,在英格兰是国王亨利八世,他本人就是非同寻常的学者;在我们这里,查理国王为此而奋斗,他年富力强、天资令人惊叹;在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似乎天生就被委以和平的使命,他用丰厚的奖赏吸引五湖四海兼有美德和学问的杰出才俊;在德国,为和平而奋斗的是许多王公和主教,尤其是马克西米连皇帝本人。年迈的皇帝厌恶多年来的一切战争,他决心在和平的艺术中去寻求安宁:这个决心既符合他的德高望重的身份,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幸运。多亏这些帝王的虔诚,世界各地似乎在服从统一信号的指挥,才华横溢的才俊都觉醒了,他们行动起来为复兴至善至美的学问而共同奋斗。这难道不是心灵相通的事业吗?各国最伟大的学者分享研究成果,为高尚的任务而奋斗,不仅怀着满腔的热情,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几乎肯

① 沃尔夫冈·法布利丘斯·卡皮托(Wolfgang Fabricius Capito, 1478—1541), 希伯来学者, 支持宗教改革。——原注

② 希梅内斯(F. Ximenes, 1436—1517), 伊莎贝拉女王的告解神父, 托莱多大主教(1495), 创建阿尔卡拉大学(1500), 提倡多语版《圣经》。——原注

定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前景：一切学科在阳光下纷纷涌现，更加纯净，更加纯真。首先，苏格兰人、丹麦人和爱尔兰已经在复兴并培育几乎失传的文质彬彬的典雅的文学。至于医学，有多少人在竭力呼号提倡啊！罗马的尼古拉斯·利奥尼切努斯^①、威尼斯的安布罗斯·利奥^②、法国的威廉·柯普^③和约翰·卢尔^④、英格兰的托马斯·利纳克尔等人都在为振兴医学而奋斗。巴黎的威廉·布多伊斯^⑤和德国的乌尔里希·扎修斯^⑥正在复兴罗马法，巴塞尔的亨利·格拉雷阿努斯^⑦正在复兴数学。

至于神学，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了，这是因为迄今的神学教授总是根深蒂固地讨厌高尚学问的人，他们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愚昧，因为他们用的是宗教借口，他们劝说愚昧的群氓相信他们的欺人之谈：如果有人抨击他们的蒙昧主义，那就是违犯了宗教信条。一看到自己的愚昧有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危险，他们就立即呼天抢地地哀号，就煽动没有文化、不明事理的暴民扔石头。然而我相信，一旦学校公开接受三种古典语言（希腊

220

-
- ① 尼古拉斯·利奥尼切努斯(Nicholas Leonicensus, 1428—1524), 费拉拉大学医学教授, 翻译亚里士多德、卡修斯(Dio Cassius)、盖伦(Galen)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著作。——原注
- ② 安布罗斯·利奥(Ambrose Leo, ?—1525), 那不勒斯大学医学教授, 1507年起在威尼斯任教; 阿尔杜斯的家庭医生, 在此与伊拉斯谟邂逅。——原注
- ③ 威廉·柯普(William Cop, 1466—1532), 医师、天文学家、人文主义者, 在巴黎师从伊拉斯谟学希腊语, 弗朗西斯一世的宫廷御医。——原注
- ④ 约翰·卢尔(John Ruel, 1479—1537), 巴黎大学医学院院长(1508—1509), 弗朗西斯一世的宫廷御医。——原注
- ⑤ 威廉·布多伊斯(William Budaeus, 1467—1540), 巴黎人文主义者, 代表作有《法典汇编评注》(*Annotationes in XXIV Pandectarum libros*), Badius, 1508。——原注
- ⑥ 乌尔里希·扎修斯(Ulrich Zasius, 1461—1535), 自1506年起在弗赖堡大学任法学教授, 直至去世。——原注
- ⑦ 亨利·格拉雷阿努斯(Henry Glareanus, 1488—1563), 亦名亨利·罗利提, 在巴塞尔主办学苑, 收徒30人。——原注

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一切都会顺利展开,因为万事难的第一步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份微薄的贡献落到了我的肩上,这正中下怀。不知道我的贡献是否有价值。无论如何,那些不想让世界恢复理智的人气得大发雷霆,现在看来,我那点微不足道的努力并不是没有产生奇效。虽然我不敢相信,我可以传授经天纬地的思想,但我想要为别人开辟一条道路,注定要干一番大事的道路,使他们能够比较轻松地到达更加光辉的高度,而不必遭遇许多凸凹不平的地貌和烂泥潭。然而,我这点卑微的勤勉并没有遭到诚实者和博学者的否认,除了少数几位愚昧之徒以外,谁也没有表示不满。即使略有头脑的人也要喝倒彩,把这些愚昧之徒轰下台。不久前,这里有个人布道时眼泪汪汪地抱怨说:《圣经》完了,迄今肩负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家完蛋了;因为有人竟然跳出来修订神圣的《福音书》,修订我主的圣言,所以《圣经》和神学家快要被糟蹋殆尽了。他们的企图是,好像我在谴责《马太福音》和《路迦福音》,而不是在抨击曲解福音书的愚昧和疏忽。英格兰有那么一两个人高声嚷嚷说,伊拉斯谟竟敢教训伟大的圣哲罗姆,他真是无耻之极:仿佛我在篡改圣哲罗姆而不是在恢复他的学问!

221 这些哀号挽歌的人自认为是了不起的神学家,其实明白一点事理的洗衣工也会嘲笑他们的……我不想今日学校里传授的神学被束之高阁而被人遗忘,我想要人们能够读到古典的正宗的学问,以便使具体的神学更加值得信赖、更加正确。如果有错讹段落得到纠正,让人们读到正确的文字,如果许多神学家误解的段落能够得到正确的解读,《圣经》和神学家的权威是不会削弱的。相反,他们的权威将更有分量,神学家对《圣经》的理解将更加正宗。我首次接触这些人感到的震惊至今挥之不去,正是泰伦斯所云最尖锐的刺激……至今仍然有一丝疑云令我不安。我担心,在复兴古典学问的幌子之下,异端可能会抬头,这是因为即使在基督徒里也有一些人名义上承认基督,内心却是异教徒;在希伯来研究复兴的过程中,犹太教可能会趁此机会复活;这样的灾难与基督教会背道而驰甚至是对立的,再也没有比这更加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了。然而,这却是人事的本

质：美好的东西繁荣昌盛时难免有邪恶与之相伴，有些邪恶的东西必然会利用美好的东西，将其作为借口，以期转弯抹角地推销自己。我希望那些令人生厌的遁词被涤荡殆尽，至少不能够让它们成为神学家们唯一的活动；我希望基督的质朴和纯洁能够深入到人们的头脑之中。我相信，只要我们用那三种古代语言正宗的原典来训练自己的头脑，我们的追求就一定能够实现。不过我祈祷，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弊端而不必陷入另一种更加严重的错误。不久前出版的几种小书散发着彻头彻尾的犹太教的臭味。……再见。

书简 12 致托马斯·莫尔

卢万，1518年3月5日

致朋友托马斯·莫尔，问好：

首先请你相信送信人，他是我的仆人约翰，如果你认为略微修改就可以发表的话，你和我的信件都可以由他传递。无论我是否喜欢，形势都迫使我不得不公开出版我的书信。让小伙子尽快赶回来。即使你发现乌尔斯维克(Urswick)对我没有好感，也许我们也不要使他感觉遇到麻烦。其他的事情是帮我买一匹马。我即将动身去巴塞爾和威尼斯，需要一匹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出版《新约全书》^①。亲爱的莫尔，这就是我的命运。我将扮演我人生剧目中的这个角色。《新约全书》出版之后，我会禁不住要为“我自己和缪斯”歌唱了。我感觉年迈体衰，健康日益恶化，年龄和健康情况都需要我尽快出版《新约全书》。在这里，身披伪装的恶棍都很有权势；除了旅店老板、律师和托钵僧之外，谁也挣不到钱。许多人牢骚满腹，谁也不做好事，世风之坏让人实在难以忍受。

巴塞爾的出版商未能按时推出你的《乌托邦》，借口是追加了布多伊

^① 伊拉斯谟编订的《新约全书》1519年3月在巴塞爾出版。——原注

斯优雅的序文。他们已经收到这篇序文，正在排印你的书。接着又适逢弗洛本的岳父拉克内尔(Lachner)去世。不过，弗洛本的印刷厂还是会加班加点地印制我们的书。由于巴黎人和我作对的密谋，我还没有机会看到利纳克尔的《治疗法》^①。请客气地向鲁普赛特追索我给《丰富多样的语言》写的附记^②并尽快寄给我。

教皇和君主们借口讨伐土耳其人的残暴正在玩弄新的花招。倒霉的土耳其人！但愿我们的基督徒不残忍！甚至妻子们都被煽动起来了。一切二十六岁到五十岁的已婚男子都被迫拿起武器。与此同时，教皇还不允许留在家里的妻子们娱乐；她们要远离端庄的衣服，不能够穿金戴银，不能够穿丝绸，不能够佩戴珠宝首饰，不能够沾胭脂口红，不能够喝一滴酒，而且每隔一天就得搞一次斋戒；禁令声称，这是为了祈求上帝庇护她们出门征战的丈夫。即使有的男人由于必要的事务羁留在家，他们的妻子也必须遵守上述禁令，仿佛她们的丈夫已经奔赴疆场。夫妻二人可以同室却不能同床。基督保佑的战争胜利之前，夫妻不能接吻。我知道，这些规定会使妻子们感到恼怒，因为她们并不觉得这场战争十分重要。尽管如此，我知道你的妻子很有理智，她会服从教会的禁令，甚至会高高兴兴地服从。

我送来理查德·佩斯的小书《关于教皇赎罪券的结论》^③和《向土耳

① 《治疗法》(Therapeutice)是利纳克尔的译著，原著是盖仑的 *Methodus medendi*，该书到1519年6月方才问世。鲁普赛特(Lupset)知道这本书的印制情况。——原注

② 这篇附录也许是《论儿童的成长与文理教育》(*De pueris statim ac liberaliter instituendis*)，是在意大利写的。莫尔1516年致信伊拉斯谟(艾伦版《伊拉斯谟书简》第502封)云，他已经收到由鲁普赛特转交的伊拉斯谟的部分手稿，不过《丰富多样的语言》直到1529年才问世。——原注

③ 《关于教皇赎罪券的结论》(*Conclusions on Papal Indulgencies*)即是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Theses*)，1517年10月31日张贴在教会墙上，迅即在德国维滕堡印行。——原注

其人宣战倡议书》^①，因为我猜想这两本书尚未传到英格兰。有人从科隆来信说起一本小书，写的是关于尤利乌斯和彼得在天堂门口的争论^②，这本书已经印行，但没有刊印作者的姓名。德国人的印刷所不会停止他们疯狂的恶作剧，除非法律明令约束他们的轻率鲁莽。这不会有害，这样做对世人有好处……

请允许我的仆人在你的仆人处留宿一两夜，以免他万一碰上旅店里有传染病的房间，并请给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虽然我已经给了他来回的盘缠。我终于看到了巴黎印行的《乌托邦》，可惜有许多错讹。巴塞尔正在刊印另一个版本。我威胁说，除非他们比印制我的书更加用心，否则我就会和他们分手。再见，我最真诚的朋友。

223

书简 13 致庇突斯·雷纳努斯^③

卢万, 1518 年[约 10 月 15 日]

致朋友雷纳努斯, 问好:

亲爱的庇突斯, 让我向你描绘沿途那番悲喜剧。你知道, 我离开巴塞尔时身体还是虚弱, 人也烦躁, 这是因为我躲在家里的时间太久, 工作

① 《向土耳其人宣战倡议书》(*Proposal for Undertaking a War against the Turks*), 是罗马 1517 年 11 月 16 日发布的十字军东征令。——原注

② 《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Julius Exclusus*)。这首讽刺诗抨击 1513 年去世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伊拉斯谟从未直接否认他是该诗作者, 根据莫尔记述, 伊拉斯谟本人手里有一个抄本(艾伦版《伊拉斯谟书简》第 502 封)。——原注

③ 庇突斯·雷纳努斯即比特·比尔德(Beat Bild, 1485—1547), 原籍施雷特斯塔特(Schlettstadt)附近的莱诺(Rhenau), 1503 年在巴黎大学获硕士学位; 曾在几家出版社担任校勘工作, 先后服务的出版社是: 巴黎的 Henry Stephanus、斯特拉斯堡的 Schurer 和巴塞尔的弗洛本。他在弗洛本的出版社编辑和监察出版了许多书。——原注

又连轴转,没有来得及适应当地的气候。河上的航行并非不愉快,但中午时分的太阳热得烤人。我们在布雷沙克吃了一顿饭,那是我生平最难吃的饭。发臭的饭菜几乎要了我的命,成群结队的苍蝇比发臭的饭菜更加要命。我们坐在餐桌边无所事事地等了半个小时,等待他们端上所谓的“盛宴”。最后端上桌子的饭菜根本就不能吃:稀饭肮脏,里面不知道掺杂着什么团块,咸鱼已经不止热过一次,足以把人放倒。我没有造访加利纳利乌斯(Gallinarius),他捎来口信说发低烧。送信人还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加利纳利乌斯是小兄弟会(Minorite)神学家,我曾经和他辩论过个体性和“此”性^①的问题。他准备典当教堂里用过的圣餐杯。这是他苏格兰人的天才创意!黄昏时分,船主让我们到一个昏暗的村子住宿。我无心打听村子的名字,即使知道,我也不想告诉你。我几乎死在那里。我们在一间小屋里吃晚饭,强烈的汗臭味,塞进了60个人,混杂着许多恶棍,这一餐饭几乎吃到10点钟。天哪,那恶臭、那嘈杂,特别是那烂醉如泥之后的丑态!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只好硬撑着坐在那里去将就他们的时间安排。

224 早上天还很黑,我们就被水手赶着起床。我上船时又饿又困,前天晚上既没有吃饭,也没有睡着。午饭前我们抵达斯特拉斯堡,大约在9点钟;在那里,我们受到的接待要略微舒服一点,出版商舒尔(M. Schurer)送来的一点酒尤其助兴。文学社^②的一些朋友也来迎接,后来该社的全体成员都来会晤,其中最殷勤的是戈贝尔(Gerbel)。戈布怀勒(Gebwiler)和鲁道尔芬根(Rudolfingen)不让我付钱,他们的情况如常,无变化。我们从那里骑马到斯派尔,沿途没有看见士兵的影子,虽然一直有令人惊悚的战

① 个体性、“此”性(haecceitas),苏格兰哲学用语,比较“本质”(quiddity)和“实质”(essence)。——原注

② 文学社,即斯特拉斯堡的文学社,有一封该文学社致伊拉斯谟的信幸存下来,落款日期是1514年9月1日,伊拉斯谟提到的名字全都出现在这封邀请函里,只有戈贝尔例外。——原注

争谣传。我那匹英国马累垮了,难以走到斯派尔。那位该死的铁匠对我的马太粗暴,他竟然用烧红的烙铁给马的两只耳朵都打上了烙印。在斯派尔,我一个人溜出客栈去看我的邻居马特努斯(Maternus)。在那里,一位博学多才、很有修养的戴卡努斯(Decanus)整整款待我两天,他文质彬彬,待人谦和。我在此巧遇赫尔曼·布什(Hermann Busch)。

我乘马车从斯派尔到沃尔姆斯,再转美因兹。有一位名叫乌尔里希·瓦恩布勒^①的皇家秘书和我们同车。一路上他对我极其热情,照顾得无微不至。到了美因兹以后,他不让我住客栈,把我带到修会的住所去借宿,临行时他又把我送到船头。天气明丽,行船相当舒适,唯有一点不足:精心的安排把行船的时间拉长了。此外,船上的马臭味也难闻。第一天,约翰·兰根菲尔德(John Langefeld)偕同他的一位律师朋友陪我一程,他曾经在卢万大学执教。还有一位名叫约翰的威斯特法利亚人,他是美因兹城外圣维克多教堂的牧师,待人谦和、妙趣横生。

在波帕德(Boppard)口岸,我沿着河岸散步时,有只船正在靠岸,船上有人认出我,并把我的身份透露给一位海关官员。他惊呼,“那就是伊拉斯谟”。如果我没有记错,海关官员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夫·齐尼坎皮乌斯(Christopher Cinicampus),他的德语通用语名字是埃森菲尔德(Eschenfelder)。你简直不会相信,埃森菲尔德高兴得狂跳起来。他硬拽着我不放,请我到他家。他的一张桌子上堆放着伊拉斯谟的著作和海关文件。他大呼小叫地说自己运气好,呼唤妻子儿女和所有的朋友来看我。与此同时,我们船上的水手却呼唤我回船,他用两大扎啤酒把水手打发走了。水手们再次大声呼唤我时,他又许诺说,等他们回程时,他将免收他们的通关税,因为船长把我这样的贵客送到了他的家门口。从波帕德出发时,

225

^① 阿尔布雷特·丢勒为乌尔里希·瓦恩布勒(Ulrich Varnbuler)作的一幅肖像画现存维也纳的阿尔伯特纳艺术馆(Albertina);丢勒还以这幅画为蓝本作过一幅木刻。——原注

女修院的牧师约翰·弗拉米尼乌斯(John Flaminus)一直陪我到柯布伦茨(Coblenz);他像天使一样纯洁,判断力健全、冷静,学问非同一般。抵达柯布伦茨时,主教的秘书马提亚斯(Matthias)立即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这位年轻人举止沉稳,拉丁语很精确,又是精明的律师。我们共进晚餐非常尽兴。

抵达波恩后,牧师道别,以避免去科隆;我也想避开科隆,但仆人已经牵着马前往科隆,而船上又没有可靠的、可以托付的人,没有人去召回我的仆人。船上的水手我是不信任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科隆靠岸,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6点钟,这时的天气极其恶劣。我走到一家客栈,吩咐客栈的马夫替我租一两双驾马车,吩咐10点钟备饭。然后我到教堂去做礼拜,回到客栈后发现,午饭没有及时准备好。我运气不佳,双驾马车也没有租到,于是就退而求其次,租了一匹马,因为我的英国马已经累得不能再跑。但一切努力均告失败。我意识到这里的人在玩什么花招:他们想方设法让我逗留。我立即吩咐套好我原来的那几匹马,装好行囊驮在马上,另一个带不走的行囊寄存在客栈里。我翻身骑上那匹跛脚的英国马,急忙向牛恩巴赫伯爵^①的府第奔去,这是五个小时的行程。他家住贝德堡(Bedburg)。

我在伯爵家度过了五天美好的时光,愉快、安静、平和;此间,我完成了《新约圣经》的相当大一部分修订工作——我随身带着手稿。亲爱的庇突斯,你要是认识伯爵就好了。他年轻,但很有头脑,比很多年长者还强。他言语不多,但正如荷马对梅内莱厄斯^②的评价一样,他说话“调子清

① 牛恩巴赫伯爵(Hermann, Count of Neuenahr, 1492—1530),恺撒利乌斯(Caesarius)的学生,1508—1509年,牛恩巴赫伯爵陪老师去意大利。1517年,他在科隆大学教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后来成为科隆大学校长。他的著作中有为伊拉斯谟辩护的一封信。——原注

② 梅内莱厄斯(Menelaus),特洛伊战争期间的斯巴达王,美人海伦之夫,英雄阿伽门农之弟。

晰”、思维缜密。他的学问不限于某一领域,人不张狂,非常真诚,珍视友情。几天下来,我感觉身体健朗,很满意自己的状态,希望造访列日的主教时保持很好的状态,希望回到布拉邦的朋友之中时能够精神矍铄。多么期待美味佳肴、觥筹交错、尽情叙旧啊!奈何那是骗人的希望吧!人事沧桑陡转难测!从这些至福的美梦中,我突然又被扔进不幸的深渊了。

我预定了第二天的双驾马车。我的朋友不想在天黑前道别,他宣布第二天早上我动身时前来送行。那天晚上刮起了飓风,不过到早上时风力减弱了。但我半夜过后起床了,写字条给伯爵道别。到7点钟时伯爵尚未露面,我遂派人去请他。他应约而来,以惯常的腼腆和谦虚问我,是否决意冒着恶劣天气上路,他说为我的安全担心。亲爱的庇突斯,我那一刻鬼迷心窍,正如赫西奥德所云,我的理智已经完全丧失、荡然无存了。也许我冒险去科隆时理智就已经丧失过半了,也许有什么恶神在作祟吧。我希望,要么我的朋友事先给了我更加严厉的警告,要么我自己应该更加重视他那情真意切的劝阻。我被命运的魔力攫住了,我还能够说什么呢?我爬进没有棚顶的马车,风仍然在刮,“强风怒号,把深山里坚挺的圣栎都刮得瑟瑟发抖”。南风强劲,就像瘟疫来袭。我心里想,我裹了一层又一层衣服,足以抵挡寒风了吧,但猛烈的冷风还是刺入骨髓。黄昏时分又下起了小雨,比风更伤人。抵达亚琛时人已经筋疲力尽,马车在铺路的鹅卵石上颠簸,人累得够呛,肾结石又犯了,疼痛难忍。虽然我的坐骑跛脚,但骑马总还是比坐马车好受一些。到亚琛之后,一位牧师把我从客栈接到苏德曼(Suderman)的府邸。几位牧师像平常一样正在喝酒。午饭吃得不多,胃口吊起来了。但他们那一刻的下酒菜只有鲤鱼,且鲤鱼是冷的。我饱餐一顿。他们喝酒一直喝到很晚。我提前告辞就寝,因为前一天晚上几乎没有睡。

第二天,有人把我送到副修士长的家,轮到他做东款待我了。除了鳊鱼之外,没有其他的鱼(显然是由于暴风的影响,因为他很殷勤好客)。我吃的是风干的鱼,德国人称之为鱼干,鱼干串在小棍上。如果是其他的时

候,我肯定会吃得津津有味。不过我发现,这条腌制的鱼火候不够。午饭后的天气还是很不好,所以我回到客栈,叫人生火取暖。上文提到的牧师很有学问,他陪我聊天大约有一个半小时。这时我感到肚子不舒服,因为
227 不见好转,我送走他去上厕所。仍然不见好转,我就用手指头去刺激喉头,把半生不熟的鱼全部吐出来,恶心的感觉没有了。我躺在床上,不是睡觉而是静卧休息,头和身子都不疼了。和马车夫讲好两包行囊的运费后,晚上酒会的请柬到了。我婉言辞谢,但无济于事。我知道肚子最多只能够承受几口酒……这种场合的酒宴是非常丰富的,但对我而言则是浪费。我呷了一口酒暖暖胃,效果不错。酒后在苏德曼家里小憩。但一走出门,空荡荡的肚子不能暖身子,在夜晚的寒风之下,我不禁瑟瑟发抖。

次日早晨,我喝了一点暖过的啤酒,吃了几片面包,翻身上马。由于坐骑跛脚,骑马并不舒服。此时我的身体状况应该是卧床保暖而不是骑马赶路的。但那里是一片荒野,崎岖,不毛,丑陋得难以想象,乡民无所事事,所以我情愿赶快离开。路途危险有强盗,那些地方匪患严重——至少我是害怕遭遇盗匪,对匪患的担忧把心里因病的不舒服感觉驱赶得一千二净……走完4英里路后,到了马斯特里赫特,我下马喝酒暖胃,然后上马继续前往腾格雷斯,大约有3英里路。最后这一段路最痛苦。跛脚马使我的肾结石痛得难以忍受。如果下马走路,疼痛应该减轻一些,但我怕走路出汗,又怕天黑以后还在乡间赶路。赶到腾格雷斯时,我浑身上下痛得难以想象。此刻,由于肚子空荡荡,又加上耗费体力,我全身肌肉乏力,站立和走动都没有力气了。我嘴上说着话以掩盖病痛——嘴巴说话还有力气。我喝了一点啤酒暖胃,然后就寝。

早上起来我雇了马车,但决定先骑马,因为路面铺的是鹅卵石。到了不铺鹅卵石的路,我才坐上马车。我换骑一匹高头大马,心想它走鹅卵石路更平稳。我翻身上马时受冷空气刺激,眼前一黑,急忙叫人给我披上斗篷,但不久我就失去知觉,只是随行人员触摸我时还有感觉。我的仆人约翰和其他人站在我身边,让我自己自然恢复知觉,搀扶着我仍然骑到马

上。恢复知觉后,我换乘马车……此刻,我们快到圣特隆德城了。我挺直身子,以免看上去一副病态,端坐在马车里。黄昏的冷风又使我感到不舒服,好在没有失去知觉。我给车夫双倍租金,叫他第二天把我送到特尔蒙,离腾格雷斯6英里。他同意了。在特尔蒙,一位客人告诉我,列日的主教非常生气,因为我动身去巴塞尔时没有去造访他。喝酒安胃之后,我上床准备睡,但怎么也睡不好……我在这里巧遇一辆去卢万的马车,也是6英里的路。我随即登车。一路上身体不舒服,实在是难以忍受,但我们当天下午7点钟赶到卢万了。

我不想回卢万大学为我保留的宿舍。一是因为猜想屋子会很冷,二是不想冒险给学校的礼仪造成任何麻烦——如果有人谣传我患了瘟疫的话。于是我到提奥多利克的印刷所去借宿……当天晚上,背上的一块溃疡破口,我却不知道,因为疼痛减轻了。第二天,我请一位外科医生登门看病。他给我敷了些药膏。我的背上长出了第三个溃疡,那是一位仆人在腾格雷斯给我抹玫瑰油时抓伤的,为了舒缓肾结石的疼痛,他在一条肋骨上抹油时用力过猛,结果他那刺一样的指甲把我抓伤了……外科医生退出房间时悄悄地对提奥多利克及其仆人说,我患的是瘟疫;他说会送来药膏,但不会再上门诊治……过了一两天仍然不见外科医生登门,我才问提奥多利克是何原因。他托辞不答。我满腹狐疑,于是就问:“怎么,他认为我患了瘟疫?”提奥多利克才回答说:“正是,他肯定你那是瘟疫斑。”我禁不住破口大笑,连想都不会去想,我会患瘟疫。过了几天,外科医生的父亲上门探看虚实,检查一番之后,他肯定地说,真的是瘟疫。即使到这一步,我也没有被他说服。我悄悄地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他检查之后,用小丑的口吻说:“如果你是女人,我不会害怕和你睡觉——还要和你做爱呢。”……(我又请了另一位医生,但他爽约,没有第二次登门给我看病,而是派他的仆人把药送上门。)我把他的仆人赶走,我对那些医生失去耐性,向基督毛遂自荐当上了自己的医生。

三天之内,我的胃口恢复了……我立即恢复研究工作,修订完《新约

229 《圣经》……一到卢万我就吩咐，除非我指名道姓邀请，谁也不得上门，以免我的病吓坏人，也避免有人过分殷勤而给我带来不便。然而，多普首先不请自来，接着是阿特、马克·劳林（Mark Laurin）、帕斯查西乌斯·波西利乌斯（Paschasius Berselius）。他们每天来探视，他们的陪伴令人愉快，这大大有助于我恢复健康。

亲爱的庇突斯，我个子瘦小，身体孱弱，年老体衰，经过旅途的劳顿和痛苦，沿途又笔耕不辍，但我竟然能够战胜这么多病痛——谁又能够相信呢？你知道，不久前在巴塞尔时我病得不轻，不只一次病倒。我当时怀疑那一年就会要我的命：疾病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加重。但即使在病痛的巅峰时期，我也没有感觉到求生欲望的折磨，更没有因惧怕死亡而浑身颤栗。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基督身上。我祈祷的唯一请求是，基督给予我他认为最有益的东西。我觉得很久以前年轻的时候，一听说死亡这个字眼就吓得发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至少不那么害怕了。我不用寿命的长短来衡量人的幸福。我已经五十多岁，没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年纪，我没有理由抱怨说我的寿命不够长。倘若寿命的长短有关系，我已经拟好一篇纪念文字，向子孙后代证明，我曾经来人世走过一遭。倘若真如诗人们所云，嫉妒在人死之后保持沉默，美名将像日光一样更加艳丽：虽然因荣光而感动未必适合基督徒的心，让我还是能够享受到使基督愉快的荣光吧！再见，我最亲爱的庇突斯，其余情况你可以从我给卡皮托的信里看到。

书简 14 致马丁·路德

卢万，1519年5月30日

最良好的祝愿，最亲爱的虔信基督的兄弟。对你的来信表示由衷地欢迎，兄弟展现出犀利的智慧，散发着基督的精神。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你的书在这里引起的轰动。人们甚至无法铲除

奇怪的念头,他们怀疑你的书是在我的帮助之下完成的,而且怀疑我是这一帮人里的旗手,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他们认为自己抓住了一个把柄,可以借此摧毁优秀的学问;他们在道德上厌恶这样的学问,害怕它构成威胁,担心自己神学会黯然失色。他们把自己置于基督之上。他们的另一个目的是摧毁我,因为他们认为我对学术的复兴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一场闹剧闹翻了天,无边无际的狂言、花招、诋毁、狡诈满天飞,要不是亲自在场、亲眼目睹,要不是目睹这一切,谁要是说神学家们竟然会如此疯狂,我是绝不会相信的。你可能会把这样的疯狂当做致命的瘟疫。然而,这场瘟疫的毒气硬是从几个人弥漫开来,卢万大学相当多的人染上了这种异常的疾病,他们发疯了。

230

我申明不认识你,从来没有读过你的书,因此既说不上同意也说不上反对其中的任何思想。我仅仅是警告他们说,如果没有读过你的书,就不要向公众这样大呼小叫地发泄自己的仇恨;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的判断应该是具有非同小可的分量。再者,我还请他们考虑在混杂了各色人等的公众面前搞这一套中伤诋毁是否有好处。其实,如果在有文化的人中间用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去磋商、探讨、批驳他们指责的观点,那才是恰当稳妥的,因为他们批驳的生活方式是人人赞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做法尤其不妥。我的苦口婆心输得很惨。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狂言乱语,继续含沙射影地,不,是恶意中伤地搞那一套驳斥。我们不知道多少次呼吁和解啊!他们多少次煽动新的混战啊!可他们凭借的却是轻率而胡猜的一丝怀疑。这些人竟然自认为是神学家呢!这里的宫廷圈子里不喜欢神学家,他们把这一点也归罪于我。这里的主教们非常喜欢我。这些所谓神学家们不相信书本,他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狡诈上。我鄙视他们,坚信我是对的。他们对你的态度略有缓和,但他们怕我的笔,因为他们问心有愧。我肯定会揭穿他们的真相,因为基督的教诲和榜样不会叫我回避这样的责任。野兽能够靠和善来驯服,相反,和善却能够使这些人疯狂。

231

英国有许多位高权重的人高度评价你的著作。卢万这里也有人支持你的追随者,比如列日的主教就支持你的追随者。我个人则尽量保持中立,这更加有助于新型学术的繁荣。看起来,不事张扬、彬彬有礼的态度比诉诸暴力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正是这样的态度使基督的影响传遍世界,也正是这样的态度使保罗避免了犹太律法的追究,他用比喻的方式解释一切事物。强烈反对滥用教皇权威的人而不是反对教皇本人,这样做显然是更加明智的,我认为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和君主们打交道。至于学校,我们不应该拒绝学校,而是应该使它们回到更加理性的研究工作轨道。凡是普遍被人接受的东西都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从人们的头脑中彻底铲除的,我们必须反复用说服力强的证据讲道理,而不是做强势的断言。对有些人恶毒的责难最好是不理睬而不是去搞反驳。我们必须处处小心,绝不以傲慢的态度和党派的精神去说话和行事;我相信,这样做对基督的精神而言是令人愉快的。与此同时,我们要保持平静的心态,不要受愤怒、仇恨或野心的诱惑。我们在虔诚侍奉上帝时,这一类情感有可能正潜伏着等待我们去上当呢。

我并不想班门弄斧,我仅仅是在继续做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我拜读了你对《诗篇》的评注^①;很喜欢,希望你的大作能够使读者大获裨益。安特卫普修道院院长^②是白璧无瑕的教徒,他非常喜爱你的著作,自称是你的老学生。他几乎是独一无二认真为基督布道的人,其他人提倡的是人间鸡毛蒜皮的琐事,或者是为自己谋利。

我已经致信梅兰希顿。基督传授给你的精神将与日俱增。为基督的荣光祈祷,为民众的福祉祈祷。

① 《诗篇里的宗教活动》(*Operations in Psalmos*),路德著,维滕贝格印行,1519年。——原注

② 该修道院院长是(伊珀尔的)詹姆斯·普鲁斯特(*James Probst/Proost of Ypres, 1486—1562*)。——原注

书简 15 乌尔里希·胡腾^①

安特卫普,1519年7月23日

致杰出的骑士乌尔里希·胡腾,问好:

……至于你想要的莫尔肖像,但愿我能够用自己的妙手作一幅完美的画就好了,那才能够和你强烈的欲望相匹配!此外,如果能够用相当大的篇幅思考并描绘这位最美好的朋友,那也会使我不胜愉快。首先,并非每个人都想要探索莫尔的才干。再者,我不知道他本人是否能够让一位冷漠的画家给他作画,这是因为我觉得给他作画是了不起的任务,其庄重并不亚于为亚历山大大帝或阿喀琉斯^②作画,他们两人不朽的程度也未必能够胜过莫尔。总之这样一件大事需要阿佩利斯^③那样的艺术大师。我担心,我可能更像贺拉斯笔下的角斗士^④,而不像阿佩利斯那样的画家。不过,我准备为你画一幅莫尔的素描,而不是一张呆滞的全身像,以我在他家里和他相处的观察或回忆为依据,尽我所能画好。如果你曾经在什么外交使馆与他邂逅,你就会意识到你挑选作画的伊拉斯谟是多么的笨拙。我非常担心,你会责备我有嫉妒心或太偏爱,在无数的英雄才俊里,我可怜的洞察力体察的人居然如凤毛麟角,我的嫉妒心记住的人居然会寥若晨星。

232

让我先介绍你不了解的莫尔那一面。他的身材并不伟岸,但也不见得矮小,他的四肢匀称,没有任何不尽人意之处。他的皮肤白皙,容光焕

① 乌尔里希·胡腾(Ulrich Hutten, 1488—1523),德意志骑士和人文主义者。——原注

② 阿喀琉斯(Achill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

③ 阿佩利斯(Apelles),公元前4世纪希腊画家,曾任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宫廷画师。

④ 贺拉斯:《讽刺诗集》,卷二,第vii页,第96页(诗里描绘的角斗士是画家作画的对象而不是用炭精作画的画家)。

发,虽然并不红润,但不乏血色,有一丝玫瑰红闪烁。他的金色头发带有一丝棕色,或者说是浅棕色,他胡须稀疏,眼睛呈蓝灰色,有一些雀斑:这通常说明快乐的天性,英格兰人也认为这样的眼睛好看,而我们则更加喜欢深色眼睛。据说没有任何一类眼睛是没有缺陷的。他的表情和他的性格是温和的,总是表现出娱悦而友好的欢欣,但不凝固于微笑的神态。说实话,这样的神情更适合欢乐而不是严肃和庄重,当然和愚蠢或滑稽毫不搭界。他的右肩似乎略高于左肩,走路时尤其如此:这不是天生的姿态,而是习惯所养成,像我们很多人这样那样的习惯一样。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任何令人注目的地方,但那仅仅是和他的其余外观比较而言。从童年时代起,他就不太注意个人修饰,到了奥维德^①所谓的男人都应该注意他却偏不注意的程度。即使到他这个成熟年龄,你还是可以从他的外观看出,他年轻时一定是仪表堂堂。我初次认识他时他不过二十三岁,他现在刚好四十岁。^②

233 他的身体不强壮,但令人满意,能胜任一切优秀公民承担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病痛。一切迹象表明,他的预期寿命应该很长,因为他的父亲享年将近八十^③,活到了充满活力的耄耋之年。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不挑食的人。成年以后,他仍然喜欢喝水,这是继承父亲的习惯。为了不使人厌烦,他用锡罐壶喝的啤酒清淡得就像清水,而且他常常就只喝清水。英格兰人喝酒的习惯是朋友共用一个高脚杯,他总是做出一个呷酒的姿

① 奥维德(Ovid,前43—17),罗马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岁时记》、《哀歌》等。

② 托马斯·莫尔爵士的肖像画是他五十岁时由汉斯·霍尔拜因作的,现在由纽约的弗利克(Frick)收藏。霍尔拜因为他另外作的两幅肖像画收藏在温莎堡的皇家图书馆。关于莫尔的全家福画像,请见本书英文版第236页注释4。——原注

③ 托马斯·莫尔的父亲名约翰·莫尔(John More,1453?—1530),那时任民事诉讼法官,1523年晋升为英国高等法院法官。——原注

态,以便不让人看出他不喜欢酒,同时也是让自己习惯于大家交往的方式。他似乎喜欢牛肉、咸鱼和二等的面包,但面包要发得好,他不喜欢一般人认为的美味佳肴;除此之外,他绝不讨厌任何使人愉快的东西,甚至是大快朵颐的东西。他非常喜欢奶制品和水果,喜欢吃鸡蛋。他的声音既不高亢也不微弱,很容易听清楚,但既不柔和,也不富有韵律,这是口齿清晰的声音。虽然他喜欢各种音乐,但他似乎没有声乐天赋。他说话清晰明快,不紧不慢,既不急促,也不犹疑。

他穿着朴素,不喜欢佩戴丝绸、紫色或黄金色的饰链,只要不因此而觉得不体面就行。他不太注意普通人所谓的优雅仪态,不要求别人这样行事,在会晤、娱乐场合也不将这样的举止强加于人;当然如果他喜欢,他是熟悉这一套仪态的。不过,他认为这一套仪态有一点阴柔;如果把很多时间花在这一套华而不实的虚饰上,那是不适合男子尊严的。

起初他不喜欢宫廷生活,不喜欢和君主王公打交道,因为他始终特别讨厌暴政,正如他特别喜欢平等一样。(你看到的宫廷生活很难得是谦虚的,很难得是不大肆张扬、不尚虚饰和奢侈、不沾染暴政的。)实际上,虽然亨利八世彬彬有礼、不拿架子,不欠缺帝王的品格,但皇室把莫尔拽进宫廷还是遭遇到重重困难。他天性贪恋独立和闲适;闲暇时他一定会玩得尽兴,但每当公务需要,谁也比不上他那样细心或耐心。

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友谊,他最真诚地培育友谊、维护友谊。赫西奥德不赞同“过多朋友”,他却不怕朋友多,愿意和任何人建立友好关系。他择友绝不挑剔,为了维护友谊总是做必要的调适和经常的努力。如果他遇见不能改正缺点的朋友,他总是等到适当的时机才解除朋友关系;他不是立即断绝关系,而是逐渐化解友谊。如果他发现某人真诚,适合他的脾性,他就喜欢与之交往和聊天,使人觉得这似乎是他生活的主要乐趣。他讨厌打球,讨厌玩纸牌,讨厌赌博,讨厌一般有地位的人消磨时间的那些游戏。此外,虽然他对自己的事情有点粗心,但他对照顾朋友的事情倒是非常细心的,恐怕谁也比不上。需不需要我继续往下说呢?如果有人想

要寻找真挚友谊完美的例子,他就最好到莫尔身上去寻找。

在社会交往中,他的礼貌和魅力罕有人能与之匹敌,无论多么忧郁的人他都能够使之高兴,任何禁忌的话题他都能够驱散其沉闷的气氛。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喜欢说笑话,他有许多天生的笑料,但他说的笑话不会降格到小丑的地步,他绝不会喜欢那种刺伤人的讥讽。到了青年时代,他创作并出演小喜剧。哪怕是针对他的风趣笑话,他也会喜欢,他喜欢有新意的、机敏的俏皮话。青年时代他就喜欢写隽语诗,尤其喜欢卢奇安讥讽的隽语。实际上,我写《愚人颂》是由他推动的,他是要我像骆驼一样献舞。

在人际关系上,他在一切交往中寻求乐趣,即使是最严肃的事情。如果他接触的是聪明而有文化的人,他就在人家的智慧中寻求乐趣;如果他接触的是无知而愚蠢的人,他也在其中寻求乐趣。面对甲级傻瓜时,他不会感到为难,他能够用灵活多样的手法适应一切人的感情。与女人即使与他的妻子交往时,他也有说不尽的笑话和乐趣。你可以说,他是德谟克利特再世,甚至是毕达哥拉斯再世,毕达哥拉斯悠闲地在市场里漫步,眼看着买卖双方吵吵嚷嚷地讨价还价,他也能够以平静的心情思考问题。谁也不如他那样不被大众舆论牵着鼻子走,同时,谁也不如他那样与人们的普通情感拉开距离。

235 他特别喜欢观察各种动物的相貌、脾气和行为,所以他家里豢养的鸟类几乎是无所不有,他豢养的兽类是难得一见的,比如猿猴、狐狸、雪貂、鼬鼠,等等。此外,他喜欢购买外国制造的、有观赏价值的东西,他的住宅里遍布这样的洋玩意,所以凡是客人目光投向的地方无不陈列着需要仔细欣赏的藏品;每当客人高兴地观赏这些藏品时,他也从别人的享受中得到乐趣。

他年轻时并不讨厌和年轻女郎谈情说爱,但他尊重女人,喜欢把爱施予他必须追求的女人,吸引他的女人魅力与其说是性的交往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交流。

他幼年就如饥似渴地狂吞古典。少年时就学希腊文学和哲学。他的父亲本人善良而理性,但却不支持他学古典,而且还剥夺他从其他途径可

能得到的一切支持。人们认为他和父亲断绝了关系,因为他似乎抛弃了父亲的学问——英国法学。在英国,司法行业和真正的学问几乎没有关系,但司法界的权威却特别受人尊敬,学法学被认为是成名的最佳捷径,因为这个岛国的大多数贵族的背景都是法学。据说没有多年的苦读,谁也不可能获取完美的法学知识。于是,虽然年轻的莫尔天生能够做更好的事情,虽然他反叛父亲的愿望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品尝了各门学问之后,他还是攻读法学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诉讼人请他受理案子时,他比谁都高兴。他在业余时间从事律师业务的收入超过了那些全职律师的收入,因为他智力过人,才思敏捷。

与此同时,他下苦功研究基督教作家。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登台对大群听众讲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牧师和长者向这位年轻人请教时并不感到难堪或害臊。有一段时间,他全心全意地研究虔诚的宗教情怀,在职守、斋戒和祈祷上的初步体验中学习担任牧师。在这个方面,他的理性远远超过那些轻率进入这个艰巨领域、缺乏训练的人。他不能献身神父工作的唯一阻碍是他无法摆脱娶妻生子的欲望。因此,他选择做守身如玉的丈夫而不是做不守贞操的牧师。

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姑娘^①,门第不低,但尚未经过淑女训练,她一直在乡间与父母和姐妹一道生活,所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妻子。他让妻子学习文学,让她学习各种音乐。他按照终身伴侣的目标来训练妻子,可惜她英年早逝,但她还是为莫尔生了七个儿女,健在的孩子有三女一子,女儿玛格丽特、爱丽丝^②、塞西莉和儿子约翰。虽然朋友们劝他不要再婚,但他不愿意长期鳏居。妻子去世才几个月,他就娶了一位寡

236

① 莫尔的妻子原名简·科尔特(Jane Colt)。——原注

② 伊拉斯谟有误,莫尔这位女儿的名字是伊丽莎白;爱丽丝是他继女的名字。——原注

妇^①，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有人理家；因为第二任妻子并不太漂亮，他自己就幽默地说，娶了一位女子，一位精明而警觉的家庭主妇^②。不过，他和第二任妻子的生活也既惬意又和谐，仿佛她还是一位含苞待放、美丽迷人的黄花闺女。妻子顺从他，那不是靠他的指令，而是靠他的俏皮诙谐和甜言蜜语。他已经处在老年的边缘，如果没有这几手，他怎么能够诱惑一位绝非唯唯诺诺的女人呢，怎么能够吸引一位时时刻刻盯着自己家庭的女人呢？他又怎么能够劝妻子学会西特琴、长笛、单弦琴和雷高德直笛呢？她又怎么愿意按照每天的规定完成练习的曲子以满足丈夫的希望呢？

他管理家庭的方式令人愉快，没有争吵，没有纷扰。即使偶尔的争辩也立即得到平息，他能够使分歧立即消除。他绝不让任何人怒气冲冲地离家外出。他们全家似乎受到幸运女神的惠顾，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走了好运，谁也没有让家庭的美名染上一点污迹。你难以找到像他那样与继母愉快相处的人——他的父亲已经给他娶了两位继母，莫尔像爱生母那样爱两位继母。不久前，他的父亲又给他娶了第三任继母。莫尔捧着《圣经》发誓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更好的母亲。此外，他对父母和孩子均一往情深，绝不会因为情深而感到厌烦，也不会会在家庭责任中失职。

237 他坚决反对肮脏的谋利手段。他从自己的大笔财富中拨出足够孩子生活的资产；其余的家财他慷慨大方地用于捐助。他担任律师时总是给予顾客真诚而友好的咨询，为委托人的利益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总是劝说当事双方协商解决分歧——这样做少花钱。如果劝说失败，他会向当事人指出打官司花费最少的方法——因为有些人的心态是倾向

① 莫尔的第二任妻子名叫爱丽丝·米德尔顿(Alice Middleton)。——原注

② 托马斯·莫尔爵士有一张汉斯·霍尔拜因画的全家福(约1527—1528年)，背景是他家住宅，画家是伊拉斯谟推荐的。原作亡佚，见第xxix页图片和第260页图片。——原注

于对簿公堂。在他出生的伦敦城,他担任过几年的民事法庭法官。^①这个职务并不繁重,只有星期四上午才开庭审理案子,他的审理工作被认为是最令人尊敬的工作。谁也比不上他审理的案子多,谁也不如他的品德高尚。他免收习惯上应该向诉讼人收取的费用(比如原告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应该向法庭支付的3个先令,被告应诉前应该缴纳的费用也免除;而且指出多收费是错误的)。他的表率作用赢得了伦敦市民的喜爱。

他决定满足于这样的地位,既有足够的影响又不至于遭遇严重的不测。他两次被迫接受使馆的职位,由于他外交工作出色,亨利八世不会善罢甘休,直至把他拽进宫廷。难道他不是被“拽进”宫廷的吗?孜孜不倦工作的人务必以获准进入宫廷为荣,可他不稍懈怠的工作却是为了逃避进宫廷去效命。当亨利八世准备在宫廷里塞满有分量、学问、智慧和品格的人物时,莫尔正是他最需要召唤的人之一;他认为莫尔是属于他亲密圈子里的一个要员,他绝不允许莫尔离开他的身边。凡是国王有要事商讨时,谁也不如莫尔能干;当国王准备在轻松的闲聊中取乐时,谁也比不上莫尔那样使宫廷里充满欢声笑语。棘手的问题处理需要重量级的人物做出明智的裁决,而莫尔的裁决竟然能够让当事双方都充满感激之情。然而,谁也无法说服他接受感谢他的任何礼物。如果世界各地的统治者都能够把莫尔这样的官员委派到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世界各国的人民就能够安享幸福啦!在此期间,莫尔没有沾染上一丝一毫的傲气。

在公务的重重压力之下,他并没有忘记老朋友,且不时回头去研究他热爱的文学。一切官位的权威,他对国王的一切影响全都被用来为国家和朋友服务。他热望为所有的人服务,具有悲天悯人的美好情怀,他总是能够随时随地给人提供帮助;现在他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人了,因为他享有了更大的权力。有人受到他金钱方面的帮助,有人受到他权威的保护,有人由于他的引荐而获得晋升。凡是不能用其他方式帮助的人,他就提供

238

^① 1510年,莫尔被推举出任代理的县治安官。——原注

咨询建议，他从来不会把人打发走而让人失望。你不妨说他是一切受困者的庇护人。他认为，帮助受压迫者、使迷惑者脱困、使疏远者互相妥协时，他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厚了。无论怎么看，他都很幸运，而鸿运的伴生物常常是自高自大，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他这样远离骄傲恶习的人。

然而，我必须回头说莫尔为我的《愚人颂》作的序文——这是把我和莫尔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他青年时代主要是写诗，稍后他长期致力于磨砺他的散文，用各种文章锤炼自己的文风。我不必描绘他的文风是什么样子，尤其不必在你面前多此一举，因为你总是对他的书爱不释手。他尤其喜欢创作宣言式的文章，喜欢其中那些处理悖论主题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能够更好地砥砺人的智慧。这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写了一篇对话去捍卫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捍卫在那种制度下的妻子。他反驳卢奇安的《论暴政》(*Tyrannicide*)。在写这个主题时，他希望把我作为对话里的对手，以检验他驾驭这种文字的能力。他发表《乌托邦》的目的是要解释国家败坏的原因，不过其主要目的是为英国画像；他对英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和探索。他的第二本书是忙里偷闲写成的，第一本书却是机会来临、一时兴起一挥而就的。两本书风格的不一致大概是这样引起的吧。

你难以找到胜过莫尔的即兴讲演大师，他具有驾驭巧妙言辞的巧妙才能。他具有即兴发挥的才智，他的才智总是一路向前飞翔，他的记忆力总是取之不尽；这一切他都能够信手拈来，他总是能够因时因地制宜，什么话题他都能够兴之所至、随意发挥、文思汹涌、毫不滞涩。他的论述极其准确，超乎想象，所以他能够在神学家熟悉的领域里使神学家疲于应付、十分困惑。虽然约翰·科利特自己的判断力机敏而准确，可是他在和朋友聊天时常常说，英国只有莫尔这样一位天才，虽然这个岛国确实有许多优秀的才俊。

他孜孜不倦地培养虔诚的感情，同时又远离一切迷信的惯例和仪式。他在固定的时间祈祷，可他的祈祷不是一般的祈祷，而是发自内心的祈祷。他和朋友们谈及世界的未来时，你可以看到他言词恳切，满怀坚定的

信念。即使在审理案子时,他也表现出这样坚定的信念。可是有人却认为只有在修道院里才能够找到基督徒!……你瞧,我为你作的这幅画不是很像,莫尔这位模特很棒,我这位画家却很差劲。但即使你更加了解莫尔之后,你对我这幅画的喜爱也不会减弱。不过,此刻我可以堵住你的嘴巴了,你不至于责备我没有听你的话吧,你总是抱怨我写的信太短。但这封信似乎并不是很长,我知道你不会觉得它拉得太长:我们的朋友莫尔的魅力使你不至于觉得这封信长吧。再见。

书简 16 维利波尔德·皮尔克海默^①

巴塞尔,1525年3月14日

致卓越的维利波尔德·皮尔克海默,问好:

收到你馈赠的戒指,非常漂亮,这是很好的纪念品。我知道人们珍爱珠宝是因为有人相信,珠宝能够保佑人摔跤时不伤筋动骨;还有人说,如果摔跤是致命的,危险就会转移到珠宝上去,结果是珠宝摔坏而人却安然无恙。在英国骑马的时候,我曾经从一条相当高的河岸边摔下去,但人和坐骑都毫发无损,且我戴的戒指也没有摔坏。这是圣安德鲁斯的大主教^②亚历山大的礼物,我想你从我的著作里已经对他有所了解。我和他在意大利锡耶纳告别时,他脱下戒指送给我说:“请收下这枚戒指,这是我们终身不渝友谊的宣示。”即使在他战死之后,我仍然信守我们友谊的诺言,我在著作里纪念他。如今的巫术迷信无孔不入,潜入了生活的一切领

① 维利波尔德·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 1470—1530),德国人文主义者、诗人,曾赴意大利攻读法学和希腊语;画家丢勒曾为他的著作画插图。——原注

② 亚历山大·斯图尔特(Stewart, Alexander, 约1493—1513),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私生子,在弗洛登战死,1508—1509年在意大利游学期间是伊拉斯谟的学生,有关该戒指的情况,请见本书英文版第247页之后。——原注

域；倘若珠宝真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德，我真想得到一枚神奇的戒指，希望它能够使我免遭恶意中伤。至于防止摔伤的作用，我将听你的劝告——我情愿相信其魔力而不愿意冒险。

240 肖像画不如珠宝珍贵，我收到你的一枚纪念牌和一幅肖像画，这两件礼物至少把你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亚历山大大帝只让阿佩利斯一人为他作画。你在阿尔布雷特·丢勒身上找到了阿佩利斯的影子^①。丢勒是一流画家，他非凡的判断力也令人敬仰。但愿你找到利西波斯^②之类的艺术家为你作纪念牌就好啦！我把你的纪念牌挂在卧室的右手墙上，你的肖像画挂在左手墙上。无论我伏案写作还是在室内踱步，我都看见我的维利波尔德，所以即使我想忘记你，那也不可能了。不过，我对朋友的记忆力胜过对一切东西的记忆力。当然，即使没有备忘录、肖像画、书信唤起记忆，维利波尔德也是不可能忘记的。另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你的画像常常使客人和我谈起你。但愿我们的书信能够更加安全畅通就好了，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至于那么互相思念了。你已经有一枚我的铜质纪念牌。我不会反对伟大的艺术家丢勒为我作肖像画^③，但我不知道怎么能够请到他。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曾经为我作过一幅速写，可惜他刚一动笔，宫廷就派人来召唤我，这幅画就不得不半途而废。艺术家为我作画时，我一直是表情阴郁的模特儿，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

① 丢勒为皮尔克海默作了三幅画，两幅素描（分别存德国柏林和布伦瑞克），一幅铜刻画。——原注

② 利西波斯(Lysippus)，希腊雕塑家，活跃于公元前350年左右。在1523（或1524）年1月8日致皮尔克海默信（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1408封，注释29）中，伊拉斯谟似乎对昆廷·梅奇斯1519年为皮尔克海默作的纪念牌的背面不满意。现存的皮尔克海默纪念牌的背面有迹象表明，纪念牌背面根据伊拉斯谟的建议做了修改。——原注

③ 1520年丢勒为伊拉斯谟作了一幅素描（现存卢浮宫），1526年他又为伊拉斯谟作了一幅铜刻画。——原注

我可能会更加阴郁。^①我津津有味地读你写的著作,既博学又风趣。你谈到有些人蛊惑人心的那一套东西,他们在摧毁福音运动,自己却幻想正在从事伟大的事业。关于他们这一套东西,我也许有话要对你说,但那是下一封信的事了,有余暇我再写信。再见。

书简 17 致马丁·路德

巴塞尔,1526年4月11日

致马丁·路德,问好:

你的信来得太迟。^②然而,即使它恰逢其时,我也不会有丝毫的动摇。我不是那种一两句好话就可以安抚的人,也不是受到你们的致命伤害以后还可以被一两句恭维话抚平伤口的人。你的本性如今已世人皆知,可你来信收敛笔锋、若无其事,仿佛你从未疯狂攻击任何人,不,仿佛你从来没有写过令人恶心之至、恶毒之至的东西。现在你觉得你是一位小小的罪人,其他时候你却几乎硬要把自己当做上帝。正如你信中所云,你脾气暴躁,而且你在这种令人惊讶的争辩中寻求乐趣。那么请问,为什么你不把这一篇骂人的杰作用来针对罗彻斯特的主教^③或科克勒斯^④

241

① 1523—1524年之间,伊拉斯谟请霍尔拜因作了几幅肖像画。现存的有几幅原作和临摹。——原注

② 在路德致伊拉斯谟的信中,他显然试图缓和伊拉斯谟的愤怒,伊拉斯谟对他的《论意志的不自由》(*De servo arbitrio*)非常不满。《论意志的不自由》是他对伊拉斯谟1524年所著《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 diatribe*)的答复。路德的信来得太迟,伊拉斯谟的《驳路德所论意志的不自由》(*Hyperaspistes Diatribe adversus Servum Arbitrium Martini Lutheri*, Basle, Froben, 1526)已经在当年由弗洛本刊印。——原注

③ 罗彻斯特的主教即约翰·费希尔(1459?—1535)。——原注

④ 科克勒斯(Cochleus),即温德尔斯泰因的约翰·多本内克(John Dobeneck of Wendelstein, 1479—1552)。——原注

呢？^①他们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侮辱你，刺激你，而我的《论自由意志》^②只不过是客气争辩。你书中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探讨的主题有何关系呢？你那么多歪曲和诬蔑我的谎言，你指控我搞无神论、伊壁鸠鲁论、怀疑论，责备我亵渎神圣的信仰，如此等等，而且你还在许多我保持沉默的问题上^③对我发起攻击——这一切和我们探讨的主题有何关系呢？我不会把你这一切攻击放在心上，因为我不至于由于你的任何攻击而于心不安。倘若我不是以信奉上帝和《圣经》的基督徒的头脑来思考问题，我绝不会希望把自己的生命拖到明天。即使你陈述意见时用的是你平常的激烈情绪而不是疯狂的歪曲，你也不至于刺激这么多反对派的。从目前的事实看，你疯狂的歪曲就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④，你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放纵你的感情，你为此而得意洋洋。你在多大程度上让事实说话呢？你把那么多明显的罪名强加在我的身上。我的《论自由意志》根本就无意挑动众所周知的事情。

也许你幻想伊拉斯谟没有人支持。我的支持者超乎你的想象。不过，我们两人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这并不重要，对我尤其不重要，反正我来日无多；即使全世界都在为我们两人鼓掌喝彩，那都不重要。使我感到不安、使我周围最有思想的豪杰不安的是：你那傲慢、放肆、煽动的脾气正在粉碎这个世界，使之陷入毁灭性的混乱之中，使善良的人和爱好学问的人去接触一些疯狂而伪善的法利赛人^⑤，你正在把邪恶者和革命者武装起来造反，总之，你的福音事业正在使一切神圣的和世俗的事物陷入混

242

① 罗彻斯特的主教约翰·费希尔和约翰·多本内克两人均反对马丁·路德。

② 《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 diatribe*)。——原注

③ 伊拉斯谟使用的拉丁文的 *reticeo* (沉默) 应该读作英语的复数 *retices* (沉默)。——原注

④ 伊拉斯谟指的是路德的著作《论意志的不自由》。

⑤ 法利赛人 (Pharisee)，公元前 2 世纪到 2 世纪犹太教中的一派的教徒，标榜墨守传统礼仪，后转义成伪善者。

乱。你似乎在竭力阻止你掀起的风暴转向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我一直在追求这样的机会。所谓你欠我什么情,你偿还了多少——我不想说这些东西,因为那一切只不过是个人的事情;使我感到忧心的是你造成的公共灾难,是一切混乱、难以挽救的局面。我们感谢的只能是你那桀骜不驯的脾气。你不听朋友们理智的劝告。在朝秦暮楚的骗子的挑唆之下,你很容易走极端。我看不见你把谁从黑暗的力量中解放出来。你应该把你的笔当做利剑,刺向那些不知感恩的可怜虫,而不是胡乱攻击温和的对手。我希望你的脑子更好使,希望你不那么沾沾自喜。无论你给我什么祝愿吧,只要不用你的脑子祝愿就行,除非上帝改造了你的脑子。

书简 18 致提奥夫雷斯图斯·帕拉切尔苏斯^①

[巴塞尔,约 1527 年 3 月]

致医术高明的爱因塞登的提奥夫雷斯图斯·帕拉切尔苏斯,问好:

大夫,你给予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向你问好并祝你继续安享精神健康,这并无异常之处。你只见过我一次,不知道你为何对我如此了解。你的话我似懂非懂,但我意识到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不是靠我的医学知识判断你说得有道理,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医,而是从我自己疼痛的感觉中意识到你有道理。我一直觉得肝区疼痛,但无法确诊问题出自哪里。许多年前,我就看见尿液中有乳糜性脂肪。你提到的第三个问题^②我不完全

① 原名爱因塞登的提奥夫雷斯图斯·庞巴斯特(Theophrastus Bombast of Heindeln, 1493—1541), 又名霍亨海姆的提奥夫雷斯图斯(Theophrastus of Hohenheim), 霍亨海姆是他的祖籍地。帕拉切尔苏斯这个名字可能是从霍亨海姆翻译过来的,其含义可能是声称胜过切尔苏斯(Chelsus)。切尔苏斯是古罗马医师。1527 年,帕拉切尔苏斯被聘为内科医师和基础科医师。——原注

② 根据伊拉斯谟主诉的症状,帕拉切尔苏斯诊断伊拉斯谟患的是肾结石,病因是盐分在肾脏里形成结石。——原注

懂,不过看上去还是很有说服力。

正如我向你通报的那样,几天内我没有时间来看病,也不敢有什么病痛,更不敢死亡,我现在忙学问忙得不亦乐乎。但如果有什么办法减轻痛苦而不使身体虚弱,恳请你指教。你的来信太简略,你的话短得不能再短,可否请你详细解释信中的诊断和嘱咐,亦请开点其他药让我口服,直到我有时间来看病。我不敢承诺能够支付和你的医术及心血匹配的酬谢,但我至少可以保证有一颗感激不尽的心。

243 你救活了弗洛本^①,他是我的另一半。倘若你能够使我恢复健康,你在救我一个人的过程中就拯救了我们两个人。但愿我们运气好,能够让你待在巴塞尔!

恐怕你难以阅读我(收到你的信以后)匆忙中草写的几行字。再见。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亲笔

书简 19 致马丁·布泽尔^②

巴塞尔,1527年11月11日

最良好的祝愿:

你用熟练的修辞技巧为卡皮托的事业辩护。但我看到,你在其他方面的辩才不错,但为他辩护的能力恐怕尚有不足。倘若要我提出攻防的猜想和证据,你就会意识到,我会设计另一种不同路数的辩护词。但我经

① 弗洛本几个月以后在当年年底去世。——原注

② 马丁·布泽尔(Martin Butzer,约1491—1551),后名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多明我会修士,1521年被恩准豁免入会誓言,坚守宗教改革主张。此刻他是斯特拉斯堡参访团的成员,他和斯特拉斯堡的其他代表团成员正在从巴塞尔去波恩的路上,他们希望会见伊拉斯谟,本信可能是伊拉斯谟对布泽尔的答复,布泽尔最后在爱德华六世治下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皇家教授。——原注

历的争论太多,要把我鼓动起来去和我昔日喜欢的人对阵,实在是很难的。埃朋多夫^①骑士是否冒险和我没有关系,只不过他回头玩那些花招是太频繁了。我不会把卡皮托拽进这一场闹剧,除非他自己主动再次参与其中。让他不要把我当傻瓜,我知道问题所在。我已经写过一些东西论述这些事情。再者,关于你为自己和你的教会辩护的问题,我认为最好是不予回答,因为虽然这件事不存在争论,但需要长篇大论。以上仅仅是对你一些分散的问题所做的简短的回答。

关于给我提供有关“语言教学”^②信息的人,恐怕你自己都不会太小看他的可靠性吧。他对你没有不好的评价。实际上,就个人感情而言,我从来就不讨厌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城里有些人絮絮叨叨地说,“一切学问都是被上帝遗弃的倒霉蛋发明的”。毫无疑问,无论叫“倒霉蛋”还是被冠以什么其他的称号,这些搞学问的人处在上升的地位,各地情况莫不如此;然而一切学问都被人忽视、都停滞不前了。纽伦堡市财政局花钱雇人做讲演,竟然没有人去听。

244

你拼凑了一些猜想,解释我为何不加入你们的教会。你必须知道,我避免和你们的运动产生瓜葛的最重要原因是我的良心:如果良心劝说我相信,你们这场运动来自于上帝,我早就加入这个营垒成为其战士了。第二个原因是,我在你们的团体里看见许多人并不知道福音的健全思想是什么。我不想提及谣言和怀疑,我只想说从我亲身经验里了解到的东西,不,从我受到的伤害里学到的东西;不仅包括从暴民那里学到的经验,而且包括那些似乎有一些价值的人对我的伤害,从那些头面人物那里受到的伤害就不用提了。我不知道的东西不应该由我来做出判断;世界之大

① 埃朋多夫曾经是伊拉斯谟的朋友,后追随胡腾与伊拉斯谟辩论。——原注

② 在1530年8月1日的《答复》(Responsio)里,伊拉斯谟说,改革之后的学校很少传授教义和语言以外的知识。这篇文章的依据是一位可靠人士(也许是纽伦堡的皮尔克海默)提供情况写成的。布泽尔来信不赞成伊拉斯谟的观点,可能就是由伊拉斯谟的批评引起的。——原注

浩瀚无际。我认识你们教会的一些信徒，他们入会前很优秀，现在如何我则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从人类判断力的角度说，我看到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

第三个阻拦我和你们建立联系的原因是你们运动里的领袖人物之间并不和睦。姑不论先知派和你们再洗礼派，单说茨温利、路德和奥西安德尔^①用小册子展开了多么激烈的混战啊！我从来就不赞成这些领袖人物那种凶狠的作风，不过他们这种作风是一些人的行为举止刺激出来的。这就是你真正能够吹嘘的地方。姑不论其他人，只说路德，他那些小丑式的攻击英王的榜样有什么用呢？须知，他任重道远，需要得到人民大众普遍的拥护啊。难道他不想一想他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吗？难道他没有意识到他处在世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吗？这就是这场运动的头面人物。我并不因为他用污言秽语攻击我感到特别愤怒，使我精神上倍受折磨的是：他背叛了福音的事业，他放手让君主、主教、假修士、假神学家攻击好人，他给我们难以容忍的、被奴役的命运雪上加霜。如果被激怒的教派喘过气来，而现在的情况无疑正是这样的，那么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一百年将会发生的残酷而血淋淋的纷争。你会说，任何人群里都不可能不混进坏人。但毫无疑问领导人必须要特别提防自己的言行，他们和撒谎的人、作伪证的人、酒鬼和私通者连说话的关系也不能存在。目前的情况是，我听见甚至看见的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更加柔顺，老师发现学生更加守规矩，官员发现公民更好管理，雇主发现工人更加可靠，买主发现卖主不那么欺诈，福音必然会更加受人欢迎。按照目前的走势，一些人的言行已经产生了降温的作用；在运动的初期，出于热爱虔诚、憎恨伪善，人们以拥护的态度看待这场运动；如今，尾随这场运动而起的人群中混进了许多流浪汉、逃亡

245

① 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Andres, 1498—1552)，德意志基督教神学家，在纽伦堡推行路德的教义，失败后转往柯尼斯堡，后来宗教改革领袖内部出现分歧，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者、破产者、衣不蔽体生活悲惨的人甚至坏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君主们在咒骂,甚至起初对这次运动满怀希望的人也在咒骂了。

我说这些话时不会不感到深深的悲哀,不仅是因为我预料到,如果处置不当,局势必然会每况愈下,而且是因为我本人必然会吃尽苦头。有些恶棍说:经院神学家和修士在一些地方不再那么受人尊敬,医师被人忽视,罗马教皇的权威不再至高无上——我的著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情况很清楚,这样的邪恶来自何方。他们把绳子绷得太紧,眼看就要绷断了。他们几乎把教皇的权威凌驾于基督之上,他们把仪式作为衡量是否虔诚的唯一标准,把紧紧控制的忏悔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吹捧忏悔的修士们不再害怕惩罚,如今他们原本居中的作用却成了公开的暴政。结果,正如谚语所云,“绷紧的绳子必然要断裂”,不可能产生其他的结果。我很担心,倘若君主们把绳子绷得太紧,他们有一天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再者,对方既然已经登台扮演自己的角色,其他的结局就不可能了。但愿我们不会看见更加可怕的事情!

然而,如果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的目标是基督,他们的责任就不仅是避免恶习,而且是避免一切弊端的出现,就是不给福音造成任何障碍;即使被允许的但并非有利的惯例也要避免。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要防止一切煽动和骚乱。如果他们以真诚和温和的态度去处理问题,他们就会得到君主和主教的支持,因为他们不会担心局面无法挽回。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时,他们就不必轻率地损毁任何东西。实际情况是,放弃了一日七次祈祷的教徒根本就不再祈祷。脱去形式主义伪善的人在其他方面反而比过去还要伪善。鄙视主教制度的人连上帝的戒律也不服从了。过去不挑食的人如今却沉溺于贪食。这是一出持久的悲剧,我们每天亲耳听到这样的悲剧,也听见别人转述这样的悲剧。虽然我从来就不喜欢那些靠低俗的弥撒捞钱的神父,但我从来就不赞成废除弥撒。其他一些事情也是可以修正的,但骚乱一定要防止。现在的情况是,有人对普遍接受的任何惯例都不满意,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总有一些

事情是虔诚的人们必须要忍受的。倘若因为有人滥用弥撒就应该废除弥撒,那么你们这一党人唯一接受的布道也应该废除。如果是那样,我觉得召唤圣徒、使用圣像也应该废除。

你的来信需要长篇的答复,但我实在太忙,即使写成这个样子也很长了。听说你很有宣讲福音的才华,你比许多人彬彬有礼。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智地奋斗到底,无论这场运动是如何开始的,凭借你在教义上的坚定和温和,凭借你言行的高贵品格,你能够使运动达到福音的价值。为此目的,我将竭尽全力助你一臂之力。虽然许多修士和一些神学家用尽一切花招对我进行攻击,但什么压力也不能够诱使我抛弃自己的灵魂。你有良好的判断力,不会让这封信流传,以免引起纷扰。如能晤面,我们可以再谈这些问题。再见。我没有时间看一遍这封信。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亲笔

书简 20 致阿方索·瓦尔德^①

巴塞尔,1528年8月1日

致杰出的阿方索·瓦尔德,皇帝陛下的秘书,问好:

247 我从别人那里获悉,你以自己特有的反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有人在我戒指上的铭文“忒尔弥诺斯”(Terminus)^②上大做文章,诬

① 阿方索·瓦尔德(Alfonso Valdes,1490?—1532),始终钦佩伊拉斯谟,1522年起任查理五世秘书,曾写两篇对话捍卫查理五世。——原注

② 关于这个戒指上的铭文,见埃德加·文德(Edgar Wind)《忒尔弥诺斯之谜》(Aenigma Termini),载 *Journ.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 1 (1937—1938), p. 66。——原注

忒尔弥诺斯(Terminus),古罗马界石神,3月23日为忒尔弥诺斯节,人们用花环装饰自己地界上的界石,杀猪宰羊,敬献忒尔弥诺斯。

蔑我,对铭文中的“决不让步”(*Concedo nulli*)提出异议,说它显示我那难以容忍的傲慢。难道这不是歪曲一切的致命的神经病吗?有人讥讽莫摩斯^①,说他讥讽维纳斯的拖鞋。这些人比莫摩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居然在一个戒指里挑刺。我会把这些人称为莫摩斯,但莫摩斯讥讽的仅仅是那些他已经仔细检查过的东西。再来看这些挑刺的人或者更加准确地说乱咬的人,他们闭目塞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懂:他们真是病入膏肓了。同时他们却自认为是教会的栋梁,然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暴露了自己的愚蠢,暴露了他们极端的恶毒用心,他们已经臭名昭著却没有自知之明。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伊拉斯谟说了“决不让步”,那他们就是在做梦。倘若他们读过我的书,他们一定会知道,伊拉斯谟谦虚谨慎,不会自视比任何人高明,伊拉斯谟会对一切人让步,而不是对谁也不让步。

深知我的人绝不会把傲慢的恶习算到我头上,他们会一致认为,我更加接近于苏格拉底所云“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不是“我决不让步”。但即使他们幻想,我厚颜无耻地把自己置于一切人之上,他们还认为我会傻到在戒指上公开宣扬这样的观点吗?倘若他们有什么基督徒的感情,他们就能够理解,这几个字不是我的话,或者有其他意义。他们看见戒指上的一个人物形象,下部镶嵌着一颗宝石,上面是一位头发飘逸的年轻人。这个形象和伊拉斯谟有任何相似之处吗?倘若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他们看见戒指上的 *Terminus* 一词,如果把这个词当做诗行末尾的词,那就是一句诗 *Concedo nulli Terminus*,抑扬格两音步的诗行;把 *Terminus* 这个词放在诗行的开头,你就得到这样一句诗: *Terminus concedo nulli*,那就变成扬抑格两音步的诗行了。如果我画一头狮子,留的题款是“快跑啊,除非你想要被撕成碎片”,他们会做何解释呢?他们会不会把这些话算到我的头上而不是算到狮子的头上呢?他们现在对我的诬蔑就是

① 莫摩斯(Momus),希腊神话中非难指责与嘲弄之神。

这样愚蠢。如果我没错,我更像是说那句话的狮子,而不是说那句话的宝石。

248

他们会辩解说,“我们没有注意那铭文是一句诗,我们不知道 *Terminus* 的意思”。那是不是说因为他们没有学过诗歌理论,别人写诗就是罪过呢?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这种诗歌技巧瞄准的实际上是一定程度的朦胧,以便调动欣赏者猜测的能力。如果攻击我的人不知道忒尔弥诺斯,他们就应该向专家请教,其实他们是可以从圣奥古斯丁或圣安布罗斯的书里了解到忒尔弥诺斯的。古人在自己的地界上竖立标记。这种标记是冒出地面的界石,根据古代律法,界石是永远不准挪动的。柏拉图的话“不要挪动你种下的东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宗教上的敬畏强化了这条法律,对没有文化的大众起到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挪动界石,使他们相信,挪动界石就是亵渎神,罗马人把这位神灵叫做忒尔弥诺斯。罗马人为他修建了神庙,为他安排了专门的节日。根据罗马历史学家的记述,忒尔弥诺斯是唯一没有向朱庇特屈服的神灵,“其他的神庙都允许鸟儿藏身,这些神庙已经失去神圣的性质;唯有忒尔弥诺斯神庙不准鸟儿进去,鸟儿仍然被当作不吉利的象征”^①。李维^②在他的《历史》里讲述了这个故事。在《历史》卷五里,他又说:“主神殿里的预兆被清除之后,朱文塔斯^③和忒尔弥诺斯不准别人把他们清除出去。”^④这个征兆引起普遍的欢呼,因为人们相信,这是帝国长治久安的吉兆。因为朱文塔斯这位青春之神有利

① 李维:《历史》卷一、卷五五、卷三。李维所指的是罗马皇帝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Tarquinius Superbus,前534—前510),他命人清除塔尔皮亚岩石,使原有的神庙不再具有神圣的色彩,准备给朱庇特修建主神庙。预兆允许原有的众神被移走,但忒尔弥诺斯和朱文塔斯拒绝离开。——原注

② 李维(Livy,前59—17),罗马历史学家,他所著的罗马历史共有142卷,记述罗马自建城到公元9年的历史,现存35卷。

③ 朱文塔斯(Juventas),罗马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柏(Hebe)。

④ 李维:《历史》卷五、卷五四、卷七。——原注

于作战胜利,而忒尔弥诺斯这位地界神又是岿然不动的。

说到这里,那些攻击我的人恐怕又会说:“你和神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神来到我身边,而不是我利用神。我应邀赴罗马时,圣安德鲁斯主教亚历山大^①被他的父亲苏格兰的詹姆斯国王召唤准备回国;离开我在锡耶纳的家时,亚历山大送给我几枚戒指作纪念,表示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其中一枚戒指的宝石上镌刻着忒尔弥诺斯。以前我对忒尔弥诺斯并不了解,一位对古董感兴趣的意大利人给我解释戒指的意思。我对其征兆心领神会,认为这是对我的告诫,暗示我来日无多——那时我四岁左右。为了把这个念头铭记在心,我开始用这枚戒指作印鉴封信。如上文所云,我加上了那行短诗。就这样,我把一位异教神用作铭文,告诫自己矫正不当的言行。因为正确的言行对任何人都是不可逾越的疆界。在这枚戒指上我还用希腊语加上一句诗:“思考漫长生命的终点。”他们又会说:“你完全可以在上面刻一具骷髅呀。”如果我有意的话,我会接受这条建议。但我喜欢这句诗,因为这是我信手拈来的诗,而且它有双重的魅力,因为它出自一个古老而著名的故事,因为它具有朦胧美,这特别适合戒指的铭文。

249

以上是我就忒尔弥诺斯铭文所做的辩护,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细如发丝的辨析。但愿他们最终能够给自己的歪曲定下一个界标!如果他们能够改变那种病态的挑剔,我将愉快地和他们达成妥协。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威,可他们抱怨爱好学问的人损害了他们的威信。我绝无损害他们名声的想法;他们的愚蠢花招沦为使人讥笑的把柄,受人讥笑和批驳却不感到脸红,我为此而感到痛心。上帝保佑你身心健康,我亲爱的朋友。

① 参见英文版第66页。——原注

书简 21 致查尔斯·布隆特^①

布赖斯高地区的弗赖堡,1531年3月1日

致优秀的年轻人查尔斯·蒙特伊,问好:

……我决定把李维的《历史》献给你,李维是拉丁历史之王;本书已经刊印多次,但过去的版本不如这个新版堂皇和准确。如果这本书还不够,我可以把最近才发现的五本书也献给你。这五本书是一位天才人物西蒙·格利纳伊斯^②在洛施附近的修道院发现的,他既博学多才又谦虚谨慎,似乎是为了人文研究的昌明而生。这所修道院是为了对抗沃尔姆斯(Worms)或伯贝托马吉姆(Berbethomagium)而修建的,由查理曼大帝^③下令修建,距今七百年有余。这所修道院藏书极其丰富,因为历代君主特别关心,它是众多修道院里最珍贵的宝藏。原稿在古抄本中极其华丽,以古老的方式描绘^④而成,字母连成一串而不间断,所以整理的过程中分离词语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整理者学问渊博、小心谨慎、训练有素、且有专攻。我在整理抄本、准备送印的手稿时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必须要小心翼

250

-
- ① 本信又是李维《历史》的序文,伊拉斯谟编订的《历史》1531年由巴塞尔的弗洛本刊印。——原注
查尔斯·布隆特(Blount, Charles, 1518—?),蒙特伊爵士威廉·布隆特的儿子。
- ② 西蒙·格利纳伊斯(Simon Grynaeus, 约1495—1541),1529年任巴塞尔大学希腊语教授,1527年发现李维《历史》卷四一至四五的手抄本。——原注
- ③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的学术中心。
- ④ 伊拉斯谟没有用“插图”这个词。在其他场合(艾伦编《伊拉斯谟书简》第919页书简55),他说这个羊皮纸抄本不是抄写的而是绘成的(*non scripto sed picto*)。——原注

翼、忠于原文,不得偏离原抄本的文字。因此可以说,最近在美因兹发现的这部可怜的残稿使学者们欢呼雀跃^①,这本大部头的李维《历史》问世后引起的欢呼就可想而知了。

愿上帝保佑李维的著作能够完全重现于人世。满天飞的谣言使人抱一丝希望:有人吹嘘握有李维未刊的抄本,这样的谣言有时从丹麦传来,有时从波兰冒出来,如今又在德国流传。至少幸运女神给我们保存了这些残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期待,我看不出为什么要绝望,看来还是有希望找到更多残卷的。至少我想在此提出建议:如果君主们悬赏搜寻和刊印李维著作的抄本,请学者们出力,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义举;如果有人把他的残卷压在手心里深藏不露,那就是学术研究的莫大损失,公众就没办法用上这些文献。人们不惜承担风险、消耗重金在地球上开肠破肚甚至深挖到冥府去寻找金银,可是他们对古典文献这样的宝藏却置之不理,认为它们不值得搜寻,那真是荒谬之极。古典文献的价值应该是远远高于金银的价值,就像灵魂的价值远远高于肉体一样。这种人的精神是迈达斯^②的精神,而不是君主们应该具备的精神。我知道你的性格和这种迈达斯精神格格不入,所以我不怀疑,你会热切地欢迎这种伟大的收获。现在看来,过去的五年真是李维盛行的五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是该书的修辞,一切特征都使我们想起李维;其次是弗洛鲁斯^③那种论述的词锋或特征。这两方面的特征都完全符合李维《历史》的风格。

① 这部残稿含李维《历史》卷三三、卷一七至四九、卷四〇、卷三七至五九,是在美因兹大教堂藏书室找到的,1518年11月由舒尔出版社印行,但原稿不幸遗失。——原注

② 迈达斯(Midas),希腊神话中的佛里几亚国王,酒神狄俄尼索斯赐给他点金术,使他能够把一切都变成金子。

③ 弗洛鲁斯(Publius Annius Florus),活跃于1世纪末和2世纪初,非洲罗马史学家、诗人,编撰过一部罗马简史。

251 我知道,对成就卓著者而言,阅读史学家的著作是最适合的,而李维在史学家中独占鳌头(我指的是罗马史学家),因为即使萨卢斯特^①的著作我们也只找到两个短简残篇。我记得,你的父亲嗜书如命,他终身喜欢历史书(我不怀疑你在这方面像你父亲)。所以我相信,我刊布这五本书时给予你特别献辞应该不是失当之举。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不应当希望你太像你父亲。他老是每天晚饭后读书到深夜,这使他的妻子和仆人都感到疲惫,并引起仆人的不满。迄今为止,他是在不损害健康的情况下保持了这样的习惯。不过我并不认为你和他一样冒险是聪明之举,因为你的冒险未必得到他同样的收获。你的父亲年轻时和现任国王一道念书,他们读的书主要是历史著作,他的父亲亨利七世——一个多谋善断的国王——给他们强有力的支持。

这个版本附录了亨利·格拉雷阿努斯为该书做的年表。格拉雷阿努斯的学问精致而全面,他孜孜不倦,不仅以多学科的知识装饰弗赖堡体育馆,使之精致、华丽而堂皇,而且使整个地区更加漂亮。他编订的年表显示历史事件的顺序、战争的细节、人物的名字,廓清混乱,恢复原貌,清理了抄书人和半吊子读书人造成的混乱。他的年表是唯一的历史明灯,给我们导航。没有这颗北极星,我们在历史的汪洋大海里航行时就成为盲目的瞎撞。没有这条线索,读者就会身陷迷宫;否则即使读者有学问,他也理不清那一团乱麻似的历史事件。如果你认为,我这份礼物是对你来信很好的回报,那就轮到你给我写信了。再见。

① 萨卢斯特(Sallust,前86?—前34?),罗马政治家、史学家,追随恺撒,著有《喀提林战争》、《朱古达战争》等,但仅存残卷。

书简 22 致巴托洛美·拉托姆斯^①

巴塞尔,1535年8月24日

致巴托洛美·拉托姆斯,问好:

……相信我,你为写信不勤快而致歉,那是在浪费时间。我没有习惯用常人的礼节来判断久经考验的朋友。指责你疏于写信未免太轻率,因为你也有权利指责我写信偷懒……各学院院长在创新方面都没有追求。他们害怕预算收入短缺,争夺预算成了他们大多数人的唯一目的。你难以相信,为了阻止在卢万大学办一所三语学院,他们如何费尽心机、玩弄花招。我为创办这所学院竭尽全力,因而使自己很不受欢迎。图尔奈的语言系系主任有意设置一个语言教授职位,但卢万大学和图尔奈的方济各会修士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直至这个创意被放弃为止。为设置这个教习而修建的那幢房子俯瞰方济各会的花园——这就是计划遭遇麻烦的原因……

252

以年龄计算,我已经算长寿。但如果把我和发热病、肾结石和痛风病搏斗的时间计算在内,我的寿命并不长。不过,我们必须忍受上帝赋予我们的一切,谁也不能对抗,唯有上帝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不朽声名的荣光不能打动我的心,我不急于得到后代的嘉许。

这里的许多法国贵族被召唤回来之后^②,由于害怕冬天可能发生的风暴又离开了。先知说:“狮子吼叫,谁不怕呢?”^③英格兰也出现了类似

① 巴托洛美·拉托姆斯(Bartholomew Latomus,1498?—1570),在弗赖堡大学教拉丁语和希腊语,任其中一所学院院长,1534年任法兰西学院拉丁语教授,1524年退休后回到柯布伦茨。——原注

② 被皇家敕令召回。——原注

③ 《旧约圣经·阿摩司书》第三章第八节。——原注

的恐怖，原因有一点莫名其妙。有些修士已经被斩首。圣布利奇特修会的一位修士^①被人在地上拖着跑、被斩首、被肢解。这里盛传罗彻斯特主教已经被斩首的谣言，看来很可能确有其事。据说，他与教皇保罗三世^②合作，教皇将要任命他为红衣主教，他准备弹冠相庆，这可能是加速他从大牢中被提出来斩首的原因。托马斯·莫尔身陷囹圄、家产被没收已经很久，据说他也被处死了，但我尚无确切消息。^③但愿他没有被那种危险的事务牵连，但愿他把神学让给神学家们去研究。偶尔赐我书信和小礼品的其他朋友现在由于害怕再也不来信，不送小礼品了，没有收到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仿佛每一个石头下面都藏着蝎子。

253

教皇似乎正在考虑召开一次公会议。但我不知道在君主和国家如此纷争不息的情况下如何开会。下德意志受再洗礼会的影响令人吃惊；在上德意志，人们假装看不见这些再洗礼会教徒。这些教徒正在成群结队地向我们这里涌来，有些人正在去意大利的路上。皇帝正在围困戈雷塔（Goletta）。我个人认为，再洗礼会教徒更危险。

我看，法国并未完全免予这一场灾祸，但法国人怕挨棍子，所以他们沉默……

我得告诉你我目前的处境，这会使你感到好笑。我已经以杰出的神学家路易·贝尔为例给教皇保罗三世回信。教皇在来信封口之前以敬重的口气说到我。在即将召开的公会议之前，他想委任几位学者当红衣主教，他建议的名单里就有鄙人的名字。但阻碍我当选的因素也提出来了，比如健康、收入低、体力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等。据说有一条敕令排除了

① 被斩首的修士是艾尔沃斯的布利奇丁·西昂学院的理查德·雷诺兹（Richard Reynolds）。——原注

② 保罗三世（Paul III, 1468—154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籍教皇，资助文艺事业，承认耶稣会，绝罚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召开特兰托公会议（1545），为日后教会改革奠定基础。

③ 莫尔已经在1535年7月6日被处死。——原注

收入低的候选人,年收入低于3000达克特金币的人不得当选。所以现在他们忙于为我确保许多份教士的薪俸,以便我能够得到超过这个定额的年收入,以便我能够戴上红衣主教的红帽子。那是罗马教廷著名的帽子。有一位罗马朋友特别热心。我多次去信劝阻却无效。我告诉他,我不要职位,也不要津贴,我活一天算一天,每天都盼望死,渴望死,有时痛得生不如死。我足不出户,一旦出门,小事也会使我不安。^①我这奇怪而虚弱的身体只能够忍受暖和的天气。以我衰朽之身,他们居然怂恿我去争取教士的薪俸和红衣主教的红帽子!然而话又说回来,教皇对我不切实际的希望以及他对我的深情厚谊却令我十分感动。我饶舌了,一写就收不住笔。如果你再犯写长信的毛病,我就可以原谅你那比较长的来信……再见。

① 这句话是意译,直译应为:“驴子偷窥户外也会使人不安全。”这条希腊谚语说的是为小事打官司的人:一位陶工作坊里的陶器被驴子踩烂,陶工把驴子告上法庭,法官问他控告谁,他说:“告驴子偷窥。”见《阿普留斯文集》,卷四,第42页。——原注

阿普留斯(Lucius Apuleius,约124—170),罗马哲学家、讽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金驴》(原名《变形记》)、哲学著作《论柏拉图及其哲学》、《论苏格拉底的神》、《论宇宙》等。

◎人名索引(中译本边码即此地所标原书页码)

Adrian of Utrecht, Dean, later Pope 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教长,后来任教皇 55,131,162

Agricola, Rudolf 鲁道夫·阿格里科拉 7

Albert of Brandenburg, archbishop of Mayence 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美因兹大主教 140,145

Aldus Manutius 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 63,64,81,207

Aleander, Hieronymus 海罗尼姆斯·亚里安达 64,124,147,149,171,184,187

Alidosi,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阿里多西 214n.

Amerbach, Bonifacius 波尼法齐乌斯·阿梅尔巴赫 176,186,223n.

Amerbach, Johannes 约翰·阿梅尔巴赫 83,90

Ammonius, Andrew 安德鲁·阿莫尼乌斯 37,58,67,79,80,81,83,86,90,93,94,119,123,134

Andrelinus, Faustus 浮斯特斯·安德烈利努斯 21,25,26,29,47

Anna of Borsden, Lady of Veere (波尔斯林的)安娜,维尔夫人 27,28,35,37,38,55,62,200—201

Asolani, Andrea 德里亚·阿索拉尼 64

Ath, Jean Briard of 阿特的让·布里阿 131,133,134,135,137,229

Aurelius (Cornelius Gerard of Gouda) 奥里利乌斯·杰拉德(高达的科尼利乌斯·杰拉德) 11,13,14,33,44

- Badius, Josse 若斯·巴迪乌斯 57, 60, 79, 81, 82, 83, 90, 133, 208, 219n.
- Balbi, Girolamo 吉洛拉墨·巴尔比 20
- Barbaro, Ermolao 埃尔默拉奥·巴尔巴罗 21
- Batt, James 詹姆斯·巴特 18, 19, 27, 28, 37, 38, 47, 48, 49, 55, 200
- Beatus Rhenanus 庇突斯·雷纳努 39, 64, 83, 96, 119, 156, 177, 184, 186, 187, 223
- Becar, John 约翰·贝卡尔 181
- Beda (Noel Bedier) 贝达(诺埃尔·贝迪埃) 120, 125, 157, 158
- Bembo, Pietro 普里特洛·本波 173
- Ber, Louis 路易·贝尔 186, 253
- Berckman, Francis 弗朗西斯·伯克曼 82, 83
- Bergen, Anthony of 卑尔根的安东尼 85, 202
- Berquin, Louis de 路易·德·伯奎因 158
- Berselius, Paschasius 帕斯查西乌斯·波西利乌斯 229
- Blount, Charles 查尔斯·布隆特 249
- Blount, William, Lord Mountjoy 威廉·布隆特, 蒙特伊勋爵 27—28, 30, 35, 36, 37, 58, 59n., 67, 68, 79, 86, 87, 95, 184, 199, 215, 251
- Boerio, Giovanni Battista 乔万尼·巴蒂斯塔·比尔里奥 60
- Bombasius, Paul 保罗·邦巴西乌斯 63
- Bouts, Dirck 迪尔克·鲍茨 3
- Boys, Hector 赫克托耳·波伊斯 25
- Brie, Germain de 热尔曼·德·布里 96
- Bucer (Butzer), Martin 马丁·布泽尔(布塞尔) 177, 243
- Budaeus, William 威廉·布多伊斯 94, 95, 96, 97, 119, 123, 124, 125, 126, 132, 153, 173, 219, 221

- Busch, Hermann 赫尔曼·布什 224
- Busleiden, Francis of, archbishop Besancon 布斯莱顿的弗朗西斯, 贝桑松的主教 55, 135
- Busleiden, Jerome 杰罗姆·布斯莱顿 135
- Cajetan 卡耶塔努斯 141
- Calvin 加尔文 165, 167, 182
- Caminade, Augustine 奥古斯丁·加米内德 37, 47, 48, 155
- Canossa, Count 卡诺萨伯爵 86
- Capito, Wolfgang Fabricius 沃尔夫冈·法布利丘斯·卡皮托 96, 132, 140, 165, 166, 171, 218, 243
- Catherine of Aragon 阿拉贡的凯瑟琳 168
- Charles V 查理五世 92, 95, 99, 145—146, 218
- Charnock, prior 女修道院院长沙诺 31
- Cinicampius 齐尼坎皮乌斯 see Eschenfelder
- Clement VII 教皇克莱芒七世 184
- Clyfton, tutor (家庭教师) 克里夫顿 63
- Cochleus 科克勒斯 241
- Colet, John 约翰·科利特 29, 30, 31, 32, 33, 34, 56, 57, 58, 80, 81, 91, 92, 96, 104, 109, 141, 144, 154, 181, 200, 211, 215
- Cop, William 威廉·柯普 49, 61, 94, 219
- Cornelius 科尼利乌斯 see Aurelius
- Cratander 克拉坦达 85
- David of Burgundy, bishop of Utrecht 勃艮第的大卫, 乌特勒支的主教 16
- Decanus 戴卡努斯 224

- Denk, Hans 178
- Dirks, Vincent 文森特·迪尔克斯 137, 149, 157, 158
- Dobeneck, John 约翰·多本内克 see Cochleus
- Dorp, Martin van 马丁·范·多普 77, 94, 126, 131, 133, 134
- Dürer, Albrecht 阿尔布雷特·丢勒 148—149, 240, 224n.
- Eck, Johannes 约翰·埃克 98, 141
- Egmond, Nicholas of (Egmondanus) 埃格蒙特的尼古拉斯(埃格蒙达努斯) 119, 133, 137, 148, 149, 158, 161
- Egnatius, Baptista 巴蒂斯塔·埃格拉提乌斯 64
- Episcopius, Nicholas 尼古拉斯·埃皮斯科皮乌斯 186
- Eppendorff, Henry of 埃朋多夫的亨利 124, 159, 160, 243
- Eschenfelder,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夫·埃森菲尔德 186, 224
- Étienne 艾蒂安 see Stephanus
- Faber 法布尔 see Lefèvre
- Farel, Guillaume 纪尧姆·法雷尔 166, 167
- Ferdinand, archduke 阿克杜克·斐迪南 175
- Ficino, Marsilio 马西利奥·费奇诺 21
- Filelfo,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法尔福 205
- Fisher, John, bishop of Rochester 约翰·费希尔, 罗彻斯特主教 58, 80, 92, 119, 181, 182, 241n.
- Fisher, Robert 罗伯特·费希尔 26, 27, 34, 199
- Flaminius, John 约翰·弗拉米尼乌斯 225
- Foxe, Richard 理查德·福克斯 58, 59
- Francis I 弗朗西斯一世 94, 99, 144, 145, 218—219
- Frederick of Saxony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 139, 143, 147

Froben, Johannes 约翰·弗洛本 83, 85, 87, 89, 90, 91, 134, 143, 156, 170, 182, 221, 233n., 243

Froben, Johannes Erasmus 约翰·伊拉斯谟·弗洛本 156, 183, 186

Fugger, Anthony 安东尼·富格尔 176

Gaguin, Robert 罗伯特·盖冈 21, 24, 25, 26, 125

Gallinarius 加利纳利乌斯 223

Gebwiler 戈布怀勒 224

George of Saxony 萨克森公爵乔治 162

Gerard, Cornelius 科尼利乌斯·杰拉德 see Aurelius

Gerard, Erasmus's father 伊拉斯谟的父亲杰拉德 6

Gerbel 戈贝尔 224

Gigli, Silvestro, bishop of Worcester 希尔韦斯特罗·吉格利, 沃斯特主教 93

Gilles, Peter 彼得·吉尔斯 66, 86, 92, 94, 107, 119, 133, 184

Glareanus, Henry (Loriti) 亨利·格拉雷阿努斯, 亦名亨利·罗利提 96, 219, 251

Gourmont, Gilles 吉尔·吉尔蒙 79, 80, 82, 209n.

Grey, Thomas 托马斯·格雷 23, 26

Grimani, Domenico 多梅尼柯·格里马尼 66, 67n., 68, 214

Grocyn, William 威廉·格罗辛 34, 58, 200, 208

Groote, Geert 格尔特·格卢特 3

Grunnius, Lambertus 格鲁尼乌斯 93

Grynaeus, Simon 西蒙·格利纳伊斯 249

Guibé, Robert, bishop of Nantes 罗伯特·纪贝, 南特主教 215n.

Hegius, Alexander 亚历山大·希基乌 7

- Henry of Bergen, bishop of Cambrai 卑尔根的亨利,坎布雷主教 16, 17, 25, 27, 35, 38, 47, 55
- Henry VII 亨利七世 58, 67, 251
- Henry VIII 亨利八世 30, 37, 67, 84, 99, 144, 145, 146, 162, 182, 218, 251
- Hermans, William 威廉·赫曼斯 11, 13, 16, 18, 26, 28, 38, 44, 47, 49
- Hermonymus, George 乔治·赫默尼姆斯 204n.
- Holbein, Hans 汉斯·霍尔拜因 114, 121, 151, 232n., 236n.
- Hollonius, Lambert 兰伯特·霍朗尼乌斯 156
- Hoogstraten, Jacob 雅各·胡格斯特拉腾 145
- Hutten, Ulrich von 乌尔里希·范·胡腾 96, 118, 119, 125, 128—129, 140, 148, 159, 231
- James IV 詹姆斯四世 66, 84
- John of Trazegnies 特拉津尼斯的约翰 50n.
- Julius II 尤利乌斯二世 58, 62, 84, 93, 152, 217
- Karlstadt, Andreas 安德里亚斯·卡尔施塔特 141
- Lachner 拉克内尔 221
- Lang, John 约翰·朗格 141, 142, 144
- Langenfeld, John 约翰·兰根菲尔德 224
- Lascaris, Johannes 约翰·拉斯加利斯 64
- Lasco, Johannes a 约翰·拉斯科 186
- Latimer, William 威廉·拉蒂默 58, 208
- Latomus, Bartholomew 巴托洛美·拉托姆斯 251
- Latomus, James 詹姆斯·拉托姆斯 133, 135, 149

- Laurin, Mark 马克·劳林 229
- Lee, Edward 爱德华·李 119, 122, 128, 133, 134, 135, 145, 157
- Lefèvre d'Étapes, Jacques 雅克·勒费弗尔·戴塔普尔 21, 119, 120, 132, 133
- Leo, Ambrose 安布罗斯·利奥 219
- Leo X 利奥十世 66, 93, 94, 134, 140, 144, 146, 215, 218
- Leonicenus, Nicholas 尼古拉斯·利奥尼切努斯 219
- Linacre, Thomas 托马斯·利纳克尔 34, 58, 200, 208, 219, 221
- Longoli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夫·隆格利乌斯 172, 173
- Loriti 罗利蒂 see Glareanus
- Loyola, Ignatius of 圣依纳爵罗耀拉 189
- Lupset 鲁普赛特 221n., 222
-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54, 96, 120, 128, 131, 135, 138, 139—150, 159, 161—165, 177, 178, 179, 209, 229, 240, 244
- Lypsius, Martin 李普西乌斯 125, 134
- Lyra, Nicholas of 吕拉的尼古拉 57
- Maertensz Dirck 狄尔克·梅尔滕斯 66, 90, 92, 134, 156
- Manutius 马努蒂乌斯 see Aldus,
- Mary of Hungary 匈牙利的玛丽 168, 187
- Maternus 马特努斯 224
- Matthias 马提亚 225
- Maximilian, emperor 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 84, 99, 141, 147, 176, 218, 219
- Medici, Giovanni de' 乔凡尼·德·美第奇 see Leo X
- Melanchthon 梅兰希顿 145, 152, 165, 178, 180, 231
- Metsys, Quentin 昆廷·梅奇斯 92, 240n.

More, Thomas 托马斯·莫尔 29, 30, 34, 35, 58, 69, 70, 92, 107, 119, 126, 127, 141, 146, 148, 153, 154, 182, 183, 200, 209, 221, 231—239, 252

Mountjoy 蒙特伊勋爵 see Blount

Musurus Marcus, 马库斯·穆苏卢斯 64

Mutianus 穆奇安努斯 165

Neuenahr, Hermann Count of 赫尔曼·牛恩巴赫伯爵 225, 226

Northoff, brothers 诺托夫家三兄弟 26, 27

Obrecht, Johannes 约翰·奥布雷克特 62

Oecolampadius 厄科兰巴丢 157, 166, 167, 168, 174, 175, 180

Osiander 奥西安德尔 244

Pace, Richard 理查德·佩斯 159, 222

Paludanus, Johannes 约翰·帕卢达努斯 131

Parachelsus, Theophrastus 提奥夫雷斯图斯·帕拉切尔苏斯 242

Paul III 教皇保罗三世 184, 185, 253

Peter Gerard, Erasmus' s brother 彼得·杰拉德, 伊拉斯谟的兄弟 5—

10

Phileticus, Martin 马丁·费雷提乌斯 205n.

Philip le Beau 腓力亲王 56, 59n.

Philippi, John 约翰·菲利普 58

Pico della Mirandola 皮柯·德拉·米兰多拉 21

Pio, Alberto 阿尔博托·皮奥 77, 158, 167

Pirckheimer, Willibald 维利波尔德·皮尔克海默 95, 165, 184, 239

Platter, Thomas 托马斯·普拉特 182

Politian 波利齐亚诺 205

- Poncher, Étienne 艾蒂安·庞彻 94, 96
- Probst (Proost), James 詹姆斯·普鲁斯特 231n.
- Reuchlin, Johanne 约翰·罗伊希林 90, 94, 128, 145
- Reynolds, Richard 理查德·雷诺兹 252n.
- Riario, Raffael 拉法尔·里亚利奥 67, 214n.
- Rombout 隆包特 8
- Rudolfingen 鲁道尔芬根 224
- Ruell, John 约翰·卢尔 219
- Sadolet, Paul 红衣主教保罗·萨多雷 93, 94, 164, 173, 177
- Sapidus, Johannes 约翰·萨皮杜 98
- Sasboud 萨斯堡 15
- Sauvage, John le 约翰·勒·萨瓦热 92
- Scaliger, Julius Caesar 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哲 173
- Schürer, M. 舒尔 90, 209n., 223n., 224
- Servatius Roger 塞瓦提乌斯·罗杰 11, 12, 58, 59, 60, 62, 87, 93, 119, 197, 212
- Sixtin, John 弗里西安·约翰·西克斯廷 31
- Sluter 斯鲁特 3
- Spalatinus, George 乔治·斯帕拉提努斯 139
- Stadion, Christopher of, bishop of Augsburg 斯特拉迪恩的克里斯托夫, 奥格斯堡的主教 182
- Standonck, John 约翰·斯汤东克 21, 22, 38
- Stephanus, Henricus 亨利库斯·斯特法努斯 223n.
- Stewart, Alexander, archbishop of St. Andrews 亚历山大·斯图尔特, 圣安德鲁斯的大主教 66, 67, 84

Stewart, James 詹姆斯·斯图尔特 198n.

Stunica 斯图尼卡 see Zuñiga

Suderman 苏德曼 226, 227

Synthen, Johannes 约翰·辛森 7

Talesius, Quirin 基林·塔里西乌斯 184, 193

Tapper, Ruurd (Ruurd of Tapper) 卢尔德·塔佩尔, 塔佩尔的卢尔德

137

Theodoric 提奥多利克 228

Thomas à Kempis 坎普滕的托马斯 4, 54

Tunstall, Cuthbert 库特伯·滕斯托尔 58, 96, 97, 132, 162, 208

Urswick 乌尔斯维克 221

Utenheim, Christopher of, bishop of Basle 乌藤海姆的克里斯托夫, 巴塞
尔的主教 166, 173

Utenhove, Charles 查理·乌滕霍夫 184, 193

Valdes, Alfonso 阿方索·瓦尔德 246

Valla, Lorenzo 洛伦佐·瓦拉 27, 57, 58, 90

Varnbüler, Ulrich 乌尔里希·瓦恩布勒 224

Veeer 维尔 see Anna of Borselen

Vianen, William of 维亚能的威廉 137

Vincent, Augustine 奥古斯丁·文森特 26

Vitrier, Jean 让·维特里尔 50, 181

Vives 比维斯 161, 164

Voecht, Jacobus 雅各布·沃克特 38

Warham, William,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威廉·沃拉姆,坎特伯雷
大主教 58, 59, 68, 81, 92, 95, 184, 204, 215

Watson, John 约翰·华生 98

Werner, Nicholas 尼古拉斯·维尔纳 198, 216

William of Orange 奥兰治的威廉 193

Wimpfeling, Jacob 雅各布·温普费林 80, 166

Winckel, Peter 彼得·温克尔 8

Woerden, Cornelius of 沃尔登的科尼利乌斯 212

Wolsey, Cardinal 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 31, 95, 137, 145, 215n.

Ximenes, F., archbishop of Toledo 希梅内斯,托莱多的大主教 95,
130, 158, 218n.

Zasius, Ulrich 乌尔里希·扎修斯 96, 153, 165, 187, 219

Zuñiga, Diego Lopez 迭戈·洛佩兹·祖尼加 158

Zwingli, Ulrich 乌尔里希·茨温利 96, 177, 179, 180, 244

◎ 中译者后记

两年前,张晓红博士和花城出版社委托我翻译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接着她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希望我翻译赫伊津哈的《伊拉斯谟传》和《中世纪的秋天》。如今,《游戏的人》刚刚面世,《伊拉斯谟传》和《中世纪的秋天》不久也将出版,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在读书和译书的过程中,从麦克卢汉到赫伊津哈再到伊拉斯谟,我追寻这些精神大师的足迹,受益无穷,其乐无穷。他们生活的时代跨度四百年,他们的思想跨度却是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他们的思想深度是超越时代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他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并非身处学术中心,却做出了问鼎学术核心的跨地域、跨时代贡献。麦克卢汉是加拿大人,赫伊津哈和伊拉斯谟是荷兰人,他们的祖国都不是欧美学术中心。

从学术边缘进入学术核心极其困难,必须具备若干条件,最重要的条件不是他们的天才,而是他们的勤奋、国际视野和历史深度。他们都嗜书如命,因而能够扫描全世界的学术成就,洞穿全人类的文明进程。

荷兰是一个地域小国,地处北欧边缘,却是文化大国,近代以来涌现出数以十计的世界级文化巨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博学鸿儒就有:人文学者伊拉斯谟、哲学家斯宾诺莎、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国际法先驱雨果·格劳秀斯、大画家伦勃朗和凡·高,等等。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大唐都以恢宏的气势促进了人类的文化交流,让我们以大量的气度、广阔的视野、精明的洞察引进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的成果,同时又创造并输出一流的文化成果,以迎接中华盛世的来临。

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魏东先生的辛勤劳动。

又:本书注释除标明“英译者注”、“原注”之外,皆为中译者所加。

何道宽

2007年9月19日

◎ 中译者简介

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市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从事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二十余年,著译约八百万字。著作有《中华文明韵要》(汉英双语版)、《创意导游》(英文版)。译作三十余部,要者有:《思维的训练》、《裸猿》、《文化树》、《超越文化》、《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麦克卢汉书简》、《传播与社会影响》、《新政治文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模仿律》、《莱文森精萃》、《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等。长期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一系列专业论文,要者有《比较文化之我见》、《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崇“二”的心理定势》、《试论中国人的隐私》、《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论非言语交际》、《比较文化的新局面》、《水向高处流》、《媒介即是文化——麦克卢汉媒介思想述评》、《麦克卢汉在中国》、《和而不同息纷争》、《媒介革命与学习革命》、《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麦克

卢汉的学术转向》、《我们为什么离不开纸媒体和深度阅读：从纸媒体阅读到超文本阅读》、《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媒介环境学辨析——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二》、《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三》、《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媒介环境学评论之四》、《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破解史诗和口头传统之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评析》等。